

112  
D 508  
108  
1111111



中國經濟學叢書

陳長蘅著

三民主義與人口政策

商務印書館發行

1261301

C908  
C04

三民主義與  
社會政策

吳敬恆題



謀國者常憂于  
民生之不安  
易曰民故  
中先夫繼庶  
以養爲政之  
衡不有不給  
產有育之樂  
不福始名不  
其輩斯意甚  
時中有所節  
是甚明  
優生和乎進  
化  
乃近大平陳  
君  
所述義蓋本  
於  
先生也

民國十六年九月某日全研字漢成書

中山先生嘗云宋儒之所謂天  
理其實是人欲宋儒之所謂人  
欲其實是天理飲食男女是自然  
賦與之本性非天理而何道  
德人倫是人類智識進步文明

發展以後之所制作者非人欲  
而何先生對於天理人欲皆只  
認為事實而不加以概括的是  
非善惡之批評與荀卿人性本  
惡其為善者偽也之論畧有相  
似處偽是人為本無是非善惡  
之意合於人類公眾之利害則  
偽是善不合於人類公眾之利  
害則偽是惡天下之文明無一  
非人為則無一非偽而不能謂

地	義	先	持	文
權	剛	生	論	明
節	中	中	用	為
制	山	和	語	惡
資	先	之	皆	也
本	生	論	偏	惟
之	所	有	而	荀
根	以	別	不	卿
本	主	耳	全	性
理	張	明	與	惡
論	平	於	中	之
明	均	此	山	說

而	質	民	族	權
發	之	生	主	主
展	根	主	義	義
民	本	義	是	僅
族	理	是	民	為
之	論	族	生	一
量	亦	主	主	種
改	明	義	之	工
良	矣	體	體	具
民	余	之	而	者
族	常	用	民	意
之	云	民		猶

是	與	至		
也	人	詳		
陳	口	且	民	
伯	問	盡	國	
修	題	因	十	季
先	論	書	八	陶
生	展	所	年	載
著	富	見	九	傳
三	教	以	月	覽
民	之			
主	理	質		
義	法	高		
		明		

中國之民生主義之精  
在能以孔子所稱之庶  
富教之新為最富  
德理之民族主義既深  
以中國國力之無力以治力  
經濟力之三大壓迫而  
人口日就減弱貧苦憂如  
于主政煉後民族固足  
之精力以外不足之以民  
生之救養以植其在而  
善氏是善品之統善  
新念佳行之完人、  
之所需即社會之所以  
搏合而標通之在也英  
不於是守守守守守守  
之歷富者三三義以之新  
合其間也禮之通也同之  
說 德理之存者也其精

語也生人。不獨親其親  
而獨子其子使老者有所終  
壯者有所用幼者有所養  
死無廢疾者皆之所養  
如是則人孰不為道哉生  
伯修先生治民生之道子  
古書氏字人曰歸一而  
善其為仁生道生亦  
生統業同脈大區細入  
之教之修可居國中雖外  
批於道守窺書力結成  
在矣批善起廢也也特  
學術界之幸也

民國十一年歲次己未

沈君元帥



教養兼施為中國古代聖哲  
施改之通則是以孔子大同之  
說難博允粵倫而分植其初  
不外乎庶富教三義本黨  
總理孫中山先多祖述中國古  
代政治哲學之真詮採觀西  
洋近代社會學說之精粹  
剪裁以聰明睿知者為三民  
主義其民族主義一篇既注  
意於恢復民族精神民生主  
義一專於衣食住行之外復  
致意於樂育其志蓋在  
改善國民之品質養成優良  
之種族而不在此無條件的增  
加人口之指數信乎知矣  
關於人口之討論發端於柏拉

圖友亞里士多德至馬爾薩  
斯而或有組織有系統之學  
說其膾炙人口之人在論身  
得有不可動搖之根據使馬  
爾薩斯於人口增加之定率  
雖有精確之發明而於人口  
過剩之危險尚乏根本之救  
濟陳伯博同志探尋三民主  
義內在之根本精神並探討  
古先哲之政治學說希以近代  
之自然科學社會科學於是  
有生育革命之發明精心結  
撰實為最近學術界前所未  
有行見三民主義中之大行世  
界大同中之實現不禁歡喜  
讚嘆以之

民國十八年十月 日焦易李



上醫治國

劉瑞恆題



民生改革

馬寅初題



## 劉序

人口問題爲我國今日最重要問題之一，然國人注意及此者尙不多觀。全國戶口總數至今既無正確之統計，而利用片段之材料，作種種之推算者，反多爲外人。故聚訟紛紛，自三萬萬以至五萬萬，相差幾至一倍。而我國人士多沿用舊說，一若四萬萬之數爲天經地義，不可增減者。各省現雖舉行戶口清查，而既未遍及全國，方法又不能一致，其正確程度頗多疑問。政府欲確定人口政策，將何所根據；學者欲研究人口問題，又何所取材乎？故舉辦精確之戶口統計，以備政府與國人之參考，爲解決人口問題之第一步。國民生計窮迫，終日操勞，或尙不足以糊口，更遑論教育與文化。因貧而愚，因愚而更貧，生活劣陋，每下愈況。而其主要原因，則爲人口多而生產力小。查生產三要素——勞力，土地，資本——須有適當之配合，方能得最大之結果。三者之中，何項過剩，則其所得之報酬亦獨少。我國人多地少，資本尤形缺乏，故一人勞力之所得，乃至最小限度。美國適得其反，生活程度亦高於世界各國，故欲改進國民生計，必一方面限制人口之過分蕃殖，一方面獎勵資本之普遍增加，而後資本因供給多而利率日減，勞力因供給少而工資日增。且在生產中勞資配合之關係，有彼此互爲供求之勢，故資本多而勞力之需要亦多，因此更增高勞工之價值。反之，人口多則勞力之供給多，而工資必不免於低落。論者或誤會三民主義，以爲節制資本，應一概限制其增加；發展民族，應無條件獎勵其蕃殖。殊不知人口過盛而資本缺少，則勞工之生產力即隨之減少，而生計亦因日以蹙。勞工生計愈促，則資本家之勢力亦愈大。且民多而貧且愚，弱且昧，民

族自衛力量反因此削減，而帝國主義者之壓迫亦愈甚。是豈中山先生發展民族，節制資本之原意哉！故限制生齒之過繁，以提高國民之生活標準，為解決人口問題之第二步。尤重要者，我國民族之數量，雖居世界第一，而品質則不如歐美遠甚。不獨大多數人民智懸程度甚低，即勞力之功效率與歐美工人比較，亦墮乎其後。此與生活程度固有密切之關係，而不講優生實為重大原因。近代生物學者研究遺傳性至為精密，對於種族改良有種種之貢獻。我國處今日情勢之下，應一方面限制人口數量之增加，一方面實行優生政策。庶使國民之體魄與精神皆可日趨健全，而民族固有之道德能力，始可發揚光大。是為解決人口問題之第三步。吾友陳伯修先生，精心研究人口問題已十餘年，對於此項問題貢獻甚多。茲復以最近之心得，著為專書，而實余為序。余愧庸陋，不克闡發其精蘊，僅以平庸之說，稍釋人口問題之要義，聊以塞責而已。

## 葉序

我自從研究經濟學以來，即認為經濟問題推到究竟，不過是一個人口問題。我們要想建設一個健全的社會經濟，必須先將人口問題得到一個適當的解決。若對於人口問題毫不注意，而要想澈底解決各種經濟問題，真是「緣木求魚。」

上面一個結論，不是無根據的。經濟學原理告訴我們，牠是千真萬真。我現在先將所謂健全的社會經濟這個名詞解釋一下，讀者便明了人口和經濟的密切關係，也就可以明了人口問題的確是經濟問題的重心。

一個健全的社會經濟，自我個人看來，要有下面所說的一個特徵。就是：

人民的生產力除維持相當舒適的生活外，還可以從事於資本的構造；社會的生產力因此可以增進，生活標準因此可以提高，兩者累積地互為因果。

我們知道生產的方法有二：一種是間接的，一種是直接的。嚴格地說，直接的生產方法，是不用生產工具的。例如我們要喝水，親自跑到河邊或有水的地方，用手捧水喝，不用水桶，不用掘井，更不用自來水管。當然這種方法，祇是原始社會纔有，現在已絕對地不存在了。當然這種方法的效率，是很細微的。牠之所以被人們放棄，也就是這個原故。

因為直接的生產方法的效率小，所以人們先後都採用間接的生產方法。所謂間接的生產方法是指用生

產工具幫助人工而言。例如我們要想喝水，先從事掘井及製造水桶，或自來水管。這種生產方法的效率當然很大。但是比前一種較難。因為製造生產工具，必須有很多的剩餘勞力。而剩餘勞力，不是個人有的。請先言資本構造與剩餘勞力的關係。

一個社會所有的資本，大半都是過去的剩餘勞力之結晶。所以剩餘勞力愈多，資本之增加愈速。反之，資本愈多，剩餘勞力愈多。假設魯濱孫漂流到某荒島上，只有島邊魚類可供食料。他化了半日工夫打魚，即能供給全日食料。因此他總可以利用半日空閒工夫，造魚竿魚網魚船之類。換一句話說，若魯濱孫沒有半日的空閒工夫——他的剩餘勞力——他就不能構造那許多東西了。他的生產效率也就不能有所增進了。魯濱孫之所以能有剩餘勞力，有四個原因：一、天然富源，二、他能勤奮，三、他能不糜費有用工夫，四、他會打魚。不過還有個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為他毫無負擔。假使他現在有妻有子，兒女成羣，盡量繁殖。而他們又不肯能幫助他打魚。那末，魯濱孫的剩餘勞力就不如先前之多了。他就不能很容易地造魚竿魚網等類了。他的生產效率也就不能有所增進了。

個人如此，全民族何嘗不是如此。全民族經濟建設——資本構造——的條件，完全與個人一個樣兒。就是說，追到底也只有剩餘勞力一個條件。全民族的剩餘勞力也和個人一樣，靠住天然富源，勤儉和生產方法的改良。而最足妨礙剩餘勞力的一件事，就是人口過多，把大家的剩餘勞力都花在生育糊口和造亂上面去了。

當然我們不能否認人口衆多也有好處。如分工制度，生產組織，種種都是。不過這種好處，總有停止的時候。

換句話說，在未達到「收效漸減的定點」是可以的。若到了此點或過了此點就不行了。人口若仍繼續增加，則每一個人民的剩餘勞力必漸減少，就無力談經濟建設，而社會經濟也就漸漸地變為不健全了。

一個健全的社會經濟既是以剩餘勞力為關鍵，而剩餘勞力又以人口適當與否為關鍵。所以我常常感覺得經濟問題，說到底只有一個人口問題。我自從有了上面結論以後，就感覺得要救中國，非從人口方面着手不可。以我們現在的生產力而養這樣許多的人口，實在不夠。不然，中國何以變為這樣地困窮呢？我十年來遇著同意的朋友也不少，但是不明了我的理論的實在很多。我的朋友陳長蘅先生，近來把他的著作給我看，他的意見是與我大同小異，因為一個民族創造能力的大小，完全是總剩餘勞力的多寡的表現。要想維持總剩餘勞力的最大數量，——就是最大的生產力量或創造力量——便要維持一個最適宜的人口密度，纔能奏效。

我得了一個同志，是非常歡喜的。陳先生費了很多的工夫——他的寶貴的剩餘勞力——完成這部重要著作。他有了健全的理論，復輔以事實的證明。我大胆說：在這一類著作之中，他的書是首屈一指了。我相信到了這部著作受了社會注意的時候，就是說，到了大家都知道要從人口方面去解決社會經濟問題的時候，我們對於這個問題纔能够得到適當的和圓滿的解決。中國的國民生計和民族前途纔有安穩的和確實的保障。所以我很懇切的希望大家把我們的人口問題平心靜氣去仔細研討，因為人口問題是與全民族和各個個人都有關係，實在是值得我們的充分注意哩！

民國十九年二月葉元龍序

中山先生民族主義第六講第七段

現在各國的政治都進步了，祇有中國是退步的。何以中國要退步呢？就是因為受外國政治經濟的壓迫。推究根本原因，還是由於中國人不修身。不知道中國從前講修身，推到了正心誠意格物致知，這是把精密的智識，拿一貫的道理，這樣精密的智識和一貫的道理，都是中國固有的。我們現在要能夠齊家治國，不受外國的壓迫，根本上便要從修身做起。把中國固有的智識與道理，先恢復起來，然後我們的民族精神和民族地位，才可以恢復。

右錄中山演講引大學要義，注重修身。自國民五公僕堂是時，以修身為本，蓋必身修而後家齊國治，方能不受外國政治經濟之壓迫。細玩原義，深合大學之旨。是孔子大學之道，當時傳之曾子者，越二千六百餘年，又傳於中山先生革命精神，全在於此。以此而論，則國內大學學生，均宜體中山先生要義，大學一章，為度若他切實修身，痛將兼而進之。人才其學，術可以治，亦國制外國，而有餘。最近報載，美國鄂倫夏大學教授密勒氏，兼身考察中國，因問及後世，先者先謂中國國民，必以界人口四分之二，而有統一之文字，與孔子之倫理學說，以維繫社會，其能力之偉大，無可計量。安足以敵西方之物質主義，而抵抗一切外力之壓迫，將未利用物質文明，你推孔子之教，根本改觀，終必得最後之勝利。據此以證，中山先生引述大學之言，信而有徵。夫必有道者，中山深明大學，知止有得，知得九核之義，必先致知格物，而後能修齊治平。本此發明，知難行易之學說，認為修身的功夫，不但在道德範圍，而智識範圍，尤宜疏通而擴充之。世代進化，核茲精理，本無窮盡。愈拾愈發，愈發愈格。要以時中，正喜為止。此要言，果修身固本，損益之標準也。田中老農，依游有志，志遠，吾長壽尚能體中山道訓，纂述三民主義，壽為人口疏，某大旨，在維持適中，庶幾法重教養，係在位者，其理真知，提高民族，民智實為解決口問題，所必由之道。似與中山先生之主義學說，尚無背馳。抄索黨團先道，吳稚暉胡鳳堂戴季陶邵元沖，易堂諸先生，暨馬宮初劉六朝葉元龍諸學友之教，正賢同符，即以廣傳，俾海內明達，進而教之，幸甚。

民國十九年二月十四日三育堂主人陳國常謹書

於錦城石室時年六十有六



## 自序

美國哈佛大學經濟教授嘉佛爾在其近著經濟的世界及其如何改善一書中說道：

最大多數的經濟問題早遲總是融化成一種人口問題。經濟學生對於人口問題的態度，可大別為二種：一種是承認這個問題的重要，而努力去尋求真知。一種則抹殺一切顯明的事實，而視若無睹。此第二種的人們通常以為各種經濟原則，如人口增加原則，及土地收穫遞減原則等的發明，都是經濟學者用來阻礙社會進化的。但是他們何以不說重力原則的發明，也是物理學者用來阻礙航空進步的呢？經濟的原則，乃人類社會設計所必須承認而不能違反的事實。猶夫重力原則乃飛行設計所必須承認而不能違反的事實。凡否認重力原則的飛行設計必歸失敗，祇有對於重力原則充分注意的飛行設計纔能成功。凡否認人口原則的社會設計亦必歸失敗，祇有對於人口原則充分注意的社會設計纔能成功。其實自一七九八年馬爾薩斯的人口原理一書出版以來，一般有志之士，莫不以人口問題為討論社會改革的中心問題。馬氏原書的主旨可縮寫成一個最簡單的定律，即「一切生物，皆有增加到無以為養的趨勢。」這個定律在學術界曾發生最多的誤解。但現已確切證明在一定的文化階段，一定的生產技術，和一定的土地面積之下，這個定律均屬普遍適用。已無人能够否認了。

許多批評馬爾薩斯的人以為歐洲現在的人口遠較馬氏時代更為衆多，而食物則反較馬氏時代更為

豐富。可惜他們對於馬氏所舉出的兩個條件未曾注意。第一他們忘記了生產的技藝在馬氏以後一百三十年間曾有若干的進步。第二他們尤其是忘記了一種遠較重大的事實，即歐洲各民族自一七九八年以來，差不多把美國非各洲的民族及其他各地的民族原有之領土併吞殆盡。所以現在的歐洲人，較諸一七八年的歐洲人，是享有數倍的領土以供其食物業給和人口分布之用。此外還有一種重大的事實，厥為生育限制與父母責任心的提高。人類的婚姻乃是第一個最重要的節育機能。婚姻之所以可貴，在於把有責任的父母天職代替了無責任的父母天職。大凡無正式配偶的生物，恆較有正式配偶的生物繁殖更速。無責任的父母天職後發生更高的生育率，有責任的父母天職至少可以減低一部份的生育率。而且生活程度愈高的國家社會，其生育率尤次第減低。一因高生活程度的國家，人民結婚較遲，二因高生活程度的國家，人民更善於慮後。馬爾薩斯曾提倡用自由的民主制度，和普遍的國民教育，來提高一般人民及勞工的生活。今則此種主張，皆已次第實現。馬氏的人口原則可謂信而有徵云。（見 T. N. Garver & H. W. Lester: *This Economic World and How It May be Improved*, pp. 280-289.）

嘉氏這段話語，實屬甚有見地。十餘年前拙著中國人口論中曾指出歐美諸族裕國富民有三大要道：一為注重科學的研究發明，改良生產的藝術方法，以增加人民衣食住三者之需。二為兼弱攻昧，取亂侮亡。兼併既多，疆土既廣，乃移民而分布之，以富厚自族之生計。三為人口學說昌明，室家夫婦大都善於慮後，相率減低生育，使人口不至過分繁殖。此三者乃歐美人民日趨富厚之總因。著者當時之見解，正與嘉氏近著所舉出之三種事實

不謀而合。我們不能因為一個國家社會防範人口過庶的辦法逐漸成功，遂否認人口學家的「人口原則」之非真。猶夫不能因為人類有了航空的發明和人造蛇島的成功，遂否認物理學家的「重力原則」之非真。其實自歐戰初起，和歐戰以後，歐美學者對於人口問題的各種精深研究，均證明世界人口增加的速率之可驚，和感覺健全的人口政策之必要。我們產業落後，教育落後，文化落後，和民族積弱不競的中國，反而對於這個最重要最根本的問題，最不能充分注意，最不能充分了解，並且最不願意去研究人口增加的事實，和解決人口問題的健全政策。我們言念及此，不能不為我們民族前途危。戴季陶先生說得好：「中國今天在政治上的人們，或是永不讀書，或是讀一句書，喊一句口號。政治是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業，又豈是這樣所能成的，真可嘆呵！」

美國臥海約大學經濟教授臥爾夫說：「人口問題在實際上大半是一個社會心理問題。一國能否達到理性的適當人口生育率，全視人民全體的心理態度如何。倘能使大家充分了解人口與富源之最適宜的關係，而變更其心理態度。則過庶的危險，當可因以免除。所以祇要把中世紀時代禁止傳播節育知識的法律一概取消，則人口生育率便可降到最適宜的程度。」這段話語，實屬甚有見地。我們中國現在的人口問題所以積重難返，也大半由於錯誤的社會心理。大致一個閉關太久故步自封的民族，總是喜歡夜郎自大。一個不能關力更不能開智的民族，總是怕自己的人口不善。這兩種「妄自尊大」和「倚賴人多」的心理，完全是兵法所謂「不知己又不知彼，屢戰屢敗」的表徵。中國近百年來的外交，當初失之「誇大」，後來失之「怯弱」，當初有如井底之蛙，後來竟成驚弓之鳥，戰也失敗，和也失敗，都是為此。現時我們國人的這兩種病態心理是依然存在。所以一談

到人口問題，遂發生許多的誤解。不是「誇口人多」，就是「恐怕人少」。大家都不肯從培植實力方面去着想。其實無意識的自誇人口衆多，和無條件的助長人口繁殖，皆非國家種族前途之福。一個國家民族要想永遠適存於世界，不但要靠人口數量的優越，更是要靠人民品質的優越；二者不可得兼，寧可捨民數的優越而取民品質的優越。今後的民族競爭，不僅是要爭生存，尤其是要爭有意義的生存，和有價值的生存。大凡人口過庶的國家，橫逆的天災，和混亂的人禍，必層見迭出，相因而至。欲希望天擇健全行使，而不至玉石俱焚，殆為不可能之事。一國不能強良其種族於內，絕對不能共競生存於外。再就全世界人類着想，凡人口增加過速，必致召大規模的國際戰爭。在比較優強的各民族總能完全制勝，而種族的胚質則仍遭受重大的損失。因為戰勝國在戰場上的大批死亡，大都為種族中的強健分子。至於戰敗的國家，其民族自然遭受更大的鉅創，甚至陷於萬劫不復的慘狀。一因戰敗國在戰場上的損失，常較戰勝國的損失尤為重大。二因戰敗的結果常引起割地賠款及種種不平等條約之產生，故戰敗的國家縱不完全失其政治的獨立，而在國民的經濟上和國家的財政上則恆受多年的束縛箝制與蹂躪摧殘。三因此種國家戰敗所遭的直接間接兩種損失，既影響全國一般的國民經濟，遂致人民生計倍感困難，於是內亂迭興，外侮愈甚。如此循環下去，非弄到整個民族皆生計窮蹙，輾轉消沈以歸於盡不止。所以無論為民族自衛計，或為世界和平計，皆不宜主張無條件的增加人口。

我們再看前此古今中外的人類社會，都有很多理想的政治設計，理想的烏托邦，理想的大同世界，乃至於理想的天國。但是人類自有文字書契以來，差不多已有一萬年的歷史，何以這些理想的設計，都沒有完全實現

呢？我們籌源竟委，可以說：「都緣這些設計對於人口問題是完全沒有根本解決的方案。」一塊農田，如果不重種植疏密，不務芟蕪蘆葦，必定弄到野草蔓延，收穫不豐。一個公園，如果不講求花木的擇種留良，和樹藝的密度適宜，必定弄到荆棘叢生，如古利克塚一班。一個城市的設計，如果不預算人口的加多和注重衛生的設備，必定弄到病疫流行，人民的死亡率一年增高一年。一個國家民族如果不注意人口增加的理則，研究預防人口過庶的方法，講求淑種優生的塗術，而完全聽民自生自養，必定弄到文化衰敗，亂輪常轉，種族遭受慘酷的淘汰。我們祇要把現時世界諸邦的生育率和死亡率考察一下，就可以知道各自自由民族的生育和死亡率都久已次第減低，祇有各被壓迫民族的生育率和死亡率還是很高。這就是文化高低與民族具有遠識或沒有遠識的最好指數，和最好標誌。英國的統計學家曾經證明英國人民婚姻率的高低是和英國國際貿易的消長有關聯，我們也不難反過來證明我國不平等條約之產生與其所以難於廢除，是和我們國人及締約各國人民的結婚年齡與生育多寡皆有關係。我們這種議論，有些人或以為過於滑稽。但是一個民族如果大家都以「喫飯生小孩子和招呼朋友」為唯一的人生觀，最大多數皆完全不知道不平等條約之所由產生，與不平等條約何以要廢除，我們又何怪乎不平等條約之尚未廢除呢？

孫中山先生說：「凡真知特識，必從科學而來，捨科學而外之所謂知識者，多非真知識也。」著者以為我們今後對於中國的人口問題和世界的人口問題，總要平心靜氣，用科學的方法去研究探討。關於數量方面的人口問題，最好用一副理想的望遠鏡去觀察；關於品質方面的人口問題，最好用一副理想的顯微鏡去觀察。一個

民族總要能夠高瞻遠矚，「未雨綢繆」，「知己知彼」，「知往知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纔能夠永生。可惜中山先生天不假年，沒有把民生主義中的「生養」、「死葬」及「樂育」諸問題分別講完。實在我們同志國人的一個最大缺憾。著者本書之作，意在闡發中山先生的人口理論，研討我國的人口病態，和草擬易於實現三民主義的人口政策，以與國人商榷。並盡量介紹歐美學者對於人口問題的最新研究和最新理論，以供讀者之參考。我們仔細瀏覽中山全集，便知中山先生並未無條件的提倡增加人口，而且為憂慮中國人口過速的最先知最先覺。著者自信本書所擬定的人口政策乃建造三民主義的新國家所必要的條件，同時這種人口政策也祇有在三民主義之下纔能夠完全實現。全書命意雖與舊著中國人口論大致相同，而主張則更為積極，更為徹底，思想範圍更為擴大，內容亦比較豐富。惟全書均係夙興夜寐，忙中偷閒所作。信筆直書，無暇修飾，訛誤之處，知所不免。尙冀海內明達，隨時加以指正，是所至幸。

余草此書，約一閱寒暑，頗費相當心血。有些愛我的朋友聽見我寫這個題目，都為我擔憂，並勸我「小心一點」。但是我鑒於這個問題關係國人的福樂憂戚，國家的治亂安危，和種族的強弱盛衰，並且鑒於自我有生以來所耳聞目覩的禍患災難和內亂外憂，已不知道有多少；直到如今，中國仍是一個最為貧弱紛亂和最為水深火烈的國家。種種現象都使我感覺良心不安，不忍擱筆。著者服膺中山主義，不敢稍落人後。不過對於人口問題尤特別注意。自信本書對於中山先生的人口理論頗能發前人之所未發。並且深信本書所補充的人口政策乃「最為革命」的人口政策，乃「後來居上可以迎頭趕上歐美」的人口政策，乃「最能促進三民主

義的實現」的人口政策。著者以爲要在這種比較更爲科學的人口政策之下，我們將來所造成的三民主義的新國家纔能長治久安，萬世一系，永遠不再改朝換代。洪亮吉說：「人未有不樂於爲治平之民者也，亦未有不樂於爲治平既久之民者也。」所以我們相信大家都喜歡大同世界能够早日實現，甚至於遠過去的保皇黨首領也做過「大同世」的迷夢。本書原來也想定名爲「達到大同世必由之路。」後來因爲去年冬間在上海書坊裏頭偶然看見朱謙之先生已經出了一本書叫做「到大同之路」，爲避免「商標」雷同，特改今名。著者覺得我們要達到「有饑饉災荒的大同（譬如山西的大同）」是非常容易。要達到「無饑饉災荒的大同」便非常困難。本書所再三致意的是要達到一個「無饑饉災荒的大同世界。」所以著者的見解是和一般僅讀過中山先生一部份人口理論之人大不相同。孟子說：「聖人復起，不易吾言。」孔子說：「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知我罪我，著者皆所不計。惟一本中山先生「行易知難」的遺教去尋求真理真知，以免「自惑以惑人」，并略盡「不獨親其親子其子」之義務天職而已！

本書屬稿，內子王俊英女士贊助頗多。並承陳華寅先生、朱仲梁先生、朱景文先生、孫公度先生、陳其鹿先生、童季齡先生、胡適之先生、喬啟明先生及卜凱先生借給一部份參考資料；黃松庵先生、陳慰農先生、蔡遐長先生分任校對。書成，復蒙吳稚暉先生、胡展堂先生、戴季陶先生、邵翼如先生、焦易堂先生、劉月如先生、馬寅初先生、劉季陶先生、葉元龍先生，親爲題署或賜序，付印之時李伯嘉先生、劉南陔先生、何柏丞先生，亦有所協助。謹誌於此，以表謝忱。又著者少時束髮讀書，家嚴卽以三育垂訓。自別家山，已十有九年。國步艱難，蜀尤未治。每奉親命，常教

以國事爲重，家事次之，宜移孝作忠，不必歸省。現時兩親均已年近古稀，尙稱雙慶。但著者春暉未報，負咎實多。故此書脫稿之時，特稟請家嚴恭錄中山先生演講一段，並題跋數語，以彰令德而資取法云爾。

中華民國十八年十二月三十日，自序於南京公園路西方寺別墅

# 三民主義與人口政策

## 目錄

第一章 中山先生人口理論的總分析	一
一 中國人口問題的急要	一
二 中山先生對於中國人口問題的重要理論	二
三 對於中山先生人口理論的總分析	二六
第二章 人口問題爲澈底實現三民主義的先決問題	三四
一 解決人口問題爲實現三民主義的必要條件	三四
二 對於國內樂觀派人口論著的簡略批評	三八
三 中國現時人口過庶的表徵和健全人口政策的需要	四三
第三章 中國人口總數的新推測	五四
一 中國的人口總數果真祇有三萬萬嗎	五四
二 最近人口繼續增加的左證與全國人口的新推測	六五

## 第四章 如何維持「超出物種原則」的人口密度……………八四

一 人口最易過庶的根本原因……………八四

二 人口增加能夠如何迅速……………八七

三 時中的人口密度與普遍的生育革命……………九〇

四 貧人是否也應犧牲一點生存權……………九四

五 要使人類進化「超出物種原則」當首先化除由物種遺傳下來的繁殖方法……………一〇四

## 第五章 人口密度與人生標準……………一〇八

一 時中的人口密度為提高人生標準的必要條件……………一〇八

二 時中的人口密度與物質革命和教育革命……………一一三

三 時中的人口密度與耕者有其田……………一二一

## 第六章 關於品質方面的人口政策……………一二三

一 人口數量與品質之相互關係……………一二三

二 時中的人口密度為行使健全選擇之必要條件……………一四〇

三 人口過庶與中國民族的橫逆淘汰……………一四六

四 普遍的生育革命為改良種族品質及減免人口壓迫的最要法門……………一五二

第七章	自然環境與種族進化之關係	一六二
一	人類種族生存進化的必要因素	一六二
二	自然環境與種族進化之關係	一六三
三	自然環境對於種族進化的勢力影響	一六六
第八章	遺傳優劣與種族進化之關係	一八六
一	種族進化爲人類之最高目的	一八六
二	天賦的不平等與人種改良之可能	一八九
三	遺傳的理則和遺傳的工具	二〇八
四	優生學的真正目標和真正使命	二一五
第九章	習傳良窳文化優劣與種族進化之關係	二二三
一	習傳的性質和種類	二二三
二	改進習傳提高文化爲維持種族進化的必要條件	二三一
三	三民主義指導之下的基本建設	二三三
第十章	生育革命的積極意義博愛精神和科學基礎	二四八
一	普遍的生育革命可免除國際競爭焦點齊一國際文化進差以促進世界的大同	二四九

- 二 普遍的生育革命可以減少苦樂時差苦樂地差和苦樂人差以增高人生的價值和人類的幸福……………二五七
  - 三 普遍的生育革命可以減少苦樂性差和男女數差以維持兩性的數量平衡及增進兩性的共同幸福……………二六三
- 第十一章 生育革命的具體方案與政府應有的指導設施……………二七八**
- 一 取種宗法式的早婚和納妾……………二七九
  - 二 實行一枝花和二枝花制……………二八七
  - 三 生育革命應以政府為主要訓導保育機關……………三〇四
- 第十二章 結論……………三一二**
- 一 生育革命與種族前途……………三二三
  - 二 達到大同世界必經之階段與必由之正路……………三二〇

# 三民主義與人口政策

## 第一章 中山先生人口理論的總分析

### 一 中國人口問題的急要

中國的人口問題，是現在全世界最重大而且最急要的人口問題。因為這個問題是非常重大而且非常急要，所以孫中山先生在他畢生的著作或演講裏頭，也曾提到好幾次；並且有很詳細的討論說明，和很周密的解決方案。這個問題是甚麼呢？簡單說來：就是我們全中華民族的生存問題，就是三民主義的中心問題，也就是全世界被壓迫民族起死回生的總關鍵。論全世界的人口，亞洲佔了過半數。論亞洲的人口，中國佔了小半數。論全球的面積，亞洲不及三分之一。論亞洲的面積，中國又僅佔四分之一。所以要使世界被壓迫的各民族能夠翻身，就要先使亞洲被壓迫的各民族能夠翻身。要使亞洲被壓迫的各民族能夠翻身，又要先使被壓迫的中國民族能夠翻身。中山先生是承認我們中國今日人口過庶的最先知最先覺。他在三十六年前上書李鴻章的時候

就說道：「今日之中國已大有人滿之患，其勢岌岌不可終日。嗷嗷之衆，何以安此？不急挽救，豈能無憂？」並且他在幼年十二三歲的時候，就覺得中國人民死守着賣兒鬻女，妾妾，拜偶像，纏足，和別的種種不合理的舊俗，都是因爲沒有一個領袖去引導他們脫離這種風俗的範圍。他少時就有天賦的本能，教他知道中國舊俗並不都是好的。（見中山全集中孫逸仙傳記第十二及十三兩章。）他畢生事業，更是完全致力於三民主義，以求中國國家民族的根本解放，和中國人口問題的根本救濟。可惜我們多數的國人對於中國人口問題與國家民族前途的種種關係，迄今尙未能充分注意。假定考試院出一個題目叫大家「試述中山先生對於中國人口問題的意見」，恐怕沒有一個人能作一個圓滿的答案。甚至許多根據中山先生的人口理論去著書立說來討論中國人口問題的人，也大都一知半解，未窺全豹，遂致所得的結論多偏而不全。著者鑒於這個問題十分重要，十分緊急，而又很不容易解決，並且覺得國人對於中山先生的人口理論固未充分認識，且對於現時中國的人口狀況與歐美諸邦的人口狀況，以及今後的趨勢，和解決的方法，亦多未詳加探討。是以不揣淺陋，試述三民主義與人口政策。

## 二 中山先生對於中國人口問題的重要理論

欲明瞭中山先生對於中國人口問題的意見，不可不將中山全集中所有關於人口的理論加以整個的分析。著者謹按中山先生的人口意見，在民國十三年以前皆按四萬萬立論，有時並言中國人口總數或不至此數。

自十三年起至路過日本之時止約十一個月之中所發表的言論，始有一重要部份係根據英國前駐華公使樂克里耳及其他外國學者之意見，改按三萬萬或三萬萬一千萬立論。茲爲便於研究及便於讀者參考起見，特將中山先生關於中國人口問題所發表之重要理論摘要彙錄如左：

(一)「富強之本，不盡在於船堅炮利，墨固兵強，而在於人能盡其才，地能盡其利，物能盡其用，貨能暢其流。人能盡其才，則百事興。地能盡其利，則民食足。物能盡其用，則材力豐。貨能暢其流，則財源裕。此四者，富強之大經，治國之大本也。……所謂人能盡其才者，在教養有道，鼓勵以方，任使得法也。教養有道，則天無狂生之才。鼓勵以方，則野無擊抑之士。任使得法，則朝無倖進之徒。……所謂地能盡其利者，在農政有官，農務有學，耕耨有器也。農政有官，則百姓勤。農務有學，則樹畜精。耕耨有器，則農力省。夫水患平矣，水利興矣，荒土闢矣，而猶不能謂之地無遺利而生民養民之準備也。蓋人民則日有增多，而土地則不能以日廣也。倘不日求進益，日出新法，則荒土既盡之後，人民之溢於地者，不將又有饑饉之患乎？是在急興農學，講求樹畜，速其長植，倍其繁衍，以彌此憾也。……所謂物盡其用者，在窮理日精，機器日巧，不作無益以害有益也。窮理日精，則物用足。機器日巧，則成物多。不作無益，則物力節。……所謂貨能暢其流者，在關卡之無阻難，保商之有善法，多輪船鐵道之載運也。無關卡之阻難，則商賈願出於其市。有保商之善法，則殷富亦樂於賈運。多輪船鐵道之載運，則貨物之盤費輕。如此而貨有不暢其流者乎？」

「蓋今日之中國，已大有入滿之患矣。其勢岌岌不可終日。上則仕途壅塞，下則游手而聚，嗷嗷之衆，何以安

此明之闖賊，近之髮匪，皆乘機之餘，因人滿之勢，遂至潰裂四出，爲毒天下。方今伏莽時聞，災荒頻見，完善之地，已形覓食之艱；凶殘之區，難免流離之禍。是豐年不免於凍餒，而荒歲必至於死亡。由斯而往，其勢必至日甚一日。不急挽救，豈能無憂？夫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不足食，胡以養民？胡以立國？是在先養而後教。此農政之興，尤爲今日之急務也。」（見民國紀元前十八年上李傅相書。）

（二）「中國積弱，至今極矣！有志之士，能不痛心。夫以四百兆人民之衆，數萬里土地之饒，本可發奮爲雄，無敵於天下。乃以政治不修，綱維敗壞，朝廷則鬻爵賣官，公行賄賂；官府則剝民括地，暴過虎狼。盜賊橫行，饑饉交集。哀鴻遍野，民不聊生。嗚呼！慘哉！方今強鄰環列，虎視鷹瞵，蠶食鯨吞，已效尤於鹽接，瓜分豆剖，實堪慮於目前。嗚呼！危哉！……識時賢者，能無責乎？故特聯絡四方賢才志士，切實講求富國強兵之學，化民成俗之法，方爲推廣，曉諭愚蒙，務使舉國之人，皆能通曉。聯智愚爲一心，合遐邇爲一德，羣策羣力，投大遺艱，則中國雖危，庶可救挽。所謂「民爲邦本，本固邦寧」也。……擬辦之事務，須利國益民者，方能行之。如設報館以開風氣，立學校以育人材，興大利以厚民生，除積弊以培國脈等事，皆當惟力是視，逐漸推行。必使吾中國四百兆生民，各得其所，方爲滿志。」（見興中會宣言及會章。）

（三）「中國四萬萬之衆，等於一盤散沙。此豈天生而然耶？實異族之專制有以致之也。在滿清之世，集會有禁，文字成獄，偶語棄市，是人民之集會自由，出版自由，思想自由，皆已削奪淨盡。至二百六十餘年之久，種族不至滅絕，亦幸矣。豈復能期其人心固結，羣力發揚耶？今後民國前途之安危若何，則全視民權發達之如何耳。以我四

萬萬優秀之民族，若一心一德以圖富強，十年之後，必能駕歐美而上之。四萬萬同胞行哉勉之。」（見民國六年二月民權初步自序。）

（四）「我中國地大物博與美國同，勞力之人工，則四倍於美國，主顧之社會，我亦四倍於美國。我國所欠缺者，資本也，才能也。然則欲圖中國實業之發展者，所當注意之問題，即資本與人才而已。……吾國既有天然之富源，無量之工人，極大之市場，倘能利用歐美戰後之機器與人才，則數年之後，吾國實業之發達，必能並駕歐美矣。」（見民國八年論中國實業當如何發展。）

（五）「地方自治之範圍，當以一縣為充分之區域。如不得一縣，則聯合數村，而附有縱橫二三十里之田野者，亦可為一試辦區域。其志向當以實行民權民生兩主義為目的。故其地之能否試辦，則全視該地人民之思想智識以為斷。若自治之鼓吹已成熱，自治之思想已普遍，則就下列之六事試辦之，俟收成效後，陸續推及其他。其事之次序為：（1）清查戶口，（2）立機關，（3）定地價，（4）修道路，（5）墾荒地，（6）設學校。」

（1）清查戶口 不論土著或寄居，悉以久居是地者為準；一律造冊，列入自治之團體，悉盡義務，同享權利。……地方之人，有能享權利而不必盡義務者，其一，則為未成年之人，或以二十歲為準，或以十八歲為準，隨地所宜，立法規定之。此等人悉有享受地方教育之權利。其二，為老年之人，或以五十歲為準，或以六十歲為準，隨地所宜，立法規定之。此等人享受地方供養之權利。其三，為殘疾之人，有享受地方醫治供養之權利。其四，為孕婦，於孕育期內，免一年之義務，而享有地方供養之權利。其餘之人，則必當盡義務，乃得享權利，不盡義務者，停止一切

權利。故於清戶口時，須分類登記之。每年清理一次，註明變更，列入年冊。

(2) 立機關 戶口既清之後，便可從事於組織自治機關。凡成年之男女，悉有選舉權，創制權，複決權，罷官權。而地方自治草創之始，當先施行選舉權，由人民選舉職員，以組織立法機關並執行機關。執行機關之下，當設立多少專局，隨地方所宜定之。而其首要在糧食管理局。量地方之人口，儲備至少足供一年之糧食。地方之農產，必先供足地方之食，然後乃准售之外地。……其餘「衣」「住」「行」三種需要之生產製造機關，悉當歸地方之支配，逐漸設局管理。(下略)

(3) 定地價 其法以地價之百分抽一為地方自治之經費。地價隨地主之報多報少，所報之價，則永以為定。此後凡公家收買土地，悉照此價，不得增減，而此後所有土地之買賣，亦由公家經手，不能私相授受。原主無論何時，只能收回此項所定之價，而將來所增之價，悉歸地方團體公有。如此則社會發達，地價愈增，公家愈富。由衆人所用之勞力以發達之結果，其利益亦衆人享有之，不平之土地壟斷，資本專制，可以免却。(下略)

(4) 修道路 吾人欲由地方自治，以圖文明進步，實業發達，非大修道路不為功。道路宜分幹路支路兩種。幹路以同時能往來通過兩輛自動車為度。此等車路宜縱橫遍布於境內，並連接於鄰境。築路之後，宜分段保管，時時修理，不使稍有損壞。如地方有水路交通，亦宜時時修理保存，無使稍有積滯，務期水路交通，衆行並到。

(下略)

(5) 墾荒地 荒地有兩種。其一，為無人納稅之地。此等荒地，當由公家收管開墾。其二，為有人納稅而不

耕之地。此種荒地，當科以值百抽十之稅，至開耕完竣為止。如三年後仍不開墾，則當充公。由公家開墾。凡山林，沼澤，水利，礦場，悉歸公家所有，由公家管理開發。開墾後支配之法，亦分兩種：其為一年收成者，如植五穀菜蔬之地，宜租與人民自種；其數年或數十年乃能收成者，如森林果藥等地，宜由公家管理。開墾之工事，則由義務勞力為之。（下略）

（6）設學校 凡在自治區域之少年男女，皆有受教育之權利。學費，書籍，以及學童之衣食，當由公家供給。學校之等級，由幼稚園而小學，而中學，當陸續按級而登，以至大學而後已。教育少年之外，當設公共講堂，書庫，夜學，為年長者養育智識之所。……學校之目的，於讀書，識字，學問，智識之外，當注重於雙手萬能，力求實用。凡能助雙手生產之機械，我當仿造，精益求精，務使我能自造，而不依賴於人。必期製造精良，實業發達，此亦學校所有事也。學校者，文明進化之泉源也。必學校立，而後地方自治乃能進步，故於衣食住行四種人生需要之外，首當注重於學校也。（見地方自治開始實行法。）

（七）「中國職員廣大，人民衆多，比較日本還難，何止數十倍。但是幅員雖大，人民雖衆，祇可稱是一個半獨立國罷了。講到五族底人數，藏人不過四五百萬，蒙古人不到百萬，滿人祇數萬，回教雖衆，大多數卻是漢人。講到五族的地位，滿洲是處於日本的勢力範圍之內，蒙古向來是俄國的範圍，西藏幾乎成了英國的囊中物。由此可見他們都沒有自衛的能力，我們漢族應該要幫助他們才是。漢族向來號稱四萬萬，或者還不止此數。用這樣多的民族，還不能夠真正獨立，組織一個完全漢族的國家，這實在是我們漢族莫大的羞恥」（見民國十八年六

月對國民黨特設辦事處講演。）

〔七〕「從前帝國時代四萬萬人都是奴隸。現在民國時代，大家都是主人翁。這就是民國和帝國不同的地方。」（以上見民國十年十二月三民主義爲造或新世界之工具演說詞。）

〔八〕「今日所抱改造新世界之希望，非徒保民而已。舉凡救民養民，亦當引爲國家之責任。」（以上見民國十一年一月軍人精神教育演說詞。）

〔九〕「我們這次把滿清推翻，改革專制政體，變成共和，四萬萬人都享有主權來管理國家大事，這便是古人所說的公天下。這項公天下的道理，便是三民主義中第二項的民權主義。」（見民國十二年二月打破舊思想要用三民主義演說詞。）

〔十〕「宣傳的工夫，就是以黨治國的第一步工夫。到了四萬萬人都受過了本黨的宣傳，四萬萬人的心理便要歸化本黨，本黨便可實行以黨治國。」（見民國十二年十月黨員不可存做官心調詞。）

〔十一〕「國家是人類湊合而成。人人都有機會可以造成一個好國家。我們要造成一個好國家，便先要人人有好人格。我們要開政治的人，想中國改良成一個好國家，便是想得有一個機會，合四萬萬人都變成好人格……諸君自然知道中華民國和中華帝國不同。帝國是以皇帝一個人爲主，民國是以四萬萬人爲主。我們要想是真正以人民爲主，造成一個蘊乎萬國之上的國家，必須要國家的政治，做成一個全民政治……兄弟所希望於諸君的，是要諸君轉教全國的人民，怎麼樣分縣自治。如果一千六百多縣，縣縣都可以自治，中華民國便自然

成立。如果全國的人民不能自治，總是要靠官治，中華民國便永遠不能成立。所以我現在相信建設民國，不是完全從上面做得到的。以後建設民國，還是要從下面做起來。」（見十二年十月國民要以人格救國演說詞。）

〔十二〕「我們中國人現在的痛苦，每日生活，至少總有三萬萬人，朝不保夕，愁了早餐愁晚餐，所以中國是世界上最窮弱的國家……現在的中國，不但是最貧弱的國家，並且是最愚蠢的國家。」（見十二年十二月學生要立志做大事不可做大官。）

〔十三〕「現在我們的國家自從光復以後，成立了中華民國，這個民國，便是我們的國家。當中的國民有四萬萬：一半是男人，一半是女人。就是四萬萬人之中，有二萬萬是女人。從前滿人做皇帝的時候，不但是女子不能問國事，就是男子對於國事，也不能過問。經過革命以後，才大家都有份，大家都可以問國事。推究大家可以問國事的來歷，還是由於我們主張三民主義實行革命的原故。所以大家要問國事，便要明白三民主義和實行三民主義。這便是諸君對於國家應該負的責任。」（見十三年四月女子要明白三民主義演說詞。）

〔十四〕「我們中國人數有四萬萬，向來雖愛和平，但是為生死的問題當然是要奮鬥的，當然有很大的武力。如果亞洲民族全聯合起來，用固有的武力，去和歐洲人講武，一定是有勝無敗的。更就歐洲和亞洲的人數來比較：中國有四萬萬人，印度有三萬五千萬，緬甸、安南、木蘭由共有幾千萬，日本一國有幾千萬，其他各弱小民族有幾千萬。我們亞洲人數佔全世界的人數要過四分之一。歐洲人數不過四萬萬。我們亞洲全部的人數有九萬萬。用四萬萬人的少數來壓迫九萬萬人的多數，這是和正義人道大不相容的。反乎正義人道的行為，終久是要

失敗的！」（見十三年十一月大亞洲主義講演詞。）

〔十五〕「說到中國人數，向來都是號稱四萬萬。但是真正的戶口冊總沒有調查清楚。……大家常聽得說中國有四萬萬人。但照我按最近各國科學家同宗教家對於中國人口精確的調查，前二年祇有三萬一千萬，去年不足三萬萬。在從前各國教士同科學家調查中國人口，確有四萬萬。何以從前的人數有四萬萬多，近年便減少到三萬一千萬，到去年便更形減少，連三萬萬的數目也是不足呢？何以在這十幾年中，便減少了一萬萬？在前一年之中，便減少一千多萬呢？我們人口這樣減少，真是可驚可怕這樣可驚可怕的事，是受甚麼大影響呢？我看起來，最大的影響，是受國內的變亂。以後內亂如再不停止，全國人口當更要減少。推其極端，真有亡國滅種之憂！這就是「民生主義」中的一個大問題。我們要中國前途不至亡國滅種，便要趕快解決這種民生問題！中國近來人口死亡，不止是戰爭。在戰場中死亡的人數，最多不過十萬，其餘大多數的死亡，都是在戰場附近凍死餓死，或受其他各種兵災的影響，生活不遂而死。我們要和平統一，防止亂源，就是救亡的最重要問題！」（見十三年十一月國民會議為解決中國內亂之法演說詞。）

〔十六〕「中國現在是做十幾個的殖民地，不是一個獨立的國家。中國的地位，比殖民地還要低一級，可以叫做次殖民地。說到我們的領土，要大過美國。我們的人民有四萬萬，要多過美國。美國是現在世界上頂富頂強的國家。我們中國有這樣大的領土，和這樣大的民族，還不能成一個獨立的國家。推到這個原因，雖然很多，最主要的，就是受那些不平等條約的壓迫。」（見十三年十一月日本應助中國廢除不平等條約演說詞。）

〔十七〕「就中國的民族說，總數是四萬萬人。當中參雜的，不過幾百萬蒙古人，百多萬滿洲人，幾百萬西亞人，百幾十萬回教之突厥人；外來的總數，不過一千萬人。所以就大多數說：四萬萬中國人，可以說完全是漢人，完全是一個民族。我們這種民族，處現在世界上，是甚麼地位呢？用世界上各民族的人數比較起來，我們人數最多，民族最大，文明教化有四千多年，也應該和歐美各國並駕齊驅。但是中國的人，只有家族和宗族團體，沒有民族的精神。所以雖有四萬萬人結合成一個中國，實在是一片散沙。弄到今日，是世界最貧弱的國家，處國際中最低下的地位。如果再不留心提倡「民族主義」，結合四萬萬人成一個堅固的民族，中國便有亡國滅種之憂。我們要挽救這種危亡，便要提倡「民族主義」，用「民族精神」來救國！」

「我們現在把世界人口的增加率，拿來比較一比較：近百年之內，在美國增加十倍，英國增加三倍，日本也是三倍，俄國是四倍，德國是兩倍半，法國是四分之一。這百年之內，人口增加許多的原故，是由科學昌明，哲學發達，衛生的設備，一年比一年完全，所以減少死亡，增加生育。他們人口有了這樣增加的迅速，和中國有甚麼關係呢？用各國人口的增加數，和中國的人口來比較，我覺得毛骨聳然！譬如美國人口，百年前不過九百萬，現在便有一萬萬多。再過一百年，仍然照舊增加，當有十萬萬多。中國人時常自誇，說我們人口多，不容易被人消滅。在元朝入主中國以後，蒙古民族不但不能消滅中國人，反被中國人同化。滿洲人征服中國，統治二百六十多年，滿洲民族也沒有消滅中國人，反為漢族所同化。許多學者便以為縱讓日本人或白種人來征服中國，中國人祇有吸收日本人或白種人的，中國人可以安心罷。殊不知百年之後，美國人口可加多到十萬萬，多過我們人口兩倍半。如

果美國人來征服中國，那麼百年之後，十個美國人中，只參雜四個中國人，中國人便要與美國人所同化。諸君知道中國四萬萬人，是甚麼時候調查得來的呢？是滿清乾隆時候調查得來的。乾隆以後，沒有調查。自乾隆到現在，將及二百年，還是四萬萬人。百年之前是四萬萬，百年之後當然也是四萬萬。法國因為人口太少，獎勵生育；但法國人口並不減少。不過他們的增加率，沒有別國那一樣大罷了。

「我們的人口到今日究竟有多少呢？增加的人數，雖然不及英國日本，但自乾隆時算起，至少也應該有五萬萬。從前有一位美國公使，叫做樂克里耳，到中國各處調查，說中國的人最多不過三萬萬。我們的人口到底有多少呢？在乾隆的時候，已經有四萬萬。若照美國公使的調查，則已減少四分之一。就是說現在還是四萬萬，以此類推，則百年之後，恐怕仍是四萬萬！」

「日本人口，現在有了六千萬，百年之後，應該有二萬萬四千萬。因為在本國不能生活，所以現在便向各國覬覦，說島國人口太多，不能不向外發展。向東走到美國，加利佛尼亞省便閉門不納。向南走到澳洲，英國人說澳洲是白色人的澳洲，別色人種不許侵入。日本人因為到處被人拒絕，所以便向各國說情，說日本人無路可走，所以不能不經營滿洲，高麗。各國也明白日本人的意思，便容納他們的要求，以為日本殖民到中國，於他們本國沒有關係。」

「一百年之後，全世界人口，一定要增加好幾倍。就現在全世界的土地與人口比較，已經有了人滿之患。像這次歐洲大戰，便有人說是「打太陽」的地位。中國是全世界氣候最溫和的地方，物產頂豐富的地方。各國人

所以一時不能來吞併的原因，是由他們的人口和中國的人口比較，還是太少。到一百年以後，如果我們的人口不增加，他們的人口增加得很多，他們便用多數來征服少數，一定要併吞中國。到了那個時候，中國不但是失去主權，要亡國。中國人並且要被他們民族所消化，還要滅種。

「自古以來，民族之所以興亡，是由於人口增減的原因很多，此為天然淘汰。人類因為遇到了天然淘汰力，不能抵抗，所以古時有很多的民族，和很有名的民族，在現在人類中，都已經絕迹了。我們中國的民族也很古，自開始至今，至少必有五六千年。當中受過了許多天然力的影響。遺傳到今日，天不但不來銷滅我們，並且還要令我們繁盛，生長了四萬萬人。和世界的民族比較，我們還是最多最大的。所以一般樂觀的人，以為中國民族，從前不知經過了多少災害，至今都沒有滅亡，以後無論經過若何災害，是決不至滅亡的。這種論調，依我看來，是不對的。因為就天然淘汰力說：我們民族，或者可以生存。但是世界中的進化力，不止一種天然力，是天然力和人為力混合而成。這種人為的力，最大的有兩種：一種是政治力，一種是經濟力。這兩種力關係於民族興亡，比較天然力還要大。我們民族處在今日世界潮流之中，不但是受這兩種力的壓迫，並且深中這兩種力的禍害了！

「中國幾千年以來，受過了政治力的壓迫，以至於完全亡國，已有了兩次：一次是元朝，一次是清朝，但是這兩次亡國，都是亡於少數民族，不是亡於多數民族。那些少數民族，總被我們多數民族所同化。所以中國在政權上，雖然亡過了兩次，但是民族還沒有受過大損失。至於現在列強民族的情形，便和從前大不相同。一百年以來，列強人口增加到很多。照已往一百年內的增加，推測以後一百年的增加，我們民族在一百年以後，無論所受的

天運怎麼樣深厚，就很難和列強的民族並存於世界。到百年之後，我們的人口便變成了少數，列強人口便變成了多數。那時候中國民族，縱然沒有政治力和經濟力的壓迫，單以天然進化力來推論，中國人口便可以滅亡。況且在一百年以後，我們不但是要受天然力的淘汰，並且要受政治力和經濟力的壓迫。此兩種力比較天然力，還要快而且烈。天然力雖然很慢，也可以銷滅很大的民族。政治力和經濟力比較天然淘汰力還要更快，更容易銷滅很大的民族。此後中國民族，如果單受天然力的淘汰，還可以支持一百年。如果兼受了政治力和經濟力的壓迫，就很難渡過十年。故在這十年之內，就是中國民族的生死關頭。如果在這十年以內，有方法可以解脫政治力和經濟力的壓迫，我們民族還可以和列強的民族並存。如果政治力和經濟力的壓迫，我們沒有方法去解脫，我們的民族，更要被列強的民族所銷滅。縱使不至於全數滅亡，也要被天然力慢慢去淘汰。故此後中國民族，同時受天然力、政治力、和經濟力的三種壓迫，便見得中國民族生存的地位非常危險。

「中國近來一百年以內，已經受了人口問題的壓迫。中國人口總是不加多，外國人口總是日日加多。現在又受政治力和經濟力一齊來壓迫，我們同時受這三種力的壓迫，如果再沒有辦法，無論中國領土是怎麼樣大，人口是怎麼樣多，百年之後，一定是要亡國滅種的。我們四萬萬人的地位是不能萬古長存的。所以我們覺得政治壓迫的利害，還要曉得經濟的壓迫更利害。不能說我們有四萬萬人，就不容易被人銷滅。因為中國幾千年以來，從沒有受過這三種力量一齊來壓迫的。故為中國民族的前途設想，就應該要設一箇甚麼方法，去打消這三種力量。」

「黑進化論中的天然公例說：適者生存，不適者滅亡。優者勝，劣者敗。我們的民族到底是優者呢？或是劣者呢？是適者呢？或是不適者呢？現在我們民族處於很為難的地位，將來一定要滅亡。所以滅亡的原故，就是由於外國人口增加，和政治經濟三箇力量一齊來壓迫。我們現在所受政治力、經濟力兩種的壓迫已達極點。惟我們現在的民族還大，所受外國人口增加的壓迫，還不容易感覺。要到百年之後，才能感覺。我們現在有這樣大的民族，可惜失去了「民族思想」，因為失了「民族思想」，所以外國的政治力和經濟力，才能打破我們。如果「民族思想」沒有失去，外國的政治力和經濟力一定打不破我們。」

「現在世界上所有的人數，大概在十五萬萬左右。在這十五萬萬人中，中國占了四分之一。就是世界上每四箇人中，有一箇中國人。歐洲所有白種民族的人數，合計起來，也是四萬萬。現在世界上民族最發達的是白人。我們今日要把中國失去的「民族主義」恢復起來。用此四萬萬人的力量，為世界上的人打不平，這才算是我們四萬萬人的天職。」

「歐洲所以駕乎我們中國之上的，不是政治哲學，完全是「物質文明」。因為他們近來的「物質文明」很發達，所以關於人生日用的衣食住行種種設備，都非常便利，非常迅速。關於海陸軍的種種武器毒藥，也非常完全，非常猛烈。所以有這些新設備和新武器，都是由於科學昌明而來的。說到歐洲的科學發達，「物質文明」的進步，不過是近來二百多年的事。在數百年前，歐洲還不及中國。我們現在要學歐洲，是要學中國沒有的東西。中國沒有的東西是科學，不是政治哲學。至於講到政治哲學的真諦，歐洲人還要求之於中國，去補救他們科學

之偏。「世界主義」在歐洲是近世才發表出來的，在中國二千多年以前，便老早現過了。我們固有的文明，歐洲人到現在還看不出來。不過講到政治哲學的世界文明，我們四萬萬人從前已經發明了很多。就是講到世界大道德，我們四萬萬人也是很愛和平的，但是因為失了「民族主義」，所以固有的道德文明，都不能表彰，到現在便退步。至於歐洲人現在所講的「世界主義」，其實就是有強權無公理的主義，美國話所說的「能力就是公理」就是以打得勝的為有理。中國人心理，向來不以打得為然，以講打的就是野蠻。這種不講打的好道德，就是「世界主義」的真精神。我們要保守這種精神，擴充這種精神，是用甚麼做基礎呢？是用「民族主義」做基礎。像俄國的一萬萬五千萬人，是歐洲「世界主義」的基礎，中國四萬萬人，是亞洲「世界主義」的基礎。有了基礎，然後才能擴充。所以我們以後要講「世界主義」，一定要先講「民族主義」。所謂「欲平天下者，先治其國」，把從前失去了的「民族主義」，從新恢復起來，更要從而發揚光大之，然後再去談「世界主義」，乃有實際。

「現在各國的政治都進步了，祇有中國退步。何以中國要退步呢？就是因為受外國政治經濟的壓迫。推究根本原因，還是由於中國不「修身」。不知道中國從前講「修身」，推到「正心誠意」，「格物致知」，這是很精密的智識，是一貫的道理。像這樣很精密的智識和一貫的道理，都是中國固有的。我們現在要能夠「齊家治國」，不受外國的壓迫，根本上便要從「修身」起。把中國固有的智識，一貫的道理，和固有的能力，一齊先恢復起來，然後我們「民族」的精神和「民族」的地位，才可以恢復。

「但是恢復了我們固有的道德、智識和能力，在今日之世，仍未能進中國於世界一等的地位。這要去學歐

美之所長，然後才可以和歐美並駕齊驅。如果不學外國的長處，我們仍要退後。我們要學外國，是要迎頭趕上，不要向後跟着他。我們知道了跟上世界的潮流，去學外國之所長，必可以學得比較外國還要好，所謂「後來者居上」。我們此後去學歐美，比較日本還要容易。所以這十年中，便是我們的生死問題。如果我們醒了，像日本人一樣，大家提心吊膽去恢復「民族」的地位，在十年之內，就可以把外國的政治經濟和人口增加的種種壓迫和種種禍害，都一齊銷滅……中國如果強盛起來，我們不但要恢復「民族」的地位，還要對於世界負一個大責任。所以我們要先決定一種政策，要「濟弱扶傾」，才是盡我們「民族」的天職。我們對於弱小民族，要扶持他。對於世界的列強，要抵抗他。如果全國人民都立定這個志願，中國「民族」才可以發達。若是不立定這個志願，中國「民族」便沒有希望。我們今日在沒有發達之先，立定「濟弱扶傾」的志願，將來到了強盛時候，想到今日身受過了列強政治經濟壓迫的痛苦，將來弱小民族，如果也受這種痛苦，我們便要把那些「帝國主義」來銷滅，那才算是治國平天下。我們要將來能夠治國平天下，便先要恢復「民族主義」和「民族地位」。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礎，去統一世界，成一個大同之治。這便是我們四萬萬人的大責任。諸君都是四萬萬人的份子，都應該擔負這個責任，便是我們「民族的真精神。」（以上見十三年一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二日所講「民族主義」）

〔十八〕「民權」就是人民的政治力量。「政治」兩字的意思，淺而言之「政」就是衆人的事，「治」就是管理，管理衆人的事，便是「政治」。有管理衆人之舉的力量，便是「政權」。今以人民管理政事，便叫做「民

權。」

「現在成立共和政體，以民爲主，大家試看這四萬萬人，是那一類的人呢？這四萬萬人當然不能都是先知先覺的人，多數的人，也不是後知後覺的人，大多數都是不知不覺的人。現在「民權」政治，是要靠人民作主的。所以這四萬萬人，都是很有權的。全國很有權力能够管理政治的人，就是這四萬萬人。大家想想：現在的四萬萬人，就政權一方面說，是像甚麼人呢？照我看起來：這四萬萬人都是像阿斗。中國現在有四萬萬個阿斗，人人都是很有權的。阿斗本是無能的，但是諸葛亮有能，所以劉備死了以後，西蜀還能够治理。諸葛亮把宮中和府中的事分開，就是把「權」和「能」分開。所以我們治理國家，「權」和「能」一定是要分開的。我們現在行「民權」，四萬萬人都是皇帝，就是四萬萬個阿斗。這些阿斗，當然是應該歡迎諸葛亮來管理政事，做國家的大事業。要使人民有充分的「政權」，直接去管理政府。政府有很大的「治權」，去治理全國事務。中國能够實行這種「政權」和「治權」，便可以破天荒在地球上成一個新世界。」（以上見十三年三月九日至四月二十六日所講民權主義）

「十九」「民生主義」的「民生」兩個字，就是指「人民的生活」，「社會的生存」，「國民的生計」，「羣衆的生命」，「民生問題」就是「生存問題」，「民生」爲「社會進化」的重心，「社會進化」又爲「歷史」的重心。古今一切人類之所以要努力，就是因爲要求生存。人類因爲要有不間斷的生存，所以社會才有不停止的進化。所以進化的定律，是人類求生存，人類求生存，才是社會進化的原因。人類求生存，是甚麼問題呢？就是

「民生問題。」所以「民生問題」才是社會進化的原動力我們明白「民生問題」為社會進化的原動力然後社會問題才有解決的辦法。

「國民黨對於「民生主義」老早就定了兩個辦法：第一個是平均地權，第二個是節制資本。只要照這兩個辦法，便可以解決中國的「民生問題。」……要解決「民生問題」一定要根據事實，不能單憑學理。在中國這種事實是甚麼呢？就是大家所受貧窮的痛苦。中國人大家都是貧，並沒有大富的特殊階級，祇有一般普通的貧。中國人所謂貧富不均，不過在貧的階級之中，分出大貧與小貧，其實中國的頂大資本家，和外國的資本家比較，不過是一個小貧。其他的窮人可說是大貧。中國的大資本家，在世界上既是一個貧人，可見中國通通是貧，並沒有大富，只有大貧小貧的分別。我們要把這個分別，弄到大家平均，都沒有大貧，要用甚麼方法呢？……中國現在最大收入的資本家，只是地主，並無擁有機器的大資本家。所以我們此時來平均地權，節制資本，解決土地問題，便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我們在中國要解決「民生」問題，想一勞永逸，單靠節制資本的辦法是不足的。所以還要製造國家資本，發展國家實業，所得的利益歸人民大家共享，然後全國人民便得享資本的利，不致受資本的害。全國人民都可以得安樂，都不致受財產分配不均的痛苦。

「民生主義」的第一個問題，便是吃飯問題。如果一人一家沒有飯吃，是很容易解決。至於全國人民都有飯吃，像要中國四萬萬人都是足食，便是很重要的，便不容易解決。中國現在正是民窮財盡。吃飯問題的情形到底

是怎麼樣呢？全國人口現在都是不够飯吃。每年餓死的人數，大概過千萬，這還是平時估算的數目。如果遇着水旱天災的時候，餓死的人數更是不止千萬了。照外國確實的調查，今年中國的人數，只有三萬萬一千萬。中國的人數在十年以前是四萬萬，現在只有三萬萬一千萬。這十年之中，便少了九千萬，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是應該要研究的一個大問題。中國人口在這十年之中，所以少了九千萬的原故，簡而言之，就是由於沒有飯吃。中國之所以沒有飯吃，原因是很多的，其中最大的原因，就是農業不進步，其次就是由於受外國經濟的壓迫……我們講「民生主義」，是要四萬萬人都有飯吃，並且要有很便宜的飯吃，要全國個個人都有的飯吃，才算是解決了「民生」問題。

「中國自古以農業立國，所以農業就是生產糧食的一件大工業。中國的糧食生產，既然是靠農民，中國的農民又是很辛苦的勤勞，所以要增加糧食的生產，便要在政治法律上制出種種規定來保護農民。中國的人口，農民是大多數，至少有八九成。將來「民生主義」真是達到目的，農民問題算是完全解決，是要耕者有其田，那樣算是我們對於農民問題的最終結果。

「我們對於農業生產，除上說農民解放問題之外，還有七個增加生產的方法：第一是機器問題，第二是肥料問題，第三是換種問題，第四是除害問題，第五是製造問題，第六是運送問題，第七是防災問題。

「但是解決農民和以上種種生產問題，能夠得到圓滿解決的時候，吃飯問題還是沒有完全解決。要完全解決「民生」問題，不但是要解決生產的問題，就是分配的問題，也要同時注重的。要解決糧食的分配問題，便

要每年儲蓄糧食，等到有了三年之糧以後，纔許運到外國去賣。

「除吃飯問題之外，「民生主義」裏頭的第二個重要問題，就是穿衣。穿衣需要的原料，共有絲、毛、棉、麻四種。這四種工業，都受外國政治經濟的壓迫。所以要解決穿衣問題，便要用全國的大力量統籌計畫，先恢復政治的主權，用國家的力量來經營絲、麻、棉、毛的農業和工業，更要收回海關，來保護這四種農業和工業，加重原料之出口稅及洋貨之入口稅，穿衣材料之問題，方能解決。」（以上見十三年八月三日至八月二十四日所講民生主義。）

〔二十一〕「夫國之貧弱，必有一定之由也。有以地小而貧者，有以地瘠而貧者，有以民少而弱者，有以民愚而弱者，此貧弱之四大原因也。乃中國之土地則四百餘萬方畝之廣，居世界之第四，尙在美國之上，而物產之豐，實藏之富，實居世界第一。至於人民之數，則有四萬萬，亦為世界第一。而人民之聰明才智，自古無匹，承五千年之文化，為世界所未有，千百年前已為世界之雄矣。四大貧弱之原因，我曾無一焉。然則何為而貧弱至是也？曰：官吏貪污，政治腐敗之為害也。倘此害一除，則致中國於富強，實頭頭是道也。今經革命之後，專制已廢，人民為一國之主，官吏為人民之僕。其循良者，吾民當任用之；其酷劣者，吾民當淘汰之。為人民者，祇知除害尼矣。國害一除，則國利自興，而富強之基於是乎立。」

「夫以中國之人，處中國之地，際當今之時，而欲致中國於富強之境，其道固多，其一即為利用外資外才，以開發我之富源。……今之美國，吾人知其為世界最富最強之國也。然其所以致富強者，實業發達也。當其發達實

業也，資本則悉借之歐洲，人才亦多聘之歐洲，而工人且招之中國。其實業之發達，今已爲世界冠矣。統計美國所發展之自然力約一萬六千六百七十五萬匹馬力。以一馬力等八人力計之，則美國約有一十三萬萬有奇之人力以助之生產。其人口一萬萬，除人力作工之外，每人尙有十三人之機器力爲之助，而此十三人之權力，乃夜以繼日，連作二十四時之工而不歇者；而人之作工，每日八時耳。權力則每日多作三倍之工，是一權力無異三人也；而十三人之權力，則等於三十九人矣。大學曰：「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此美國之所以富也。我中國人口四萬萬，除老少而外，能作工者，不過二萬萬人；然因工業不發達，雖能作工者，亦恆無工可作。流爲遊手好閒，而寄食於人者，或亦半之。如有工可作者，不過一萬萬人耳。且此一萬萬人之中，又不盡作生利之工，而半爲消耗之業。其爲生產之事業者，實不過五千萬人而已。由此觀之，中國八人中，不過一人生產耳。此國之所以貧，尙過於韓愈所云：「農之家一，而食粟之家六，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六，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奈之何民不窮且盜也。較之美國人口一萬萬而尙有五千萬人有工可作，而每人更有三十九人之機器力以助之，卽三十九人有半作工以給一人。此其所以不患貧，反憂生產之過盛，供過於求，而岌岌向外以覓市場爲尾閥之疏濬也。此貧弱富強之所由分，亦商戰勝敗之所由決也。

「然則今日欲求迅速之法，以發展中國之財源，而立救貧弱者，其道爲何？尙以中國而言，則本無其法，更無迅速之法也。夫以中國之地位，中國之富源，處今日之時會，倘吾國人民能舉國一致，歡迎外資，歡迎外才，以發展我之生產事業，則十年之內，吾實業之發達，必能並駕歐美矣。……倘知此爲興國之要圖，爲救亡之急務，而能萬

衆一心，舉國一致，而歡迎列國之雄厚資本，博大規模，宿學人才，精練技術，爲我籌畫，爲我組織，爲我經營，爲我訓練，則十年之內，我國之大事業必能林立於國中，我實業之人才，亦同時並起。十年之後，則外資可以陸續償還，人才可以陸續成就，則我可以獨立經營矣。若必俟我教育之普及，知識之完備，而後施行，則河清無日，坐失良機，殊可惜也。必也「治本爲先，救貧宜急」，「衣食足而知禮節，倉廩實而知榮辱」，實業發達，民生暢遂，此時則普及教育乃可實行矣。」（以上見建國方略之心理建設。）

〔二十七〕又物質建設中發展國家經濟及國家實業之大規畫如左：

【甲】交通之開發：

子 鐵道一十萬英里。

丑 碎石路一百萬英里。

寅 修設現有運河。

卯 開新運河。

辰 治河。

巳 增設有線無線電報電話等，使遍布於全國。

【乙】商港之開闢：

子 於中國北部中部南部各築一大洋港口。

丑 沿海岸建種種之商業港及漁業港。

寅 於通航河流沿岸建商場船埠。

(丙) 鐵路中心及終點併商港地設新式市街，各具公用設備。

(丁) 水力之發展。

(戊) 設治鐵製鋼並造土敏土之大工廠，以供上列各項之需。

(己) 鑛業之發展。

(庚) 農業之發展。

(辛) 蒙古新疆之灌溉。

(壬) 於中國北部及中部建造森林。

(癸) 移民於東三省、蒙古、新疆、青海、西藏。

「鐵路經濟上之原則，凡由人口衆多之處築至人口稀少之處之鐵路，其利尤大。殖民蒙古、新疆，實爲鐵路計畫之補助。蓋彼此互相依倚，以爲發達者也。願殖民政策除有益於鐵路以外，其本身又爲最有利之事業。即以滿洲現時殖民民言之，雖於雜亂無章之中，虛耗人工地方不知凡幾，然且奇盛。假能以科學方法行吾人之殖民政策，則其收效將無倫比。以此之故，余議於國家機關之下，佐以外國練達之士，及有軍事上組織才者，用系統的方法指導其事，以特惠移民，而普利全國。」

「土地應由國家買收，以防專占控權之家，置土地於無用，而遺棄於社會。國家所得土地，應均爲農莊，長期貸與移民，而遷始之資本，種子，器具，屋宇，應由國家供給，按實在所費本錢，現款取價，或分年攤還。而興辦此事，必當組織數大機關，行戰時工場制度，以爲移民運輸居處衣食之備，第一年中，不取現值，以信用貸借法行之。

「一區之移民爲數已足時，應授以自治特權。每一移民，應施以訓練，俾能以民主政治的精神，經營其個人局部之事業。

「假定十年之內，移民之數，爲一千萬，由人滿之省，徙於西北，墾發自然之富源，其普遍於商業世界之利，當極浩大。際此所投資本，龐大若何，計必能於短時期中，子償其母，故以有利之原則論，別無疑問也。

「以國民需要之原則衡之，則移民實爲今日急需中之最大者。夫中國現時應裁之兵，數達百萬，生齒之衆，蓄地以養，殖民政策，於斯兩者，固最善之解決方法也。兵之裁也，必需給以數月恩餉。綜計解散經費，必達一萬萬元之鉅。此等散兵，無以安之，非流爲餓殍，則化爲盜賊，窮其結果，寧可忍言此弊不可不防，尤不可使防之無效。移民實荒，此其至善者矣。

「各種關鍵及根本工業，固須利用外資外才，以資發展，至於工業本部，亦須外力扶助發達。所謂工業本部者，乃以個人及家庭生活所必需，且生活安適所由得。當關鍵及根本工業既發達，其他各種工業，皆自然於甚短時期內同樣發達。發達本部工業之目的，乃使多數人民可得較高工資，又得許多生活必需品安適品，而減少其生活費也。世人嘗以中國爲生活最廉之國，其錯誤因爲尋常見解以金錢之價值衡量百物。若以工作之價值衡

量生活費用，則中國爲工人生活最貴之國。中國一尋常勞工，每日須工作十四至十六小時，僅能維持其生活，商店之可寄，鄉村之學究，每年所得，恆在百元以下。農人既以所生產價還地租及交換少數必需品之後，所餘已無幾何，工力多而廉，惟食物及生活貨品，雖在尋常豐年，亦僅足敷四萬萬人之用，若僅荒年，則多數將陷於窮乏死亡。中國平民所以有此悲慘境遇者，由於國內一切事業，皆不發達，生產方法不良，工力失去甚多。凡此一切之根本救治，爲用外國資本及專門家發達工業，以圖全國民之福利。歐美二洲之工業發達，早於中國百年。今欲於甚短時期內追及之，須用其資本，用其機器。若外國資本不可得，至少亦須用其專門家發明家，以爲吾國製造機器。無論如何，必須用機器以補助中國巨大之人工，以發達中國無限之富源也。（以上見建國方略之物質建設。）

### 三 對於中山先生人口理論的總分析

綜觀中山全集中討論中國人口問題之文字，不下數萬言，足見中山先生對於中國人口問題和民族前途是非常注意。其所規定之解決方案，尤爲規模遠大，精密周詳。吾人加以分析，至少有以下各項結論：

(一) 在中國現今的經濟和社會狀況之下，實已大有人滿之患。大多數人民皆味弱質乏，窮愁悲慘。天災人禍，年復一年。生育雖多，死亡亦多。故人口增加不能如歐美諸國之健全。

(二) 中國現時民族遷大，所受外國人口增加的壓迫還不容易感覺。可惜大家醉生夢死，失了一民族思想，一遂致外國政治和經濟的壓迫接踵而來，迄今猶水深火熱。所以國民革命的第一個大目標是要

本著「民族主義」來求得中國之「國際地位平等。」

(三)中國之積弱不競，非由於「地小」、「地瘠」及「民少」、「民愚」，乃由於「官吏貪污，政治腐敗。」故國民革命的第二個大目標是要用「民權主義」來改造政治，以達到「政治地位平等。」

(四)中國「現時四萬萬人中，有三萬萬人皆岌岌不可終日，」且「每八人之中僅有一人為生產之事業。」是以「人民的生活，」「社會的生存，」「國民的生計，」「羣衆的生命，」殆無一安全。故國民革命的第三個大目標是要實現「民生主義」使人民得到「經濟地位平等。」

(五)今後改造新世界之希望，非徒保民而已。舉凡救民養民，亦當引為國家之責任。教民之道：「凡少年男女，皆有受自由教育之權利，由幼稚園而小學，而中學，陸續按級而登，以至大學而後已。」又年長失學者亦「當設公共講堂，書庫，夜學」以教之。「學校之目的，於讀書識字，學問智識之外，當注重於雙手萬能，力求實用。」養民之道：除未成年之人悉享教育權利外，「老年之人，悉享地方供養之權利。殘疾之人，悉享地方醫治供養之權利。孕婦於孕期內免一年之義務，而享有地方供養之權利。其餘人人則必當盡義務乃得享權利。」

(六)中國國民革命的最後目標，是要去「濟弱扶傾，」扶助世界一切被壓迫民族的獨立解放。用我們民族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礎，去統一世界，成一大同之治。決不忍把自身受過「帝國主義者」種種壓迫的痛苦再去加諸其他弱小民族。故中山先生並不提倡無條件的加多中國人口，致無法包容再

去滅人國家。而且詳言「物種之進化以競爭為原則，人類之進化則以互助為原則。人類進化的共同希望，乃在化現在之痛苦世界，而為極樂之天堂者也。近代文明進步，以日加速，太平之世，當在不遠。蓋人類今日之進化，已逐漸超出物種原則之上矣。」（心理建設第四章第十段）

上述幾個最簡單的結論，乃中山先生解決中國人口問題的大政策，也就是中山先生畢生提倡三民主義的真精神。我們全國國民倘能同心努力，遭大投艱，本中山先生救人救國救世之宗旨，去促進三民主義的實現，則中國的人口問題固可解決大半。故本章開宗明義首先闡揚中山先生之人口理論，使大家明瞭中山先生對於人口問題的主張，實與古代專制帝王或近代軍國主義者和國家主義者對於人口問題的傳統主張完全不同。關於此點，我們可引用孫哲生先生新近演講「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的分別」的一段話語來資證明。孫哲生先生說：「國家主義者，是崇拜武力的結合，看輕民族的真正意義。他們只曉得有國家，不曉得有人民，時常犧牲人民的利益，以造成少數統治階級向外發展的侵略機會，或貫徹其夢想富國強兵的英雄主義。如意大利國之法西斯蒂黨，就是國家主義派的大本營。他們的領袖墨索里尼，以人民為犧牲，而走入帝國主義之覆轍。我們看意大利的領土，是歐洲的中等國家，其面積之大，差不多像我國廣東一省，領土既少，出產又不多，本國的麥田和礦產又缺乏，實在是一個山國。故以意大利區區小國而維持其四千萬人民之生活，已覺其人口過剩了。在歐戰前，殖民到美國的，每年有幾十萬，到南美洲的更多。到歐戰以後，意大利殖民美國的政策，也不能實行，只可到南美和歐洲各國。可是歐洲也覺人口過剩，又不能再移民去了。這樣看來，意大利人口，確不能再增，致人民生活

更覺困難。但是法西斯蒂黨的領袖墨索里尼因要貫徹其國家主義之侵略政策，猶以爲人口不夠用，決意再使人口增加二千萬（即增至六千萬），以爲其戰爭之工具。因爲意國在歐洲表面上雖稱一等國，而實際上不過是二等國，武力仍在英法等國之下，故法西斯蒂黨想以人民爲犧牲，以奪取地中海的霸權，恢復從前羅馬帝國的地位。將來和法國的國家主義相火併，定生出劇烈之戰爭。這種以人口爲戰爭工具，爲塞槍砲材料的策略，就和本黨的民族主義大大相反。本黨的民族主義，不是以人民爲國家的工具，是以國家的力量來發展人民的利益。民族主義的對外態度，是不侵略的，不掠奪的。其作用與侵略的和掠奪的帝國主義完全不同。假若英日帝國主義者不妨礙中國，不侵略中國，他們自己也可以生存的。即以日本謂與我國接近，可以說因人口過多，經濟未發展，要向我國的滿蒙來爲其壓迫的尾閥，以繼續其大和民族的生命；但是日本不侵略滿蒙，並不會使其民族消滅的，並不會使其國家不存在的。故我國反抗其帝國主義的侵略，並不是予日本以致命傷。所以民族主義力量之發展，與外國民族並沒有妨害的。（見中央日報十八年三月七日專載。）孫哲生先生這段話語很可表明三民主義的人口政策是和國家主義者或軍國主義者所採用的人口政策是大不相同。這是我們討論中國人口問題所最應首先認定的第一要點。

中山先生說：「我們現在要學歐洲，是要學中國沒有的東西。中國沒有的東西是科學，不是政治哲學。」我們現在就拿人口問題來說，中國也老早就有很精彩的人口哲學。老子說：「天下有始以爲天下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又說：「多言數窮，不如守中。」孔子說：「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既

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又言：「政之大者，莫若使民富且壽也。」孟子雖有「無後爲大」之說，但同時非常注意人民的教養，所以主張「民有恆產」並言「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又梁惠王問「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的原因，孟子則告以要使「穀與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老者衣帛食肉，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的原因，孟子則告以要使「穀與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老者衣帛食肉，民不加少。」要「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並且不許爲政者「率獸食人」也不許「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率土地而食人肉。」凡此皆力言欲加多民數，須注重有教和減少死亡，而不能僅靠「移民移粟」與增多生育。韓非子更言：「古者人民少而財有餘，故民不爭。是以厚賞不行，重罰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爲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是以人民衆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雖倍賞累罰而不免於亂。……故饑歲之春，幼弟不餓；饑歲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愛過也，多少之實異也。是以古之易財，非仁也，財多也。今之爭奪，非鄙也，財寡也。」（五蠹篇）又言：「父母之於子兒也，產男則相賀，產女則殺之，此俱出於父母之懷。然男子受賀，女子殺之者，慮其後便計之長利也。故父母之於子也，猶用計算之心以相待也，而況無父母之澤乎？」（六反篇）又言：「存亡在虛實而不在衆寡。」胡漢民先生說：「韓非子的見解恍惚是一短篇馬爾薩斯的人口論。」確有見地。又墨子因宋處大國之間，常受鄰國的欺侮，固感覺「人爲難倍。」然其倍人之法，一方面固要增多生育，一方還要減少死亡，故提倡早婚與非攻。其言曰：「昔者先王爲法，丈夫年二十，敢母不處家；女子年十五，毋敢不事人。……聖王既沒，於民次也（次作恣解），其欲蚤處家者，有所二十年處家；其欲晚處家者，有所四十年處家。以其蚤與其晚相踐，後聖王之法十年。若純三年而字，子生可以二三人矣。」

……今天下爲政者，其所以寡人之道多，其使民勞，其籍故厚，民財不足，凍餓死者不可勝數也。且大人惟毋異師以攻伐鄰國，久者終年，遠者數月，男女久不相見，此所以寡人之道也。居處不安，飲食不時，作疾病死者，與侵就饑饉攻城野戰死者，不可勝數也。」（節用篇。）且墨子之提倡衆民，亦非毫無限度。故其言曰：「仁者之爲天下度也，天下貧，則從事乎富之，人民寡，則從事乎衆之。衆而亂，則從事乎治之。」（節葬篇。）又曰：「民有三患：飢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三者，民之巨患也。」（非樂篇。）又曰：「五穀者，民之所仰也。故食不可不務也，地不可不力也，用不可不節也。……備者，國之重也。食者，國之寶也。兵者，國之爪也。三者，國之具也。……故周書曰：國無三年之食者，國非其國也。家無三年之食者，子非其子也。此之謂國備。」（七患篇。）夫民衆而能治，民衆而能不飢，不寒，不勞，民衆而國能有備，固非一般修言增加人口，而不顧人民幸福樂利者所可同日而語也。中山先生之三民主義，既大都以中國固有的政治哲學爲其背景，並且明言：「將來造成的新民國，一定是要澈底……一定要造一個民有、民治、民享的新國家。」其人口理論之完全以人民福利爲前提，自不待言。此吾人討論中國人口問題所應切實注意的又一個要點。

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可惜沒有講完，據戴季陶先生說：「我在孫夫人處看見中山先生所親筆記出的民生問題目錄當中，除衣食住行之外，還有兩個題目：一個是養生，一個是送死。可惜我當初關於這兩個問題，都沒有聽見先生直接的解釋。先生曾經對孫夫人談過一點大意，以後想細細的研究一下，把先生關於這兩個問題的意思，大概寫出來。我們未睹民生主義的全豹，不僅是中國人的缺憾，實在是世界全人類的缺憾。但是我們看

孫先生講民生問題，在許多地方，都非常注意到生育、養育、教育的問題，要圖一般人民少有所教，壯有所用，老有所養，男女老幼，各得其所。所以我們認定先生所要解決的民生問題當中，除衣食住行之外，最重要的就是一個「育」的問題。（見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第十三十四兩頁及中山先生思想概要第一〇五頁。）著者本書之作，正是要想研討這個很重要的「育樂」或「生養」問題。至於「送死」或「死葬」問題比較簡單。著者主張仿照歐美辦法，設備公共墓地，由各級地方政府管理之。並主張一面限制埋葬需用之土地面積，一面採用墨子節葬的辦法。由地方政府規定棺材樣式標準，不許過奢。並取締各種繁文縟禮，以減少社會無用之消費。墨子說：「衣食者，人之生利也。然且猶尙有節。葬埋者，人之死利也。夫何獨無節乎？葬埋之法，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領足以朽肉，掘地深不逼於泉，氣不發洩於上，蠶足以期其所，則止矣。」（節葬篇）此種辦法，既適合土地經濟，而且各種風水命運之說，亦可一併掃除。墨子說：「古者王公大人為政國家者，皆欲國家之富，人民之衆，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貧，不得衆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亂，則是本其所欲，得其所惡，是何故也？曰：執有命者以難於民聞者衆。執有命者之言曰：命富則富，命貧則貧，命衆則衆，命寡則寡，命治則治，命亂則亂，命壽則壽，命夭則夭，上以說王公大人，下以說百姓之從事。故執有命者不仁。……今天下之士君子忠實，欲天下之富而惡其貧，欲天下之治而惡其亂，執有命者之言不可不非。此天下之大害也。」（非命篇）我們雖主張節葬，但不主張火葬。至於不主張採用火葬之理由，則完全根據醫化學家朋奇（Engel）之主張。朋奇曾以科學的立足點，痛論火葬之非，略謂：「現時人類之死亡率，每年為每一千人中約有二十人死亡。假定屍體悉付諸火葬，則僅五十年之間，足

以構成現在地球上總人口，即約十五萬萬人之人體之多類化合物之氮素，均變爲植物不能利用之遊離氮氣。實爲植物繁殖上永遠不可取償之一大損失。土葬則屍體腐化，而其氮素常分解爲如阿母尼亞之化合物狀態，因而植物再得利用之。生命資本之化合物氮素，毫無損失。一生物體雖死，而他生物體反能應用其材料，而得新成，殊大合理云。」（永井潛著胡步續譯生命論第五十二至五十四各頁。）是以火葬一事足以減少植物所需要之氮素肥料，而破壞動植物兩界之大經濟與大調和。爲維持生物養料之均衡及人類生命之保障計，祇宜提倡適合經濟原則的節葬，而不宜提倡違反自然法則的火葬。孔子說：「衆生必死，死必歸土。」又說：「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見也。」其立論雖以倫理爲出發點，實與近代科學家之主張不謀而合。將來交通便利之後，如罐雨量充足之各省區農地缺乏，儘可由公家將內地許多的墳墓分別遷徙歸併，並利用沙漠地方和森林地方爲公共埋葬之處所，此亦節省全國土地之使用之一法焉。

## 第二章 人口問題爲徹底實現三民主義的先決問題

### 一 解決人口問題爲實現三民主義的必要條件

中山先生心理建設中說：「予之所以不憚其煩，連篇累牘，以求發明行易知難之理者，蓋以此爲救中國必由之道也。」又說：「凡真知特識，必從科學而來。捨科學而外之所謂知識者，多非真知識也。」又說：「方今革命造端之始，開吾國數千年來未有之局，又適爲科學昌明之時。知之則必能行之，知之則更易行之。故天下事惟患於不能知耳！倘能由科學之理則，以求得其真知，則行之決無所難。然則行之之道爲何？即全在後知後覺者之不自惑以惑人而已。」中山先生所倡三民主義的最高使命和最大目標是要「使中國永遠適存於世界」和「促進人類的大同。」所以我們不但是要用三民主義來解決中國的人口問題，同時還要大家努力去「求得真知」，然後根據我們的真知去擬定一個能夠徹底實現三民主義的人口政策，庶使我們三民主義的新烏托邦能夠早日實現，並使我們所建造的新烏托邦能夠長治久安，永遠適存於世界。

中山先生說：「革命是不待已而爲的事，不是今年革命，明年又來革命。革命要用徹底的方法，才可以永遠享幸福。」又說：「我們改造新世界，要求一勞永逸始可。」我們從前國家的治亂和民族的盛衰，都是循環往

復的。孟子說：「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我們詳考前此古今中外國家的治亂和種族的盛衰，所以不能逃脫這個循環圈套的最大原因，則爲人口與土地的比例發生變化。大致治平愈久，人口與土地愈失其均衡，其所召的變亂亦愈大。所以中國社會學術史上，有卓然不朽貢獻的經濟學者洪亮吉氏，在乾隆末年時候就曾說道：

「人未有不樂爲治平之民者也，人未有不樂爲治平既久之民者也。治平至百餘年可謂久矣。然言其戶口，則視三十年以前增五倍焉；視六十年以前增十倍焉；視百年百數十年以前不啻增二十倍焉。試以一家計之，高曾之時，有屋十間，有田一頃，身一人，妻孥後，不過二人；以二人居屋十間，田一頃，寬然有餘矣。以一人生三子，至子之世而父子四人，各妻孥，即有八人，即不能無傭作之助，是不下十人矣。以十人而居屋十間，食田一頃，吾知其居僅僅足，食亦僅僅足也。子又生孫，孫又娶孥，其間衰老者或有代謝，然已不下二十餘人，而居屋十間，食田一頃，即量腹而食，度足而居，吾知其必不敷矣。又自此而曾孫，而玄孫，視高曾祖時，已不下五六十倍。是高曾時爲一戶者，至曾玄時不分至十戶不止。其間有戶口消落之家，即有丁男繁衍之族，勢足以相敵。或曰：高曾之時，隙地未盡闢，閒廬未盡居也。然亦不過增一倍而止矣，或增三倍五倍而止矣；而戶口則增至十倍二十倍。是田與屋之數常處其不足，而戶與口之數常處其有餘也。又况兼併之家，一人據百人之屋，一戶占百戶之田，何怪乎遭風雨霜露飢寒顛踣而死者之比也。曰：天地有法乎？曰：水旱疾疫，即天地調劑之法也。然民之遭水旱疾疫而不幸者，不過十之一二耳。曰：君相有法乎？曰：使野無閒田，民無剩力，疆土之新闢者，移種民以居之；

賦稅之繁重者，酌今昔而減之；禁其浮靡，抑其兼併；遇有水旱疾疫，則開倉廩，悉府庫以賑之；如是而已矣。是即君相調劑之法也。要之，治平之久，天地不能不生人，而天地之所以養人者，原不過此數也。治平之久，君相不能使人不生，而君相之所以爲民計者，亦不過前此數法也。且一家之中，有子弟十人，其不率教者，常有一二。又况天下之廣，其游惰不事事者，何能一一遵上之約束乎？一人之居，以供十人已不足；何況供百人乎？一人之食，以供十人已不足；何況供百人乎？此吾所以爲治平之民慮也。」（見洪北江遺書卷言一卷治平篇）

洪氏又言：

「今日之賦，約凶荒計之，歲不過出一石；今時之民，約老弱計之，日不過食一升，率計一歲一人之食，約得四畝。十口之家，即須四十畝矣。今之四十畝，其實廣即古之百畝也。四民之中，各有生計，農工自食其力者也。商賈各以其贏以易食者也，士亦挾其所長，備書授徒以易食者也。除農本計不議外，工商賈所入之至少者，日可餘百錢，士備書授徒所入日亦可百錢，是士農工商一歲之所入，不下四十千。聞五十年前，吾祖若父之時，米之以升計者，錢不過六七布，之以文計者，錢不過三四十。一人之身，歲得布五丈，即可無寒；歲得米四石，即可無飢。米四石爲錢二千八百，布五丈爲錢二百，是一人食力，即可以養十人。即不耕不織之家，有一人營力於外，而衣食固已寬然矣。今則不然。爲農者十倍於前，而田不加增；爲商賈者十倍於前，而貨不加增；爲士者十倍於前，而備書授徒之館不加增。且昔之以升計者，錢又須三四十矣；昔之以文計者，錢又須一二百矣。所入者愈微，所出者益廣。於是士農工商各減其儲以求售，布帛粟米又各昂其價以出市。此即以終歲勤動，舉生息而自好者，

居然有溝壑之憂；不肖者遂至生攘奪之患矣。然吾尙計其勳力有業者耳。何況戶口既十倍於前，則遊手好閒者更數十倍於前。此數十倍之遊手好閒者遇有水旱疾疫，其不能束手以待斃也明矣。是又甚可慮者也。（見原書生計篇）

洪氏又謂

「戶口至今日可謂極盛矣。天不能爲戶口之盛而更生財，地不能爲戶口之盛而更出粟。一州一邑之知治理者，唯去其糜費而已矣。粟費之道有二：一則前議中所云飲食服用是也。一則寺廟是也。……東南之患，在土狹而民衆。民之無業者已多，而又積此數百萬人之僧徒道士，使耕夫織婦奉之如父母，敬之如尊長，罄其家之所有而不惜。俗安得不貧，而民安得不困。」（見原書寺廟篇）

洪亮吉認爲「天地調劑之法」與「君相調劑之法」，皆不能澈底解決人口問題，所以始終抱悲觀態度，而「爲治平之民慮」。洪氏之人口論係專就治平時而言，明乎戰爭與變亂之爲例外，且暗示人口問題爲一治一亂之主要原因也。按洪氏生於乾隆十一年，即西歷一七四六年，卒於嘉慶十四年，即西歷一八〇八年，與英國人口學鼻祖馬爾薩斯之時代約略相當。兩氏之學說復不謀而合，而洪氏意言一卷則成於一七九三年，較馬氏人口論成於一七九八年尙早數年，洵足爲國史爭光。猶夫瓦列斯（Wallace）達爾文（Darwin）兩氏之同時倡進化論，同爲學術史上之美事焉。惜洪氏之人口學說迄今尙泯焉不彰。我們有了發明家而無宣傳家，遂致「莫爲之後，雖聖弗傳」。誠如張蔭麟先生所云：「西方自馬氏人口論出，經濟學及社會學上開一新天地，

其直接間接影響於政治及社會上一般人之思想，至鉅且重。反觀洪氏之論，則長埋於故紙堆中，百餘年來，舉世莫知莫聞，不龜手之藥一也，或以伯，或不免於洪辭沈，豈不然哉。」（見東方雜誌第二十三卷第二號張蔭麟著「洪亮吉及其人口論」與拙著增訂再版中國人口論）洪氏之人口論倡於乾隆末年，按照洪氏之意見，乾隆時代的戶口已稱「極盛」。而當時之人口密度尚遠遜於今日。果然乾隆末年以降，清運遂衰。厥後人口愈繁，內憂外患，亦為禍愈烈。直到現在，清室雖亡，而我們民族的不競則仍然積重難返，所以才有今日的種種革命。我們今後並不懷疑三民主義有無實現之可能。我們所值得精密研究的是我們將來所造的新烏托邦能否長治久安，萬年有道。據著者的管見，如果中國的人口問題能夠和三民主義同時解決，則有造成長治久安萬年有道的新烏托邦之可能。否則我們仍然不能斷定將來我們造成的新烏托邦能否逃脫「一治一亂」的循環圈套。所以本書特別注重我們「青天白日」底下的人口問題。因為人口問題乃人類各種政治問題經濟問題及社會問題的鎖鑰，人口問題不能圓滿解決，一切政治問題經濟問題及社會問題決無完全解決之希望也。

## 二 對於國內樂觀派人口論著的簡略批評

美國俄海約大學經濟教授臥爾夫說：「反對馬爾薩斯的樂觀派人口學者大都抱定兩個錯誤的觀念。第一他們心目中所謂理想的地球是比真的地球要大許多。第二他們是迷信科學進步的神聖萬能。他們以為移民和科學發明能夠解決一切的人口問題。他們看見處處都是空地，但是並不將雨量地圖和氣候地圖稍加研究。

他們以爲科學的發明能將收穫遞減的原則變爲無效或無定期的延緩行使。可惜他們忘記了幾種重要的事實：（一）世界僅有區區的下等土地尙未開墾。（二）科學的進步並非毫無限量。（三）科學問題與經濟問題不能混爲一談。在技術上可能之事，在經濟上或代價過鉅。（四）製造品的價值低廉，終難抵償原料品的價值高漲。（五）對於每人的農業生產量應將直接與間接的勞力一併計入。如果樂觀派能將此種事實詳加研究，則愚叢的樂觀主義當可減少。而各種情威的反對節育論調亦可收聲。所以要有健全的人口理論，纔能有合乎經濟的人口政策。中國現時持樂觀論調的人所以獨多，都是由於彼等昧於各種事實。現在國內許多樂觀派的學者，對於中國的人口問題，都是非常樂觀。譬如楊效春先生就是樂觀派的一個代表。他說：「我們對於中國人口問題，不宜輕信悲觀學者的學說，從事減少生育。……以中國的土地，養中國的人民，好好的生產屯來，並且好好的爲之分配，中國人難道終不能得到安定幸福的生活嗎？」（見東方雜誌第二十四卷第二十二號）我們的答案是「當然可以享受一陣安定幸福的生活；但是恐怕不能享受許久，天下又大亂」又民生主義與人口問題的著者王警濤先生，也是一個樂觀派的代表。他說：「人口過庶與否，在現代既未成爲問題，當然不必去管他。」又說：「人口問題就是吃飯問題，民生主義實現以後，便無所謂人口問題了。」王先生所根據的唯一理由是中山先生所說：「民生主義就是要四萬萬人都有飯吃，並且要有很便宜的飯吃」那一句話。所以王先生的結論是「可知民生主義的目的，在使人人有便宜飯吃，人口問題便已圓滿解決。所以我說民生主義實現以後，在中國便無所謂人口問題了。」但是我們覺得王先生這個結論，未免把中國的人口問題看得太簡單而

太容易。自然「民以食爲天」，人人都能夠「大吃大喝」是再好不過！但是「大吃大喝」之後，大家「飽暖思淫欲」，必定又努力去「添子益孫，多多益善」。「添子益孫，多多益善」的結果，必定使「白米飯」和「吃飯的人」又失其均衡。於是「粥少僧多」，「天下又大亂」！何況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絕對不僅是一個吃飯問題，而且人口問題也不僅是一個吃飯問題呢！

又蔡步清先生也是一個樂觀派的代表，他說：「地大物博的中國，當致力研究食物之所以增加，而惡貨棄於地，才是正理。人口增加未發現若何過庶的狀態，可以不必憂慮……人口過庶與否在現時中國既不爲問題，我們不必去管他。不過許多人誤會貧困就是人口過庶所產生的現象。如果放下冷靜的頭腦來考慮一番，却其中大大的有一個致貧困的總因，這個總因就是經濟制度不好；經濟制度不好，才產出經濟地位不平等；經濟地位不平等，社會上才發生貧困；所謂不患貧而患不均。中國現在民生問題的發生，不在人口問題，而在數千年相沿下來的經濟制度之未改良。」（詳見指導第二三、四、五等期）我們可以反問道：「中國約佔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五的農人皆終歲勤動，試問他們對於增加食物運算不盡力嗎？又農人無力改良農業，不是由於耕地過於狹小和資本過於缺乏嗎？耕地狹小，資本缺乏，不是過庶的特徵嗎？又中國貧困的總原因，祇是由於經濟制度不良嗎？我們把大貧和小貧平均下來，就可以一律變成大富或一律變成小富嗎？我們民族的貧弱不競和產業落後，果真完全由於帝國主義者的侵略壓迫嗎？我們受帝國主義的侵略壓迫，不是有許多致召此種侵略壓迫的內因嗎？」

又李海上先生也是一個樂觀派的代表。他立論的出發點是和我們相同，我們都承認「三民主義的最後使命是要解決人類的生存問題。」可惜我們的結論不能夠一致。李先生說：「到了大同世界，就是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還有什麼人口問題呢？」又說：「所以就民生的意義說，解決人口問題，是在增加生產，公平分配，使個個人都有便宜飯吃，得以安樂的生存繁殖，絕對不應主張減少人口，實行人類的自殺。」又中國人口問題著者文公直先生的結論也說：「欲中華民族永遠存於世界，欲無滅種之患，則不能不急謀人口之增加。」又說：「吾國之人口，百年之後必可增加至十萬萬以上。且人口決無遞剩之憂。物質亦決無窮乏之患。國計民生亦不至如今日之艱難。人類平等的「大同之治」，可基於斯而漸期於實現。」李文兩先生的結論都是非常樂觀，他們都把人口問題和大同世界看作易如反掌。但是我們覺得一個國家社會的人口問題，乃至全人類的人口問題未圓滿解決以前，就根本沒有實現大同世界之可能。人類在有史以前無論矣，自有史以來，差不多已有一萬年的歷程，何以古今中外都找不出一個大同世界呢？我們中國亦已有五六千年的歷史，何以孔子兩千多年前所懸想的大同世界至今還是天差地遠沒有實現呢？我們這兩個發問，並非懷疑三民主義是否為達到大同世界必由之路。我們獨情中山先生未能多享天年，把他的民生主義全都講完，致我們未睹民生主義的全豹。後之「同志讀者」既未能本其遺教，「觸類引伸，匡補闕遺。」復未能「舉一反三，聞一知二。」大半都犯了陶淵明所謂「好讀書不求甚解」和戴季陶先生所謂「讀一句書喊一句口號」的毛病。對於中國的人口問題遂大都視為無足輕重。「行易知難」，有如此者。祇有最少數有識之士

注達到此種問題而已。

### 三 中國現時人口過庶的表徵和健全人口政策的需要

中山先生說：「中國今日之不振，固由於能行之人少，而尤患於不知之人多。」故著者以為我們不革命則已，如果要革命，就要如胡展堂先生所說：「大家提着科學的火把來革命」換言之，我們要革命，就要去尋求真理，先致其知，我們求得真理真知，就要本着「不自惑以惑人」的精神努力去「喚醒民衆。」據著者的管見，我們對於民生主義如果祇講衣食住行，而把另外一個很重要的「育」的問題完全不講，則無論物質建設如何進步，亦祇能解決中國的人口問題於一時，決不能夠把這個問題永遠解決。如果要把這個問題永遠解決，使人永遠不發生衣食住行的困難，永遠不會再有循環的變亂，便還要用別的方法來補助。中山先生說：「我們中國人現在的痛苦，每日生活，至少總有三萬萬人朝不保夕，愁了早餐愁晚餐，所以中國是世界上最窮弱的國家。」又說：「今日之中國已大有人滿之患矣。其勢已岌岌不可終日。上則仕途壅塞，下則游手而聚，嗷嗷之衆，何以安此……由斯以往，其勢必至日甚一日，不急挽救，豈能無憂？」這些話語，不是明明承認中國現時人口的過庶嗎？何以樂觀派的學者竟漫不加察呢？

我們現在再舉一點最近的事實來證明。試問近年以來我們由海關進口的食品超過出口的食品年多少一年，是不是人口過庶的又一個表徵呢？據外人根據中國海關報告計得「中國自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三

年之間，每年平均進口食品超過出口食品之數量約合二十二萬萬六千萬磅，或按人口計算可供一百萬戶以上人口之食料。」（見美人孟祿所著演進中的中國 China: A Nation in Evolution, by Paul Monroe, 1928）若以每戶五人計算，每年的食品入超數量，已可供五百萬人或十個南京首都這樣多的人口之用。這不是表示本國糧食不夠本國人之食嗎？又據饑荒的中國著者馬羅立（W. H. Malloy）君之意見，「中國進口食糧的價值，雖已平均超過她出口的百分之二十，但中國人的食糧需要，猶未達到充分的供給。」馬羅立君並舉出中國海關貿易統計所載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三年間的食料進出口價值，均為進口超過出口。證明中國似乎已和日本一般，是一個不足自給的國家。（見吳鵬飛譯饑荒的中國第一四五至一四六頁）我們再看衛生部薛前部長視察西北的報告說道：「西北災情奇重，饑於十室九空，饑斃人數無算，災民食品約二十餘種，有常人耳不忍聞，目不忍視者。其食物名稱如下：醋油渣，油渣麵，棉花葉，槐豆，油渣饅，榆樹皮，菱草根，醋糟饅，榆樹麵，棉子麵，白薯葉，糠粃饅，薯香，豆渣，杏葉，梓雜麵，杏樹葉，刺筋，首看根，穀糠麵等。」（見三月十五日中央日報）又華洋義賑會幹事愛德華（D. W. Edwards）關於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一年的華北旱災報告裏頭亦曾將災况最嚴重的時候在吳區挨戶考察所得到的食物名單開列如下：糠，薊，麥葉，花種，木屑，葉粉，棉子，草葷，高粱皮，榆樹皮，白楊葉，草木的根，深布的泥土，落花生的殼，玉蜀黍的穗軸，含有雜質的樹子，極不適口的豆餅，以及認為最可口的紅薯。這些食物都是不易下咽的。其中有幾種尤為難吃，無怪小孩子們都哭號不肯下咽。而盡顧受餓。（見吳鵬飛譯饑荒的中國第三頁）試問這些飢民連樹根草根都食盡，豈不是隔三民主義的大同

世界遼天差地遠嗎？我們對於這些現象能夠用冷靜的頭腦來擁抱樂觀嗎？中山先生不是教我們要用「由己滿之，由己飢之」的精神來救人救國救世嗎？

有些人必定說道：這種災荒是局部的特殊現象，或軍閥所造成的罪惡，不是人口過庶的表徵。但是現時全國大多數的省份都已有饑荒，都是民窮財匱，達於極點。試問是不是人口過庶的特徵呢？據國民政府賑災委員會調查現時全國災區共有一千零九十餘縣，災民已有調查報告者共為五千餘萬人，尚有七省災民確數未經詳報。又據國民政府賑務處報告如左：

迄二月底止，接到各處災荒報告自山西迄江蘇，計有二十一省之多，幾佔吾國版圖全頁，其中縣份，計一千一百三十餘，老幼災民，除未經查明失記外，將填溝壑者計四千餘萬人，而尤以西北為多。茲將災區列后，計山西八十六縣。兵旱水雹風蝗匪等災，六百零一萬七千八百九十七人。甘肅六十五縣。旱匪雹風土塵葉倒沖沒地震等災，二百四十四萬零八百四十餘人。陝西八十五縣。兵旱匪蝗水疫雹風等災，五百三十五萬五千二百六十四人。外有長安等七縣災民，未據調查尙未列入上項災民數內。綏遠十七縣。旱雹匪兵等災，近又地震，饑孱遍野，一百四十九萬八千八百十九人。河南一百十二縣。旱蝗匪雹風霜等災，四百零一萬一千六百六十六人。山東八十三縣。旱蝗風水匪霜雹蟲兵，暨被日軍殺戮燒焚等災，五百萬人。察哈爾十六縣。旱霜雹蝗鼠等災，三百另六萬八千四百三十二人。河北七十一縣。兵匪蝗旱雹風水火等災，六百餘萬人。廣東五十九縣一市，匪風水兵蟲蝗旱雹山崩等災，一百二十七萬一千八百〇七人。外有新豐等十一縣，及廣州市災民未據列報。

尙未加入上項災民數內。廣西五十一縣一市，旱蟲兵匪水火等災，三百十六萬一千一百三十五人。安徽四十一縣，蝗旱水風雹兵匪等災，五百四十二萬一千八百八十二人。湖北六十二縣，旱匪水蝗蟲兵火等災，九百十九萬七千二百八十五人。湖南五十一縣，兵匪火旱水疫等災，災民人數未據列報無法填註。浙江三十三縣一市，水風蟲沙漲等災，七十餘萬人。江西六十九縣，匪旱風水蟲等災，災民人數未據列報，無法填註。熱河十五縣，早霜雹冰凍風等災，災民人數因災區遼闊尙未據查明，故付闕如。雲南五十三縣一市，震霜水等災，三百四十四萬四千二百七十五人。四川五十一縣，旱水兵匪等災，災民人數未據詳報故闕。福建三十一縣，水匪旱火兵等災，被災者據調查約十萬六千三百七十餘家。貴州三十八縣，兵匪雹水火等災，災民人數未據詳報無法填註。江蘇四縣，旱蝗兵匪水等災，查該省災表尙未寄到，故災民人數無法填註。（見三月十九日中央日報）

又據賑務處另一報告如下：

〔災區統計〕江蘇四縣，貴州三十八縣，河北七十一縣，四川五十一縣，綏遠十七縣，福建三十一縣，熱河十五縣，山西八十六縣，江西六十九縣，廣西五十一縣，廣東五十九縣，河南一百一十二縣，陝西八十五縣，甘肅六十五縣，湖南五十一縣，山東八十四縣，雲南五十三縣，浙江三十三縣，湖北六十二縣，察哈爾十六縣，安徽四十一縣，共二十一省一千零九十三縣，災民五千零六十二萬餘人。尙有湖南，江蘇，貴州，四川，福建，熱河，江西等省，災民確數未報者。災區等次有一區而迭被數災者，有一省而分遭數災者，故就各省之面積戶口及災情之種類次數多寡輕重，分爲五等（甲）陝西，甘肅，山西，綏遠，（乙）山東，河南，察哈爾，（丙）河北，廣西，廣東，浙江，

安徽。(丁)湖南,湖北,江蘇,江西,呼瑪爾河。(戊)雲南,貴州,四川,福建,熱河。(見三月二十四日中央日報)

「又據國府賑災委員會賑款委員會及賑務處會同報告如下」

國民政府賑災委員會賑款委員會及賑務處，頃會同調查全國受災區域，有二十二省計一千九十多餘縣，災民約計五千七百六十二萬餘人，尤以陝甘綏三省為最慘，樹皮草根，均將食罄，每日死亡，斷以千計，其簡略統計如左：陝西被災八十五縣，災況水旱風雹蝗蟲，災民五，三五五，二六四人。甘肅被災六十五縣，災況地震，風雹旱，災民二，四四〇，八四〇人。山西被災八十六縣，災況水旱風雹蝗，災民六，〇一七，八九七人。綏遠被災十七縣，災況地震風雹旱，災民一，四九八，八一九人。山東被災八十二縣，災況旱蝗水風兵匪，災民五，〇〇〇，〇〇〇人。河南被災一百十二縣，災況旱蝗風雹，災民四，〇一一，六六六人。察哈爾被災十六縣，災況旱蝗霜鼠，災民三，〇六八，四三二人。河北被災七十一縣，災況兵匪旱風水，災民六，〇〇〇，〇〇〇人。廣東被災五十九縣一市，災況水旱山崩蝗雹匪，災民一，二七一，八〇七人。廣西被災五十一縣一市，災況旱蟲水火，災民三，一六一，一三五五人。安徽被災四十一縣，災況水蝗旱雹匪，災民五，四六一，八八二人。湖南被災五十一縣，災況水旱兵匪疫，災民數未詳。浙江被災三十三縣一市，災況水風，災民七〇〇，〇〇〇人。江西被災六十九縣，災況水旱風匪，災民數未詳。熱河被災十五縣，災況水旱雹霜，災民數未詳。雲南被災五十三縣一市，災況冰霜地震，災民三，四四四，二七五人。湖北被災六十二縣，災況水旱火蝗匪，災民九，一九七，二八五人。四川被災五十一縣，災況水旱兵匪，災民數未詳。福建被災三十一縣，災況水旱兵匪，災民數未詳。貴州被災五十八縣，災況水火旱雹，災民數未詳。

江蘇被災四縣，災況水旱蝗匪，災民數未詳。黑龍江被災一縣，災況水災，災民數未詳。上列所開，雖未十分精詳，而各省受災情況，已可概見。賑委會方面除已呈請政府撥給備荒專款，及舉辦海關附加賑款，以期永久外，現尙力求籌妥善之救濟辦法云。（見四月廿二日中央日報）

又據上海英文泰晤士報本年七月三十日北平路透電通訊一則如下：

中國華洋義賑會派赴華北各災區之調查員現已返平。關於華北災情已可得而聞其詳。據稱自今春以來，施賑方法及天降霖雨已將災區範圍縮小頗多。災民已減少一半，現時尙有三千五百萬之譜。

此次災區區域爲甘肅中部、陝西自西安以北、綏遠北部、山西、察哈爾北部、內蒙、黃河流域自陝西邊境以至於海，災情均甚嚴重。甘肅中部已四年無雨，麥田儼若沙漠，其中安定一城，人口已由六萬減至三千。又據一調查員報告，某縣知事欲將食死屍之災民治罪，但此項災民則謂彼等僅食犬已吃過之死屍云。

除上開各區域外，其餘各省區均已得雨，秋收頗有希望，當可支持到明春。又聞有糧食者亦因情形變更，將糧食出售，故災情已見減輕。山西一省，因省政府購運糧食甚多，已不感缺乏。河南北部則有華人團體提倡移送災民前往東三省。已輸送者約有一萬四千人，俟西至洛陽之鐵路交通恢復原狀以後，當有更多災民向東三省輸送。

辦理施賑之西人，死於腸熱症者甚多。甘肅方面染此病者有二十人，僅存其七。死者之中有法，英，美，三國之教士牧師云。

又據中國華洋義賑救災總會十八年七月刊行之「民國十七年度賑務報告書」序言內稱「經實地調查並就各方報告，精密審核後，計截至十八年五月，本刊尚未付印以前，冀魯豫晉陝甘察綏八省災民總數，已超過五千萬之衆」云。

又據國府賑災委員會主席報告，「全國災區蔓延二十一省，共有災民七千餘萬人」云。試問如此普遍的兵凶饑饉現象，是否大半由於人口過庶呢？試問宋皇帝、袁皇帝、大軍閥、小軍閥、舊軍閥、新軍閥、和共軍、匪軍，爲什麼不出在外國，而偏偏要出在「十年到有九年荒」的大中國呢？有些人還說：「欲救中國，應努力增加人口。」試問此種現象是否用增加人口的方法所能救濟呢？吾恐提倡增加人口的結果，不過多養些小孩來充「易子而食」的材料罷了！據甘肅賑務處致中央黨部及國府通電云：「甘肅不幸，匪旱頻仍，刀兵瘟疫凍死者不知凡數，乞丐殺食同類，父母亦有迫於饑餓，竟將襁褓之子，供作食品者。其他仰藥而死者，棄小兒於山野者，延頸待斃而自殺者，種種慘狀，不可勝紀。首念及此，能不痛心……」（見三月二十一日中央日報）又據本年九月上海申報所載西安通訊，陝西方面也有「把親生子女殺來生吞熟嚼」的慘狀。人民餓死者不可勝計。其他關於各省天災人禍之報告，因運載各報，隨時皆俯拾即是，不勝枚舉也。莫考中國近百餘年來的亂源，固然很多，但人滿爲患，乃其最大原因之一，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關於高生育率與常關饑荒的現象，外國學者馬羅立（W. H. Malloy）君所著饑荒的中國一書，言之甚詳。原書已由吳鵬飛君譯成漢文，很值得我們一讀）現在東西文化的一個最大差別，就是東方諸國（尤其是中國、印度）人民「生」與「死」的兩個大輪迴都轉得太快；西

方諸國民的這兩個大輪迴，則愈轉愈慢。這兩個輪迴在東方轉得太快的結果，實使東方民族許多創造的力量和建設的力量，都消滅淨盡。東方社會許多怪惡的現象，和黑暗的現象，都緣此產生，東方文化亦因此日形落後，吾國民族之消沈，豈無故哉？

所以我們今後無論在三民主義實現的過程之中，或在三民主義實現之後，都要隨時顧到人口問題，才能夠提高人民的生活，富厚人民的生計，實貴羣衆的生命，健全民族的生存，促進文明的發達，維持文化的長興。我們這個主張並不是要使中國今後的人口如何減少，不過希望大家把我們對於人口問題的眼光視線，由增加生育一方面移到減少死亡那一方面去。倘能使生育率與死亡率均逐漸低落，而人口則並不減少，豈不是國家民族最大的經濟和羣衆生命最大的節省嗎？近來國內已有最少數有識之士知道這些原理原則。可惜他們仍然如在深山窮谷中呼號，不能引起一般人民的注意。同時又有許多樂觀派在那裏高唱似是而非的論調，遂使一般讀者愈覺如墮五里霧中，不知何所抉擇。孰知歐美之節育運動迄今已越百年之久，現時且愈趨普遍，而人口反有增無減，國勢亦蒸蒸日上，非其明效大驗耶？按歐美新馬爾薩斯主義實創始於西曆一八一八年，是年耶莫斯密爾（James Mill）遂有重要論文，載入英文百科全書，參閱（Carr-Saunders, The Population Problem, p. 31）中國政治思想綱領著者王恆先生說得好：

「人口問題是人類政治經濟上最後問題。此為現代經濟學者公認之事實。蓋一切政治經濟之設備與研究，乃爲人而設。而人口問題，實爲人類之最後利害問題也。人口問題並非單由人口成立。人口問題之他一

面，即爲土地問題。若有無限廣大之土地，可以容納無限之人口，決不至有入口問題之發生。故入口問題未有不與土地問題合併討論者也。

工商業民族，容易密集。惟農業則被限制於土地，水流，日光，空氣，耕地任何精作，亦不能不被收入遞減。故入口問題，在農業民族，最易發生。以其吸收人口之能力，比之工商業特少也。

中國之有「一治一亂」實以中國人口問題爲一種特別背景。在政治上最應注意。而一切制度法律所不易解決者也。在過去時代，當局之謀解決此問題者，只有興水利，防蟲災，積穀以救荒之後天的救濟法。而不明早婚與優生諸原理。以其與孝行衝突故也。

關於此點，西方民族重視工商業者，則常以鄰國爲鑒。其趨於極端者，則爲今日之帝國主義。其結果，亦是殊途同歸。即中國歷代一治一亂之結果，係用本國人殺本國人的方法，以解決一時人口的問題。西方民族則用內國人殺外國人的方法，以解決一時人口的問題。其以殺人了事之結論則一也。至若求一人類之不相殺而解決人口問題之方法，決非求之農業或工商業之本身所能解決。而必超乎物質以上，以精神修養法解決之。則其意義早超出本書所論列之範圍矣。」

又楊適六先生也說：

「人口與地面的分配，比勞力與資本的分配還要爲難些……何況我們中國人是生出來就要傳代的，所以無論他窮得如何地步，也要生幾個小孩子來裝裝門面。越是窮的，越生得多。他們那裏來飯吃呢？在我們

舊社會的習慣底下，他們是不怕沒有飯吃的。他們的人生觀，正是如吳稚暉先生所謂「吃飯生小孩子，招扶朋友；無論有錢的，沒有錢的，有勢力的，沒有勢力的都是一樣。所以人人都有飯吃，都可以生小孩子。照這樣儘量做去，到了一二百年人口覺得太多，就大大的淘汰一下。這個淘汰的方法，無非是饑荒，疾病，兵災……等到人口稀少了，他們又重新製造起來。如此循環反覆，以至於今日。」……有人說人多不要緊，只要有職業，社會就有飯吃……但是對於我們中國人是完全不適用的。我們中國人真是窮得可憐。若是照老習慣只管把小孩子生下去，那就無論如何開發富源，也是來不及的。」

又武瑋幹先生也說：

「我國對於人口政策之實施，與人口問題之解決，向來不甚注意。於是數千年來，人口孳生分配便是純任自然，種種惡果，不免相因而至：政治之紊亂，社會之擾攘，民生之凋敝，國勢之衰弱，差不多都是由於「人口過剩」所致。我們只要從歷史上一加觀察，十年小亂，百年大亂，大都「盜賊開幕，殺伐收場。」這種循環現象，一般人只知誦之數命，其實也不過受人口原理的支配罷了。近年以來，有識之士，才憬然覺悟人口問題未得解決，我國之亂源終不泯滅，於是書報之中，時有討論解決人口問題之方案。都想從人口問題上根本解除中國的亂源，因以促進國家之強盛與社會之進步。」（以上兩段均見武瑋幹譯英國柯克斯所著人口問題一書）

我們現在要想根本解決中國的人口問題，去建造一個長治久安萬年有道的新烏託邦，要用甚麼方法呢？

我們自然一方面要努力去促成三民主義的實現，但是同時也要取締天公隨意從天上海民到我們新島託邦裏來。「取締從天上海民入境」(to restrict immigration from Heaven)這句妙語，是美國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嘉佛爾(H. N. Carter)所編造的。嘉氏說：「從天上海民入境的影響，和從外國隨便移民入境的影響，完全是一樣的。」但是我們用甚麼方法去取締天公移民入境呢？就是希望大家不要不負責任的隨便生小孩子。換言之，就是希望大家結婚不要過早，養子不要過多，並且要根據淑種原理去擇配，去限制生育。這些問題，著者十多年前在播著中國人口論和在別的書報之中大致已經討論過幾次了。現在因為中國的人口問題仍然沒有解決，中國的亂源也還沒有泯滅，加以我們國民革命的勢力既日有進展，各種改革問題和建設問題，也一天多一天，在在皆與人口問題有很密切的關係，所以我們對於人口問題也應該有解決的方案和健全的政策，庶使國家民族更適於生存，而三民主義亦可早日告厥成功。所以不揣淺陋，要把這個很重大的問題提出來再行討論一次。還望邦人君子用最坦白和最開明的態度加以懇切的指正。祇要大家能够想出一些良好方法來把中國的人口問題圓滿解決了，使我們人羣社會能够永遠前進上進，使我們國家種族能够永遠適存於世界，使我們今後所建造的三民主義的新島託邦能够逃出一「一治一亂」的循環圈套，永遠長治久安，萬年有道，使我們四萬萬聖主明王，能够萬世一系，民治光華，永遠不再改朝換代。不像我們從前的舊中國數千年一個小亂，數百年一個大亂，這就是著者所馨香禱祝的！

人口問題可分為兩大部份：一為數量方面的各項問題。一為品質方面的各項問題。其次則有人口分佈問

題及人口組合問題，各與數量及品質問題有相當之關係。惟主要分類則不外數量與品質的兩方面。又數量與品質亦非毫無相互之關係，健全的人口政策對於人口的數量和品質均須兼籌並顧，不能偏重任何一方面，而忽視其他一方面。茲特於以下諸章略為分述之。

### 第三章 中國人口總數的新推測

#### 一 中國的人口總數果真祇有三萬萬嗎

近來有許多人，讀了中山全集中有幾段語語，說根據外國學者的精確調查，我們的人口差不多減少了四分之一，大家遂爲我們民族擔憂，並且大家都努力去提倡增加人口。著者不敏，亦爲最關心我們民族前途之一人。所以現在要把那些外國學者的估計調查來分析一下。中山全集中，雖曾有數處引用外國人的估計，但是並未承認此種估計如何絕對可靠。中山先生固明明說道：「中國真正的戶口總冊沒有調查清楚。」而且再四提倡要清查戶口。他舉生的演講著作，大半都還是按照四萬萬人口數目立論。所以善讀中山先生遺著的人，總要把全書讀通，而不必過於拘泥。其實中山先生是認識我們中國人口過庶的最先知最先覺。他在幼年時代，就感覺賣兒鬻女妾妾和其他種種舊俗的不合理；並且在三十六年前上李鴻章書的時候就說道：「今日之中國已大有人滿之患，其勢岌岌不可終日。嗷嗷之衆，何以安此？不急挽救，豈能無憂？」又在其他很多的地方也說道：「中國之福，非由於人少。」又說：「我們現在四萬萬人，每八人中祇有一人生產。」又說：「我們中國人現在至少總有三萬萬朝不保夕，愁了早餐愁晚餐，所以中國是世界上最窮弱的國家，並且是最愚蠢的國家。」中山先生的

重要人口理論，在本書第一章已詳細闡述之。

關於中國人口增加的快慢，我們首先要注意「四萬萬人」這個數目並不是前清乾隆時候的調查。中山先生或因「登壇之後，隨意發言，無暇參考，」遂致偶有遺忘，亦未可知。按照前清官府統計，乾隆六年的時候人口不過一萬四千多萬，乾隆末年的最高數目，亦僅為三萬一千多萬，自道光十五年（1835）起，人口始滿四萬萬，即距今僅約百年之久。至於乾隆以後人口增加較為迂緩的原因，固然由於人口總數愈大，增加愈慢，但是乾隆時代疆吏或偶有擴張浮報以迎合旨意之處，遂使乾隆以後之人口增加，表面上遂更形迂緩，亦未可知。按乾隆四十一年之人口總數，較諸乾隆三十六年之數，曾由二萬一千四百六十萬增至二萬六千八百二十四萬。即六年之中約增加五千三百六十餘萬。（參閱東方雜誌第二十四卷第十八號拙著中國近百年人口增加之徐速及今後之調劑方法）非遇開疆拓土，人口決難增加如此之速。俄人薩卡若夫（Sarkisov）在一千八百五十八年曾謂「乾隆四十年之人口曾經疆吏故意多報約四千八百萬，藉以迎合上意。此數在隨後歷年編造之戶口統計中，或均未刪去，亦未可定云。」此說或有幾分可信。假如果有其事，則乾隆末年之最高人口數目當僅為二萬六千五百餘萬，並非三萬一千萬，更非四萬萬可知。今假定乾隆末年的最高數目為二萬六千五百萬，則由乾隆末年至光緒二十八年（1903）一百零七年之間，人口曾由二萬六千五百二十萬增至四萬三千九百九十萬，計增加人口一萬七千四百七十萬或百分之六十九有奇，即每年平均增加率約為千分之五。九。但自乾隆六年起至光緒二十八年止一百六十一年之間，人口曾由一萬四千三百四十萬增至四萬三千九百九十萬，計增加

人口二萬九千六百五十萬，或二倍有奇。即每年平均增加率爲百分之六·九。此數固然不算很快，但是也不算很慢。據澳斯達利亞統計局長尼布士計得世界二十六國自一八零四年起至一九一四年止之平均每年人口增加速率爲百分之八·六，又據國際聯合會一九二七年的估計，全世界的人口自一八〇〇年起至一九二七年止，曾由八萬五千萬增至十八萬萬，即每年平均增加約爲百分之八·八<sub>六</sub>（見 G. I. Knibby, *The Mathematical Theory of Population*, 1917 及 E. A. Ross, *Standing Room Only?* p. 102）至光緒二十八年的人口總數似不能再行減去四千八百萬之理由，則因咸同年間以至光緒初年，國家多故，保甲廢弛，戶口調查，甚少舉辦。故光緒二十八年的調查和咸同年間的調查，前後既中斷甚久，頗難假定乾隆年間所浮報之數，仍然包括在內。今即從最低方面估計，謂光緒二十八年之人口總數或亦嫌太多，亦應減去四千八百萬，則該年人口總數變爲三萬九千二百萬，較乾隆末年減去同樣數目後之最高人口總數，僅增加一萬二千六百餘萬，即每年平均增加率僅爲百分之三·七。若再與道光末年減去同樣數目後之人口總數三萬六千五百萬（即四萬一千三百萬減去四千八百萬）兩相比較，則五十二年之間，僅增加人口二千七百萬，即每年平均增加率僅爲千分之一·三。蓋在此時期中，曾有洪楊之亂，捻匪之亂，回疆之亂，直隸秦晉一次災荒，秦晉閩二次災荒，與夫其他內憂外患，屢見迭出，疆土日削，民生多艱，凡此皆爲此期不能有健全增加之大原因也。惟光緒年間大亂較少，人口理應上漲，乃宣統二年的調查則較光緒二十八年曾經減去四千八百萬之人口總數，又驟然減少七八千萬之多，殊屬不近情理。所以著者十餘年前遂認爲宣統二年的人口統計甚不完全。而外國學者則持

相反的論調，竟視該年的人口調查爲有清一代最精確之數，此即美國公使樂克里耳及其他外國學者所謂中國人口僅有二萬七千萬乃至三萬萬之所由來也。著者因爲這個問題關係十分重大，很容易引起我們國人對於本國人口問題的種種錯誤觀念，所以現在要把宣統二年的調查加以縝密的分析，並仿照中山先生「攻心爲上」的辦法，來糾正外國人的錯誤，免致國人受其迷惑而使我們將來的人口政策受「此心中之打擊」，則國人或不至株守忙於養子的舊觀念，而爲印度之續。須知「存亡在虛實而不在衆寡」世界上固有以人少而亡人國者，亦有以人多而亡其國者，印度乃以三萬萬的衆民而亡其國者也。

外國學者如美國公使樂克里耳 (Bookhill) 如康乃耳大學教授韋爾柯克斯 (Willcox) 如鄂萊 (Toumey) 諸氏大都異口同聲稱贊「宣統二年的戶口調查爲有清一代調查最確之數」(參閱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in 1910, by W. F. Willcox) 與潘光旦著人文生物學論叢第六七頁及中國之家庭問題第二三九頁) 我國學者如潘光旦先生，遂亦自己不加研究，貿然崇拜外人的估計，以爲「精當遠甚」而深信不疑。潘先生謂著者對於「外國學者取材中國歷代戶口調查而爲比較釐訂以估得比較可靠之中國人口總數」「不一加參考。著者則獨嘆潘先生不能仿照外國學者將中國歷代戶口調查自行加以比較釐訂，其實外國學者對於宣統二年的調查，大都預懷成見，以爲宣統年間滿清政府掛了一塊預備立憲的金字招牌，因爲要辦選舉，遂不得不認真調查戶口。但是我們人人皆知滿清末年所掛的預備立憲招牌，無非用以撐持門面。當時內政腐敗到若何程度，歷史家自有公論，固無待我們批評。所以辛亥革命，遂如摧枯拉朽，而戶口調查也就隨着

「小產」這些事實，是誰也不能否認的。（參閱現代評論第七卷一六八期拙著關於中國人口問題答潘光旦先生一文）鄧憲宣統二年的戶口調查，其戶數或有七八分可靠，但亦不甚完備。譬如奉天僅有二十八縣，山西僅有八十九縣，江西僅有大多數縣份，四川僅有五十四縣，江蘇僅有寧屬六府之各首縣，及蘇屬五府各縣，曾有戶數調查。至於人口數目，則全國曾經調查完竣者不過四分之一，其餘尚有最多數的省區都沒有調查，而滿清遂亡。又曾有戶口調查的各省之中，亦有數省甚不完全。如山西江西僅有大多數縣份，四川僅有五十五縣，又浙江的人口調查亦甚欠完備。大致此數省的人口調查較戶數調查缺漏尤多，所以每戶平均人數均嫌過少。茲將曾有戶數及人口調查各省份之戶口總數及計得之每戶平均人數列表如下：

省	戶數正附合計	男	女	男女合計	平均每戶人數
北京(內外城)	三六、五七〇	五八、〇一九	二五、六六六	七六、四一七	五·五
順天府所屬	六三、六六六	一、九八、〇六六	一、七四、六〇〇	三、七二、六六六	五·四
直隸北京順天府及八旗除外	四、六四、〇九九	一一、五三、〇六七	九、六四、四四七	三、一、一、七四四	五·〇
吉林	七六、四六一	二、六四、〇六六	二、〇六、六〇〇	四、七〇、七六六	六·四
黑龍江	一、四一、〇三三	八、〇〇、〇三三	六、五七、四六六	一、四、五七、五〇〇	六·〇
貴州	一、七二、五三三	四、六六、六六六	三、八六、六六六	八、五三、三三三	四·八

山西(註一)	一、九六〇、〇三五	四、五六一、四四四	三、四〇〇、七一九	七、九六一、二四四	四〇
江西大部份	三、四九九、九七五	八、三三七、三九九	六、三三三、五〇〇	一四、〇五三、六九九	四二
浙江	三、八六六、三三二	七、〇〇五、〇六一	五、二六九、三三七	一二、九三三、三九九	三三
四川(註二)	三、三三九、七七	七、三三三、〇三〇	五、〇〇一、九六〇	一二、四四五、〇九〇	三九
總數	三〇、三三三、五七	四九、〇六五、二五	三〇、〇三三、三五	六六、三六八、五六	四三
晉贛川浙 外之總計	七、七三七、三三〇	三三、六二二、三五	一八、三六〇、九九	四〇、九八八、三四	五一

(註一)戶保全省數，口保八十九縣數。(註二)戶保五十五縣數，口一百二十五縣數。

據上表觀之，山西江西浙江四川四省的每戶平均人數顯屬過低。其原因乃由於宣統二年的戶口調查，係根據民政部頒布之調查戶口章程，先調查戶數，俟戶數查得之後，再從事調查人數。兩種調查既非同時舉行，前後參差，錯誤必多。而人數調查復較戶數調查困難甚。且當時祇由官廳將調查表分給各戶填報，並未加以覆查，是以有些省份少報人數甚多。且尚未全部調查完竣，遂行啓奏。譬如浙江人口平均每戶僅三人有奇，即最大多數家庭均由一夫一妻與獨生子組織而成，纔能小到如此地步，這是完全不近情理。劉光華先生說得好：「我國向來缺乏健全的集權的國家組織，上下官廳間的統屬關係不嚴。尤其在清末，中央既沒有威信可以統馭地方，數字的觀念又很薄弱，且沒有統計的知識，人民對於這種調查更沒有相當的了解，又不出巨額的調查費，只

漫然令其進行，其報告之不近事實，是可想而知的。」（新生命月刊第一卷二號劉光華著中國的人口問題）

所以前表所列會有戶數和丁口調查各省區總平均每戶四·三人之數，在中國的大家庭狀況之下，實在是太小，不足為信。乃美國康乃耳大學教授韋爾柯克斯竟根據這個每戶平均四·三人之數，來推得中國全國的人口總數為二萬九千四百餘萬有奇，豈不是「低得可笑」嗎？韋氏曾說道：「美國的家庭在一七九〇年之際每戶平均人數為五·七人，隨後逐漸減低約每十年減低十分之一人，至一九二〇年每戶平均人數減至四·三人。至於中國的家庭，則在此期間內或無甚變遷，雖有變遷，亦不能如美國之甚。」韋氏既明明承認美國今日的小家庭制度係由逐漸演進而來，中國的家庭既尚未經過這個演進的階級，則每戶平均人數應與美國工業革命以前或十九世紀初中葉的家庭相彷彿，而不能僅為四·三人可知。乃韋氏竟拋棄宣統二年民政部所計得較為切近事實之每戶平均人數（即五·五人），而以四·三人代之，豈不是自相矛盾嗎？韋氏以為每戶四·三人之數較民政部所用每戶五·五人之數更為精確，孰知反離事實愈遠，凡此皆由於韋氏不甚明瞭中國社會的狀況和歷史的背景之故。

關於此點，金陵大學農學院卜凱教授（Prof. J. L. Buck）曾根據該院歷次舉辦鄉村調查之結果，與韋氏通信數次，否認韋氏的估計，視為太低，故韋氏新近復根據兩個假定，（一個是假定宣統二年的人口少報女子甚多，一個是假定二歲以下的小孩均未列報）並參照一九一〇年印度人口一〇〇與九五·四的男女比例，及一九一一年日本人口二歲以下兒童佔二歲以上人口百分之六的比例，而將其原來計得之每戶平均

四・三人之數目加以更正，求得每戶平均爲四・九人，並推得中國人口總數約爲三萬三千四百九十餘萬，即較韋氏原來的估計增多四千餘萬矣。惟著者以爲此平均每戶四・九人之數仍與事實不合，因韋氏這兩個假定的根據殊嫌薄弱也。鄙意不如將前表所列山西江西浙江四川四省不完全之數一概除外，而求得其餘各省區之每戶平均人數爲五・二人，尤爲切近事實。此每戶平均人數，較宣統二年民政部所用每戶平均五・五人之數稍低，惟民政部所用之每戶平均數，顯係根據北京內外城的戶口而求得者。至於每戶五・二人之平均數，則係根據北京內外城與順天府及直隸吉林黑龍江貴州六省區的戶口而求得者。故每戶平均五・二人之數，當更能代表全國一般戶數的大小無疑。

按韋氏以上兩個假定，皆不能視爲完全合理。一則男女比例，各國不同，不能強冠李戴，強以印度的男女比例爲中國的比。二則二歲以下之兒童容或少報甚多，但不能視爲概未列報，而根據日本人口的年齡組合，一律增加等於二歲以上人口百分之六之兒童數目。觀於下表所列按照這兩個假定所計得之每戶平均人數，在戶口調查較爲完備之各省區均嫌過高，則韋氏的修正估計之不能成立，又不攻自破矣。

省 區	戶 數	二歲以上之男女數目		二歲以下之兒童		人口總數	每戶平均人數
		男	女 (等於男子百分之九五)	男 (等於二歲上男百分之六)	女		
北京(內外城)	一六,五〇〇	五〇,〇〇九	四二,六二八	五,四三六	一,〇〇,〇七五	七六	

順天府	六九二,六六六	一,九八〇,五九六	三三三,九六六	四二,一五五,五五五	五,九
直隸前兩區及八旗除外	四,一四〇,〇八九	二,五三〇,〇六七	一〇,九四〇,五三四	一,三四六,三三四	三三,八三四,七五
吉林	七九〇,〇〇〇	二,六六六,〇六六	二,五五〇,〇二二	三,四一,五五	五,五五〇,〇〇〇
黑龍江	二四〇,〇〇〇	八〇〇,〇〇〇	七九〇,〇〇〇	九四七,七五	一,六七〇,三三七
貴州	一,七七七,五三三	四,六六六,六六六	五,四四四,四四四	四,五五五,〇〇〇	九,四四四,〇六六
總數	七,七七七,五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三	三三,〇〇〇,〇〇〇	二,五〇〇,〇〇〇	四,五,七七八,六六六

是以韋氏先後計得之兩個每戶平均數，一為四·三人，一為四·九人，均不能適用，遠不如本文刪去不完全省份所計得每戶平均五·二人之數。尤為切近事實也。

至於宣統二年的全國戶數，雖較人口數目差強人意，但亦有數省區缺漏頗多。其中缺漏最多者為四川，奉天，江蘇；其次則為山西，江西；又內外蒙古及西藏，青海，川邊，除八旗戶口外，大都罕有調查。故所列全國戶數統計共五千九百八十四萬五千四百六十一戶之數，尚須比較釐訂，分別增補，方能代表全國。韋爾柯克斯教授曾根據四川五十五縣已有之戶數統計，用添插法，推得四川全省一百七十五縣之戶數為一〇,三九四,一九四戶，奉天全省戶數亦增為一,五五九,六七二戶，惟對於其他調查缺漏之各省區，則並未增訂。著者以為山西全省一百零五縣之戶數，亦應按照同樣方法，至少增加二五〇,〇〇〇戶，即全省約為二,二四二,八〇〇戶。又江蘇全省之

戶數，其曾經調查者，祇有清屬六府各首縣及蘇屬五府各縣，蘇屬雖包括全部，而清屬六府各首縣以外之其餘各縣，則均無調查。故清屬全部戶數至少應等於所報各首縣戶數之三倍或為二，九三四，〇一八戶，外加蘇屬全部戶數即全省約為五，一〇四，一四六戶。又江西之戶數調查祇為全省之最大部份，至少亦可增加一成，或三四四，〇〇〇戶，即全省共為三，七八三，八六〇戶。他如雲南全省之戶數僅為一，五四八，〇一四戶，反較貴州少二二三，五一九戶。又廣西全省之戶數僅為一，一七四，五四四戶，反較貴州少五九六，九八九戶，似亦於理不通，均不能視為確數。故雲南至少應增加二二〇，〇〇〇戶，廣西至少應增加五五〇，〇〇〇戶。故章氏計得之十八行省總計戶數為六四，五三九，四七九戶，二十二行省總計戶數為六七，五八六，二九四戶，著者計得十八行省總計戶數則至少為六七，八五九，四九一戶，二十二行省之總計戶數至少為七〇，九七六，三二六戶。鄙意宣統二年二十二行省之實在戶數或尚不止此。關於此點，我們可用乾隆十八年的全國戶數來間接證明。蓋乾隆十八年的全國戶數即有三八，八三五，三五四戶，到宣統二年已經過一百五十六年之久。我國家庭，通常罕有三世以上不分別者，按照每三十年為一世計算，則中間已經過五世。假定每三世之中每戶僅分為二戶，則到宣統二年之時，當有一五五，三四一，四一六戶。（即等於乾隆十八年戶數之四倍）假定在此期間因家敗人亡，凶年饑饉，戰爭禍亂，及割讓領土所損失之戶數，多至此可能的總數之一半，則宣統二年的全國戶數，亦應有七七，六七〇，七〇八戶，假定二十二行省之戶數佔全國戶數百分之九十五，（按前清戶口調查，大都邊民祇計戶，腹民則計戶復計丁，故乾隆十八年的戶數，大致包括藩屬在內。可惜該年的人丁數目缺漏甚多，與宣統二年如出一轍。惟乾隆二

十二年之人丁數目則爲一萬九千萬人，故十八年之人丁數目當有一萬八千餘萬，或每戶亦約爲五人之譜。則宣統二年二十二行省之戶數應有七三，七九〇，〇〇〇戶之多。其實三十年爲一世，在今之歐美國約略相當，但在中國，則二十年至二十五年卽爲一世，故宣統二年二十二行省之戶數卽以七五〇〇〇，〇〇〇計，亦不能視爲過多也。

是以宣統二年二十二行省的人口總數，按至少七〇，九七六，三二六戶及每戶平均五·二人計算，應有三萬六千九百零七萬七千人。而蒙古，西藏，青海，西康，熱河，察哈爾，綏遠之人口以及其他苗蠻黎夷羅羅西番諸原始民族之人口，尙不在內。關於蒙古西藏之人口，按照英國前駐華公使樂克里耳一九一二年之估計，一爲一百八十萬人，一爲二百萬人。據著者意見，蒙藏人口或不止此數，姑採用之。又青海，西康，熱河，察哈爾及綏遠等區在宣統二年均無全部戶口調查，據各地理書上的記載歸納起來，至少亦有九百六十萬人左右。關於其他原始民族，按照張其昀君之估計，共約數百萬人，其中苗人約佔一百五十萬。又按照廣東省政府民政廳之報告，黎苗二族人口亦達數百十萬人。（見張其昀著中國民族志第一二一頁至第一二五頁）故宣統二年全國的人口總數至少應有三萬八千五百萬人。其各省區之人口概數約略如下：

## 二十二行省

三六九，一〇〇，〇〇〇

熱河察哈爾綏遠西康青海

九，六〇〇，〇〇〇

（熱河西康各約三百萬察哈爾青海各約一百五十萬綏遠約六十萬）

蒙	古	一、八〇〇、〇〇〇
西	藏	二、〇〇〇、〇〇〇
苗、僮、黎、夷等 各原始民族		二、五〇〇、〇〇〇
全 國 人 口 總 計		三、八五〇、〇〇〇

上表所列三萬萬八千五百萬人之數，乃吾人最低之估計。若二十二行省改按七五〇〇〇〇〇〇戶計算，則宣統二年之全國人口總數當有四萬萬零六百三十萬人矣。於此可見十餘年前拙著中國人口論初版中所謂「宣統二年之人口總數至少當在三百五十兆以上乃至四百兆，決不止三百二十餘兆」一語，並非憑空杜撰，毫無根據。一般迷信外國少數學者之估計，以為中國人口僅有二萬七千萬乃至三萬萬者，當可稍釋疑慮矣。

## 二 最近人口繼續增加的新左證與全國人口的新推測

吾人若將最近已有新的人口調查各省分之戶口統計與宣統二年之戶口統計互相比較，便知宣統二年之戶口調查甚不完全。按最近曾舉辦新的人口調查之省分，有浙江、江蘇、安徽、山西、陝西、廣西等省。此項新的人口調查，雖不能視為十分精確翔實，然大致較諸從前的戶口調查總算稍有進步，而且可以證明中國人口之有增無減。所以著者個人並不擔憂我們人口的減少，反而擔憂我們人口的過庶，蓋十餘年如一日。並且還望今後

爲我們人口過庶擔憂的「同志」能够一天加多一天，中國的人口問題才有解決的希望，中國民族前途才可  
以大放光明，和世界其他最優強的民族並駕齊驅哩！

茲據國民政府立法院統計處及著者個人所搜得之各省最近戶口統計與宣統二年之各省戶口統計，作  
一簡略比較如下：

省區	宣統二年戶數	民國十七年戶數	宣統二年人口數目	民國十七年人口數目	人口增加率
江蘇	(甲)一,〇〇〇,〇〇〇 (乙)一,〇〇〇,〇〇〇	六,六九五,五三三	(甲)一六,三七〇,二九七 (乙)一六,五五四,三九九	三〇,九九二,〇〇〇	
浙江	三,六六六,三三三	四,六四六,八三三	(甲)一三,九三三,三九九 (乙)一三,九三三,三九九	一〇,〇六三,〇〇〇	
安徽	三,一四四,一六四	三,七〇三,三三三	一五,三三〇,一三三	三,三七五,三三三	
山西	(甲)一,六二二,九〇〇 (乙)一,六二二,九〇〇	二,三三三,三三三	(甲)七,九九九,一六四 (乙)一,六二二,九〇〇	二,〇六七,三三三	
陝西	一,〇〇〇,〇〇〇	二,一〇三,〇〇〇	八,三三七,〇〇〇	二,〇二二,七〇〇	
廣西	(甲)一,一七三,五五五 (乙)一,一七三,五五五	一,八五五,六六六	(甲)八,二二〇,六六六 (乙)八,二二〇,六六六	一〇,二二〇,六六六	
共計	(甲)一,七三三,三三三 (乙)一,七三三,三三三	三,三三三,三三三	(甲)一六,六六六,六六六 (乙)一六,六六六,六六六	二二,〇〇〇,〇〇〇	(甲)一〇,〇〇〇 (乙)一〇,〇〇〇

(附註)(甲)爲調查報告之數(乙)爲比較蓋訂之數

據上表觀之，可知民國十七年，已有新的戶口調查之各省分，其人口自宣統二年以來大都均有顯著之增

加；且無論黃河流域，揚子江流域，或珠江流域之人口，皆有加無已。此則極堪注意者也。如果宣統二年的調查認為精確可靠，則近十八年之間，江浙皖魯豫桂六省之人口會由六六，九八二，〇七五人增至一一，〇七四，九四〇人，或共計增加四五，〇九二，八六五人。用人口增加的普通公式，求得該六省近十八年間之平均人口增加率為千分之二十九。此數實屬太高，即等於歐美現時人口增加率之兩三倍，顯然不近情理。足見宣統二年的戶口調查遺漏甚多無疑。其計算法如下：

$$\begin{aligned} \text{Log}(1+r) &= \frac{\text{Log}P_n - \text{Log}P_0}{n} \\ &= \frac{\text{Log}112,075,000 - \text{Log}66,982,000}{18} \\ &= \frac{8.049509 - 7.825953}{18} \\ &= \frac{.223551}{18} = .012419 \\ 1+r &= 1.029 \end{aligned}$$

但按照著者釐訂之估計，則宣統二年該六省之人口總數應為九一，〇六二，四三六人。近十八年間該六省之人口共計增加二一，〇二二，五〇四人，用同樣公式求得該六省近十八年間之平均人口增加率為千分之十一，此數實遠較合理。其計算法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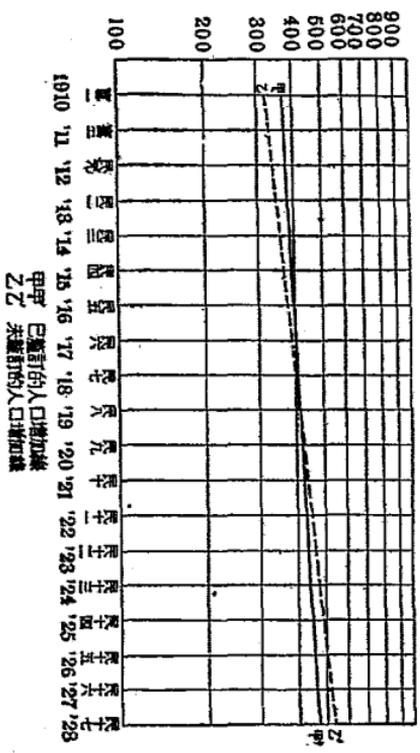
$$\text{Log}(1+r) = \frac{\text{Log}112,075,000 - \text{Log}91,062,000}{18}$$

$$= \frac{8.049509 \cdot 7.959387}{18}$$

$$= \frac{.090172}{18} = .005009$$

$$1+r = 1.0116 \cdot r = .011$$

宣統二年至民國十七年底人口增加圖



於此可見著者所估得宣統二年全國人口爲三萬八千五百萬之數，實遠較前清民政部當時所計得三萬二千九百餘萬之總數，與外國學者所估得二萬七千萬乃至三萬三千餘萬之數皆遠較精確。今以該六省近七八年間之平均人口增加率爲標準，便可得全國現在的人口總數約爲四萬七千三百八十餘萬人，爲數不可謂不巨。其計算法如下：

$$\text{Log } P_n = \text{Log } P_0 + n \text{ Log } (1+r)$$

$$= \text{Log } 385,000,000 + 18 \times \text{Log } 1.011$$

$$= 8.585461 + 18 \times .005009$$

$$= 8.585461 + .090162$$

$$= 8.675623$$

$$\therefore P_n$$

$$= 473,830,000$$

此數如果切實，則我國現時之人口總數殆與全歐洲之人口相埒。但歐洲諸國共有數倍於歐洲面積之殖民地以供給其本國人口之種種需要，而我國人口與土地之比例，則不如歐美諸國遠甚。無怪我國民窮財匱，困苦顛連，生活艱難，遂於極點。處今日之世界尙有林林總總之異民，這二十二省區，其他亂象危機，亦仍然應有盡有。此著者所以爲我們「青天白日」旗下之民生問題慮也。按民國十七年江蘇安徽兩省的人口調查較諸宣統二年已經釐訂之數仍增加甚多，此種情形或因魯豫等省近年飽受天災人禍，有一部份人民曾遷入蘇皖亦

未可定。今即將上列已有新的調查之六省平均增加率減去一成，然後用以推測全國的人口總數亦有四萬六千零五十一萬之多。其計算法如下：

$$\text{Log } 385,000,000 + 18 \text{ Log } 1.01 = 8.585461 + 18 \times .004321$$

$$= 8.585461 + .077778 = 8.663239$$

∴  $P_n$

$$= 460,510,000$$

讀者或疑著者之估計為數過巨，但外國學者所釐訂宣統二年之人口統計如果確切，並假定宣統二年以後之人口增加率果真為千分之二十九，則中國現時之人口總數，當有五萬五千零四十八萬之多。其計算法如下：

$$\text{Log } P_n = \text{Log } P_0 + n \text{ Log } (1+r)$$

$$= \text{Log } 329,000,000 + 18 \text{ Log } 1.029$$

$$= 8.517196 + 18 \times .012419$$

$$= 8.517196 + .223551$$

$$= 8.740741$$

∴  $P_n$

$$= 550,480,000$$

故外國學者對於宣統二年之人口估計，雖較著者之估計約少七八千萬乃至一萬萬，然根據彼等之估計

所計得之人口增加率，則較諸根據著者之估計所計得之人口增加率約多兩倍半，有奇。是以根據彼等之假定所計得之現時全國人口總數，反較根據著者之假定所計得之總數多六七千萬。因按照著者之估計所計得之增加率，全國人口約六十年增加一倍，若按照外國學者之估計所計得之增加率，則二十四年即可加倍也。其計算法如下：

$$(1) \quad n \log 1+r = \log 2$$

$$n = \frac{\log 2}{\log 1.011}$$

$$= \frac{.30103}{.005009} = 60.4^{\text{年}}$$

$$(2) \quad n \log(1+r) = \log 2$$

$$n = \frac{\log 2}{\log 1.029}$$

$$= \frac{.30103}{.012419}$$

此又足證明外國學者之估計爲全不合理。至於著者對於宣統二年戶口統計所釐訂每戶平均五·二人之數，亦有各種新統計，證明其並非過高。蓋新近各種戶口調查之每戶平均數，亦以五·二人左右爲最普通也。茲將民國十七年曾有戶口調查各省分每戶之平均人數列表如下：

省	分	每戶平均人數
江	蘇	五、一〇人
浙	江	四、四四人
安	徽	五、八二人
山	西	五、二七人
陝	西	五、六〇人
廣	東	五、八七人
六省總平均		五、二一人

又民國十七年曾有戶口調查之各大城市每戶平均人數如下：

城		市		每戶平均人數
九	燕	安	寧	
江	湖	慶	波	四、七五八
五、〇九八	五、三二八	五、七三八	四、七五八	五、〇八八
杭	武	天	北	五、二九八
州	陽	津	平	五、一八八
五、〇八八	五、二九八	五、一八八	五、〇一八	五、五八八
南	上	京	海	四、九八八
五、五八八	四、九八八	四、九八八	四、九八八	



加率，較著者所計得之自然增加率尚多百分之三。二，即每四十九年人口便可加倍。（此項加倍年數乃著者根據喬先生原文所列之自然增加率而計得者）足見中國現時人口之增加仍極為猛速。此外喬先生並查得已婚女子在年齡十五歲至四十四歲間之生產率為百分之二八五，實高過世界任何國家，故斷定『早婚多產』為我國人口問題的一大危機云。（喬啓明著中國鄉村人口問題之研究金陵大學農林科刊行並載東方雜誌第二十五卷第二十一號）喬卜兩教授舉行鄉村人口調查所計得之每戶平均數與著者根據宣統二年戶口調查所計得之每戶平均數，讀者若覺過高，則尙可援引印度與日本戶口統計之每戶平均人數以資比較。茲將英文百科全書與一九二六年英文印度年鑑內所載印度歷次戶口統計及每戶平均人數列表如下：

調查戶口年度	人口總數	每戶平均人數
一八七二年	二〇六、一六二、三六〇	未詳
一八八一年	二五三、八九六、三三〇	五·八人
一八九一年	二八七、三一四、六七一	五·四人
一九〇一年	二九四、三六一、〇五六	五·二人
一九一一年	三一五、一五六、三九六	四·九人
一九二一年	三一八、九四二、四八〇	四·九人

又查日本一九二五年十月一日戶口統計報告中所列一百零一城市之每戶平均人數，其最多者為五·七人，最少者為四·二人。茲將各該城市之每戶平均數歸納如下：

每戶平均人數	城市數目
每戶 五·〇人以上至五·七人者	三十六城
每戶 四·五人以上至四·九人者	四十五城
每戶 四·五人以下至四·二人者	二十一城

(附註)上表所列每戶平均數係根據一九二六年英文日本年鑑

按日本工商業之發達雖駕乎我國之上，然每戶平均人數在四·五人以上乃至五·七人之城市仍佔最多數，足見中國十六大城每戶平均五·〇八人之數，並非過高也。

綜觀本章對於宣統二年戶口調查所比較釐訂之每戶平均人數及當時之人口總數，與夫根據最近有新的戶口調查各省區之人口統計所得自宣統二年以來之人口增加率，以及現時的全國人口總數，便知我國的人口，不但沒有減少四分之一，而且增加了七千五百萬。即十八年之間，曾由三萬八千五百萬增加到四萬六千零五十一萬，或每年平均約增加四百萬。我們最近十八年間所增添的人口，是比日本現在全國的人口還要多一千多萬，比歐洲法國的人口幾乎要多一倍之譜。或者有些人說我們的估計為數過高，但著者以為這個人

口總數，可以算是我們根據現有的統計材料所估得的最精密數目了。按照去年三月二十二日時事所報北京專電及同日申報專電，北京郵政局發表之全國最近人口總數爲四億八千五百五十一萬，過去四年之中共增加四千九百四十一萬，即較諸著者之估計尚多二千餘萬。至於黎世衡陳啓修兩先生的估計，則又比郵政局的估計更多哩！現時國民政府立法院正着手戶籍法起草，又行政院內政部與立法院統計處及京內其他統計機關現正籌辦全國戶口調查。我們很希望全國於可能的最短期間，能夠有很精密的國勢調查和很完全的戶口統計與生命統計，以爲實現各種大政方針和決定健全的人口政策之根據標準。其有裨於國家民族前途，誠未可限量也。

我們現時的人口增加既如此迅速，我們人口的數量既如此龐大，我們人口的壓迫既如此緊張，誠爲中山先生三十六年前所云，「不急挽救，豈能無憂？」我們的人口自前清乾隆六年以來是差不多增加了三倍有半，我們的領土自前清乾隆以來是差不多削減了一小半，我們翻閱國恥地圖，不得不爲我們民族前途危。我們今後「人民既日有增多，土地則不能日以加廣，將來荒土既墾之後，人民之溢於地者，將仍有饑饉之患。」我們現時人口雖已一再加倍，然而我們的國力是「依然故我」；我們的國計民生是加倍困窮；我們的國際地位仍然是「次殖民地」；我們的民族仍然是味弱不競；我們的國家仍然混沌紛亂；我們的社會仍然是黑暗愚蒙；我們的國民仍然是一盤散沙；我們的一般青年仍然是「未修其身，先齊其家」；我們一般已婚婦女死於多育難產的，是超過世界任何文明國家；我們男子多過女子的比率，是高於世界任何國家；我們的嬰兒死亡率是高於世

界任何國家；我們的天災人禍是仍然蔓延全國，多於世界任何文明國家；我們一般國民心理素所崇拜的「三多」是祇展下了「一多」；我們的人口是不久就要達到最高死亡率與最高生育率完全「正負相消」的「飽和點」。乃國內的樂觀派仍然說道「中國現時尚無所謂人口問題。」一般淺見者流，更是如醉如夢，迷信多生主義，努力去提倡增加人口。吾恐他們提倡增加人口的結果，無非使我們民族已經旋轉太快的「生」與「死」兩個大輪迴，再行加快，以自速國家種族的滅亡罷了！昔「宋人有憫其苗之不長而揠之者，芒芒然歸，謂其子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長矣。其子趨而往視之，苗則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長者寡矣。以為無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長者，揠苗者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據著者的管見，我們欲提高國際的地位，人民的程度，和人生的價值，欲增進人民的福利，種族的健全，和社會的安寧，欲尊重人民的生命，全羣的生活，和國家的生存，欲發展人民天賦的本能，和創造的力量，欲維持文明的進步，和文化的長興，我們不但不要再鼓勸多生，而且還望大家努力去灌輸西方諸國調劑人口和改良種族的各種健全學理和健全方法。一面要限制「天公」隨意移民到我們島託邦羣來，以減輕我們人口的壓迫，一面也要要求「天公」多送一些健全優秀的小孩子，少送一些劣弱低能小孩子到我們島託邦來，以增進我們種族的健康。所以我們還望大家一致歡迎「節孕」與「優生」兩個「並蒂連理」的大運動，為精深的研究，作正當的宣傳，使國人養育有節，淑種有方，共開好花，共結好果，然後我們的國家可以返老還童，久安長治，我們民族的新生命可以脫胎成長，世代光昌，我們羣衆的共同生活和個人生活可以完全美滿，長樂永慶。這就是我們研究人口問題的最高使命！

自本章脫稿提前登入立法院統計月報及建國月刊之後，吾友陳華寅先生復將在華多年的美國學者浩澠君關於中國人口問題之論文三篇（Chinese Population Figures, China's Population and Present Census, and The Present Population of China. By Harry Paxton Howard）舉以見示。浩澠氏對於中國近數十年的人口統計頗有相當的研究，其所得之結論亦與著者的結論大致相同。其所估計的全國人口總數及人口增加率且較著者之估計為高。足見著者之估計並未稍事鋪張。浩澠氏首言前駐華美國公使樂克里耳及其他少數外國學者對於中國人口的意見之錯誤，并深惜有些中國學者被其迷惑，甚至中山先生亦受其蒙蔽。遂致許多人對於中國的人口現狀均發生很大的誤解。浩澠氏曾將太平天國以後比較重要的各項人口總數分別釐訂列表如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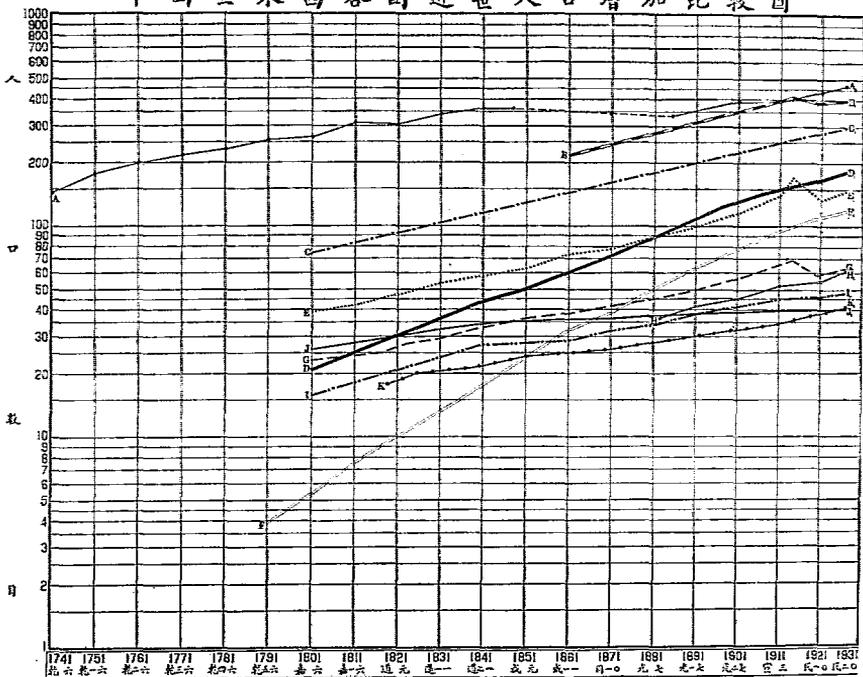
一八八五年	光緒十一年	三三七、〇〇〇、〇〇〇	浩氏釐訂之十八省總數
一九一〇年	宣統二年	三八四、五〇〇、〇〇〇	浩氏釐訂之二十一省總數
一九一九年	民國八年	四四七、四七五、〇〇〇	基督教中國續辦委員會所估全國總數
一九二〇年	民國九年	四三四、〇六三、〇〇〇	郵政估計廿一省總數
一九二三年	民國十二年	四四四、六五三、〇〇〇	海關估計
一九二八年	民國十七年	四八二、八〇八、〇〇〇	郵政估計廿一省總數

一九二八年	民國十七年	四八九、五五七、〇〇〇	浩氏蓋訂之廿一省及熱察綏總數
一九二八年	民國十七年	四九七、〇四七、〇〇〇	浩氏蓋訂之全國總數各原始民族除外

右表末項所列全國人口總數係包括新疆、外蒙、西藏、青海、川邊共約七、四九〇、〇〇〇人在內。至於全國的原始民族據浩氏之意見約有數百萬。故中國的人口總數現已超過五萬萬，即大於全歐洲的人數。此外浩氏並計得中國近二十年來的每年人口增加率為千分之十三，按照此項速率，人口約每五十年增加一倍。換言之，今後的中國人口如果按照近二十年間的速率繼續增加，則再過三十年（即民國四十九年）便可增加到七萬五千萬之鉅數。是以中國若不採用人為的限制人口方法，則人口的壓迫將更加嚴重，餓饉亦必愈多。一切賑災的方法不過擴大糧食缺乏的區域，而中國的經濟前途將愈感困難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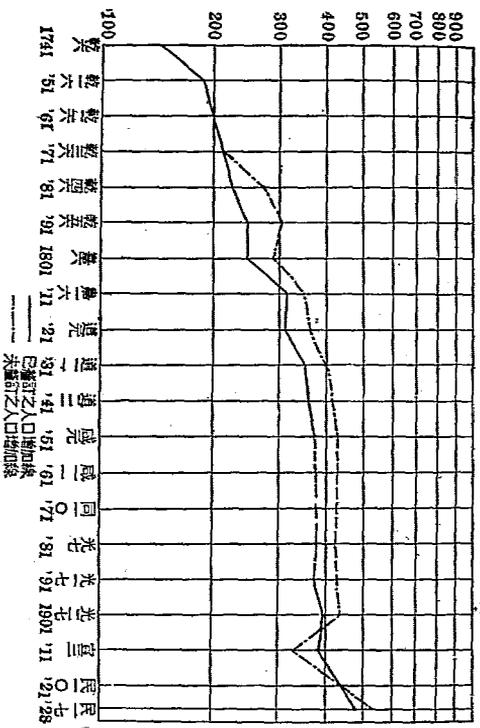
此外並據友人朱祖晦先生新從美洲返國言及韋爾柯克斯教授最近已將其關於討論宣統二年中國人口統計之論文作第三次的修正，求得中國人口總數為三萬九千萬，即較諸氏第一次的估計約多一萬萬矣。惟簡氏之修正論文尚未付梓，姑誌之以待證實。（著者補誌）

# 中國暨東西各國近世人口增加比較圖



A A. 中國 B. 日. 俄. 英. 丹. 麥. 芬. 蘭. 奧. 斯. 大. 利. 亞. 英. 國. 美. 國. 法. 國. 德. 國  
 C. 德. 國. 丹. 麥. 芬. 蘭. 奧. 國. 奧. 國. 法. 國. 德. 國. 及. 奧. 斯. 大. 利. 亞. 等. 國  
 D. 德. 國. 俄. 國. 日. 本. 11. 英. 國. 12. 法. 國. 13. 意. 大. 利.

自乾隆六年起至民國十七年止中國人口增加圖



第三卷 中國人口發展與經濟

## 第四章 如何維持「超出物種原則」的人口密度

### 一 人口最易過庶的根本原因

大凡人類愈進化，其超過維持種族生存所需要之餘剩生育力愈巨，而人口增加的可能速率亦因此加大。洪荒時代，人類所處的境遇較諸今日危險千百倍，凶惡千百倍，困難千百倍，辛苦千百倍，不知經過了幾千百萬年，始演進到現在所具的體格形象和現在所具的智識腦力。及創造到現在所有的生活狀況和現在所處的環境，在此長期的進化過程中，人類因得天獨厚，逐漸戰勝其他物種。當初僅戰勝目所能見的各種生物，今則逐漸戰勝目所不能見的微生物。人類死亡率率遂較洪荒草昧時代大大減低。人類之增加遂因此異常迅速，人類的生育力亦因此遠超過維持種族繁殖的實在需要。在自然界中凡遇任何一種生物過分繁殖之時，必受天演的嚴厲裁汰，以恢復各種生物之均衡。其裁汰之法，不外生存競爭，弱肉強食，優勝劣敗。此種裁汰方法，或為異類的物種互相殘殺，或為同類的物種自相殘殺，其結果則一也。人類既強於其他一切生物，既比較不易供其他生物之犧牲。此為人類最易過分繁殖之第一大原因。人類既最易過分繁殖，於是殘殺其他物種之不足，更進而互相殘殺。是以人類前此之自相殘殺，恐較其他各種生物之自相殘殺尤為普通。美國總統胡佛爾說：「人類

已往之歷史，殆爲鮮血所塗成，未非無因。在下等生物之中似罕有大規模的自殘同類。因其多數的同類和所生的幼子皆被他種生物蠶食鯨吞，故比較不易過分繁殖，即比較無自殘同類之必要也。但今後的人類既逐漸承認互相殘殺不是裁制過分繁殖的良好方法，而殺嬰，溺女，乃至打胎，亦逐漸認爲不合人道，分別加以法律禁止。人口當更易過庶。遂不得不想出其他良好方法以資調劑。

人類最易過分繁殖之第二大原因，則爲支配環境與抵抗環境的力量遠過於他種生物，並且這種力量是隨着科學發達而日有進步。許多下等生物皆「春作夏長，秋斂冬藏。」故「生」與「死」的輪迴多半都是每年旋轉一次。此外並有許多生物，大都「澤地弗良。」即生於熱帶者或不能在寒溫兩帶繁殖；生於溫帶者或不能在寒熱兩帶繁殖；或生於寒帶者又不能生在溫熱兩帶繁殖。此種情形，非特由於生物本身缺乏抵抗環境的能力。而且每因環境一經變遷，則其維持生存所必需之養料驟感缺乏，自無繼續繁殖之可能也。人類則除不能水陸兩棲之外，大都在寒溫熱三帶均能生活，不過在溫帶尤爲相宜耳。且人類雖不能在水中生活，然許多養料及其他需要仍可向水中取得之。（英國前經濟學大家馬廬爾曾謂將來人類繼續增多，恐大洋公海亦必次第變爲有主權之物各自圍定區域分別管理云。）加以人類壽命較長，故能「大父尚存，子又抱孫。」甚至像我們民族繁衍加快的時候，竟能達到「五世同堂」的速度。一般人類既非如許多的下等生物「秋斂冬藏」每年大淘汰一次，相率死去。於是人口的總數量逐日積月累，年多一年。加以社會愈安定，科學愈昌明，人類的死亡率亦愈低落。此又爲人類最易過分繁殖之一大原因。

人類最易過分繁殖的第三個大原因，則爲人類愈進化，其兩性之生育力似亦隨之增大。生物學家達爾文與現代英國人口學家卡爾萊德爾斯（A. M. Carr-Saunders）均抱此種見解。大致環境愈佳美，生活愈豐富，以及人民愈健康，種族愈優強，則其兩性之生育力亦愈大。斯賓塞爾（H. Spencer）所謂「人類愈進步，個性愈發達，個性愈發達，生育力愈低減」之說現已證明不能成立。美國社會學家洛士及人口學家雷特爾均謂大學女子之減低生育量完全由於遲婚節育，並非由於大學女子之生育力不如尋常女子云。（參閱 Carr-Saunders, *the Population Problem*, Ch. V; E. A. Ross, *Standing Room Only?*, pp. 7-9; E. B. Rauter, *Population Problems*, pp. 164-165）又希卜（W. Heape）與愛理士（Havaloak Ellis）亦謂人類之性欲與生育力似均隨文明的進步而有增加。按此種論調與吾國俗諺所謂「飽暖思淫欲」及「有錢人娶妻過冬夜，無錢人凍一夜」與洪亮吉所謂「性欲強弱由於秉賦」的，一番話語，正是意義相同，並非含有何種高深哲理。不過「人無遠慮，必有近憂」人類對於與國家社會及家庭子女休戚相關的生殖行爲，如果不加考慮任性濫用，必定會因人口過分繁殖而引起激烈的生存競爭，並使大家又復回到「天下之亂若禽獸然」的原有狀況耳。

現在全人類的生育力是大大超過維持全人類最高幸福所實在需要的生育量。故人類的生育力非特不隨文明進化而減低，反隨文明進化而增大。惟人類的生育力（fecundity）雖隨文明進化而有增無減，人類的生育量（fertility）則將隨文明進化而逐漸減低，此乃必然之趨勢。生育力與生育量這兩個名詞，意義各

殊，不可互相混淆。生育力是指女性在養子期間能够生殖的總能力而言，即等於女性產卵期間的生育能力之總和。至於生育量則指女性在孕育的數量而言，即等於實在受精成胎的卵子數目之總和。故女性之生育力好比像雌雞畢生產卵的能力一樣，生育量則好比像雌雞畢生所孵雛雞的數目一樣。現時人類女性產卵的時期是大約每隔二十八天產卵一次，而繼續產卵的總期間則每人約有三十年之久。每代每女性一人產卵之總數約為六萬左右，而每一女子的最高生育力可達二十人。即數倍於維持種族生命所需要之數量。將來種族繼續進化，女性產卵的總期間或更能加長，亦未可定。至於男性的生育力則更是無法計量了。大致人類的生育力猶如人類其他的創造力一樣，各隨種族進化與文明進步而增大。爲人類福利計，生育力要大，生育量則要小。生育力之增大乃種族健全之表徵，生育量之減小則爲文明進步之表徵。因此這兩個「力」與「量」如果能夠分開並善於應用，善於節省，實爲增進男女兩性及所養子女的最大幸福與最大健康之要素，亦爲維持全人類社會的最大經濟與最大調和之要道焉。

## 二 人口增加能夠如何迅速

我們祇要略舉幾個人口學專家的計算，便可知道人類繁殖之速，實在令人可驚！現時世界許多國家的人口都是六十多年即可加倍。我們中國現時的人口按照前章所述，也是六十年便可加倍。若按照金陵大學蕭卜爾教授舉辦小規模鄉村人口調查所得的結果推算，每四十九年便可加倍。按照人口學家卡爾桑德爾斯的計

算：「假定一百萬的人口同年產生男女各半，並假定這些男女同時結婚而且每雙夫婦皆於二十歲以前各養子女二人，亦男女各半；並假定每雙夫婦活到滿二十歲時，即同時死去；此一百萬之子女亦同時結婚皆於二十歲以前各養子女二人，亦男女各半，且於活到滿二十歲時亦同時死去。則在此種情形之下，人口當常為一百萬，無增亦無減。但每雙夫婦若養子二人有半，則一百年之中，人口便可增加到三百零五萬；每雙夫婦若養子三人，則一百年之中人口便可增加到七百九十五萬四千；每雙夫婦若養子四人，則一百年之中，人口便可增加到三千二百萬；每雙夫婦若養子五人，則一百年之中人口便可增加到九千七百六十五萬云。」這還是假定每雙夫婦在年滿二十歲後即同時死去。但是我們都知道人類的平均壽命是比這個假定的壽數要多二三倍。所以人口的增加在健全情形之下，就更為迅速了。卡氏並謂：「現時世界的人口雖受種種限制，但按照現在世界人口增加的平均速率，祇要一雙夫婦於一千七百五十年間所繁衍之子孫便可等於現在全世界人口的總數。所以無論如何增加生產或鼓勵移民，亦祇能容納所增人口之一最小部份云。」

又奧斯達利亞統計局長克尼布士亦言：「人口增加的通常速率，在有些人看來似乎很小，但祇須於最短期間即可人滿為患，而在人口已經不少的國家尤然。故人口增加的限制實遠較普通心理所想像者為近。將來食料的供給不久就會非常困難，一切維持人口顯著增加或提高人類生活標準所需要的各種力量，不久即將耗盡。按照世界人口（一九一四年）現在每年平均增加千分之一一·五九的速率，世界的人口約六十年即可增加一倍，一百年即可增加三倍有奇，即約由一，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人增至五，三八〇，〇〇〇，

〇〇〇人；二百年即可增加十倍或一七、〇四〇、〇〇〇人；三百年即可增加三十二倍有奇，或五三、九三〇、〇〇〇、〇〇〇人；四百年即可增加一百倍，或一七〇、七一〇、〇〇〇、〇〇〇人。一萬年之後即可增加到二二、一八四又加四十六個零之巨數。（即 $22,184 \times 10^{16}$ ） 假定屆時每人僅佔地球面積一英方尺半，則全地球之面積亦祇能容納  $80,000 \times 10^{11}$  人。即人類大家站立所需的面積約比地球全面積還要大  $60,570 \times 10^5$  倍。是以世界人口增加的速率終必次第減低，否則必有恆河沙數或無量數的養生毫無立尼之地也。」（參閱 G. H. Knibbe, *The Mathematical Theory of Population*, p. 453）

又美國社會學家洛士亦言：「一個現代開明興旺的社會如果歡迎多生主義，並利用現今所有的衛生方法，祇要二十年便可加倍。……如果健全的夫婦平均各養子女四人，各個子女復於成婚之後，亦各養子女四人，則一代之中，人口即可加倍，三代以後，人口便可增加到八倍，假定每三代為一世紀，則兩世紀之後，人口便可增加到六十四倍，三世紀之後，便可增加到五百十二倍。此種速度並非純屬理想。譬如英屬坎拿大的法國人即其一例。在一六八〇年前，曾有法國人五千八百人移居坎拿大，至一九二〇年之際，遂增加到三百萬以上，即二百四十餘年之間計增加五百餘倍云。」洛氏又謂：「通常健全的夫婦如果每僅養子女三人，假定每三代為一世紀，則五十六年之間，人口便可加一倍。在一世紀之後，便可增加三倍半，在三世紀之後，便可增加四十倍。但在歐洲大戰以前，多數國家的人口繁殖，皆較此尤速云。」

又一個社會的人民結婚年齡，亦與人口增加的快慢有大關係。假定一個社會的人民，平均結婚年齡為二

十歲，又一個社會的人民，平均結婚年齡為二十五歲，又一個社會為三十三又三分之一歲，並假定這三個社會的每雙夫婦皆平均各養子女四人。則一百年之後第一個社會的人口當增加三十二倍，第二個社會的人口當增加十六倍，第三個社會的人口則增加八倍。（參閱 E. N. Charver and H. W. Lester: "This Economic World and How it may be Improved," p. 287-288）因為第一個社會在一百年之間，當傳衍五代，第二個社會祇傳衍四代，第三個社會祇傳衍三代也。可列表如下：

年數	人口數		
	第一社會	第二社會	第三社會
0	1	1	1
10	2	2	
20	4	4	2
30	8	8	4
40	16	16	8
50	32	32	16
60	64	64	32
70	128	128	64
80	256	256	128
90	512	512	256
100	1024	1024	512

現時我國人民的平均結婚年齡，約與第一種相彷彿，歐美人民的平均結婚年齡，則與第二種相彷彿，甚或稍高。我國人口壓迫的嚴重可以想見，盛衰治亂亦可於此卜之。

### 三 時中的人口密度與普遍的生育革命

由上所述，人類既可增加如此迅速，既可繁衍至於無限，而人類各種養生必需之物則決難增加如此迅速，加以地球面積與所有富源均屬有限，於是人口限制途不可少。人類限制人口的需要與事實由來已久。英國人口學者卡爾萊德爾斯曾舉出許多事例證明，在世界各民族的歷史中，遠自漁獵時代及原始農業時代即已有之。除天災人禍，饑饉戰爭，疾病瘟疫外，尚有打胎溺女，及殘殺老弱廢疾幼孤等的種種事後裁制。此種方法大都係裁汰人口過庶於已然，並非防止人口過庶於未然。非特異常慘酷，不合人道；而且耗費甚大，極不經濟。近世限制人口的方法，則大都注重防止過庶於未然，是以遠較經濟，遠較健全。現時世界人口既日有增加，地球面積則不能日以加廣，是以領土最大，富源最巨，及兼併最多的國家，亦不得不逐漸注重人口限制，以預防人滿為患。其重大原因，計有數端：一、因領土的兼併與其他的政治的或經濟的侵略，逐漸不易得着被壓迫民族的「欣然同意」。二、如果操之過急，反足促成各被壓迫民族的內部團結與國際聯合。三、因一切農工商業無論如何發達，如何進步，如何改良，終久總不能逃脫收益遞減的經濟公例。且一國的富源，決非如文學家所謂「取之無盡，用之不竭」。地面的土宜與地下的礦產，若因人口無限的增加而盡量耗用，終必有地質變壞及礦產耗盡之一日。為種族將來的福利計，勢不得 unlimited 增丁，俾後來之子孫得多承繼一些共同的遺產而延長其族類。三、因經濟發達，教育普及，民權擴張，婦女解放以及其他種種社會進步之結果，普通人民皆次第高攀上達，漸知虛後，遂亦不得不從事限制生育，以再行提高一般的生活標準。四、因一國人口愈大，愈無再行增加之必要，加以種族愈健全，死亡率愈低減，生育率之再行普遍減低，又為必然之趨勢。

故現今的人口學者大都（不鼓勵增加人口而提倡限制人口以維持最適宜的人口密度（an optimum density of population）所謂最適宜的人口密度云者，乃指任何民族在任何時代及任何地域及任何進階段之中，能使各種生產事業最為發達興旺，及各個人的收益，均為最巨之人口密度而言。此種密度，意在維持最適宜的天然富源與勞力比例，或最適宜的土地與人口比例。而將人口過庶的壓迫減低到零點，但不至於低於零點。然後隨時皆無過庶與不蕃之弊。故最適宜的密度並非固定的或靜止的，乃無定的或變動的。應隨經濟進步及文明進化而常有變更，故又可稱為適應的人口密度，或時中的人口密度。時中云者，即在自強不息的進化途程上，隨時皆中道而行，無過與不及之謂也。欲維持時中的人口密度，須一般的人民皆有很高的教育程度與生活標準，大家都有遠慮，有希望，有操守，有進步，各知維持其適應的生育量（adaptive fertility）始能辦到。故英國人口學者卡爾桑爾德新謂：「中國與印度許多部份的人口過庶，大都由於政治壓迫過甚，與生活標準太低。故一般人民無希望與畏懼。大家祇要能夠糊口，遂覺滿足。在此種情形之下，自無維持適當的人口密度之可能。」（見 Carr-Saunders, *The Population Problem*, pp. 276-277 and 299）卡氏並謂：「人口不蕃，甚不常有。人口過庶，則頗屬常有。大致被壓迫的社會常發生人口過庶之患。奢侈無度的社會則有時或致人口不蕃云。」（見原書 p. 294-296）又美國俄海約大學經濟教授臥爾夫亦言：「真正的人口問題不外如何達到及如何維持人口與富源之最大生產比例。所謂最大的生產力，應以最後財富使用者之每人的最大收益為計量標準。換言之，不僅全人口的經濟總收益應為最大，乃全人口每人平均的經濟收益應為最大。欲

實現此種每人平均收益最大的人口政策，須將人口嚴加限制，即一面要減低生育率，一面也要認真取締移民入境，方可辦到。（參閱 *Population Problem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Edited by L. I. Dublin Ch. V. on the Optimum Size of Population, by A. B. Wolfe）足見維持時中的人口密度頗非易事。大致歐美大富階級的生育量有時或嫌過小，下等社會的生育量則仍嫌過大。至於我國則一般人民的生育量均嫌過大。所以我們國人將來的生育革命，不應如歐美現時僅爲自上而下不能澈底的生育革命，而應爲一般人民都要參加的普通生育革命，才能收良好的結果。我們考查歐美所以發生差別的生育量 (Infant mortality) 的大原因不外二端：一爲經濟制度與政治制度之不良，故祇有富裕階級、智識階級、治人階級、及中等階級能知節育，而下層階級則罕知節育。二因節育方法之不公，致上中等階級獨享學術應用之利益，而下層階級則大都不知有生育節制之可能。我國將來三民主義革命完成之後，上述發生差別生育量的第一個原因當可免除，至於第二個原因之能否免除，則全視今後我們國人對於生育革命，係抱何種態度。如果大家均採取最開明的態度，則發生差別生育量的第二原因亦可消滅。生育革命既最貴普遍，我們可以說中山先生三民主義的革命理論對於生育革命亦極適用。即革命是爲全民謀幸福的，不是僅爲一個階級或一部份人民謀幸福的。革命是要澈底的，普遍的，全民的，是人人都要參加的，都要負責的，都要努力的，生育革命更是要適合這種革命理論，纔不違背澈底的原則。

## 四 貧人是否也應犧牲一點生存權

關於生育革命這個問題，大致持反對論調者之中，其最為妄誕不經而最為違反事實的，當首推用擁護「窮人生存權」作招牌的馬克斯一流人物了。他們的論調是和高唱頭二等火車輪船應限制座位，三四等火車輪船不應限制座位的人們所持的論調完全是一樣，「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他們的辦法是使窮人的生命更是不值錢，更是不能翻身。就像主張火車輪船對於三四等客車或船艙不應限制座位，徒使乘客更為冒險，更是受罪，更有礙衛生一樣。我們不是時常聽見招商局的輪船因載客載貨過多，偶遇風浪遂遭沈沒嗎？其實窮人和被壓迫的民族不知限制生育，自謀解放，正是資本家和帝國主義者所最樂聞的一件事。因為窮人和被壓迫的民族能夠糊糊塗塗多養一些小孩子，能够在最低生活狀況之下盡量繁殖來供他們的驅使，和奴隸牛馬一樣看待，工價既可最為低廉，約束又是很方便，凡事都可「欣然同意」，毫無抵抗能力，豈不是很好嗎？哈佛大學經濟教授嘉佛爾曾有一個甚妙的比喻，他說：「狐狸都是喜歡提倡野兔應該有大家庭。」一般的資本家大半也是抱這種心理。他們都喜歡勞工多而工價賤。我們稍稍念過歐美工業史的人，都知道英國十八世紀末葉所採用的「拯貧制度」不但是窮人很歡迎，製造家是尤其歡迎。因為一般的貧民都可按照了口多寡向地方政府領津貼。他們的「生存權」有了若干「先令」的保障，於是大家都早婚繁育，努力去添子益孫。結果是拯貧稅愈增，貧民愈多，貧民愈多，工資愈跌落，工資愈跌落，製造家的贏利愈厚。所以拯貧稅的效果，是同由政府拿出補助費來津貼製造家一樣。一般的人民是增加了一種無關的負擔，製造家是發了一筆意外的

大賤，而貧民則因為人口增加了，工資跌落了，所以還是貧窮如故。（參閱 E. B. Rauter's Population Problem, pp. 53-57）試問製造家與貧民誰得最多的利益呢？

我們再拿統計事實來說，也很容易證明在歐美近百年來的生育節制史上，首先情願犧牲一部份「生存權」的，大半都是「富人」不是「窮人」；都是「資本家」不是「勞動者」；都是「有產階級」不是「無產階級」；都是「智識階級」不是「無智識階級」；都是「自由的民族」不是「被壓迫的民族」。所以一般優生學者所最擔憂的都是「富人和智識階級的生存權」，不是「貧民和無智識階級的生存權」。與馬克斯一流人物所唱違反事實的奇特論調，是恰恰相反。試略舉數種統計事實如下：

英格蘭與威爾士一九一一年在五十五歲以下之已婚男子每千人中所養子女數目如左：

社會階級	每千人中所養子女總數
上等及中等階級	一一九人
中等階級	一三二人
精巧的工人階級	一五三人
中等工人階級	一五八人
粗笨的工人階級	二一三人

又前表所列各階級所養子女之一歲以下嬰兒死亡率如左：

三民主義與人口政策

九十四

上等及中等階級

七六·四

中等階級

一〇六·四

精巧的工人階級

一一二·七

中等工人階級

一一一·五

粗笨的工人階級

一五二·五

據以上兩表觀之，一歲以下之嬰死亡雖愈貧愈多，但即除去早夭較多而外，各階級之生育率仍然愈富愈低，愈貧愈高，其比較更正之生育率仍為同一順序，即一〇人，一一八人，一三六人，一三九人，一八一人。故各階級的生育量仍屬愈上層愈小，愈下層愈大。（見 Carr-Saunders' the Population Problem, pp. 317）又法國統計學者巴塞蘭（J. Bertillon）曾將巴黎柏林維也納三大城在十九世紀末葉之婚姻率按照經濟地位及貧富區域，列表如左：

區域性質	維也納一八九一—九七年	
	男	女
巴黎一八八六—九五五年	四四·〇	六七·〇
柏林一八八六—九五五年	四四·四	五二·七
最貧區	二九·一	八〇·六
貧區	二七·九	

貧富區域列表如左：

巴君并將巴黎柏林維也納及倫敦四大城，年齡在十五歲與五十歲之間的婦女，每千人中之生育率，按照

小康區	二四·七	三六·三	八四·〇	四八·九
小富區	二四·五	二六·五	七一·六	四〇·七
中富區	二一·〇	二六·〇	五六·六	二八·七
大富區	二一·一	二〇·五	四三·四	一九·一

區別	巴黎	柏林	維也納	倫敦
最貧區	一〇八	一五七	二〇〇	一四七
貧區	九五	一二九	一六四	一四〇
小康區	七二	一一四	一五五	一〇七
小富區	六五	九六	一五三	一〇七
中富區	五三	六三	一〇七	八七
大富區	三四	四七	七一	六三

第四章 如何維持產出物極原則的人口密度

又巴黎柏林兩城結婚女子，每年每千人中所養子女數目，亦可按照貧富區域，列表如左：

區 別	巴 黎	柏 林
最 貧 區	一四二	二一四
貧 區	一二八	一九八
小 康 區	一〇九	一九二
小 富 區	九六	一七二
中 富 區	九四	一四五
大 富 區	六五	一二一

又據美國學者義齡 (D. Nearing) 計得美國費納德菲亞城各階級，每千人中之生育率如下：

階 級	區 別	生 育 率
富 人 住 區	區	一八・〇
中 富 住 區	區	二一・四
美 國 生 長 之 工 廠 工 人		二四・五

又丹麥首都柯本恰棋城一八七八年至一八八二年各階級第一次結婚之平均年齡如左：

職業	男	女
官吏大商	三三·二	二六·五
技師店主	三二·二	二七·六
教員	二九·七	二六·五
低級官吏	二八·〇	二六·八
工人	二七·五	二六·八

〔附註〕以上五表見 S. J. Holmes, *The Trend of the Race*, pp. 132-133, 288-284 及

E. M. East, *Heredity and Human Affairs*, p. 256

又英格蘭與威爾士新近各種職業界中人，每一百雙伉儷在丈夫未滿五十五歲時之相對生育量 (relative fertility) 如左：

第四章 如何維持超出補償原則的人口密度

職業	每一百雙夫婦養子之數
教員	九五八
不從英國國教之牧師	九六八
從英國國教之牧師	一〇一八
內外科醫生	一〇三三
著作家與編輯家	一〇四八
警務員	一五三三
郵務員	一五九八
電車人員	二〇七八
船塢工人	二三二一
酒店工人	二三四八
礦業工人	二五八八
普通工人	四三八八

又美國霍布金斯大學教授雷門柏爾 (Raymond Fagot) 曾將美國各州婦女的生育率，和各州的人口平均財富分爲六組，計得每組每千婦女之比重平均生育率如左：

組別	每組州名	比重平均生育率	比重平均人口所擁財富
第一組	坎勒第克特麻本秋色池紐約及哥倫比亞特別區	三三·二	三四一七元
第二組	加利福尼亞紐澤卜夏非爾莽及阿利根	三六·〇	三八三八元
第三組	臥哈約華盛頓密雲及潘士番尼亞	四一·二	三四五元
第四組	印第安那威士康辛堪利士及馬麗蘭	四五·三	二九九一元
第五組	米西根明利所達尼布那斯加及坎士基	五〇·〇	二八二三元
第六組	維基尼亞南卡洛利那北卡洛利那及猶大	六〇·五	一八四〇元

又荷蘭統計學者柯爾布魯格 (Koolbrugge, J. H. F.) 抽查荷蘭城市四七五八雙夫婦及鄉村四六八五雙夫婦，按照經濟狀況將每千家養子之數 (死產在內) 列表如左：

經濟分組	第一組 (最貧者)	第二組	第三組	第四組 (最富者)
城市家庭	五六一	五二一	四三五	四一八
鄉村家庭	五一九	五〇九	四七五	四五〇

〔附註〕以上三表見 (R. Pearl, The Biology of Population Growth, Chap. VII.)

此外雷門柏爾并計得美國一九二三年各職業階級之相對生育量如左：

職業階級	相對生育量
一、專門職務	1.00
二、文書職務	1.02
三、商業	1.23
四、家庭服務及個人服務	1.27
五、公益服務	1.31
六、交通業	1.44
七、製造及機械工業	1.58
八、農林業及牲畜業	1.65
九、礦業	1.90

據柏爾教授之結論：「在美國的人口組合之中，大致專門職務，文書職務，商業，家庭及個人服務，公益服務，與交通服務六種職業階級的生育量，似僅足維持其各階級現在之相對比例。惟製造業，農業，與礦業三種職業中之多數勞動階級，則繁殖甚速，其生育量實遠超過彼等現時在人口組合中所佔之相對比例」云。（參閱）

以上所舉各種統計事實都是證明貧民是「生存權」的最後犧牲者。所以馬克斯一派掛「擁護貧民生存權」的假招牌的人們，不但是不配做「社會生理家」並且也不配做「社會病理家」。因為他們對於限制人口所見到的病症是完全與事實相反。而且他們擁護「貧人生存權」的結果，無非使貧者愈貧，無產者愈無產，無知識者愈無知識，充其量不達到大家抱着小孩，向資本帝國主義者門口去討飯，而被印度巡捕趕走不止。試問這種政策能夠打倒帝國主義，和促進無產階級的解放嗎？所以真正為無產階級謀幸福的人，都感覺獎勵無產階級多生子女，完全是慘酷的事情。因為他們生育愈多，生命愈賤，生活愈艱，愈難向上進展。據立法院統計處最近抽查南京工人家庭七百家的結果，查得早婚習慣在工人家庭中甚為普遍，尤以女子早嫁現象為特別顯著。綜計二十歲以上之未婚男子，僅佔男子總數百分之十九，十五歲以上之未婚女子，則僅佔女子總數百分之六而弱。工人結婚之早，生育之繁，子女死亡之多，生計之困窮，和生活之不健康，可想而知。其他各階級的發式家庭，自然也是早婚多產，不過經濟狀況稍為良好罷了。我們想想這種愚蠢的習慣長此相沿不改，我們整個民族的「生存權」能夠有保障嗎？所以據我們的意見，一國的無產階級和無知識階級，和全世界一切被壓迫民族，如果情願長為文化的落伍者，以鍾天演淘汰則已耳。否則亦應仿效資產階級，智識階級，和世界各自由民族犧牲一部份生育量，纔有前進上進的希望；纔能夠迅速達到種族的自由平等，政治的自由平等，和經濟的自由平等；而且我們整個民族未來的「生存權」纔有確實保障哩！

## 五 要使人類進化「超出物種原則」當首先化除由物種遺傳下來的繁殖

### 方法

是以現代的人口學者、優生學者、社會學者、經濟學者、與夫建設的社會主義者，皆主張要使生育限制更爲普遍、更爲徹底，人類社會纔能够避免殘酷的生存競爭，纔有普遍的長足進步，纔能够樹立世界和平的鞏固基礎，而進人類於大同。中山先生說：「物種以競爭爲原則，人類則以互助爲原則。然而人類今日猶未能盡守此原則者，則以人類本從物種而來，其入於人類進化之時期，爲時尚淺，而一切物種遺傳之性，尙未能悉行化除也。然人類自入文明之後，因天性所趨，已莫之爲而爲，莫之致而致，向於互助之原則以求達到人類進化之目的矣。近代文明進步以日加速，最後之百年，已勝於以前之千年，而最後之十年，又勝於已往之百年，如此遞推，太平之世當在不遠，人類今日之進化，已超出物種原則之上矣。」著者以爲人類今後欲完全達到以互助爲原則而不以競爭爲原則的境界，應首先「悉行化除」由物種遺傳下來的生殖方法，大家用理性去約束天性，用人演去糾正天演，用人爲限制去代替天然限制，總要使生育一事亦適合「量入爲出」的經濟原則，方能維持時中的生育量和「超出物種原則」的人口密度。否則人口一經超過適當的密度，人類必定又回到以物種爲原則的地位，這是如影隨形，絲毫不可爽的。關於此點，我們可引用韋爾斯和吳雅羅兩個現代世界大思想家的幾段話語來作本章的終結。英國現代的社會主義者韋爾斯在其新近所著公開的合謀或世界革命的藍本 (H. G. Wells,

The Open Conspiracy: Blue Prints for a World Revolution, pp. 36-37)裏頭就道說：

「人類創造的進步和創造的事業的保障，首賴經濟生活有適當的規定以維持全體的利益。蓋人人皆有衣食住行和閒暇以及其他物質的根本需要，人類生活始能自由發展。人類的生活雖不僅為飽食暖衣，但物質需要實人類勇邁向上的必要條件。人類生活以經濟為首要，猶如屋宇以地基為首要。經濟的公平和經濟的充實，應為其他一切事業之基礎。惟人類社會的鑑別與夫一切政治事業和社會事業的組織若完全以經濟為基礎，則不啻僅注重物質的供給而忘記人生進化之目的矣。」

「人類係從物種進化而來，是以亦如其他生物，賴奮鬥以維持其生命。但人類能設法避免生存競爭的壓迫，而他種生物則無法避免。人類能自行限制其數量之增加，同時復能再行擴大其經濟的生產力。故能逃避生存競爭而有其他生物所不能有的餘剩力量以從事其他種種事業。故理智的人口限制實使人類有超出物種原則之可能，且為人類超出物種原則之唯一法門焉。」

「人類自行管理其生育，現時雖尚未完全辦到，然為期當在不遠。吾人所希望之大同世界——具有組織而自行指導與保障其進化之大同世界——須以深思熟慮的全體人口限制為其基本條件。此則吾人所敢斷言者也。」

「大凡女子本然之天性，皆不希望多子。至於多子與人口壓迫的原因實基於間接的性欲。故女子如具有充分的知識、智慧和自由，則人類的性欲既能滿足，同時復無多子之患。在一個富有健全知識而對於生育

問題最爲開明的世界之中，祇要把社會的和經濟的安排稍加整理，遂能使某種人民之生育率按照社會的需要分別提高或減低。世界多數人類的滋生若長此儼然任隨性慾和愚昧的驅使，人類就一天不能透脫物種競爭的壓迫。但吾人一旦認識在人文生物界中有根本的生育革命之可能，則一切社會的和政治的進化均當完全改觀。故人口增加的有效限制，不啻完全爲人類開闢許多新的途徑焉。

又國民黨元老吳稚暉先生也說：

「全世界人類的大同世界依我的理想，有三條路可以達到：一是教育革命，望他迅速達到大學校強迫這大學強迫的一個希望不是烏託邦。小學強迫已成了信條。歐戰後學齡要加增到十六歲，已近中學強迫。止要世界製造生產，够安排學校，大學強迫，終有一地，預料在二百年內可以實現。

「二是物質革命，終得要達到什麼衣食住行的生活物都歸機器做了，而且做好得，做得多，簡直止用得少少人工。於是止需一個分配均勻，便可馬上共產。

「三是生育革命。即要在科學上大努力，得到圓滿的方法，來真把生育限制了。否則殺機又不許開，生活又豐富，當然無限制的一日性造起來，死的又不肯死，地球又不能如吹糖般的吹大起來，那裏站得下呢？又非請共產黨來屠殺不可。所以共產黨能够在民窮財盡的國家殺點人，滑稽的說法，也是功德無量。因爲牀舖一空，睡覺的人便舒服了，吃飯的傢伙砍掉許多，米糧也賺了。終之宇宙不生不滅，不增不減。共產黨是主張把已成人的精蟲屠殺，我是主張不使精蟲成人，且不使性菩薩輕易製造精蟲。今日的節育法是屠殺精蟲，我還嫌

他不圓滿，故我決不願意共產黨來屠殺人。」（參閱吳稚暉最近言論集上卷譚汪先生「分共以後」的發言上）

吳先生是一個大仁大智的哲學家，不但不願意共產黨來屠殺人，并且連屠殺精蟲也嫌牠不圓滿。所以他的理想的節育方法是要精盡不下凡，而不耍屠殺精蟲。吳先生說，他的主張「不是甚煩難的空想」這話確有幾分可信。其實人類最進步的節育知識，大致已能適合吳先生理想的條件了。

至於教育革命和物質革命，自然也是非常要緊，因為教育愈普及和民生愈富厚，生育率亦必自然跌落。大學的強迫教育，不僅是吳先生的理想，並且是中山先生預定的政策。大學強迫教育一時雖不易實現，我們的最小限度，也應於調政期間達到全國小學強迫教育。以後再次第向上推進。達到中山先生所謂「至大學而後已」。他如制定勞工法，及禁止幼童工作，與制定婚姻法，限制結婚年齡，亦為增進勞工幸福與減低一般生育率及死亡率之重要法門。英國著名優生學者柏爾森（Karl Pearson）曾由統計上證明限制兒童工作之法律愈嚴密，則下層經濟階級之生育率亦隨以次第減低。因愚昧無知的下層經濟階級常視兒童為利藪，一經限制兒童工作，則為父母者在短期時間既無利可圖，自必節制生育也。又中山先生的整個民生主義，不但是最好的經濟政策，同時也是最好的救濟政策；因為一個社會的生產愈增多和分配愈均平，則各階級之生育率亦必遞較均平，不至如歐美諸國的軒姪生育率之優劣倒置。歐美最明達的優生學者多已逐漸見到此點，惟陳腐迂酸之輩，尚持個人主義的舊論調耳。

## 第五章 人口密度與人生標準

### 一 時中的人口密度為提高人生標準的必要條件

中國現時人口過庶與否，以及理想的人口密度應為若干，全視吾人所假定的生活標準如何為斷。大致我們所假定的生活標準愈高，則我們理想中的最適宜的密度亦愈小。譬如現時國內的樂觀派說：「中國尚無所謂人口問題」，都是因為他們心目中所懸想的生活標準，在我們看來是一種很低的人生標準；他們所假定的生活標準是祇能適合「物種互競原則」而不能適合「人類互助原則」的標準。他們的標準是遠在國家民族的適存點以下。我們則深信中國民族各個人的生活標準，如果不努力去盡量提高，我們的人口就是能夠增加很快；而大家長此黑暗貧弱渾沌紛亂，中國也仍然有滅國滅種之憂。我們所以主張人口要有最適宜的密度，是因為要在適當的人口密度之下，纔能够提高我們國民全體的一般生活標準，而使我們國家民族永久適於生存。這個最適宜的或時中的人口密度，是與人口達到飽和點時的密度完全不同。人口在飽和點時的密度，是最髙生育率和最髙死亡率正負相消時的密度。飽和的密度，是人口壓迫達到頂點時的密度，是種族最不適於生存的密度。時中的密度，是人口壓迫降到零點時的密度，是國家種族最適於生存進化的密度。故又可稱為中

和的人口密度。中和的人口密度，是遠在飽和的密度之下。飽和的密度，好比像不說座位人擁擠的舊式戲園的密度一樣。中和的密度，好比像設有一定座位依次入座的最新式戲園的密度一樣。中國現在的人口密度，是和舊式戲園的密度很相彷彿，弄到全國都不安寧。大家在這個舊式的戲園裏擠來擠去，你爭我爭，強凌弱，乘暴，踏死人不填命，婦女和小孩更是受罪遭殃，並且有很多外國的大兵在我們的戲園裏行兇滋事，我們的軍警不但不能維持秩序，彈壓他們，而且自己也常常打架鬧事，不守紀律。試問在這種情形之下，演戲的人能夠唱拿手好戲嗎？看戲的人能夠享五分鐘的安靜嗎？我們這個戲園裏頭是已經有了人山人海，林林總總的人，鬧到不得開交。有些人還要「主張大登廣告，說我們的戲園還有很多的空場子，請做父母的大家多帶些小孩子來看，全武行的拿手好戲；」真所謂「不識時務。」我們這個比喻，不是滑稽，實在是我們現時人口過庶以致天災人禍蔓延全國的縮影。我們現在要把密度快到飽和點的中國人口問題來想出一個根本解決的方法，實在是很不容易。我們的人口問題，是比世界許多國家都更為急迫而且更難解決。但是我們無論從「心理建設、物質建設、社會建設、或國家建設」方面着想，皆非要使人口問題有一個根本解決的辦法不為功。中山先生說：「方今中國之不振，固患於能行之人少，而尤患於不知之人多。」又說：「予之所以不憚其煩，連篇累牘，以求發明行易知難之理者，蓋以此為救中國必由之道也。」著者以為欲求根本解決中國的人口問題，亦全靠大家努力去求其理真知，此外別無他道。所謂「天下事惟患於不能知耳，倘能由科學之理則以求得其真知，則行之決無所難。然則行之之道為何？即全在後知後覺者之不自惑以惑人而已。」

我們今後欲安內攘外，救國救種，欲完成三民主義，創造一個真正民有民治民享的國家，再去促進全世界人類的大同，皆非努力提高全國人民一般的生活標準不可。欲使全國人民大家維持其最高生活，又非使人口不超過中和的密度不為功。我們的目標是最高生活的最大民數，不是當低生活的最大民數。中山先生說：「要解決民族問題，同時不能不解決民權問題，要解決民權問題，同時不能不解決民生問題。」又說：「三民主義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這個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就是國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又說：「不能有安能治，不能治，安能享。」依中山先生的簡語，民族主義是民有，民權主義是民治，民生主義是民享。按照胡漢民先生的解釋：「民有不只是在民族意義上的民有，而且是在民權和民生的意義上的民有。政治上人民不能自己有權，不得謂之民有。經濟上人民不能自己利用天然的富源，不能自己管理生產分配的條件，也不得謂之民有。民治不只是在民權意義上的民治，而且是在民族和民生的意義上的民治。換言之，人民要自治，不僅是要有自治其縣，自治其省，自治其國的權；而且要有能力發展其民族所具有的特點，如語言、科學、算術、文學、哲學、優種學等，都要能夠自己創造，自己發展，始得謂之民族。同樣的在民生的意義上人民要自治，也不只是盲目的要求衣食住行各項需要之滿足；要能夠自己管理生產，自己分配平均，始得謂之民治。至於民生，也不但是人民經濟上的慾望滿足就謂之生，要同時政治清明，民族不受壓迫，始得謂之生。要全民族個個有擁護民族獨立的能力，有發展文化的能力，始得謂之生。就人類生存的立場說，求生是求生命的充實，充實的生命，才是幸福的生命。然而在生命上求充實，要從個個人有自治能力，個個人有生活需要滿足，個個人有民

族獨立性表現，這幾方面去求。革命的目的，就是在於把自由正義平等互助，這種種人生的價值來充實民族的生命，和個人的生命，而將一切的壓迫性和被壓迫性根本掃除。」（見胡展堂先生著『民主主義的連環性』第八頁。）又戴季陶先生也說：「民族的統一思想，統一信仰，統一力量，就是日本維新成功的最大元素……一代歷史的創造，不是簡單的東西。一個時代當中革命的成敗，民族的盛衰，文化的隆污，都是整個的東西。」又說：「今天的民族競爭，不單是爭生存，而且是要爭有意義的生存。我們的三民主義就是今天生存的意義，是我們今天共由之道。」又說：「人生的重要生活條件，中山先生舉出五樣：是衣、食、住、行、印刷。這一個分類是就產業爲主的分類法。便以此着想，無論那一樣都是不僅只有，還要美；不僅要美，還要不斷的要求美的發展進步。這樣的人生才是一步一步向上的人生。如果有了番薯吃，便永不再想吃米麥；有了棉布穿，便再也不想絲織；有了茅屋住，便再也不想高大華屋；只要披荆斬棘的走得通，便再也不想造路；有了雕刻梨棗的印刷術，便再也不想機器印刷；這種生活意識，說甚麼文明？說甚麼進步呢？並且在道德生活上面好美的關係更大極了。一個人要求道德生活的進步，他的心理和好美是一樣的。不懂得好美的人，決不要求道德的進步。即使有一種要求，也是很虛空很錯誤的。中國講修身，把外的生活丟開，專講性理，結果不單物質的文明不得進步，連精神的文化也一天一天倒退。把民族向上發展的能力殘破得乾乾淨淨，都是爲此！」（見戴季陶先生著『日本論』第十一、第十五、及第二十三章。）

以上所引的幾段話語，都是說道我們民族今後的生存，應爲有完全意義的生存，應爲全國國民各個人均

能自強不息，永遠向前向上的生存。即全國人民大家的生存都要有意義，有價值，有希望，有進步，有條理，有建設，有創造，有貢獻。總要使我們整個民族的共同生活和個人生活，都最為獨立自由，最為光明正大，最為豐富康強，最為完全美滿，最為莊嚴神聖；才能適合中山先生所定「以三民主義救中國，使中國民族永久適存於世界。」及「使人類共同互助原則進化，而成一大同之世」的最高標準。但是這種最高的人生標準，祇是全國或全世界均在時中的人口密度之下，才能够完全實現。否則無由「化現在之痛苦世界，而為極樂之天堂。」所以我們不能不提倡生育革命來維持時中的人口密度。英國的社會主義者韋爾斯說：「生育節制乃新的人生觀與舊的人生觀之所由分別；乃將來人類創造大同世界的必要元素。凡贊成生育節制的人，即係贊成創造新世界的人，凡反對生育節制的人，即係反對進化的世界革命的人。普遍的生育節制，乃人類進化自由之先聲，因人類從此可有無限的向上演進之機會。如果食物供給一有增加，人口就立刻上漲，毫無限制，則大同世界必無實現與永續之可能。欲限制人口的自然增加，祇有普及節育知識和普遍接受節育方法，方可辦到。」又加拿大士蘭多大學經濟學院院長馬克在其所著「人口的趨勢」一文中亦謂：「在過去的人類歷史中一切人口的均衡，大都取決於馬爾薩斯所謂天然的食物限制。至於將來的人口均衡，則當取決於生活標準的限制。前種限制為自然的，後種限制為意志的。意志的限制愈有效，人類愈無生計困乏之虞。故將來靜止的人口，必為生育率減到恰够補償最低死亡率地步的人口均衡。且生育節制應愈普遍愈佳，故應使最需節育之各階級均得着顯具的節育知識，方能收最低死亡與最低生育之最大利益。」（參閱 *Trend of Population with Respect*）

to a Future Equilibrium, by R. M. MacIver, in "Population Problem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Edited by L. I. Dublin)

## 二 時中的人口密度與物質革命和教育革命

我們中國的人口，就現在的生計狀況之下，實已遠超過時中的密度。中山先生說：「我們現在的中國，是世界最貧弱的國家，是世界上最生活最貴的國家。」我們全國的產業如此落後，我們全國的生計如此困窮，我們整個的社會如此黑暗紛亂。乃淺見者流，還去提倡多生主義，真是「愚不可及。」我們現在把各國的國富統計來比較一下，就知道我們國人是一窮得要命。」據本年四月十九日日本內閣統計局發表各國最近的國富總額及平均每人所得額如下：（見四月二十三日京報和中央日報）

國別	財 富 總 額	每 人 平 均 擁 額
美 國	七六二、三五六、〇〇〇、〇〇〇 <small>（美元）</small>	六、六〇七 <small>（美元）</small>
英 國	三三六、三二〇、〇〇〇、〇〇〇	五、二四七
俄 國	一〇四、一〇一、〇〇〇、〇〇〇	七五六
法 國	一〇三、五三〇、〇〇〇、〇〇〇	二、五四九

日 本	一〇二,三四三,〇〇〇,〇〇〇	一,七三一
德 國	七一,六八五,〇〇〇,〇〇〇	一,四四一
意 大 利	四四,七三八,〇〇〇,〇〇〇	一,二一七
中 國	三八,二八九,〇〇〇,〇〇〇	一〇一

又據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文化講師達格韋爾、孟祿及石助萊凱爾合著之美國的經濟生活 (American Economic Life by Tugwell, Munro, and Stryker, 1925, p. 118) 內列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二二年各國的國富增加狀況其較為重要諸國如下:

國 別	一九二二年國富總額	一九一二年國富總額
美 國	三二〇,八〇三,〇〇〇,〇〇〇 <sub>(五萬萬)</sub>	一八六,二九九,〇〇〇,〇〇〇 <sub>(三萬萬)</sub>
英 國	八八,八四〇,〇〇〇,〇〇〇	七九,二九七,〇〇〇,〇〇〇
法 國	六七,七一〇,〇〇〇,〇〇〇	五七,〇七五,〇〇〇,〇〇〇
俄 國	未 詳	五六,一四〇,〇〇〇,〇〇〇
德 國	三五,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	七七,七八三,〇〇〇,〇〇〇

意大利	二五、九八六、〇〇〇、〇〇〇	二三、〇三〇、〇〇〇、〇〇〇
西班牙	二九、三一九、〇〇〇、〇〇〇	未詳
加拿大	二二、〇九五、〇〇〇、〇〇〇	一〇、九八〇、〇〇〇、〇〇〇
印度	二一、九六〇、〇〇〇、〇〇〇	未詳
中國	一九、〇八七、〇〇〇、〇〇〇	未詳
阿堅廷	一三、一七八、〇〇〇、〇〇〇	一一、六八〇、〇〇〇、〇〇〇
巴西	一三、〇二〇、〇〇〇、〇〇〇	未詳

據右表觀之，中國的國富按照美國人的估計，僅為美金一百九十萬萬零八千七百萬元，以美金一元合國幣二元計算，約合國幣三百八十一萬七千四百萬元。按照日本人最近的估計，亦僅為三百八十二萬八千九百萬元。美國的人口不過中國四分之一，而其一九二二年的國富約等於中國國富的一六·八倍，其一九二八年的國富則等於中國國富的一九·九倍。若按每人的平均攤額計算，美國人的國富平均攤額，竟等於中國人的平均攤額之六十六倍左右。我們的國富總額連意大利印度都比不上，真不愧為「世界上最窮的國家」！茲將各國現時的人口概數列表如左：

國別	現在人口概數	近百年間增加倍數
中國	四萬七千萬	三倍又三分之一（自乾隆六年起算）
印度	三萬一千萬	近四十年間增加五分之一
俄國	一萬六千萬	四倍（俄國的人口增加有一部分係由於併吞）
美國	一萬一千四百萬	十倍（美國前此的人口增加大半由於移民）
德國	六千三百萬	二倍半
日本	六千萬	三倍
英國	四千六百萬	三倍
法國	四千萬	增加三分之一

據以上三表觀之，我們的人口總數是居首位，我們的國富平均是居末位。而如何實現我們的物質革命途，爲中國今日之一最大問題。無怪中山先生說：「然則今日欲求迅速之法以發展中國之財源而立救貧弱者，其道爲何？倘以中國而言，則本無其法，更無迅速之法也。……處今時之時會，倘吾國人民能舉國一致歡迎外資，歡迎外才，以發展我之生產事業，則十年之內，吾國實業之發達，必能並駕歐美矣。」這是中山先生十年前的主張。在通過去十年之中，人口又已有增加，而國富（尤其是每人的平均產額）則恐怕祇有減少，並無增加。所以除了

利用外資外才以發展中國之實業外，仍無他法。吾人於此須知中山先生主張「歡迎外資外才以發展中國之生產事業」，乃因本國資本人才均感缺乏，不得已而思其次，原屬一時權宜之計。將來償還外資，仍須直接間接取給於民。且外資早日償還，外才亦可早日辭退。但本國生齒既繁，人民既貧，倘復繼續早婚多育，增加消耗，致本國資本之增加，不能達於人口之增加，則外資必永無償還之望。將來本國縱已有够用之人才，而外才仍因外資關係，不能辭退。換言之，外資一日不能清償，外人一日仍得投資之利，與參加管理之權，即利權仍然外溢。何況國際的投資，多少總含幾分政治意味，強國對於弱國的投資尤然。日人飯島樞司在其所著金融經濟概論（周佛海譯）就說道：「國際投資和內國投資第一不同之點，厥為政治的差異。凡研究對外投資時不能忽視的一種事實，即為列強間的政治競爭。具有領土侵略的野心而行的國際投資，實比世人所想像的多得多。例如從前英國對於埃及的投資，日本對於朝鮮的投資，以及現在列強對於中國、中美、南美的投資，大約都以擴張領土，或扶植勢力為目的。近代的歷史告訴我們，強國人民對於弱國鐵路礦山之私的投資，稍進一步就是債權國在債務國建設勢力範圍；從勢力範圍進為干涉外交關係；更從干涉外交關係變為干涉內政。於是遂破壞弱國的獨立，而至於併吞。這幾個步驟之間，相差自各有有限。有時投資者私人竟成侵略國的手足，進而幫助其帝國主義的活動，有時政府又以國民由單純營利動機而行的投資為口實，而行其政治的侵略。」這段話語是把日本近數十年來由對華私人投資變為對華實行政治及經濟侵略的步驟，講得非常透澈。可見利用外資，多少總含有一些危險性。其危險性的大小全視債務國與債權國的國勢強弱比較如何為斷。並且還要更有應付的能力，才

能維持國際的信用。利用外資總要能够促進本國的經濟獨立，斯爲得之。所以著者十餘年前在拙著中國人口論中遂言及「將來欲自辦各種大實業，非厚貯蓄集資本不爲功。惟欲厚貯蓄，集資本，國民於日用飲食之外，當有餘財。是以人民宜多從事於財富之積蓄，少從事於丁口之增加，然後資本可增，實業可興，利權可挽，人民全體可以富裕也。」

按照中山先生的計算，現時全國四萬萬人口除老少之外能作工者不過二萬萬人，此二萬萬之中其爲生產之事業者又祇有五千萬人，今欲使其餘能作工之一萬五千萬人皆能從事生產的工作，誠屬經濟上一個極重大的問題。若以美國爲比例，此二萬萬能從事生產工作的人須有七十八萬萬人之機器力以助之，然後全國人民的平均生產力方能與美國並駕齊驅。所謂「資本」云者，卽人工和土地以外一切補助生產的機器力之總稱。如農工商業與交通事業之各種設備，以及其他一切用以生財之器物或原動力皆是一國的資本。愈增多，人民的生產力量亦愈加大。正如海陸軍的軍械設備愈齊全，其戰鬥力亦愈大。中國今日之大患，不患於人民少，而患於資本少。資本既爲補助人民生產所不可缺少的一種力量，自然愈普遍愈佳，愈增多愈妙。所以一方面固然要設法「節制資本」，同時也要努力「增加資本」。全國人民的生產力才能够一天大一天，民生問題才有真正圓滿解決之一日。不然，欲天下亡飢亡寒，不可得也。欲全國人民均能足其食，豐其衣，美其住，便其行，更不可得也。今欲增多全國的資本，除一面增加生產，一面減少消耗外，別無他法。假定上述等於七十八萬萬人力之機器力每等於一人之機器力須付代價五十元並年付維持費十元，則共須付代價三千九百萬萬元，外加每年維

持費七百八十萬萬元，即按四萬萬人均攤，每人應拿出老本九百七十五元，此外每人每年尚須拿出維持費一百九十五元，談何容易。國人欲聚集如此鉅額之資本，恐非數十年或百餘年不能成功，因為一國之資本全靠大家生產與節省得來也。選婚節省乃全國減少消耗增加資本之一重要法門。所以著者認為相當的選婚節省，非特與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毫無衝突，而且為早日「促其實現」的一個必要的條件。

上面說中國能從事生產工作的二萬萬人須有七十八萬萬人之機器力以助之，然後我國人民之平均生產力方能與美國並駕齊驅，這還是假定兩國人民受過同等的教育或訓練。但是中國現時受過相當教育或訓練的人和未受過相當教育或訓練的人，較諸美國差不多適成反比例。我們一般人民的教育程度，較諸中山先生所定凡少年男女皆應享受由幼稚園而小學中學大學的完全義務教育之標準，固然是天差地遠。即較諸現在的美國亦不可同年而語。美國現時在各級學校肄業的學生和學校教職員的總數約佔全國總人口四分之三，中國的學生與教職員總數則大致僅佔全國總人口四十分之一。因此兩國人民的平均生產力與創造力當然有很大的差別。今欲於最短期間使全國的民衆人人皆教育化，又是一個極重大的問題。中山先生說：「全國開始實行地方自治之時，凡少年男女皆有受教育之權利。學費、書籍、與學童之衣食，當由公家供給。學校之等級由幼稚園而小學，而中學，按級而登，至大學而後已。教育少年之外，當設公共講堂、書庫、夜學，為年長者養育智識之所。」據中華教育改進社估計，全國四萬萬人之中，向有三萬二千萬人不能讀書識字，其餘八千萬能讀書識字的人，當中受過完全教育的自然也是鳳毛麟角。假定全國未受過等於小學教育程度的人，共有三萬二千萬，

每人須由國家和自己共花教育費二百元，始能享受等於小學畢業教育程度，則所需教育費總額當為六百四十萬萬元。假定全國未享受等於中學教育程度的人共有三萬五千萬人，每人須由國家和自己共花教育費八百元，始能享受等於中學畢業之教育程度，則所需經費總額當為二千八百萬萬元。若更以大學強迫教育為標準，并假定未享受過大學教育的人共有百分之九十九或三萬九千六百萬人，每人須由國家和自己共花教育費一千元，始能享受等於大學畢業之教育程度，則所需經費總額當為三千九百六十萬萬元。統計三項教育經費總額約為七千四百萬萬元。此三項教育經費雖非同時需要，但早遲總是不可少的。以如此鉅額之教育經費，要靠人民大家一面努力生產，一面努力節省得來，又非數十年或百數十年不能成功。

是以中國的「物質革命」和「教育革命」如果要完全實現，則按照四萬萬七千萬人計算所需經費總額至少應在一萬五千萬萬元以上乃至二萬萬萬元（ $\$1,500,000,000,000$ ， $\$2,000,000,000,000$ ）換言之，即全國四萬萬七千萬人要花這樣大的本錢，才能够完全去掉一個「貧」字和一個「昧」字。美國現在的人口僅為我國人口四分之一，而美國的國富是已經超過七千六百萬萬元。中國現在的國富則僅為三百八十餘萬萬元。所以美國對於「物質革命」和「教育革命」的路程，總算已經走了一半，而中國則差不多還沒有開始。這還是假定我們的人口是靜止的，今後的人口增加概未計入。如果今後的人口仍按照千分之十一的速率增加，則每六十年即可加倍。即六十年後全國人口便有九萬萬數千萬，再過一百二十多年即可增到十九萬萬以上，或等於現時全世界這樣多的人口。試問等於地球面積十二分之一的監區中國領土，那裏能夠容

納呢？我們所懸想的「物質革命」和「教育革命」，更非並成泡影不可。我們除了仍然回到適用「物就原則」的「一治一亂」圈套上面之外，別無他法。所以如果沒有「生育革命」，則無論「物質革命」或「教育革命」，皆永遠不會成功，永遠無實現之可能，這是我們可以斷言的。

### 三 時中的人口密度與「耕者有其田」

我們現時中國的人民就職業上區分，農民是佔最大多數。據各方面的大概估計，全國的農民總要佔人口總數百分之八十以上。按照前章所述我們全國現在的人口總數約為四萬七千萬，按百分之八十計算，農民應佔三萬八千萬左右。中國的人口總數約與歐洲現在的人口總數相埒，中國的面積亦大致與歐洲相等。然減如吾友竺可楨先生所云：「我國包羅戈壁大沙漠，囊括世界最高之高原西藏，大部皆為不毛之地。而歐洲則無雨量過少之區，崇山峻嶺，佔地亦不多。故歐洲人口問題遠不若我國之嚴重。」（見東方雜誌第二十三卷第一號竺可楨著論江浙兩省人口之密度第九三頁）按照地理學家考彭（Koopen）的估計，戈壁沙漠共佔面積十八萬英方里；又橫跨中央亞細亞和中國西部的土耳其坦沙漠，則共佔面積九十萬英方里。假定中國境內之一部分沙漠僅佔五分一的面積，亦應有十八萬英方里。故蒙古新疆之沙漠面積大概當佔中國全面積十分之一左右，或約為四十萬英方里。所以著者希望我們國人不要常常以地大物博自誇。何況歐洲諸國早已覺得數倍於歐洲面積之殖民地，以容納其過剩的人口，而供給其本國人民的各種需要。猶如農夫種稻，歐洲諸國既有

播種的田以播種，復有無數分栽的田以擴分栽。其民族分布既廣，增加自較健全，同時並能維持其較高之生活。中國則播種的田祇是這一塊，分栽的田也是這一塊；而在這一塊田之中，又祇知播種，不知分栽。孰知播種愈密，收穫愈少，所謂徒勞無功。爲今之急，移民實邊，自然是一個很重要的救濟辦法。但是滿蒙回藏究能殖民若干，有待農業學者，氣候學者，生物學者，地質學者，礦物學者，水利學者，經濟學者，及其他科學專家分門別類，實地考察，精密計算，方能斷定。據意見揣測，滿蒙回藏面積雖大，似難容納等於本部現有民數三分之一的入口。故著者前年與吾友陳通夫先生談及移民實邊問題，通夫先生亦認爲不能澈底解決中國人口的過剩。據通夫先生的意見，要澈底解決中國的人口問題，一面要提倡生育節制，一面要努力提高國民的程度和國際的地位。國民程度與國際地位提高之後，我們除了開發滿蒙回藏之外，並可分頭並進，多向海外殖民。楊效春先生說：「我們散居世界的僑胞共有八百八十餘萬，不能算少，我們實在可以自豪。」陳通夫先生則言：「我們的海外華僑僅佔本國人口百分之二，並不算多。」著者到很贊成通夫先生的主張。我們試讀白種民族的殖民史，就覺得慚愧「無地」。試問白種爲何要霸佔地球面積十之八九而使其餘的民族毫無發展的機會，甚或生計滅絕，憔悴枯槁，輾轉消沈，以歸於盡呢？我們將來固然要去扶助世界弱小民族的獨立。但是我們現時更爲急要千倍的問題，是如何救濟我們自己弱大民族的人口過庶。據竺可楨先生的推算：「江浙兩省之人民如欲達到人均均享歐西之生活程度，江蘇之農田必須增加五倍，浙江之農田必須增加十倍而後可。江浙雖不乏荒地，然農田之不能增加如許倍，則可斷言。如以江蘇而論，苟農田增五倍，則農田之面積將超出江蘇全省面積兩倍有餘。是故江浙兩省

依現在之人口密度，苟不設法以謀補救之方，則一般人民之生活程度欲提高至歐西各國之平面，實為難能之事。大多數人民均將過一種柯克斯所謂「種馬鈴薯，吃馬鈴薯，和馬鈴薯死去」的生活。江浙兩省富庶甲於全國，尙且如此，則他省可知。又我國農業學者唐啓宇先生亦言：「中國農場因遺產制度之注重平均分配，故面積甚小而農人之效率甚低。照民國八年北京農商部統計表所載，十畝以下之農戶，占全體農戶百分之四十。十畝以上二十九畝以下之農戶，占全體農戶百分之二十七。三十畝以上三十九畝以下之農戶，占全體百分之十六。五十畝以上九十九畝以下之農戶，占全體百分之十八。百畝以上者占全體百分之五。試思農場如此之小。何從望其為有利益之經營。加以地積不成一片，碎塊甚多。故耕作之際不能用機器而必用人力手工。」云。（見唐啓宇著中國農業問題叢著第一編第一頁）又美國斯密士教授（Prof. J. R. Smith）亦言：「中國人口最密之區，耕地雖號稱肥美，農人亦善於經營，而且極為辛勞耐勞。無如人浮於地，政平均農作單位減至每家寥寥數英畝。（每一英畝約合六華畝半）甚至有三四人分耕一英畝者。按照如此狹小之農作單位，每一英方里之地竟供養三千零七十二人，牛二百五十六頭，驢二百五十六匹，豬五百十二頭。若在美國按照美國的農作方法，則每一英方里尙不能飼養如此許多之牲畜，毋論尙須另養如此衆多之人口。」云。（參閱 American Economic Life, by Tugwell, Munro and Stryker, p. 136）中國本部人煙之稠密及生活程度之劣陋，於此可以想見。無怪我國農人樂歲移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也。又數年前一位在中國多年而且主張瓜分中國最力的英國新聞記者漢爾德（J. O. P. Hand）在其中國漫遊記內也說道：「一個人看見中國一個鄉村和

他的林林總總的小孩子，沒有不覺得東方最重要的問題的——一個問題這樣急迫，這樣可迫，好像一個惡夢躍伏在心頭一樣。——從該國底這一端到那一端，景況簡直一樣。數不清的城市和鄉村佈滿了這一塊地面，擁擠得不堪。差不多每丘田畝所支持的人數，除印度外，都已超過於任何國家牠所能供給的了。人類爭鬪底第三者還不停的產生著，保留著牠那一羣生就的餓夫……這些人是全無出路，海外未曾開墾的土地，他們是全沒有分的。只好在這塊地方生生死死罷了……所以那毫不饒人的定律便施行牠自己慘酷的解決方法。把這些多過的生命，成千成萬的拿來肥田，因為田不够肥人哩！這種悲劇全盤湧現於吾人眼前。殺嬰呀，造亂呀，疾病呀，死人很快的飢荒呀，或死人較慢的飢餓呀！儘管多著哩！我們這樣密的人口，這樣少的地畝，和這樣窮得可憐的景況，但是非特不能引起別的民族的同情，反而致召別的民族的野心。一般以「衆民」為可恃的國人，可以恍然大悟了！

中山先生主張「要耕者有其田，才是我們對於農民問題的最終結果，」自然是很好的政策。然實現此種農業政策的最大困難，厥為人浮於地。現有的土地遠不敷現有的農人之分配。我國古代井田制度之崩壞，即以人口增多，人浮於地，為其最大原因。關於此點胡漢民先生所著唯物史觀與倫理之研究第二第三兩章均有詳細說明，可以參考。古今中外許多的良好土地政策都要在適當的人口密度之下，才能够實現，才能够持久。這是我們可以斷言的。據哈佛大學教授伊士特（E. M. East）的估計：「按照歐美諸邦現在之生活程度，每人須有耕地二英畝半，方足以供營養。」按每英畝合六華畝半計算，每人須有耕地十六華畝有奇。現若照此推算，則

中國四萬七千萬的人民欲達到人人均享歐美現有之生活程度，共需耕地十一萬萬七千五百萬英畝，或七十六萬萬三千七百五十萬華畝。假定中國農人佔全國人口五分之四，則以五分之四的人口，耕七十六萬萬四千萬華畝之地，每一農人須耕地二十又十分之三華畝，以每戶平均五·二人計算，每一農戶須耕地一百零五畝半有奇。但據民國三年北京農商部統計報告，全國除穀遠未具報外，共有農戶五千九百四十萬零二千三百十五戶，所耕農田共為十三萬九千四百十四萬六千四百十八畝，平均每戶僅耕地二三·四七畝。按每戶五·二人計算，每一農人僅獲耕地四·五畝有奇。即須將全國耕地增加四·四倍以上，始能達到歐美人民現有之生活程度，我國耕地之短少可以想見（關於中國耕地畝數與人口比例，吾友劉大鈞先生亦有精密的研究，并有專論登載中國經濟學社刊可以參考。）又美國一九二〇年供給本國人口需要所用之耕地共為三萬零一百六十六萬二千英畝，共合十九萬六千零八十萬零三千華畝，即等與民國三年中國耕地畝之一·四倍，而美國人口則僅佔中國四分之一。一國的農人愈富，耕地愈多，其每人的平均生產力愈大。據美國農學專家的計算，美國每一農人現在的生產力約等於英國每一農人二倍又十分之三，等於德比爾國農人二倍又十分之五，等於法國農人三倍又十分之二，等於意大利每一農人的六倍。（詳見O. O. Taylor: Rural Sociology, p. 13）又美國農人用於田莊之機器力平均每人約有六零四分一馬力。按一人合六分之一馬力計算約合三萬萬的人工。故美國農人僅有中國六分之一，而每一農人所耕之地則約等於中國每一農人之九倍云。（詳見O. E. Baker: Agriculture and the Future of China, in "Foreign Affairs" April, 1928, pp. 488-

(21) 以上所列統計比較，係僅就耕地而言。若將耕地、牧畜地、與森林地一併計入，則按照美國人民現在之生活程度，每人需地一八·七九英畝，或一百二十二華畝；按照歐西英法德比四國之生活程度，每人需一〇·七六英畝，或七十華畝；又按照德國戰前之生活程度，每人亦需九·五五英畝，或六十二華畝。故全國四萬萬人所需之耕地、牧畜地及森林地以美國為標準，當為四百八十八萬萬華畝，以歐西四國為標準，當為二百八十萬萬華畝，即以德國戰前為標準亦當為二百四十八萬萬華畝。若全國人口總數按四萬七千萬人計算，則所需各種地畝尚不止此數。按歐美人民所需之牧畜地及森林地常四五倍乃至七八倍於耕地，因歐美人民多肉食而木料之需用亦廣也。（參閱 American Economic Life, 1925. pp. 128-129 and Population Problem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Chap. VII.）美國哈佛大學經濟教授嘉佛爾嘗謂：「進取好戰之民族多肉食，柔弱保守之民族多蔬食。」此言雖不能「放諸四海而準」，實有若干理由。又據英國第二生產率委員會之調查，「每一百英畝之地，若種馬鈴薯，可供給四百二十人之食用，若種草飼牛，則祇能供給十五人。」故竺可楨先生言：「一國人口愈密，則愈將趨於蔬食。」實極有見地。我國一般農人因人煙稠密人浮於地之結果，除「一年三節」或冠婚喪祭偶然食肉之外，大都一概蔬食，毫不見葷。平時縱稍食油脂，亦嫌不足。一般否認中國人滿及提倡人口增殖之人反謂我們「不識時務，不顧國計」；吾恐他們提倡人口增加之結果，將使全國農人乃至人民全體大家「蔬食飲水」，「修仙成佛」，「種馬鈴薯，吃馬鈴薯，和馬鈴薯死去」；屆時自有「肉食善戰之民族」來收拾「我們的大好山河」哩！

是以欲謀我國農業的根本改造，欲使一般農民的生活程度得以提高，欲使耕者自有其田，非將全國現有的耕地增加四五倍不可。而全國可耕之地則除去沙漠高原，山岳池沼，及土壤過瘠，雨量過少，與夫畜牧森林所需之地而外，至多亦不過等於現有耕地之一倍。我國學者唐啓宇先生計得全國可以改良利用之土地，連同灌溉及排洩之土地，森林及斬伐地，沙漠及牧草地，在內，共為二千二百五十兆畝。唐君并謂：「以每兩畝能供給一人之衣食計算，可供一千一百餘兆人之生活。幾能容現在人口之三倍，中國現在固去人滿為患之時期尙遠。」惟著者則以為唐君未免過於樂觀。其實每人僅擁土地兩畝，絕對不夠供給衣食各種需要。按照前段所述每人須有二英畝半或十五華畝之標準，此二千二百五十兆畝之地祇可供一萬五千萬人之生活。而唐君所舉中國現在已耕之地一千四百七十三兆畝，若按照同樣標準亦祇能供給一萬萬人。所以全國已耕及未耕之土地，總共祇能供給二萬五千萬人，是為理想的時中人口密度。可見中國早已達到人滿為患之時期。無怪中山先生說：「中國現時至少總有三萬萬人朝不保夕，愁了早餐愁晚餐。所以中國是世界上最窮弱的國家。」不過唐君所舉已耕及未耕之地或稍嫌過低。按照美國農政部長貝克君（O. E. Baker）估計，中國土地除西藏不計外，共約二千四百四十兆英畝，比美國的面積差不多要多百分之三十；其中因氣候過於乾燥而不能耕種之地則比美國約多一倍。全國有充分雨量可以耕種之地約為一千三百兆英畝，其中百分之九十至九十五皆在本部十八省與東三省。（蒙古新疆有充分雨量，可以耕種之地，最多不過一百兆英畝或竟不及遠甚。）此一千三百兆英畝之中，氣候過寒不適耕種者約百分之五，所餘一千二百三十五兆英畝；其中山岳池沼之地及因其他地形

關係不能耕種之地，故美國的比例作爲百分之四十，所餘者約七百四十兆英畝；其中土壤過瘠不能耕作者爲百分之五，所餘全國可耕淨數僅爲七百兆英畝。（美國可耕淨數則爲九百七十五兆英畝）以每英畝合六華畝半計算，共合四千五百五十兆華畝。據吾友劉大鈞先生根據民國六七兩年北京農商統計報告，計得全國已耕之田園總面積約爲一千八百二十六兆華畝，全國可耕之地以貝克君之數爲準，已耕之地以劉君之數爲準，則我國可耕未耕之地，尙有百分之六十。惟金陵大學農林科卜凱教授則謂貝君的估計實屬過萬。又據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先生所引的統計東三省可耕之地共爲五千四百萬英畝，其中已耕之地爲二千七百萬英畝。即已耕地約佔可耕地的一半。或一百七十五兆華畝。是內地十八省可耕之地當遠在一半以下亦未可知。姑誌之以備研究參考。美國可耕未耕之地尙有百分之六十一，故中國可耕未耕之土地比例，似遠較美國的此種比例爲低。而中國的人口則四倍於美國的人口；中國的農戶共爲六千餘萬戶，約六倍於美國的農戶。中國農民之人浮於地可以想見。縱將可耕未耕之地完全開墾，亦甚嫌不敷分配。（參閱 *Agriculture and the Future of China*, by O. E. Baker, Foreign Affairs, Vol. 6 No. 3, April, 1923.）及（民國十七年七月經濟半月刊第二卷第十三期『地大物博之真相』）將來因全國工商業發達之結果，縱能吸收一小半之農人，然耕地則祇有此數，其餘牧畜森林所需之地，皆一概不能減少，甚或需要更多。因從事工商業之人民仍須靠農人供給食物及各種原料品，而全國的人口復有加無已也。據美國斯丹佛大學食糧研究院主任特那爾（A. E. Taylor）研究農業生產力與人口增加之結果，認爲美國的人口如果將來增加到二萬萬，則所需之主要食料，

牲畜、木料、紙張、纖維，以及燃料金屬等，均將無法供給。（參閱 *Population Problem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edited by Louis I. Dublin, Chap. VII. On Agricultural Capacity and Population Increase, by A. D. Taylor）故中國若以美國達到二萬萬的最大人口數目前之生活程度為標準，亦最多祇能供養二萬六千萬的人口。可見我國現在的人口密度較諸美國七十年以後的密度尚超過三分之一以上。據特氏的估計，人類每人每天須有三千五百加洛力（calorie）的熱量之食物，方能供給搭如此三千五百加洛力的食量分配為牛乳五五〇加洛力，穀類一三〇〇加洛力，肉類六〇〇加洛力，植物油菓品及蔬菜六〇〇加洛力，糖四五〇加洛力。若按年計算，則每人每年約需牛乳九〇〇磅，穀類約需麵粉二四〇磅，玉蜀黍粉四〇磅，其他穀粉二〇磅，肉類則需牛肉五〇磅，羊肉六磅，豬肉及豬油六四磅。糖則每年約需九一磅云。我國的民食隔這個理想的分量標準，真是天差地遠。所以痛快的說來，欲使我國農人的生活程度和一般人民的生活程度達到歐美最先進諸國的水平面，皆非有一二倍乃至二三倍之領土不為功。中國現在的人口佔世界四分之一，領土則僅佔地球面積十二分之一，即短少地球面積十二分之二，或六分之一。所以我們算來算去，總是不夠。無如我們非得「毛羽未豐，不能高飛。」甚至有之領土，亦因國民程度劣陋，岌岌無以自保。且我們將來的國際政策，復志在「濟弱扶傾」，而不注重「彙弱攻昧」，而如何完成全國的農業革命，遂為我們「物質革命」中的又一個最重大而最困難的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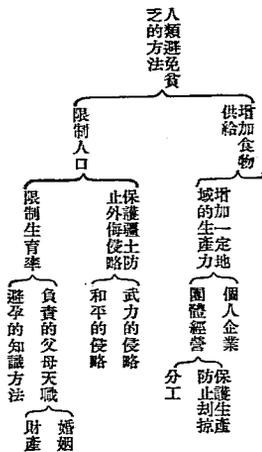
總觀以上所述，可知我國人民生計如此落後，教育如此落後，而人口與領土的比例復相差如此之巨。非人

民全體急起直追，自強不息，大大的努力前進上進，無以救國救種，而躋於世界最先進國之林。故吾人研究人口問題的第一個最積極的目標，厥爲如何使全國人民於「既庶」之後，特別致力於「富」與「教」？俾孫中山先生所提倡的三民主義，得以早日實現，俾中國各種應有的建設，得以次第完成。而欲使長期的革命途程得以縮短，不息的人文進化得有保障，若非有「生育革命」爲之輔助不爲功。楊啟濬先生說：「對於中國的人口問題，在數量上應利用國家的權力，來排除人口自然增加的一切障礙。」固然不錯。但是全國人民程度如果太低，不能行使「政權」，沒有管理政府的力量。試問政府如何能夠有力量去排除人口自然增加的一切障礙呢？試問中國近百年來一切內憂外患的總因，是否由於一般人民程度太低，不但不能做聖主明王，而且連做阿斗的資格都沒有呢？所以我們建造新島託邦的大目標，應爲最高生活的最大民數，而非最低生活的最大民數。並且要靠着最高生活的人民所發動的強大力量去排除一切障礙，人口始有真正的健全增加，若是要靠着最低生活的人民所發動的微薄力量去排除一切障礙，人口決難有真正的健全增加。蓋在最低生活情形之下，吾人縱努力提倡人口繁殖，亦無濟於事也。我們就退十步說：中國今後的人口當如法蘭西之無甚增加，我們的人口也還十一倍於法蘭西。我們祇要達到法國十一個這樣強，和法國一樣的「國家富庶，人民家給戶足。」則在世界頭等國家的國際團裏，還可以「做主席」。否則我們的人口縱一再增加，而長此生計困窮，昧弱不競，恐怕連「教陪末座」的資格都沒有哩！

美國哈佛大學經濟教授葛佛爾說得好：「一切人類社會都要承認兩種重大的事實：第一種重大事實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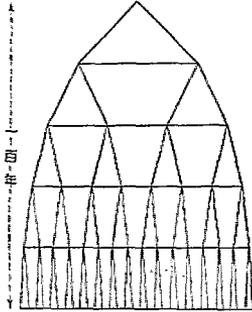
一定土地區域的生產力總是有限度的。所以在一定的土地區域之內，如果繼續增加人口，必定會達到土地生產所不能供給的地步。第二種重大的事實則爲人類的「自然」生育率（"natural" birth rate）總是超過「自然」死亡率。（"natural" death rate）所謂「自然」生育率，乃人類任性繁殖而不加理智的人爲限制之生育率。所謂「自然」死亡率，乃由幼稚而少壯而衰老至正命而死的死亡率，並非因戰爭、意外、疾病或飢餓而死的死亡率。人類的「自然」生育率，既時常高於「自然」死亡率，所以人類可繁衍至於無限，而土地的生產力則無論如何盡力，總是有一定的限度。曠是之故，人類遂時有陷於貧乏之憂。一部人類的經濟史和經濟學的使命，不外研究人類如何逃避這個最大陷阱的各種方法。」嘉氏曾將人類避免貧乏的各種有效方法分別詳加討論，並列一簡明表解如後。（參閱 T. N. Carver and H. W. Isaker: *This Economic World and How It May be Improved*, p. 68）我們檢閱下表便知「限制人口」在今後的經濟設計上所佔地位之重要。表中所列「限制人口」的方法共分兩途：一爲保護疆土，以防止外來的人口壓迫；二爲限制生育，以防止本國的人口壓迫。此二種人口限制在今日之中國皆爲切要之舉。並可證明「增加生育」與「鞏固國防」是截然兩事。在人口過庶之國家和關智不關力之世界，斯二者乃常相反而不必相成焉。

移民  
擴展地域  
通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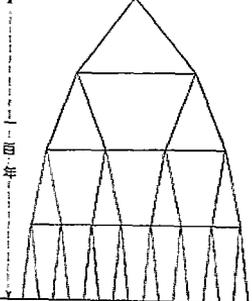


# 早婚多育與遲婚減育之繁殖比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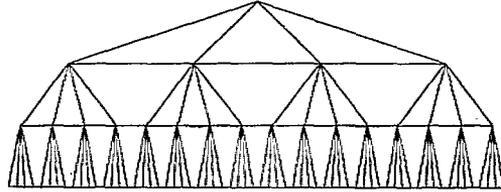
每二十年一世代之繁衍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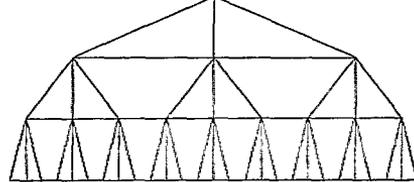
每二十五年一世代之繁衍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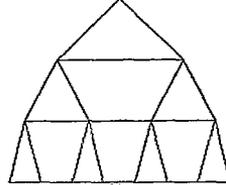
四子制之家庭



三子制之家庭



二子制之家庭



## 第六章 關於品質方面的人口政策

### 一 人口數量與品質之相互關係

以上諸章所述大半係就人口數量與文明進步方面立論。至於以下諸章則更就人口品質與種族進化方面立論。我們把人口政策大概分為數量與品質兩方面，無非為便於研究起見，並不是說數量與品質毫無相互的關係。人類的生活是整個的，不是片段的；是互相關連的，不是支離破碎的。人口的數量和品質乃同一問題的兩方面，並不是兩個獨立的問題。人口品質與數量關係之密切，正如人生胚質與體質關係之密切，實在是比彩票和竹槓的關係還要密切些。因為彩票和竹槓還是偶然的關係，品質和數量則更有不可分離的相互關係。所以英國人口學者卡爾桑德爾斯就說道：「人口問題雖有兩方面，但兩方面實有密切的相互關係，大致影響人口數量的變化亦影響人口的品質。」（參閱 Carr-Saunders, *The Population Problem*, p. 82）可惜狹義派的優生學者往往不明此義，以為數量與品質是毫不相干。譬如潘光旦先生就是我國狹義派優生學者的一個代表，潘先生把「天擇」與「化擇」、「遺傳」與「環境」、「優生」與「衛生」、「數量」與「品質」等均視為完全相反或毫不相干的對待名詞。遂謂「天擇與化擇不特不為一物，且或南轅北轍，其行動適相反而

不相成。」又說：「遺傳與環境爲相對待之二事，然國人於此向不分別清楚。」又說：「優生與衛生爲反對的名詞。」又說：鄙人所著中國人口論不應「由量的人口研究，進而得質的人口結論。」（參閱潘光旦著人文生物學論叢第一三七第一四第七〇第六六等頁）孰知潘先生原書的命名和書中的發言已首先把「人文」與「生物」混爲一談矣。可見社會科學範圍以內的許多問題和許多現象，都是有複雜的相互關係，很不容易把各種因素絕對對分，更不能把各種因素視爲絕對相反。假如黨國柱石，或國內的優生學者，飲了我們首都秦淮河的水，大家都大病特病，甚或「死亡率」也立刻增高起來！我們能够說：是因爲他們「先天的遺傳」太薄弱嗎？試問這種「天擇」也是適合優生原則嗎？又如「顏回不幸短命死」，是因爲他「質食瓢飲，居於陋巷」，所處環境太不衛生呢？還是因爲他先天不強，「遺傳」太壞呢？又潘先生既視「遺傳天擇，強種優生，爲達到人文進步的唯一途徑」，何以又抄襲美國耶魯大學地理學講師項廷頓的結論說：「中國文化的落後，似以北方氣候，環境變壞，沙漠逐漸南侵，黃河流域日見乾燥，和森林不講，水利不興，爲其更爲重要的原因」呢？（見中國評論週報第一卷第一期第十九頁）豈不是自相矛盾嗎？

潘先生又謂：「環境改良者所目擊之瘡痍景象，固屬真切之事實，設不早圖，且陷國家於危亡之域，是可懼也。然數千年來文化雖發達，而化擇力影響之所及，似不若西方之積重難返，即種族胚質上所受之侵蝕或不甚多，則又不禁引以自慰也。」又謂：「我國統計學尚未發達，然以印象所及，我國的死亡率之爲選擇的，殆無疑義。」又言：「選擇的死而爲嬰孩之死亡，則其選擇之效用愈大，蓋不特社會可減少一時之經濟負擔，而種族更可得

比較永久的正本清源之利。死亡愈早，則其弱質向下推遞之機會愈少云。」潘先生以爲化擇的死亡都是反選擇的死亡，天擇的死亡都是選擇的死亡，並且以爲我們的化擇力無多大的影響，所以我們種族胚質所受的侵蝕不多，不若西方之積重難返，不禁引以自慰。可惜潘先生忘記我們除了文化選擇之外，至少還有「野化」「蠻化」「匪化」「腐化」「惡化」的種種選擇，實使我們種族胚質受更大的侵蝕。較西方尤爲積重難返哩！我們中國自嬴秦以降，二千餘年一治一亂的歷史，大半都是盜賊開幕，殺伐收場，十年小康，百年大亂，數十年或數百年必大大屠殺一次。「成則爲王，敗則賊」，「仁義充塞，率獸食人」，這不是「野化選擇」嗎？（「秀才造反」很不常有，不然還可以算是一種「文化選擇」）又我們民族前此常被文化較低的各異族局部侵略或全部征服，如何匈奴契丹之入侵，五胡之亂華，女真之內犯，與蒙古滿清之入主中夏，是否使我們民族數十年或數百年受一次「蠻化選擇」呢？又如軍閥土匪之「嗜殺不辜」，貪官汚吏之「殺人以政」，與夫共產黨之「殺人放火」，是「文化選擇」呢？還是「非文化選擇」呢？他們所致召的死亡，是「選擇的死亡」呢？還是「反選擇的死亡」呢？這幾種「率獸食人」的「獸化選擇」，是使我們「種族胚質」毫不受侵蝕呢？還是使我們「種族胚質」受很大的侵蝕呢？所以我們認爲潘先生所懸想的「化擇」範圍，實在是掛一漏萬，其所謂「我國人口死亡率之爲選擇的殆無疑義」一語，尤屬違反事實，毫無根據。假定潘先生或別的優生學者不住在上海而住在內地，不幸被土匪架去「擄票」，這也是選擇的死亡嗎？

潘先生又謂：「選擇的死亡而爲嬰孩的死亡，則其選擇之效用愈大，不特社會可減少一時之經濟負擔，而

種族更可得比較永久的正本清源之利，死亡愈早，則其弱質向下推遞之機會愈少。」這種論調亦嫌刻薄寡恩，過於冷酷。我國的嬰孩死亡率，據各方面的小規模調查，都是很高，並且我們相信中國近二千餘年來的嬰孩死亡率也是很高，但是我們種族經過這樣長久這樣嚴酷，這樣正本清源的嬰孩死亡淘汰，何以至今還是羸弱不競，文化落後呢？豈不是令人大大失望嗎？可見薩先生的議論完全是知其一不知其二。生物界中惟人類嬰孩最為軟弱，須經過最長時間的保育，纔能「解語長成。」而一二歲以下的嬰孩尤特別容易受環境的影響，大致最幼嬰孩之死亡率，常與貧窮愚昧，人口密度，養育密度，貧富不均，和惡劣環境成正比例，不必盡隨體質強弱與胚質優劣為轉移。美國優生學者霍爾茲斯就詳細說道：「許多嬰孩死亡，顯係由於為母者之愚昧和缺乏經驗。譬如乳質不佳，喂乳不得法，醫藥方面未充分注意，以及生活狀況不合衛生，皆足以致召許多的嬰孩死亡，貧戶尤甚。在此種形狀之下，很多健全之嬰孩，也會遭殃，並有幾種普通的小孩傳染病，無論健壯與柔弱的嬰孩，皆不能倖免。在疾病期間如果看護不周，即特別健壯的嬰孩亦必死亡。故許多對於此問題有特殊研究的學者，皆以為嬰孩死亡率大都分優劣強弱一樣行使非選擇的淘汰。……故現在減少嬰孩死亡運動之大大成功，並非於種族有若何不利，且盡量保護嬰孩，使其成年以後始行增多死亡，則死亡率或更富於選擇性，實於種族有更大之利益。」云。霍氏並舉出很多的統計證明嬰孩死亡與人民貧富有密切關係。譬如德國愛爾弗特城的勞動階級，每千嬰孩中之死亡率五百零五人，中等階級為一百七十三人，富裕階級僅八十九人。又嬰孩死亡率常與父親的進款成反比例，即父親進款愈大，嬰孩死亡率愈小，父親進款愈小，嬰孩死亡率愈大。又城市的嬰孩死亡率

因人口稠密之故，當較鄉村的嬰孩死亡率稍高。試問這些嬰孩死亡差別都是「選擇」的嗎？又英國生命統計學者紐士靈華（A. Newsholme）根據英國各行政區域的死亡統計會證明凡有高嬰孩死亡率之各行政區域，其隨後各年級之成年死亡率亦屬較高，凡有低嬰孩死亡率之各行政區域其隨後各年級之成年死亡率亦屬較低。足見一切減低嬰孩死亡率的工作並不至危害人類之品質云。可見潘先生的論調在學理及事實兩方面均不能成立。（參閱 S. J. Holmes, *The Trend of the Race*, pp. 191-199, A. Newsholme, *Elements of Vital Statistics*, pp. 348, 358-359, *Strides in Evolution and Eugenics*, pp. 137 and 159; 及拙著中國人口論第五十五頁至六十頁）

至治之極，人人皆應正命而死，各以壽終，如牛頓看「蘋果之自然墜落」，纔是真正的「自然死」。英國生理學家夏弗爾（Gahan）教授曾說道：「凡不罹疾病之自然死，（病死亦由於吳厄與夭折同樣為不自然之死）恍如油盡燈消，平靜而終，毫無劇變，絕不苦痛。達斯泰（Danteo）有言：「一生之終，死之必要，正如一日之終，眠之必要」信然云。」（參閱永井潛著胡步蟻譯生命論末頁）又子貢也說：「大哉乎死也，君子息焉，小人休焉。善哉古之有死也，賢者息焉，不肖者伏焉。」所以真正的自然死，纔是選擇的死，洪亮吉所謂：「死之有早遲，由於秉賦有強弱，猶葉落之有先後。」一切無謂的吳厄病歿和其他種種不自然的死亡，在一個最進化的烏托邦裏頭，皆應減少到零點，尤其不應有不自然的嬰兒死亡。因死亡乃生命之終局，嬰孩未到衰老，就教他演生命之終局，實在是最不自然的死法也。潘先生把許多不自然的死都誤作選擇的死，實屬大錯特錯。如果按照

潘先生的印象，「中國今日之死亡率皆為選擇的，」則微菌、蒼蠅、蚊蟲、蟻、老鼠、蝗蟲、毒蛇、猛獸，皆有勤勞於我們種族的進化，我們應好好去培養他們的繁殖種是。又軍閥流寇、貪官污吏、土豪劣紳、市儈奸商、庸醫產婆、星卜巫魘、鬼怪凶邪、盜賊奸宄、竊匪人販、與夫其他諸般妖孽，也是有大勤勞於我們種族胚質的健全，都應該一律論功行賞，給予大勳位、小勳位、嘉禾章、文虎章。我們儘可完全人事不修，羣治不理，大家高頌「臣罪當誅，天擇靈明，」我們的種族就會變為超越的人類，我們這一部份的地球面積，就自然會成第二之天國，豈不是妄謬可笑嗎？又「衛生」與「優生」若是「完全相反，」則醫生、看護士、清道夫，乃至保嬰的慈母都成了種族的罪人。而在街中大小便的人們和其他妨害公衆衛生，如胡漢民先生所譏：「使大家呼吸都不能自由」的人們，乃至身染梅毒之已婚男子都可以幫同潘先生去提倡「優生」反對「衛生」。大家努力去增多人口的死亡，俾種族有「正本清源」之效，而日登優良仁壽之域。這可算是潘先生獨出心裁的絕妙「強種唯一途徑」了。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先生新近週遊世界，回到南開時的演說中有一段說道：「余抵埃及時，景象又為之一變。由埃及至西貢途中，余所得之印象為「窮」「僻」「弱」，殆亦東方民族之特徵。總之，西方之富強，因其人強。回視吾國之情形為何如乎？其最要者為體弱、道微、弱、思想弱……國弱民困，良有以也。」張先生這個印象也是與潘先生所「引以自慰」的印象恰恰相反。足見著者批評潘先生，並非出於好辯，實有充分的理由。（參閱十八年九月三十日民國日報所載張伯苓之週遊世界見聞談。）

潘先生原書之中其他謬誤之處尚多，著者固不遑一一加以批評，惟全書現論參半，則觸目皆是也。譬如潘

先生所贊賞的「門當戶對」的婚姻，即其一例。實則「門第婚姻」或「類聚配偶」的本身並不能增進種族的健全，不過使階級的區分更為顯著罷了。何況中國舊式婚姻的選擇，很多時候與其說「選擇之權屬之家長」，吾輩謂之「選擇之權操諸媒人」，即操諸一個「毫不相干之第三者」與植物界的風媒、蟲媒、蜂媒、頗相彷彿。所以許多的「天作之合」，完全是交易式的「媒作之合」。這些介紹交易的媒人，祇知注重他們的佣金，把兩造勉強拉攏，那裏知道甚麼叫做「謹嚴審慎」呢？潘先主嘗驚訝「何以在這種舊制度之下，婚嫁事後，家庭相安者多，發生問題者少？」我們則毫不驚訝，因為男子可以隨時「添置小尾」，女子則不能再嫁，自然可以家庭相安無事，何奇之有？潘先生說：「若要洞房花燭夜，除非金榜掛名時」，大率為舊式婚姻制度底下的上流社會團體中所有之理想。「我們則可以說：『王侯將相成功易，才子佳人遇合難』」，纔是舊式婚姻底下的上流社會團體內外更為普遍的怨聲哩！何況一國的「類聚配偶」如果極為普遍，而生育節制則不甚普遍，其結果祇能使反優生的現象，色彩愈加濃厚。換言之，即各階級已有之軒輊生育率，當軒輊愈甚。假如甲乙丙丁……各階級的男女各與同階級的男女互通婚媾，必相率各自維持其本階級原有的小家庭或大家庭習慣，即能知節育的上中等階級必盡量去節育，不知節育的下等階級必盡量去繁殖。其結果當使上層階級的人數增加更形迂緩，而下層階級的人數增加則愈形迅速也。總之，潘先生的優生理論大都過於冷刻陳腐，且好持矯情的論調，自己以為見解獨到，實則離事實太遠。正是孟子所謂：「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與薪。」關於原書其他的缺點，周建人先生也有很多正常的批評，可以參考。潘先生的人文生物學論叢，在我們讀之，很像「科甲中人」的八

股文章，專爲「門當戶對」「科甲出身」的人們立論，更有「王謝風流」的名貴家譜以資點綴，誠不愧爲完善之課本，可惜頗嫌陳腐迂酸耳！

## 二 時中的人口密度爲行使健全選擇之必要條件

聞話少說，言歸正傳。我們說人口的數量與品質有很密切的關係，並非憑空杜撰。假定一個國家社會的人口是遠在時中的密度以下，則地廣人稀，文明進步必異常迂緩。種族常受異族的壓迫侵略，種族中的健壯男子多供戰爭的工具犧牲，優秀女子則供戰勝者之戰利品，甚或墮落的民族完全被異族征服。如美洲的紅印度人及世界其他很多的弱小民族，都是輾轉消沉以歸於盡。在這種情形之下，整個的民族實無以自保，那裏既講甚麼優生強種，去增多具有良好胚質的分子哩！不過誠如英國人口學者卡爾桑德爾斯所云：「人口不足的事例在今日已屬罕見。從前能殖業民隨後因環境變壞祇能維持稀少人口之區域，當作別論，不應視爲人口不足。至於人口過庶的事例，則更屬常見。」所謂人口過庶的國家，即人口超過時中密度的國家。如中國印度乃其最顯著的例。在這種人口過庶的國家之中，人民內部的生存競爭，過於激烈，社會的黑暗紛亂達於極點。在此種情形之下，很多最優秀最健全的分分子，亦被犧牲。所謂「火燒昆崗，玉石俱焚。」甚或「玉碎瓦全，優劣倒置。」譬如現時各省區無辜良民的死亡率在有些縣分，恐怕比土匪的死亡率還要高些！又一般人民的死亡率恐怕比貪官污吏，軍閥財閥，市儈奸商，土豪劣紳，庸醫惡棍，共黨首領和其他諸般妖孽的死亡率，也是高得多哩！所以在人口

過庶的半開化國家，有很大一部份的生育與死亡都是「反自然選擇的」，同時也是「反文化選擇的。」其關係略如第一圖並非如第二圖。其所以然的緣故，都是因為在人口過庶的半開化社會之中，有一部份的人是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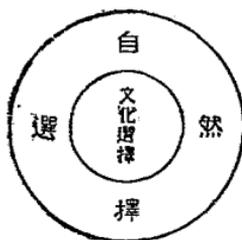
進演種人的家國明文半

圖 一 第



進演種人的家國明文

圖 二 第



經拋棄了獸性，有一部份的人則還沒有拋棄他們的獸性。於是首先拋棄獸性而在種族進化上最為寶貴的分  
子，其生存權往往被獸性承滅的分子優者剝奪，國家復無力禁暴戾奸，使人民受法律的平等保障，故種族胚  
質所遭受的災厄特大。較諸大家都推進文化選擇的國家社會，其影響結果固然不能比擬；即較諸大家都一律  
恢復物種競爭的野蠻社會，其影響結果似亦不如遠甚。換言之，即一個人類社會，從優生方面立論，要文明就要  
大家都文明，或多半都文明，否則寧肯大家都一樣野蠻，倒也罷了。最可憐的是半野蠻半文明的過渡時代。在這

種社會裏頭，每遇人口過分繁殖，則文明分子和野蠻分子的相互關係，很像是一個能和不能戰的國家，同一個能戰不能和的國家相接觸一樣。其結果是不愛和平的適於生存，愛和平的反不適於生存；惡的分子適於生存，善的分子反不適於生存。種族的胚質當然受很大的侵蝕，而民族遂因以不競。我們民族前此屢受野蠻民族的蹂躪，後來又受帝國主義者的侵略，豈無抵抗之能力。其原因雖極複雜，然種族的優秀分子早已假武修文，酷愛和平，始而首先拋棄好勇鬪狠的風尚，繼而一併拋棄自強不息的精神，乃其最大的一個原因。所以對於種族內部的選擇，則受一治一亂的淘汰消滅，對於種族外部的選擇，亦受金戈鐵蹄的蹂躪摧殘。這種國家除一面設法調劑人口過庶，一面設法促進一般文明進步之外，似乎有從事改良人種的希望。這不是證明人口的數量和品質有很密切的相互關係嗎？

我們說生齒最繁社會最黑暗紛亂的國家，其種族反選擇的死亡亦最大，實有許多證據。所謂「小人道長，君子道消；」「豺狼當道，虎豹橫行。」所謂「仁義充塞，率獸食人；」「鳳兮鳳兮，何德之衰？」所謂「天下滔滔，隴與易之；」「生靈塗炭，無解倒懸。」所謂「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所謂「賢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所謂「黃鐘毀棄，瓦缶雷鳴。讒人高張，賢士無名。」所謂「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所謂「造物多忌才，紅顏偏薄命。」這都是表明亂世的生活常使惡者劣者適於生存，善者優者反不適於生存。這種反選擇的亂象之見於詩歌者，尤指不勝屈。例如：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王風委蔓草，戰國多荆榛。龍虎相夾食，兵戈迭往來。正聲何微亡，哀怨起嗷人。

揚馬激頰波，開流瀟無垠。殿與蓬蒿變，憲章亦已論。自從建安來，綺縠不足珍。聖代復元古，垂衣貴清真。羣才屬休明，乘運共騰鱗。文實相炳煥，義星羅秋長。我志在刪述，重輝映千春。希聖知有立，絕筆於獲麟。」

「松柏本孤直，難爲桃李顏。昭昭嚴子陵，垂釣滄波間。身將客星隱，心與浮雲閒。長揖萬乘君，還歸富春山。清風灑六合，嗟然不可攀。使我長歎息，冥棲巖石間。」

「世道日交喪，澆風散淳源。不采芳桂枝，反棲惡木根。所以桃李樹，吐花竟不言。大運有興沒，羣衆爭飛奔。歸來廣成子，去入無窮門。」

「燕趙有秀色，綺樓青雲端。眉目艷皎月，一笑傾城歡。常恐碧草晚，坐泣秋風寒。纖手怨玉琴，清晨起長歎。焉得偶君子，共乘雙飛鸞。」

「三季分戰國，七雄成亂麻。王風何怨怒，世道終紛拏。至人洞元象，高舉凌紫霞。仲尼亦浮海，吾祖之流沙。聖賢共淪沒，陳鼓胡嗒嗒。」

「抱玉入楚國，見疑古所聞。良寶終見棄，徒勞三獻君。直木忌先伐，芳蘭哀自焚。盈清天所損，沉冥道爲羣。東海汎磬水，西關乘紫雲。魯連及柱史，可以躡清芬。」

「美人出南國，灼灼芙蓉姿。皓齒終不發，芳心空自持。由來紫宮女，共妬青蛾眉。歸去瀟湘沚，沉吟何足悲。」

「宋玉梧臺東，野人得燕石。誇作天下珍，却囑趙王璧。隨壁無繡磷，燕石非貞真。流俗多錯謬，豈知玉與」

現。」

「殷后亂天紀，楚懷亦已昏。夷羊滿中野，綠蕪盈高門。比干諫而死，屈平竄湘源。虎口何堪鑿，女顏空嫺娟。彭咸久淪沒，此意與誰論？」

「青春流驚瀾，朱明驟回薄。不忍看秋蓬，嚴揚竟何託。光風滅曠蕪，白霧灑萎蕤。美人不我期，草木日零落。」（以上李白詩）

「有弟皆分散，無家問死生。寄書常不達，况乃未休兵。」

「去年潼關破，妻子隔絕久。今夏草木長，脫身得西走。」

「干戈猶未定，弟妹各何之。拭淚沾襟血，梳頭滿面絲。地卑荒野大，天遠暮江遲。衰疾豈能久，應無見汝期。」

「十室幾人在，千山空自多。路衝惟見哭，城市不聞歌。漂梗無安地，銜枚有荷戈。官軍未通蜀，吾道竟如

何？」

「國步猶艱難，兵革未衰息。萬方哀嗷嗷，十載供軍食。庶官務割剝，不暇憂反側。誅求何多門，賢者貴爲

德。」

「江漢山重隔，風雲地一隅。年年非故物，處處是窮途。喪亂秦公子，悲涼楚大夫。平生心已折，行路日荒

蕪。」

「兵戈不見老萊衣，太息人間萬事非！我已無家尋弟妹，君今何處訪庭闈？」

「天下郡國向禹城，無有一城無甲兵。焉得鑄甲作農器？一寸荒田牛得耕。牛盡耕，蠶亦成。不勞烈士淚滂沱，男殺女赫行復歌。」

「自古聖賢多薄命，姦雄惡少皆封侯。五陵豪貴反顛倒，鄉里小兒孤白裘。生男墮地要膂力，一身富貴傾邦國。莫愁父母少黃金，天下風塵兒亦得。」

「更欲投何處？飄然去此都。形骸原土木，舟楫復江湖。社稷纏妖氣，干戈送老儒。百年同藥物，萬國盡窮途。」

「羈旅知交感，淹留見俗情。衰顏聊自哂，小吏最相輕。去國哀王粲，傷時哭賈生。狐狸何足道，豺虎正縱橫。」

「北風破南棧，朱鳳日低垂。酒庭秋欺雪，鴻雁將安歸。十年殺氣盛，六合人頽稀。吾輩漢初老，時清猶茹芝。」（以上杜甫詩）

是以最高死亡率的國家，不但不爲選擇死亡率甚高的國家，而且常爲非選擇死亡率及反選擇死亡率甚高的國家。因爲在混濁紛亂的國家社會之中，善者反不如惡者之適於生存也。至於死亡率最低的國家，不但不爲死亡的選擇 (death selection)，最失效用的國家，而且反爲死亡的選擇有真正效用的國家，因爲祇有死亡率最低的國家，纔能够人人皆有真正的自然死也。所以在混濁紛亂的社會之中，完全說不上真正的優勝劣

敗，猶如毫無規則及毫無標準的體育比賽，分不出一個真正的勝負好壞一樣。在這種情形之下，種族那裏能夠有健全的選擇呢？

### 三 人口過庶與中國民族的橫逆淘汰

又潘先生新近所譯美國耶魯大學地理學講師項廷頓 (Dr. H. H. Johnston) 討論中華民族性的四篇文字裏頭，不是有很多地方也說到人口的數量和品質很有關係。我們從項氏原書第十至第十三各章和潘先生的譯文中隨意挑選幾段文字，就可以表明數量與品質有很密切的關係。項氏開宗明義第一章就說道：

「一部中國歷史是幾個周而復始更迭遞轉的大節目所造成的；這些大節目的順序是外族的侵襲，人口的移徙，人文的進步，人文的退步，政治的混亂，接着又是外族的侵襲。這些外族都是來自西北方，就是來自土耳其斯坦（新疆青海）和蒙古的沙漠一帶，或來自滿洲。最初侵入現在中國地域的也許是原來的華人。後來的外族則為匈奴人、蒙古人、韃靼人和滿洲人，他們都是遊牧民族或遊牧民族的後裔。

中國北方雖有長城和大軍，但是土著的華人始終沒有力量抵禦這些富有能力的野蠻民族，或至多祇能抵禦數百年之久，這些遊牧民族，時常侵略安於農業的華人而征服之。每逢中央亞細亞一帶（即指蒙古、新疆）天時久旱，這種侵略的大禍必捲土重來。由此可知遊牧民族之所以征服中國，一半因為受了經濟的壓迫，一半因為富有領袖的能力，凡屬遊牧民族都是重領袖的。

就中國方面說，外族侵略的時期，也就是內部混亂的時期。一面有旱災和沙漠一帶一樣，旱災之後又有水災和其他天行之錯亂，一面有因他種原因而發生的內部退化。天災人禍，裹應外合，就使華人陷入無政府  
的渾沌狀態。在這種時候，北方的華人感受異族侵略和生計困苦的兩重壓迫，其自然的結果遂有許多人向  
南或向東南遷徙。人口的遷徙，當然有時因為想覺得比較膏腴或未盡開墾之地，或想遷往生活較為豐富之  
區去沾一些光。但是中國大批的人口流動，十九多在北方饑饉和異族侵入的時候，並且都是向南遷徙，好比  
像波浪向着一個方向推移。當初是從陝西東北部之黃河上游附近河套一帶向東南推移，後來則從北方各  
省悉向南移。一直要到差不多耶穌誕生的時候，即中國有史以後二千年，這種移民的波浪纔推到現在的廣  
東。

北方人民南徙之後，剩下的空隙就被內侵的異族填滿。這些異族遂立刻採取華人較高的文化，並與華  
人發生血統混合，而成一更有生力的新民族。中國史上大多數開創帝業的人不是純為異族，便是雜糅與華  
種混合的血族。

中國歷史的週環經過了外族侵略，內政混亂，和人口移動的三個段落後，便進入一個人文進步的時期。  
這也是數見不鮮的事實。大約外族從沙漠一帶移入中國本部，移徙之際所受淘汰的影響很大，所以能够達  
到中國本部的分子，大都是異常有才力的人，他們終究把華人征服了，都是因為他們領袖的能力比華人強。  
至於中國人文退化的原因，其最為深重而為最少學者所認識的，莫如在中國所常有的某種情形之下

——尤其是在人口過庶和饑饉頻仍的時候或地域，——其優秀分子可以受很大的打擊而迅速淘汰。中國退步最大原因之一，似乎就是北方全部人口品質的日趨衰敗。因為飢荒和人口過庶的緣故，能够生存的人大都僅具有節儉勤苦忍耐艱辛各種消極的品性。至於有積極的領袖能力之人便不容易生存。中國歷史的週環中，每遇凶年饑饉，內部混亂及外族侵略最為嚴酷之時，必有大部分比較劣弱無能的人口大受淘汰。淘汰嚴的或亂後遷徙歸來的，或者移民的子孫遷回桑梓的，當然比以前被淘汰的分子要優秀些。這種比較優秀的分子機會也自然比從前好。因為亂後人口比較稀少，曠土亦較多，他們可以盡量利用。因此他們營養比較充分，他們的健康比較有保障，和當初地狹人稠的景況相反。等到歷史的週環再進展一步，人口的壓迫既難免除，於是一方面有較有能力的平民，一方面有比較充裕的生計。新生的領袖乃得發展其天才，把社會引入一個人文進步的時期裏。所謂中國歷史的週環大致如此。」

又項氏原書第二章大致說道：

「近代的中國有許多大可注意的特點。其中的一個特點厥為進步的一個南方和東三省與落後的北方之大相懸殊。從這種大相懸殊的情境，似乎很可以明白看出中國北方受了橫逆的自然淘汰影響所造成的種種退化現象來。至於中國北方發生橫逆的自然淘汰的大原因，則為過庶與天災。大致殘酷的天災，在中國北方，乃屬常有，而在東三省和南方則不常有。早災水災均係北方較多，而且更為嚴厲。

中國的人口過庶和重大飢荒，似循環往復，垂二千餘年。中國現在之貧弱，皆因地被民衆，人口壓迫，有以

致之。中國民族所遭受的天災，恐怕超過世界任何國家。——連印度亦不能與中國比擬。——至於天災人禍，對於中國民族性所發生的種種積遺影響，更是可想而知。何況每遇重大天災，還有野蠻異族亦因同樣原因而大舉內侵，趁火打劫哩！

所以中國從前和現在所需要的是更多的空地。全國實在人口太多。有些人以為在此種天災流行的國家，係由於佃農制度之不良。但是長此災難時作，長此經過多年都是農產不足以養生。決非任何完善的佃農制度所能致富。在此種情境之下，貧者當然典押其土地力役與本身於富者，決非法律所能制止。唯一救濟方法在於興水利，修水道，修道路，利交通，以戰勝自然。同時並須綢繆未雨，思患預防，尤其要限制人口，庶使豐年得有很大的儲蓄盈餘，以備不可避免之凶年之用。蓋凡因自然界不規則變化所召之災難，區區變更田制與稅制祇能救濟於一時，決非根本救治也。」

又項氏原書第四章大概說道：

「關於民族的選擇和淘汰，中國式的飢饉自然是首先裁汰身體孱弱的人。其次則為淘汰一些奢侈浪費，保留一種省儉和摺節的品性。省儉與摺節雖為美德，但是很容易變為吝嗇與自私自利。自利和自私，便是中國人中間最顯著而最可惜的品性。這種自私自利的品質似乎成了種族血統的一部分。深深的鑄在胚質裏面。其所以成為種族遺傳的一部份，因為以前凡是能夠損己利人好善樂施之輩，在荒年的時候已經死完了。譬如一户十五口的家庭，家主是一位祖父，下面有三個兒子和每房的媳婦，還有好幾個孫子孫女。全家所

剩的糧食祇够一百天的消耗，可是離開下一季的收成還有一百五十天，就有五十天青黃不接，再假定東西鄰舍有好幾家也有這種情形。要是有一家肯分些糧食出來，幫助別一家，這慷慨些的一家就要減少他們自己生存的機會。要是太慷慨了，生存的機會便更少，不上幾天，自然不免餓死。在這種情形之下，談不到以羨補不足，因為災區太廣，往往包括幾省。大家都是不足，不比平日少數個人或少數家庭有困難時，別人還可以調濟他們。

祇顧自己不顧別人的行為還不止此。荒年常有賣兒女的，尤其是女子，要是妻子年輕，也可以賣。荒年來了，家裏的老輩便向全家的人打量一遍，最後決定說，要挑出一個最年輕貌美的媳婦和一個聰明伶俐的小姑娘來出賣，所得的代價纔可以養活其餘一家大小。要是某家的老輩心腸軟些，聽了媳婦和女兒的哀求，沒有把她們賣出去，結果是怎樣呢？幾個禮拜或幾個月之後，全家就再也無法支持，直到最後山窮水盡的時候，如果不把女兒媳婦出賣，這戶人家就祇有三條路可走。第一是全家出發作化子，或做搶匪。第二是死。第三是吃人肉。要是一戶人家有些傲氣，神經比普通的災民略為銳敏一些，他們也許會自殺。

但是不去理會女兒和媳婦們哀求的那一家，反而生存了。他們犧牲了一家的如花美眷，居然把其餘的人保全了。歷來的情形都是如此。二千餘年來，賣兒鬻女，尤其是鬻女，早就成爲過渡荒年的一個公認的方法。法律和政府且往往加以許可。於是自私自利的心越重，生存的機會就越大，多經一次荒年，人品上自私自利的心理就深一分。充其極，一個全付精神只替自己打算的獨夫，在這種形勢之下，便最有生存的機會。這種機

牲了一二個人來維持全家的事實，當然不必專指出賣，也許把一個小輩殺了，把人肉當糧食。這的確是中國荒年史裏所數見不鮮的事。總之，極端的自私自利心腸，可使一戶人家渡過荒年生存下去，祇要當家的人不把自己做單位，却把全家做單位。

這二千餘年的長時期中惟自私自利一類的人在荒年纔受選擇的事實，一代復一代。中國民族雖大，恐怕在全部的遺傳性上總不免發生一些顯著的變遷罷。

關於荒年出賣小孩和年輕婦女的事實，中國史乘之中都常有記載。據前次華洋義賑會的洋員於賑務結束後調查災區的人口，遂發見年輕女子特別缺乏，比起其餘的人口來，要少四五萬之多。換言之，這四五萬的女子早就打發開了。災情厲害的時候隨時都可以買這種女子。有一位教會中人不忍看她們墮落，買了幾個，纔花華幣兩元至五元一個哩！大致不很好看的只值兩元，值五元的就很過得去；真正好看的可以值到二百元。這種情形在有規模的賑務的災區尚且如此，試問從前更壞的災荒又是怎樣呢？若把幾百次荒年裏出賣的女子總算起來，一定不下幾百萬！

這些賣出的女子都是普通農家所有最優秀最聰明最美麗的女子，換言之，即身心都很健全的女子。試問亂篳的村莊賣出女子的影響是怎樣呢？就是下代很多身心健全應為賢妻良母的女子都已人面不知何處去了。又奇怪北方華人日見魯鈍，而北地胭脂較諸南朝金粉遠覺稀少呢？中國女子的生活——尤其是北方女子的生活——實屬可憐已極，每年自殺之女子不一而足。而在災區很多有堅強意志和良好品格的女

子，悉供無情的犧牲。且并無災荒之年亦常有賣女鬻妻之舉。一個社會如果把許多最為優秀的女子均悉行移去至數十代之久，則其社會必定退化愚蠢而不復重視婦女無疑。因為這種劣陋的品性不祇變為社會的風氣，而且成了種族的遺傳，自然積重難返也。

此種售出之女子在中國的種族上雖非完全喪失，然至少有一很大部份確係喪失。大致賣出之女子其品貌較為平常的多，被未受災害區域之男子買來做妻室，但此種男子亦為家境甚窮而最為庸碌之輩。至於品貌較為優秀的女子則有兩種命運，或被城市富人購去充小星，或被城市妓館買去做妓女。而使農民和鄉村較為優秀的許多女子均被一掃而空則一也。

又災情重大之區域，很多青年男子亦遠適他方，或到城市避難，而老弱獨後。故其結果實使鄉村損失許多壯健男子和優秀女子。惟城市人口的生育率既較鄉村為低，死亡率則較鄉村為高，加以城市之中花柳病既頗盛行，無子女的家庭自屬較多。是以天災流行及優秀女子皆與城市和青年男子徙居城市避難之結果，鄉村人口與城市人口雙方的品質，皆必逐漸低劣無疑。

猶幸雖在飢饉頻仍之區，亦尚有一部份的種族能力未經消磨淨盡。故正當的選擇，自由的機會，和人口壓迫的減除，似為中國今後民族改造的必要元素云。

#### 四 普遍的生育革命為改良種族質品及減免人口壓迫的最要法門

於此可見凡一國的人口如果超過時中的密度，則無論自然選擇與人爲選擇，皆不能健全行使。我們中國的人口每經一度的天災人禍，內亂外侮，橫逆的天演和混亂的人演必天翻地覆，大闢一場。彷彿像火山爆發，土匪洗劫，揚州十日，嘉定三屠一樣。種族的胚質當然遭重大的打擊，受重大的損失。雖因新的種族混合於漢族血統，或不無小補。但漢族原有最爲優秀健全與最能愛族愛類的分子則多因從井救人和捍禦外侮而被一再犧牲，則又爲不可掩之事實。吾人平心而論，漢族近二千餘年文化均無甚顯著的進步，未始非種族種種退化有以致之。王桐齡先生所著中國民族史對於我們民族的前途雖頗爲樂觀，但即按照王氏所述，亦可知漢族近數千年來所付種種代價之鉅。自西力東侵，倭族崛起，我們民族在近百餘年間，又受新的外侮壓迫。此種新的外侮壓迫，均來自文化相等或文化較高而勢力亦遠較雄厚的國家民族。較諸從前文化皆不如我的各游牧民族所施的壓迫侵略，尤爲利害武辣，尤爲嚴重復毒，而且最難應付。我們民族前途的莫大危險，就是在這一點！所以我們今後總要大大的努力圖強，實行國家的根本改造，培植種族的根本健全，治重人民優生救養，促進社會的長期進步，然後可以安內攘外，長存永保。孟子說：「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太甲說：「天作孽，猶可逭。自作孽，不可活。」孔子說：「存亡禍福，在我而已。天災地妖，不能加也。」我們民族今後欲圖有意義和有價值的永久生存，就要把一切生存問題都加以精密研究，想出一些根本解決的良好方法來。這些方法都要根據中山先生所謂：「從科學而來的真知特識」去分別擬定，庶不至「自惑以惑人」。中山先生說：「我們要學外國，是要迎頭趕上去，不要向後跟着他。我們到了今日的地位如果還是睡覺，不去奮鬥，不知道恢復國家的地位。從此以後，便要亡國滅種。」

種！現在我們知道跟全世界的潮流，去學外國之所長，必可以學得比較外國還要好，所謂後來者居上！著者以爲我們今後的人口政策，也是要「後來者居上。」歐美諸邦的節育和優生兩運動，當初祇用以改良特殊階級的境遇生活和品質遺傳。節育知識固爲特殊階級的專利貨品，優生理論亦常帶着貴族的濃厚意味。加以在資本帝國主義的政治經濟制度之下，治人階級常希望加多人口，好替他們打仗，資本階級常希望增多勞力，好替他們作工。所以他們自己的生育率儘管盡量減低，但是同時還要假冒爲善的去提倡增加人口，或用法律去禁止節育知識的傳播。其結果反使社會上發生極大的軒輊生育率，即愈上層的階級生育愈少，愈下層的階級生育愈多。與優生學家原來提倡改良人種之目的恰恰相反。所以我們今後的節育優生運動，就不要再蹈歐美的覆轍。他們的大毛病在於不澈底、不公開、不普遍，不以民福爲前提，而以特殊階級的利益爲前提。和過於重視個人主義而蔑視社會主義。我們將來的生育革命和淑種運動，在三民主義的政府指導之下，一定是遠較澈底遠較健全，這是我們可以預料的。胡漢民先生說：「人民要有能力發展其民族所具有的特點，如……優種學等，都要能够自己創造，自己發展，始得謂之民族。」這話是很有道理的。

現在歐美學者亦漸知他們社會發生軒輊生育率之癥結所在，而另行指示一條出路。這條出路將來必定會實現的。美國優生學者霍爾茲斯 (G. J. Haldanes) 說：

「生育節制在往昔所以未能盛行，或因多數爲父母者皆不知有生育節制之可能。是以人類之繁衍，一如下等生物，一切聽其自然。明知無限制的人口繁殖結果不佳，亦不設法制止。所有過剩之人類均聽其自然。」

自強；有時並藉戰爭、瘟疫、飢饉，以播除之，而拋棄胎兒亦屬常有之事。至於現時生育節制所以更為普通，則因人類知識日有進步，加以生活程度日高，皇家夫婦欲享受更為文明開適之生活所致。生育節制雖於大部分人類確有充足理由，惟不宜矯枉過正，亞里斯多德的中道實以此處為最適用。同時政府對於健全的避孕方法，亦不必禁止其傳播。蓋此種知識在上等社會之中既如此普遍，醫學界及其他方面之贊成生育節制者亦日見增多，一切法律禁止對於上等社會現已毫無效果，徒使最應節育的平庸愚昧分子，反不享其利益，且使各階級之墮胎舉動間接增多也。凡利用愚民政策以為道德保障之辦法，罕有不失敗者。故與其從事法律禁止，不如將最無損害之避孕方法廣為傳播，俾為一般已婚夫婦共有之財寶，遠較妥善。一般反對此種辦法之人，祇有少數係出於至誠，其餘大半皆為偽君子。譬如法國提倡人口繁殖委員會的四百四十五個委員之中，共計僅有子女五百七十八人，即平均每一個委員之家庭，僅有一個又三分之一個小孩，未免過於滑稽。故節育問題決非憑宗教權威或其他任何天經地義所能解決。其唯一原則應視如何最能增進種族之幸福。務使確須節育之家庭均知節育，而具有良好品質之家庭則更願傳後，庶幾近之。（參閱 B. J. Holmes, *The Trend of Race*, pp. 172—173）

霍氏又謂：

「人種改良顯與改良現時被壓迫的大部分人類之經濟狀況有密切關係。一個階級區分甚嚴的社會，如有常此愚昧困窮的平民階級在內，必難期進步。惟教育更為普及和下層階級的生活標準亦逐漸提高之

社會，其不知節育的一部分人類之高生育率方能減低經濟的改造雖不能視為救治一切種族和社會各種病症的萬應仙方，但祇有在更為平允的經濟狀況之下，各種優生理想始有確切實現之可能。凡財富分配愈均，則各階級的生育率自必漸趨均平。又提高一般人民的教育程度，和普及遺傳良好品質於後代之義務觀念，則各種情形必逐漸變好，當使更為強健聰俊而富有博愛精神之分子比較增高其生育量。一個社會如能恢復生育量與高貴品質之相互關連，——即為現代文明所破壞之一相互關連——則人類種族當復向康莊大道繼續進化云。（參閱 B. J. Holmes, *Studies in Evolution and Eugenics*, pp. 104—105）

又美國霍布金斯大學貝爾教授也說：

「軒輊生育率之反優生影響，乃為現時最引人注意之問題。自柏爾森（Karl Pearson）諸人用統計方法，證明優良分子生育率較低劣弱分子生育率較高以來，很多一知半解的優生學者遂以為凡屬高生育率皆為劣弱之表徵。譬如窮人多子，亦視為天賦劣弱，應該貧窮。此種見解實屬毫無根據。其最好的反證即係現時許多富貴之家和教育界中人，當初皆出身貧賤。所以我們不能說現時生育率較高的人都是劣弱的人。誠如美國統計學社社長達達柏林（D. I. Dublin）所云：「我們如果把全國人口的上智下愚各除去一成，則其餘八成人口的天賦本能似無重大的差別，實無充足理由，說他們不應傳後。彼輩雖無特別優點，亦無特別劣點。雖缺過人的天才，但有其他的及好品質。彼輩祇是做世界普通工作的平常人。我們有許多明顯的證據，證明平常人亦能產生有最大成就的子女，祇要他們的能力不受機會和環境的限制。我們的社會組織是

比較複雜，模制亦比較完全，故各樣的人皆得發展其本能。若在組織不甚完備之社會，則許多本領皆白白耗費。自有歷史以來，所有人類的領袖，大都出自表面似最無希望而最爲平常之家庭。安知今後的領袖不是亦一如往昔，出自此種家庭呢？達氏所用「最大成就」和「一如往昔」等字樣，容有言過其實之處。但此段文字的大意，則無可辯駁焉。

「一般優生學者爲糾正軒軀生育率之弊害起見，均欲用種種方法去鼓勵優秀分子增多生育，卒無若何成效，且管見以爲萬難奏效。但既不能設法使優秀分子多養子女，爲何不設法使其他的人們少養子女呢？節制生育運動，即係以此爲立場。吾人認爲此乃變更現時所有軒軀生育率的唯一希望。許多人反對節育運動，以爲祇足增加各階級生育率的差別，因爲智識階級始知節育，其餘則否。著者從前亦作如是想，實則不然。即現時最嚴厲的法律，亦祇能禁止節育方法，和知識的普及。徒使貧者無從得着最好的節育知識，又何怪乎貧人子女衆多呢？是以從種族的優生方面着想，固應將不適於生存而有欠缺的一部分人類之生育率切實減低。（最好完全不使傳後）惟同時爲避免世界人口的壓迫起見，亦應設法使胚質雖稱健全而境遇則屬欠佳的一重大部分貧人之生育率，亦一律低減。因其他智識階級與大富中富各階級之生育率均已分別低減也。

「人類有適應人口壓迫的能力似無疑義，生育節制即其一例。此種適應環境的能力所以展緩人口之增加，而維持生活的標準。其應用將日趨普遍。此不過人類適應環境的能力之一種。他如公衆衛生與個人衛

生，亦為適應環境能力之表現。故節育與衛生，皆為人類增加個人幸福，及應付人口壓迫之重要法門焉。參閱 Raymond Pearl, *Biologic of Population Growth*, pp. 167-171 and 212-213。

又美國哈佛大學教授伊士特 (Edward M. East) 亦言：

「從前科學家最高的目標，不外幫助人類去管領自然。但是二十世紀以來，吾人另有一個更為崇高的理想，——即為人類自己去指導其演進，自己去選擇種留良，——庶使多材多藝，有猷有為，能夠應付人生一切複雜問題之分子得以源源接濟。以維持種族人類於不墜。一個社會如能盡量增多優秀良善之分子，減少劣弱腐敗之分子，種族前途必大放光明。」

「現時軒輊生育率問題頗為嚴重。保存種族優良胚種的唯一方法，莫如對於最須節制生育的人們，均教以節制生育，作為一種公共的政策。一切鼓勵良好家庭多養子女的辦法，萬難解決此問題，因智者決不願與愚者作生育比賽也。英國學者愛理士 (Talbot Ellis) 謂：「節孕運動乃十九世紀的最大發明。」斯言實屬信而有徵。欲補救現時軒輊生育率之不良影響，而廣收博大的仁效，欲解決人口過庶問題，而使人類不感受絲毫的痛苦憂慮，其適當方法無有善於此者。前生物學大家柏德森 (Bateson) 謂：「生育率之減低，乃增加未來人類幸福最有希望的預兆，」殆即為此而發歟。

「或謂低能之家庭不能利用節育方法，實則不然。據愛士特布魯克 (A. H. Estabrook) 醫生調查美國以惡劣著名的瑪克斯族 (The Jukes family) 最近繁衍之歷史查得該族最近四十年間共增多

丁口二千人左右。幸已婚女子之生育量業已大減，否則，為數尚不止此。該族第三代結婚婦女之平均生育量為每人養子女七·六人，但第六代則已減至每一已婚婦女僅養子女三·九人。當初幾代概無養子一人或二人之家庭，至今則一百五十四家之中，已有五十四家皆僅養子一人或二人矣。足見惡劣的瑪克斯族亦知跟着現代潮流去節制生育，此則社會學家所極應注意者也。且該族因限制生育及減少血族通婚之結果，其精神不健全之惡劣分子亦已減少甚多，全族均有顯著之進步云。

「是以普遍的生育限制，乃健全種族胚質和減免人口壓迫的最要法門。誠屬一舉而兩得。此外如禁止重工及實行強迫教育，亦可以幫助減少貧民的生育率，因兒童作工常使貧戶視子女為利藪。如能限制童工和普及教育，則貧民的生育率亦必因以低落也。」據柏爾森 (Karl Pearson) 的統計研究英國限制兒童作工的法律愈嚴，貧民的生育率亦分別遞減云。

「國家猶夫個人，各有其能力的最高點。經國的要圖乃在於研究此最高點之所在，而使人口的數量與品質均能止於至善。據著者潛心研究此種問題之結果，以為美洲合衆國最適宜的人口密度當在一萬五千萬左右，能不超過此數尤佳。其實此邦最有精深研究的人口數學家雷德教授 (Prof. I. J. Reed) 則以為此邦現已超過最適宜的人口密度，(按美國現時人口總數尚未滿一萬二千萬，譯者附註) 因為在現時的人口密度之下，各種人生需要之向下遞減者，已較向上遞加者為多。」(參閱 Edward M. East, Heredity and Human Affairs, pp. 297-312, 229-232, 252, 276-278)

又英國人口學者柯克斯 (Harold Cox) 也說：

「改良自己所屬的種族，乃人類應有的責任。人類對於家畜都用很多功夫去改良他們的品質，卻還沒有下一番同樣的功夫來改良人類自己的品質。」

「減除下級人口的一個重要方法，在於普及節育的知識，使人人容易得着，尤其要使貧苦階級容易得着。因為貧苦階級倘使沒有這種知識，就會生下無數的小孩子，父母所不需要，國家所不需要，雖也不需要，所以傳佈節育福音於最貧苦的階級，並教導一般男女，凡無力撫養小孩子的時候，就須節制生育，實可減少許多比較不健全的分，因而增進社會一般的健康程度。至於有特別不健全的遺傳疾病的人，則須施行絕育手術，不許有繁殖其種類之機會，以提高人格的標準，而增進人類之福祉。」

「就全社會經濟和國際方面立論，生育率如能大減，就會立刻解決許多現在一般人所勞心焦思的重大問題，如教育問題、生計問題、和國際戰爭問題等，皆可迎刃而解。人類所作所爲，總不要耗盡地球所供給於他的凡百物質。假使一國任其人口擴張，超過於國家範圍內的天然物產限度，就會發現其國家的繁榮立刻要受經濟上的困難或受別國政治上的罪惡所危害。而其人民只有兩條路在他們面前：便是「飢饉」和「戰爭」，總歸要選一條路去走的。」(參閱 Harold Cox, *The Problem of Population*, chaps. 5, 2, and 3, 和武積幹先生譯本。)

又英國社會主義者韋爾斯 (H. G. Wells) 更是痛快坦白的說道：

「現時國際上甚多種族的偏見，然吾人以爲種族偏見並非創造共和世界的重大障礙，世界的人類雖有若干差別，但種族間的品質差異，常因文化與訓練之不同而致言過其實。吾人不信地球面上的任何地方，有絕對不配做世界共和國民的種族。卽現時最少享受文明機會的黑種人，亦曾產生著名的音樂家、文學家和科學家，且在十八世紀之時，黑人並爲英國海軍中的主要戰關力。

「人種的品性自然有很多派別，但甚難指出那種品性在任何方面看來均屬最爲低劣，故吾人並不見得各種人類何以不能互相和合而各盡其天賦本能。將來的共和世界中，各種特長均屬需要。且無論人類如何混合，如何互通婚嫁；如果機會不同，卽品格仍有差異。將來世界人類總有不注重種族分類而注重品格之一日。共和的世界如能發達完成，則一般的人養和人類的壯歲韶華均當增長。每一種族均可表現其成熟時期之特殊能力。

「前此無論在何時代絕非僅有一個大民族，大半都有許多的民族由混合而分佈，或由分佈而復混合。很少對於世界共同進化無絲毫重大貢獻的民族。今後雖在世界的很多方面仍不免有種族的糾紛。但是吾人可以問道，是否許多糾紛皆完全由於種族差別？其實吾人仔細觀察各種糾紛的起源，大都由於經濟上利益衝突者多，由於固持種族偏見者少。

「自世界大連，從前互相隔絕的民族忽然接觸，因文化與社會發達之各有不同，遂彼此發生強有力的反感。其實歐洲人之處於領袖的地位，並非由於血胤之獨優，乃由於地理之便利。蓋在五百年前，東方與西方

的物質文明殆完全相等。如果雙方的航程亦相等，則中國人日本人的帆船，或歐洲人的帆船，孰應發現美洲，實難逆料也。歐洲人既奪得此領袖地位，於是遂在美洲非洲及東印度的廣大區域，從事盡量的物質侵略，並利用本地落後的弱小民族以完成其侵略工作。譬如非洲的黑人竟被用作奴隸，以增長白種人的種族偏見，而斷定黑人為生來低劣的賤種。於是歐洲人的信仰及所作所為，遂漸視被壓迫的棕種、黃種、及黑種，為不堪教訓冥頑不靈的人類，祇適於做獲取不正當利益的主人之奴僕，而本地人民因不識字無經驗和泥於舊俗不甚開通的種種吃虧，遂被視為種族本能低劣的表徵。

【在這種經濟侵略之下，非特許多被壓迫民族的城市如印度和中國今日的大城市，均逐漸成了貧民窟 (slums)，好像英國十九世紀中葉各城市的貧民窟一樣。並且有些產業落後的民族，差不多全國都成了貧民窟 (a general "slumification" of entire populations)。這些被壓迫民族的經濟的和社會的均衡，均因外國的經濟侵略及政治侵略而破壞無餘。且對於本國許多最好的領土，亦喪失自由支配之權。大致貧民窟之產生，不外一部份的人口靠著自己不能支配的經濟方法底下去生活繁殖。其生活程度既異常劣陋，遂產生許多無教育無希望的低級僱傭。東方諸國與熱帶諸族的貧民窟，迄今尚有甚高之生育率，其原因不外乎此。

【解除此種貧民窟的方法，不在於增高白種人的生育率去和有色人種競爭，而在於使全人類日趨文明，則全人類的生育率自然會次第減低。英國自有統計歷史以來，以一九二五年之生育率為最低。但吾人竟不

蒼弱，並且望其能夠再行減低。因英國現時失業的人尙有一百五十萬之多也。吾人希望在最短期間所有英國人民之爲父母者，非經一番詳慎的考慮和真有求子的願望，決不亂生一個小孩子。並希望全世界人類於最短期間，均能超脫因大規模的經濟制度所產生的貧民窟，而從事普遍的生育節制，全人類的大同世界始有逐漸達到之可能。至於如何增進全世界人類的文明，則世界上的大實業家和大資本家實負最大的責任。解鈴繫鈴，都全在他們。因爲祇有他們能夠促進產業落後國家的經濟發展；祇有他們能夠免除從前行使經濟侵略所締造的貧民窟；祇有他們能夠幫助提高全世界人類的生活程度，和捐助巨款普及人類的教育。凡生活程度增高的社會，其生育率必自然跌落。所以祇要今後的大實業家能够真正了解他們的責任，便可爲人類創造無窮的幸福。現在的大實業家可分爲兩種：一種係重演舊日剝奪他人膏血和集中社會財富與經濟勢力，而以腐奢淫逸滅亡羅馬帝國的舊式資本家。一種則爲從事進步的經濟組織，利用科學方法去保存世界天然富源，發展世界天然美利，而爲人類創造共同幸福的新式企業家。此第二種的企業家以努力爲生產最可寶貴的元素，以減少人類血汗的工作，發達工友的技能，解除工友的愚昧，增進工友的健康，普及工友的教育和促進全社會的改造爲其職志。現時此兩種企業制度在世界的農工商界中正在互相挑戰，孰勝孰敗，尙爲未定之天。惟第二種以公共利益爲目的，而不以營利賺錢爲目的之企業組織，實爲進行各種全部的經濟根本改造之入手辦法焉。（參閱 H. G. Wallis, *The World of William Chisolm*, Vol. III, pp. 684-697, 及 *The Open Conspiracy*, pp. 121-125）

## 第七章 自然環境與種族進化之關係

### 一 人類種族生存進化的必要因素

人類種族差別之起源與其進化（或退化）之異趨，全視三大要素為轉移：一為自然環境有順逆，二為種族遺傳有優劣，三為社會習傳有良窳。此三個要素各有其作用與影響，欲斷定孰為首要，孰為次要，孰為末要，頗不易言。即現時世界許多科學專家對於此點亦尚議論紛紛，莫衷一是。大致許多學者往往對於其平素研究最有心得的一個因素亦即視為最要的因素。譬如地理學者與氣象學者則重視自然環境的影響，生物學者與優生學者則重視胚質遺傳的影響，社會改良家或社會主義者則又重視社會習傳的影響。實則種族的進化退化乃三個因素的共同產物。任何一元的解釋，皆有其缺陷，不足說明人類演進之真象。所以研究學問的人，總要能够由博反約，由約反博。對於宇宙一切的事象，庶免一元解釋之弊。中山先生說：「世界人類之進化可分為三時期：第一由草昧進文明，為不知而行之時期。第二由文明再進文明，為行而後知之時期。第三自科學發明以後為知而後行之時期。歐美幸無「知易行難」之說為其文明之障礙，故能由草昧而進文明，由文明而進於科學。其近代之進化也，不知困行之，而知之更樂行之。此其進行不息，所以得有今日突飛之進步也。」大致歐美諸國今

後的種族進化，亦已逐漸轉入「知而後行」之時期，各種科學的精深研究或注重戰勝自然的環境，或注重健全種族的胚質，或注重改善社會的習慣，實則三者各有其用。人類種族的演進，要不由此三方面去推進。茲於本章先述自然環境與種族進化之關係。

## 二 自然環境與種族進化之關係

環境變遷和自然淘汰，影響於一切生物的進化，和人類前此的進化，莫不至大且巨。迄於今日天演之進化固未嘗或息，天擇之行使亦未曾稍減。不過因人類的智力日益伸張，於是天演之進化與天擇之行使，遂有一部分受人類智力之干涉，或人類意志之活動而變異其趨勢。此一部分的演化可稱為人演的進化。惟人演的進化仍不能違反天演公例，與天演背道而馳。揆言之，即人演的進化決不能超出天演的範圍，故欲使人類最適於生存，便要努力於真理之探討發明，然後順着天演之大原則與天擇之大定律，而以人演糾正天演，以人擇輔助天擇。譬如生育革命之目的，即係以人演糾正天演。優生運動之目的，即係以人擇輔助天擇。其他一切應用科學之目的，亦不外以人力代天工，以人事範天行。關於天演與人演之關係，著者十年前在所著進化之真象一文內，亦曾略為道及，茲摘錄於左：

「宇宙之進化可分為二種：一為天演之進化；一為人演之進化。天演之進化謂自然界中一切萬有因時而與位置之作用，不受人類之干涉指揮而自然演進是也。此種天演之進化，亦可稱為自然之進化。在人類未

生以前若干億兆年即已有之，遞演遞進，始有人類。自有人類以後，天演之進化固未嘗或息，惟天演進化之一部分，因人類之指導支配而異其趨向。此受人類指使之一部分，可名之曰人演之進化。人演之進化範圍中，天演之進化仍存，不過受人類之指導以演進而已。譬如地球面上之動植物幾完全受人類之支配，有利益於人生者，吾人養之培之；無益於人生者，吾人除之滅之。如六畜百穀與有用之樹木花草，藉人演而繁其族類，至於猛獸與有毒之動植物因不受吾人之歡迎，其種類亦次第淘汰減少。是故在天演界中虎豹應較雞犬適於生存，而在人演界中則雞犬反較虎豹適於生存矣。又自然界中有各種微菌，在人治不修之社會，常倚人類為其養料，最適於生存；而在醫學發達，個人衛生與公眾衛生較善之社會，則不適於生存矣。人類愈進化，愈伸張其進化之範圍。天演進化之範圍雖未嘗縮小，然次第受吾人之指揮支配而唯命是聽。然天演雖次第受人類之指揮，固仍自有其一定不變之公例，雖人類亦莫之能違。如天演公例曰：「衆生必死，雖人類莫之能逃。」人演公例則曰：「世間萬有，人為最貴，吾人雖不敢違天演公例，然須盡吾人之力以延長人類貴重之生命，且不惜犧牲其他動植物一部份之生命，以供吾人之養料使用。」人固為天演界中之一種生物，不能逃脫天演公例，不過因其腦力心靈之發達，是以得天獨厚，荷天之寵，而享特別優待之權利耳。天演之真象「如不廢江河萬古流，」人類祇能改其方向，緩其趨勢，防其汎濫，而不能使之逆流。吾人研究各種科學要不外以發明天演之公例，指導天演之進化為其目的。天演公例曰：「最適者生存。」人演公例則曰：「最適者固應生存，最善者尤宜生存。」天演公例復曰：「最善者能同時復為最適者，則必生存之。」人演公例復曰：「吾人當竭吾人之力

以造成此種境界此種地步，使最適者同時復爲最善者，最善者同時復爲最適者。」天演以「適」爲主要，「善」爲次要。（善者不必皆適於生存）人演則謂「適」固重要，「善」尤重要。天演與「善」者以較多之機會，「惡」者以較少之機會。（所謂多行不義必自斃）人演則更進一步着想謂「善」者宜次第代「惡」者而生存。故謂人類宜設種種方法使人演界中之「適」者盡爲「善」者，「善」者盡爲「適」者。天演之進化不必皆善，惟善者似較適於生存。中庸所謂：「天之生物，因材而篤，裁者培之，傾者覆之。故大德必受命。」孟子所謂：「順天者存，逆天者亡。」人演之進化亦必皆善，（如近世戰爭之捐軀報國者皆種族之花，又現時行王道的國家民族反不若行霸道之國家民族之適於生存）然許多地方實較天演爲善。故善者更受特別之優遇。天演之於人類已可謂不薄。惟人類更欲以人演助天演，俾人類更適於生存，而人類中之善者尤適於生存。然後天演共駕宇宙以永遠日趨於美善。」（見拙著進化之真象第六至第八頁，東方雜誌社編印）

但人類無論如何進化，其支配環境的能力終屬有限。許多的自然狀況和自然定律，無論人類的腦力發達到任何程度，或智識進步到任何程度，皆不能變更之。故科學家所謂：「征服自然」或「戰勝自然」一語，乃相對的而非絕對的。人類既不能完全「征服自然」或「戰勝自然」，祇好一面去支配自然，一面去適應自然。譬如宇宙間各種勢力的總量，不消滅，亦不新成。科學並非「怪力亂神」，一切科學方法祇能用以轉換自然界的各種固有勢力，而不能「無中生有」。火車輪船必需乎煤炭之燃燒始能疾駛，開花砲彈必需乎火藥之爆發始

能飛射。且自然界許多的勢力一經轉換，便不易復元。如地球中的各種礦產若由人類盡量採取消耗，終必有用罄之一日。又地球上可供植物肥料各種天然產物，亦皆因人類之過分繁殖繼續耗用而次第減少。又土地之收穫，無論用何種科學方法總不能逃避收穫遞減的經濟定律。凡此皆足為人類文明進化之累。是以無限制的人類繁衍，終必弄到殫精極思的各科科學家亦束手無策，徒喚奈何！世之以科學為萬能者，多非真知科學者也。

### 三 自然環境對於種族進化的勢力影響

人類無論如何進化，非特不能完全支配自然環境，並且時常隨着自然環境的勢力影響而有變遷。數年前吾友竺可楨先生有一篇科學的演說，題為「地理對於人生之影響」。對於地理與人生之關係言之甚詳。茲摘錄一段如下：

「中國人常有『人傑地靈』一句話，把『人』放在『地』的前面，這或由於尊人起見。但總以科學眼光是不合的，因為地靈隨有人傑，我們何嘗聽見南北兩極和赤道裏邊出過人傑呢？十八世紀以前的地理學家都注重形勢名勝疆域一方面。換言之，在那時候地理兩字乃政治地理的代名，鮮有人講及地理和人類的關係。到十八世紀之末，研究地理的逐漸轉移目光到地理和人的關係上來。但人文地理的鼻祖要算德國地理學家萊希兒 (Ratzel)。他在十九世紀末葉曾著人文地理 (Anthropo-Geographie) 一書，論及地理與人生之關係，非常透澈。其意以為地面上有各種地形，各種氣候，對於人生有一定的影響。因人生所處地位不同，

人的性情體格不得不適應環境而變遷。所以地球上各處人類文化高低不同，其原因概有二種：一是環境，一是遺傳。而最普遍最重要的環境就是地理。地理的影響可再分為二類：一地形，二氣候。地形氣候對於人生的影響很是顯而易見。譬如我國本部人民同屬漢族，但南方人與北方人性格已有不同。南方粵東一帶居民便不及北方楚省如山東直隸一帶人民偉大。且性情比較的好動，富冒險性而乏耐久性。就是滿洲人與西北利亞之東胡人雖屬同種，但為氣候地理上的關係，文化程度差得很多。英倫三島以北方蘇格蘭人民軀幹為最偉大。上海之印度巡捕石來很高大，但不能把他們當作全印度人民的代表來看，因為他們是印度北方孟加拉物省人，印度南方人却矮小得多。可見同種的人在異樣環境之下，久而久之，性情體格就為此差別起來。

地球上極寒極熱兩帶，都不是文化舞臺。文化舞臺當在溫帶，溫帶既沒有像寒帶這樣嚴寒，足以遏滅動植物的生長，致人生不能享受。又沒有像熱帶這樣酷熱，助動植物生長太快，叫人生受安享。溫帶有適合的溫度，不至於使動植物完全不能生長，但若不好好假以人工治理，加上一番墾殖墾養的工夫，專事袖手旁觀的這樣過去，可也要做餓死首陽山的同伴了。於是使人民有憂懼和希望，一步一步迫他們前進。

美國耶魯大學項廷顧教授說：一國文化的高低，視氣候而定。一個地方天氣變化沒有一定，那地方的文化纔有進步，因為凡居在這樣之下，不得不想出種種方法，做未雨綢繆的打算。可見環境在一方面逼人勞其手足，勞其心智。在他方面就叫你有發展地步，這纔能在文化舞臺上佔一位置。我中國現為世界文化發祥地之一，而且地形氣候，統有保持文化先進國的優勢。欲達到這個目的，祇在人民努力去做。這責任不在別人，就

在我們「一輩子」。(見科學第七卷第八期第七三九頁至第七五六頁。)

又范錡君所著中國國民革命之使命一書，亦有一章詳言種族與氣候之關係。范君略謂：

「人種所以有氣質之差異，膚色之黑白，習俗之懸殊，文明之不同者，則自然環境爲之也，而自然環境，除山、海、島、陸、平原外，尤以氣候影響爲最著。

至於氣候所以能爲人類進步差異原因者：第一因氣候能直接影響人類身心、能力、疾病、死亡也。第二因氣候能影響人類文化、習俗、衣食、居住也。第三因氣候能影響政治、經濟、移居、離婚、及自然淘汰也。第四人類因自然淘汰，而能影響種族遺傳也。第五因氣候能影響文明之盛衰，國家之興亡，與夫世界人口之分配也。凡斯五者，據考古學上之報告，地質學之研究及地理歷史之記載等，皆能一一說明之。此外如氣象學者之觀察，人類學者之鑽研，亦足爲他山之助。總之，氣候之直接影響人生，較任何要素爲重，因其爲一切社會現象之原因，而非其結果也。近代文明之發達，同能以人事而挽救自然環境之影響，然其效甚微，且其範圍亦狹。究不勝天工偉力之大，能生死人而肉白骨也。且氣候之爲物，非僅指溫熱、寒冷、風雨晦明而言，即氣壓、天變、旱魃、飢饉、及降水爲災等皆包括而有之。故其淫威之大，決非人力所能左右，種族之盛衰，人口之增減，民族之文野，社會之隆替，皆直接間接與之有密切關係焉。

人類之需適當氣候，猶植物之需適當溫度、光線培養也。植物無此適當之光線，則將趨於枯萎，人類無此適當之氣候，亦當陷於病亡。縱不病亡，亦將減少其活動、能率、健康、或身心之能力，倘其不適程度愈加，則其不

良傾向愈甚。漢人嘗依實驗心理方法，測量氣候影響個人身心之深淺。其法以一年為期，分爲四季，純以氣候為比較，測量工人每日工作之能力，行之者有數工場，其結果如下：「晴雨表之變化，無甚影響；」濕度之濃淡，影響頗大；三、寒暖之變遷影響尤巨。由是得合理之推測，謂華氏六十度至六十五度為身體活動最適宜之溫度，換言之，即當午溫度昇至七十，入夜則降至五十五度之時期也。據項廷頤云：「精神活動最高點，為華氏五十八度時；冬夜有霜，夏日熱度，高不出七十五度，且常有風雨氣候之變化者，為最適宜之氣候方。」觀此可知氣候終年不變或冬寒凜冽，或酷暑如焚之處，皆不適於人類身心活動也。然則北地人之遲鈍，南國人（如南洋羣島馬來人）之懈怠，皆氣候為之，而非人種有優劣等差也明甚。」（見范君原書第一八七頁至第一八九頁。）

又英國人口學者卡爾桑德爾斯在其所著人口問題一書，亦有數章詳言環境對於人生之影響，茲摘譯數段如左：

「人類與環境之關係，在洪荒時代大約與其他生物之地位相同。惟在長期的人類歷史過程之中，其於自然界所處之地位已經過很大的變遷。直至今日，人類的許多環境情形，已與其他生物迥不相侔。非人類的外界環境有很大的變異，即人類的營養習慣與習性等，亦有種種的變化。關於外界的環境方面，人類現既布滿地球，無論在極熱極寒之地，極潮濕極乾燥之地，氣壓極高極低之地，乃至其他特殊氣候之下，皆有其蹤跡。此外尚有各種人為的影響，如宮室衣服，飲食烹調，分工分業，設市聚居，讀書習字，及其他種種人為的生活。」

狀況，皆把類人的性格改變甚多。又因人口繁殖疾病增多，亦使人類身心兩方面均受若干的影響。

環境對於人生之影響，可分為身心兩方面。心靈方面可分智慧、氣質與性情三者。三者之中，以性情最易受環境的影響。譬如氣候的變更似使人的性情最易改變。又疾病之影響於性情亦較影響於其他身心兩方面之特性為多。此外並有幾種熱帶或副熱帶獨有的疾病易使神經衰弱精力疲倦，似為熱帶諸族文明進步之一大障礙焉。

又人類的身體方面，亦常因環境變遷而有種種的變更，不過此種變更與環境的各種情狀有若何特殊的關係，頗不易言。譬如「英國的人類學會很早就已表明英國工廠法律禁止兒童作工之利益。謂英國一八七三年九歲兒童的平均身長及體重竟與一八三三年十歲兒童的平均身長及體重相等」云。

又歐洲有些國家的人民平均身長在前世紀之中均有增加。據韓森 (Goran Hansen) 君所列丹麥人身長變遷的統計如下：

一八五二年至一八五六年	平均一六五·四二米釐。
一八七九年至一八八八年	平均一六七·七八米釐。
一八九一年至一九〇〇年	平均一六八·四三米釐。
一九〇四年至一九〇五年	平均一六九·一一米釐。
又和蘭人的平均身長則一八六六年為一六五·五米釐，一八八三年為一六七米釐，一八九九年為一	

六八米釐。至於身長所以有顯著增加的原因，各方面曾舉出若干的理由，一爲生活程度之增高，二爲妨礙身體發育的疾病之減少，三爲家庭養子數目之減少。此最後一個因素在今日實極關重要。據麥屋特 (Mayer) 君調查英國某工業城市之結果，求得養子期間相隔二年以上之子女，比養子期間較密的子女，平均約高三寸重三磅云。是以收入頗小之家庭，如能養子較少，則環境狀況亦必較佳，殆無疑義焉。

大凡處於惡劣環境之人，所以體質較爲低劣，至少有一部份係因困苦情形而致體質發生變化。至於發生變化的原因，則一爲氣候良窳之不同，一爲其他環境狀況之各異。關於氣候的影響有時雖不易確定。但身體與氣候顯然有相當之關係，譬如歐洲人之久居熱帶似甚不相宜。而神經方面因刺激過甚，尤易受傷。同時在文明諸邦的環境之中，亦有許多因素能使神經受影響，除飲食疾病不計外，如強烈的震動，環境的嘈雜等皆於神經有害。其影響神經的程度或遠較吾人想像者爲大，亦未可定。

關於氣候爲判定文明所由發達之一因素，美國地理學者項廷頓 (Huntington) 近年曾有很多著作言及環境與人生之直接關係。項氏由種種觀察，表明人類須在最適宜之氣候情形之下，始有最大的力量表現。所謂最適宜的氣候情形，即晝夜的平均溫度應在華氏寒暖計五十八度及七十一度之間，並且空氣須含若干水分。項氏的觀察係根據美國工廠的零工出品以及他項材料，并證明非特歐洲諸族在最適宜溫度之下表現最大的能力，即日本人與黑人亦莫不皆然。於是項氏復從事證明世界上有最適宜的氣候之地亦即最高文明所在地。項氏并謂在人類歷史之中，亦祇氣候最適宜之地曾有文明發生。至於在

今日氣候並不適宜之國家，從前亦常有過文明，則因氣候已起變化，遂致今不如古云。按項氏之說並不稀奇，譬如孟德斯鳩即老早就道：「最大的能力祇在氣候較為溫和之地始能表現。但溫度與水分之外，尚有食物與海面高度及其他因素亦足影響人生。且人類各種族或各個人除環境的差別之外，尚有天賦的差別（*genetic differences*）亦須計及。絕不能完全歸功或歸咎於環境耳。」

又疾病自然亦足影響人生。疾病的影響可分為二種：一為影響身體的特別官能，一為影響各種官能的普通作用。人類身體中每種官能皆有受疾病侵襲及因侵襲而發生變化之可能。且身心兩方面均能受疾病之直接影響至任何程度。又小孩因疾病的結果或致遏抑某部官能之發達，遂使後來不復有發達之可能。故疾病之影響甚非輕細。

自晚近發明內分泌現象以來，一般學者僉謂人體各種器官之作用，皆有賴於內分泌腺或無管腺（*the endocrinous or ductless glands*）各種內分泌腺各有其特殊之作用。譬如甲狀腺（*the thyroid glands*）能分泌一種必需之液質，使人體得以正常發育及兼營正當的新陳代謝作用。若移去小孩之甲狀腺，則全身停止發育，並產生精神的欠缺。又某種疾病如鵝喉症及癡呆症等均與甲狀腺的不健全有關係。故各種內分泌腺如果失其尋常作用，則身心兩方面均呈重大的變化。至內分泌腺所以失其作用則又因特種疾病或其他尚未充分了解的緣由云。

又人之性情，全賴身體各官能的普通作用，及神經系的情形如何為定。各種疾病無論其為內分泌腺之

失其作用，或爲其他病狀均能影響人體的一體作用和各人的性情。誠如心理學家馬克郡格爾（McDougal）所云：「此甲狀態的作用欠缺，能使無論何人喪失情感，類似癡呆。惟其作用過強，則又發生相反的影響，能使無論何人激刺過敏，有類癡狂。此外並有數種疾病能使人性的性情根本改變，皆因疾病之時由新陳代謝作用將病毒排於血內，再由血液循環而達到神經系，致神經系起化學的變化。是以人體之各種器官皆有經過此種變化，影響到吾人的心理生活之可能。而各人的性情，大半皆爲各種影響湊合而成。」是以疾病除直接影響人體之各部機能而外，並能根本影響吾人之性情。而性情的好壞，又足影響人文的進步。熱帶及副熱帶有多種的疾病如鈎蟲病與瘧疾等能使病人神經衰弱，精疲力竭，萎靡不振，而且蔓延甚廣。論者謂美國南部諸省的進步所以較北部爲落後，乃至埃及希臘諸古國之所以衰弱不競，皆與此種疾病之蔓延有關係云。

是以人的性情似較其他身心的性質更易受環境的變化。譬如氣候的變遷似使人的性情較其他的性質尤易改變。又人之性情顯然最易受疾病的影響，不過疾病亦能影響其他一切身心的性質。故疾病之影響於人的性情或最關重要。吾人或應承認某某各種疾病的影響實爲熱帶諸邦人文進步之一重大障礙。惟疾病有不能遺傳的，有能遺傳的。此種區別殊屬困難，而實極關重要。當另篇討論及之。（參閱 Carr-Saunders, *The Population Problem*, Chap. XV.）

以上所引卡爾桑德爾斯的這段文字，係僅就環境的普通影響立論。至環境對於人類行使自然選擇之效

用，卡氏亦有很詳細的討論。本章姑從簡說。

又奧斯達利亞地理學者特萊爾 (Griffith Taylor) 著有環境與人類 (Environment and Race) 一書，詳言環境變遷與人類進化之關係，該書乃近年關於此項問題的最要名著之一。茲將全書大旨與其論到中國環境變遷和中國種族地位各段摘要譯述如左：

「現在許多科學家，已逐漸承認環境變遷為影響人類進化最有勢力的因素。無論人文生物方面或社會方面的進化，莫不皆然。吾人倘非認定原始的人類乃至於現在的人類，大半皆受環境的支配，一如其他的動物，吾人決難有遠大的進步。人生的主要目的不外求得充足之食物與居住，以維持種類之生存。人類非因生齒過繁或環境變壞，大都安土重遷，不願遠徙。近來吾人已搜得許多證據，證明在人類早先及隨後的進化歷史上多數的人口移徙和互相侵略互相爭戰，皆以環境變遷為其主要原因。尤以氣候變遷影響於過去的人類為最巨，即影響於現在的人類亦屬匪輕。譬如災克飢饉的影響，常較戰爭尤為不幸，而且每為戰爭的間接原因。

在地質史上與生物進化史上實以新生代第三紀之末造 (The Late Tertiary times of the Cainozoic period) 為對於生物進化最有關係之時期。因在此時期中，猶如在古生界的二疊紀、泥盆紀及更早之寒武紀 (The Permian, Devonian and early Cambrian times of the Primary period) (本段所用地質時代名稱多從日譯) 中，地殼相繼收縮褶曲，崇山峻嶺，高原險障，次第產生也。山脈高原不過地

較冷極及海洋下沉時所發生之緣故。但此種地面之變化實從氣候與環境亦因以變遷。各種高等生物（如猿猴等）之演進，以及人類之起源，多在第三紀末造之最新統（The Pliocene times of the Tertiary epoch），即迄今約四百萬年之久。許多新的山脈高原係自有人類以後始行產生，甚或仍然繼續高長。如亞洲之喜馬拉雅山及美洲之安第斯山即其顯著之例。學者欲了解環境變化如何左右人類進化與人類分配，須知雖在有人類以後之時期中，地球面上的許多區域非特氣候曾有變化，而且地形與高度亦有變更。並非自太古以來遂一成不變。且自第三紀之末以至第四紀之洪積統與沖積統（The Pleistocene and Recent times of the Quaternary period）約一百萬年之間，則更有四個冰期（The four Great Inter-glacial or Ice ages）之反覆推移，消長進退，對於各種生物的淘汰作用尤為至大且巨。人類經過這樣長久和這樣嚴厲的自然選擇，乃一躍而為萬物之靈。於此可見天演勢力之偉大也。

舊式的教科書，多以為人類進化的中心，均在各原始種族現在所居之地，如非洲、澳洲之中部，即常視為人類發源之地。但新的人種學則認為最早的原始種族，現已移到距離人類進化中心最遠之區域。最適者生存的基本定律在生物界是時常行使。惟此項定律在人類進化史上的行使方法，則為優強民族常佔據環境最為優美及氣候最適於身心活動之地域而繼續生存進化。劣弱民族則退居沙漠絕境，熱帶林叢，深山窮谷，及其他距人類進化中心最為偏遠之地，而苟延殘喘。甚或生計滅絕，輾轉消沉以歸於盡。

論全球的大勢，亞細亞洲可視為大陸的中心，而歐非二洲可視為亞洲的西南大半島，大洋洲可視為

亞洲的東南大半島，北美南美兩洲可視為亞洲的東北大半島。人類的起源與前此的進化，大都以亞洲大陸為舞臺的中心。實緣亞洲大陸的氣候環境前此最富於刺激性，最適於物種與人類的進化。且無論非洲、澳洲或美洲方面觀察，其主要的原始種族皆係來自亞洲也。故亞洲之中部及東部實為世界各種族之發源地。各原始種族多因生存競爭失敗，由競爭最烈的進化中心分向各方面移徙到距離亞洲最遠之處所，如波濤之由震動最大的中心次第盪漾到水面極邊一樣。現今最原始的種族多發現於距離亞洲中部最遠之區域，而最進化的種族則發現距亞洲中部最近之地帶。故今日之所謂黃種或蒙古種，實較許多所謂歐洲的白種尤為進化。換言之，東亞的民族及歐洲中部之阿爾卑民族乃最高級的種族，可謂人類後起之尤。而黑種與許多西歐的民族，則為人類進化史上較早及較低的分支也。

尋常種族分類的主要標準為膚色、語言、與國籍。實則此三個標準皆屬欠妥；而語言與國籍尤與種族的嚴格分類毫無關係。又膚色亦不甚可靠。故真正的人種分類應以頭顱的測量與毛髮的組織為標準。關於頭顱的測量則有所謂頭顱指數 (cephalic index)，其公式如下：

$$\text{頭顱指數} = \frac{\text{頭之寬度}}{\text{頭之長度}} \times 100$$

至於毛髮的區分，則有所謂毛髮指數 (hair index)，其公式如下：

$$\text{毛髮指數} = \frac{\text{根的直徑}}{\text{莖的直徑}} \times 100$$

他如眼距指數 (orbital index) 亦頗可憑。至於鼻孔指數 (nasal index) 與身材長短 (stature) 則在同一種族之中，亦變更甚大。身材長短似尤易隨環境變化而有變遷。實則許多殖民地的新民國生活較為健康，其產生之子女常較留居本國的親族所養之子女更為高大。故鼻孔指數與身材長短，皆非鑑別人種之良好標準。

關於頭顱的分別，大致圓顱的種族較長顱的種族尤為進化。譬如原始的黑種之頭顱指數僅為六十九，歐洲的哀白倫 (Iranian) 種或地中海種之頭顱指數為七十五，歐西的諾第克 (Nordic) 種之頭顱指數為七十九，而歐洲的阿爾卑 (Alpine) 種與東亞的蒙古種或黃種之頭顱指數則為八十五。頭顱指數之高低，乃腦力發達與否之表徵，故歐洲的阿爾卑種與亞洲的蒙古種或黃種乃世界最高級的民族焉。

中國的漢族，大致係來自西北邊境。按照意大利人種學者白蘇第 (Bianchi) 之意見，約在今之新疆塔里木河盆地一帶 (the Tarim basin) 因最寬的頭顱殼多在西北邊境之內地發見也。此項民族由土耳其斯坦 (即新疆) 沿西藏高原之北境及黃河上游而入中國本部。按照中國最早的史乘，亦證明中國民族係約於西歷紀元前三千六百年 (即民國紀元前四千五百餘年) 來自今之塔里木河盆地。且在此時期以前中國民族已拋棄結繩而治的方法而易之以文字書契。且當時便已廢去母系制度而創立嫁娶制度。又音樂器具亦於此時遂有發明。而更為高美的文化表現則為天文學的研究與製絲的發明。故中國民族有很多方面皆值得人種學者的最高欽佩。中國的文化自有史以來即未嘗間斷。雖經過許多時會變遷，而與中國

民族相接觸的其他民族則多被其同化吸收。此其所以爲白種獨掌霸權的大勁敵。昔之伊蘭、埃及、巴比倫、波斯、馬塞、敘羅馬及西班牙諸帝國，今皆衰敗滅亡，其民族亦散失淪胥，銷磨殆盡。惟中國的四萬萬民族則迄今仍然團結，不久即將蘇醒。凡此皆半緣中國的自然環境仍然比較優勝，非若古代諸帝國之因環境變劣，氣候日燥，災旱迭興，病疫頻仍，遂致人之云亡，邦國殄瘁也。

又從前必有與中國民族同源的圖蘭民族在土耳其斯坦一帶創造最早的文明。該處殆爲中央亞細亞在前數千年並未受環境變壞而致文化衰敗之唯一境地，且從前在雨量和平的時代即爲土宜最富之區域也。

亞洲中部之土耳其斯坦、西藏與印度北境自第三紀之始新統 (The Eocene of the Tertiary period) 以來，曾有極大的地形變化。在始新統之時，今之印度西北與土耳其斯坦之南部，皆有深海經過其間。至第三紀之最新統 (The Pliocene) 及第四紀之洪積統 (The Pleistocene of the Quaternary period) 始有喜馬拉雅山、崑崙、祁連、阿爾泰、天山等諸大山脈與帕米爾高原及西藏高原等之崛起。又亞洲西部之地勢與氣候亦有極大之變遷。其實現在的亞洲自高加索山脈及阿拉伯沙漠以東直至蒙古之東部，大半皆因山脈與高原的障礙，海洋季風不能吹到內地，而北風則時時吹入，遂致土地日益貧瘠，氣候日形乾燥，許多湖澤沼泊亦先後涸竭。昔之沃野草原，多變爲沙漠礫土。

此種氣候變遷，迄今仍未有已。美國地理學者項廷頓 (Ellsworth Huntington) 對於高加索山脈與

蒙古之闊三千英里的乾燥區域，曾作種種的研究。據稱西歐即在最近二三千年間亦有顯著的氣候變化，其最要的左證爲從前有許多能够生長植物菜蔬之地域，今皆不毛。又古時的道路，今皆廢棄，且按照歷史紀載從前曾有甚爲重要牧畜職業之地方，今已無存。又新疆之塔里木沙漠（即大戈壁）從前原有河流十三注入其間，今則河道下游皆已涸竭。其所灌溉之平原已與千餘年前之古城舊址相距甚遠。近代的城市則多居河流之上游，且遠不及古代之繁華重要。又塔里木河所注入之羅布泊在西曆第一世紀之時廣約七十英里，今則僅五英里至十英里。該湖在第三至第六世紀之時，因氣候異常乾燥，涸竭大半，有六個城市皆經廢棄。自第九至第十六世紀，情形稍佳，曾有新的城市產生，但最近數世紀中則氣候又復乾燥異常。他如二百英里以北之土耳其番泊（Turhan），亦經過同樣之氣候變遷一云。

特氏原書第四編，並詳述環境的限制與白種人將來之移植。其中對於中國民族的將來與各種環境的限制，亦曾略爲道及。茲摘述其大意如左：

「環境的限制於白種人將來之移植，極關重要。吾人的一切計畫均須顧及此種限制，始合乎科學的精神，而且此種態度纔是真正爲一個國家民族的幸福着想。

此種研究常受兩種的批評：第一種批評說，這些將來的問題，原因異常複雜，實在是太難研究。第二種批評則說，吾人對於將來的問題，不必預爲擔憂，因人類的一切需要皆有萬能的科學以解決之。關於第一種批評，吾人以爲大凡有志之士並不奢望一切研究努力皆完全成功，祇希望能幫助人類次第向前進步而已。至

於第二種批評則以為科學在近百年間，曾為人類開闢了許多新天地。將來自能花樣翻新，繼續為人類開闢新天地。其實此種論調殆完全不了解自然環境對於人類食物供給的種種限制。真正頭腦清晰的人決難如此樂觀。誠如哈佛大學伊士特（H. W. Henshaw）所云：「今日之世界，已不如從前之廣大。人類自有文字的歷史以來，至少已有一萬年的經過。但從前的人口自然增加實異常迂緩，故在十八世紀之末年，全世界的人類僅為八萬五千萬。但自時厥後近百年間，人口遂增加一倍，在一九二四年全世界的人口遂有十八萬四千一百萬之多。現時世界人類的自然增加率遠速於往昔。當十八世紀之末，世界無論何國的人口壓迫皆不甚嚴重，今則反是。中國已入瀕外溢，印度與日本若以西方的生活程度為標準，亦已超過人口的飽和點。居於沙漠綠地的澳斯達利亞人如果照現在千分之十八的速率增加，其人口不久亦必達到農業所不能供給之地步。又美國人口亦已達到農產收穫遞減的程度。吾人根據現有統計的精密研究，計得每人須有耕地二英畝半，方足以供營養。全世界可耕之地僅有一萬三千兆英畝，其中已耕之地約為五千兆英畝，總計全世界所有可耕之地，祇能供給五千兆人。」云。又美國農政專家貝克爾（O. E. Baker）同稍為樂觀，但按照下列要表，全世界的地畝雖為五千二百兆英方里，但僅餘四百二十萬英方里可供後代開拓之用。貝氏的原表如下：

土地種類	位於熱帶及副熱帶者	位於溫帶者
太乾燥而不適耕種者	八〇兆英方里	七・六兆英方里

太寒冷而適耕種者	—	六·四兆英方里
不能耕種者	一〇·〇兆英方里	一〇·〇兆英方里
牧畜地但可耕種者	〇·六兆英方里	一·五兆英方里
已耕種者	一·二兆英方里	二·五兆英方里
可耕種者	三·二兆英方里	一·〇兆英方里
共計土地面積	二二·〇兆英方里	二九·〇兆英方里

人類適於居住之地在物質方面須有四個要素：一溫度、二雨量、三地形、四煤量 (temperature, rainfall, location and coal reserves)。根據這四個要素，可將地球各洲分爲七十四個經濟區域。就溫度言之，各洲在南北兩半球有最適宜溫度即平均溫度在四十度至六十度之門之地帶總面積如左：

一、亞洲	四、二八〇、〇〇〇英方里	二、歐洲	二、五五〇、〇〇〇英方里
三、北美洲	二、五〇〇、〇〇〇英方里	四、非洲	八三〇、〇〇〇英方里
五、南美洲	八一〇、〇〇〇英方里	六、澳洲	二八〇、〇〇〇英方里
七、南極圈	無		

據右表觀之，亞洲雖最多溫度適宜之地，但一個民族無論如何發奮努力，如果缺乏天然富源，在生存競爭之中，必甚少機會。就農業與礦產而論，亞洲的大部份皆祇有貧瘠的將來焉。

至溫度以外的第二個要素則為雨量。大致能殖養民的地帶每年最少須有十五英寸至二十英寸之雨量。惟在雨節和勻可靠之區域，即每年祇有十一二英寸之雨量亦可種麥。至於普通最適宜的雨量則每年約為四五十英寸。又氣候較寒之區域，太陽蒸化力較小，即雨量稍低亦屬無妨。惟氣候較熱太陽蒸化力較大之區域，則雨量亦宜稍高。又雨量過少之區非特不宜於耕種，而且不宜於牧畜。大致世界的重要牧場罕有在雨量十英寸以下者。就溫度或雨量方面而言之，大致地球面上有四種地域皆不適於殖養民。一為過於寒冷乾燥致動植物不能繁殖之兩極地帶。二為略有牧畜，然過於乾燥不能從事耕種之各沙漠地方。三為崇山峻嶺及寒冷的高原。四為熱帶中過於酷熱潮濕之區域。

又煤炭常視為工業之母。世界的煤炭大都產於溫度在五十度左右之地帶。此種事實足以表明地球的氣候在過去的各時代中並無重大的變更，且從前變成煤炭之森林木材多產生於氣候溫和之地帶也。現時全世界所儲藏之煤炭總量，其可得而知者約為  $7,937 \times 10^9$  噸，其中約有百分之九十產於以下諸國。

美國  $3,838 \times 10^9$  噸

加拿大  $1,234 \times 10^9$  噸

中國  $995 \times 10^9$  噸

德國	$423 \times 10^9$ 噸
英國	$189 \times 10^9$ 噸
西比利	$173 \times 10^9$ 噸
澳斯達利亞	$165 \times 10^9$ 噸
共計	$7,017 \times 10^9$ 噸

據右表觀之，美國的煤量幾佔世界煤量之半，約三倍於坎拿大，四倍於中國。將來必為世界工業中心，殆無疑義。

除上述溫度雨量及煤量之外，地形亦為能否廣殖農民之一要素。世界的大平原多在海面一千五百尺至二千尺以下。大致三千尺以上之地域即難殖農民。良田美地皆在低原地方，既有河流以資灌溉，交通亦遂較便利。高原地方非特灌溉不易，而且運輸亦遂較困難。

理想的經濟區域，須備具上述四個要素，即溫度平均約為華氏五十五度，雨量為每年五十英寸，地勢恰在海面以上，煤量為每英里蘊藏  $200 \times 10^4$  噸之煤量。但此種地帶在實際上殊不多觀。

關於糧食問題，現時世界上許多人煙稠密之區域，如西歐、印度、中國、及日本諸邦，均已感覺將來糧食供給的困難。這個問題是非常重大，而且遠較一般人民所能認識者尤為急迫。據澳斯達利亞統計局長尼布士 (G. H. Knibbs) 的計算，全世界的人口在近九十年間曾增加一倍。且多數國家的每年人口增加率均

在百分之一以上云。生育率的普遍減低似為對於統計論證的唯一答案。吾人預料將來的趨勢，似為文化較高而生育較低的各國家民族與文化較低而生育較高的各國家民族之間，必有一場世界的大戰。白種諸族如欲維持其優越地位，則在今後之兩世紀中這場大戰似不能免。一切長期的經濟戰爭惟能知節省面有遠識之民族能得最後之勝利。且今後的經濟戰爭，實以環境與地理的優越為最關重要，至於種族的優越似猶在其次。蓋整個的人種學都是表明種族的混合乃為通例而非變例。且前此許多混合的民族均曾創造強有力的國家，吾人不難察往以知來。許多祖譚諾第克族而藐視阿爾卑族與地中海族的美國社會學者大都預存偏見，甚或把國家與種族混為一談。其實所謂諾第克族並不能視為最進化的民族，而且西歐的任何國家莫不由此三族混合而成。譬如法國兩國此三族的混合成分幾乎相等，又英倫三島之民則合地中海族之成分或較諾第克族尤多，但所含阿爾卑族之成分亦復不少。

或問阿爾卑蒙古族 (the Alpine-Mongolian peoples) 既較諾第克族或地中海族略為優越，何以不能如英美或其他西歐人民之為文明先導乎？則應之曰：西歐諸國人民之含有阿爾卑族的重要成分，正為彼等所以能領袖文明的一個原因。惟此外更有一個地理或環境方面的原因或尤為重要。須知英美與西歐諸國現時富強的原因，大半依賴兩個要素：一為掌握海權，二為據有最易開採的煤礦。自海通以後，往往遠竄海邊較為原始的各民族，既因掌握海權得以日臻富強，而深居亞歐大陸中心的阿爾卑族反因此相形見绌。又西歐北美諸國之乳工業牛耳，亦不過近百餘年間事，且大半因歐洲之西北與中部及北美之東部均有最

富之煤礦足以製造工業之發達一日千里。但中國與日本在今後一百年之內必能一如歐美之物質發達，實屬毫無疑義。吾人祇希望中國日本能將因工業發達所增加之財富善為分配。免致如歐美諸國之一面有富饒大王，一面用貧民屈耳。

中國與亞洲中部諸國之所以落後，自然尚有其他許多原因。譬如中國的舊式教育祇教人「事必師古」，「向後看而不向前看」，即阻礙中國民族的進步。甚大，此種崇拜祖先或崇拜古人的觀念，今後當可次第破除。但其餘亞洲的阿爾卑斯族所據有之領土，在近代以來，環境日形變壞，氣候日形乾燥，似為亞諸國人進步遲滯之總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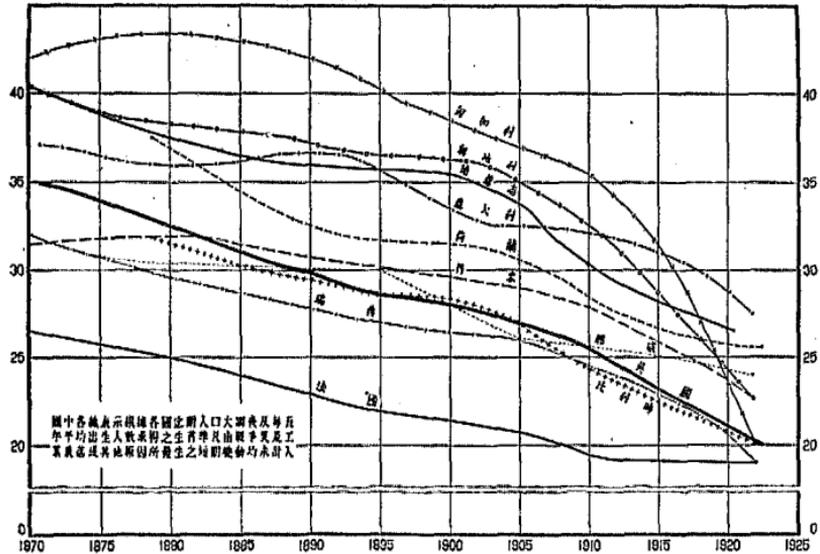
就澳洲方面而論，吾人不妨每年准許若干華人入境。既可促進澳洲之發達，並可表示吾人承認中國民族與吾人完全種族平等的正當要求。吾人深信中國將來必為世界上一個最為偉大的國家。故此種親仁善鄰的遠大政策，將來必可收良好結果。凡稍知受過教育的華人在南洋羣島的勢力之人，皆須承認華人在文化上與商業上至少皆能與吾以平等。總之現時世界的各種族，除黑種而外，吾人實無理由斷定其餘各種族孰優孰劣。無論中國民族，日本民族，英國民族，印度民族，諾第克族，阿爾卑斯族，與地中海族在適宜的環境之下，均能前進上進，盛大光輝。故環境似為將來左右每個國家民族之最要因素焉。」（參閱 Griffith Taylor: Environment and Race, Chs. I, II, III, IV, XIV, XV, XVI, XX, XXV, XXVI, XXVII, XXVIII, XXIX, and XXX.)

## 第八章 遺傳優劣與種族進化之關係

### 一 種族進化爲人類之最高目的

前章對於自然環境與種族進化之關係，已略爲述及。至於與種族進化最有密切關係的第二個要素，厥爲遺傳。其實一切環境的改善與人文的進步雖異常重要，究屬外緣的。祇有遺傳的優美和胚質的良好，纔是內緣的。所以前章首段所述種族進化的三大要素之中，其自然環境與社會習傳二者皆屬外緣的。惟種族遺傳一項始屬內緣的。所以遺傳的優劣是關係非常重大。關於此點，著者十餘年前所撰進化之真象一文內，亦有簡單說明，略謂：「人演的進化可大別爲二類，一爲人文之進步，一爲人種之進步。人文的進步，指一切人類社會的生活職業、政教、風俗、典章、制度、言文、思想、學術、技藝等之種種進步而言。人種之進化，則指人類種族利用婚姻之選擇，國家之取締，及生育之差別，以促進天演之淘汰，及維持種族自身之進化而言。此兩種演進皆絕不可少，而以第二種爲尤要。蓋第一種之進步，大都僅限於吾人環境之改善。如生計之進步，實業之振興，衣服之美，宮室之麗，政治之修明，兩士之廣袤，科學之發達，教育之隆興，物質之豐便，文物之燦然，雖極爲重要，究屬外緣的。至於第二種之進化，則爲人種自身之進化。如軀魄之壯健，體格之雄偉，膚貌之豐美，腦力之發達，心思之靈敏，精神之健爽，性

歐洲各國生育率跌落圖



情之淑善，天眞之活潑，人格之高貴，皆由選擇而來。人類必有第二種之進化，然後能成第一種之進步以繼續演進，弗替弗衰。否則如虎皮蒙馬，聊異外形，如沙上築牆，不勝其任。前此世界歷史中許多光榮燦爛如若如錦的國家，非不極一時之盛，惜皆不能長治久安，而以衰亂滅亡爲其終局。雖原因複雜，而善種學家則咸謂由於善種之學不講，善種之法不施，任人民自生自養，致種族日形退化。一國之中，多數的人皆喪失其領袖文明或撐持文明之資格，與鑄造社會或扶助社會之能力。是以國破家亡，民奴種滅，而人文亦隨之掃地也。」

上述兩種演進自然有很密切的相互關係，世界惟最優美健全的民族，纔能創造最優美健全的文化。反之，文化愈優美健全，其影響於人種之選擇與進化者亦至巨。文化的影響自然有好有壞。真正的優美健全文化應以能使種族的本身最適於生存發達爲其目標，然後兩種進化得以繼續深演，並行不悖。嚴格言之，種族自身的進化乃人類之最高目的。人文的進步不過爲供給種族進化的各種需要而設。譬如良好的領土，良好的氣候，良好的政治，良好的法律，良好的教育學術，良好的社會風俗，良好的衣食住行與夫一切物質的美便，雖極重要，無非爲增進人類種族的最高幸福起見。此外別無更爲高美的意義。所以種族有了優美的環境，更須注重優美的遺傳。即一國欲求最適於生存，除努力人文進步之外，更須講求淑種的藝術，以謀種族的繼續改良。猶夫園丁有了良園，尤宜選擇良好的花種，始能開好花。或農夫有了良田，尤宜選擇良好的穀種，始能結好穀也。

按照生物界中自然進化之公例，「優者」與「適者」恆較「劣者」與「不適者」更有生存繁衍之機會。所謂「優者勝，劣者敗。」「適者生存，不適者滅亡。」所謂「天之生物，因材而篤。裁者培之，傾者覆之。」中山

先生在其民族主義第三講中曾問道：「我們民族到底是優者呢？或是劣者呢？是適者呢？或是不適者呢？如果說到我們的民族要滅亡，要失敗，大家自然不願意。要本族能够生存，能够勝利，那纔願意。這是人類的天然思想。現在我們的民族處於很難為的地位，將來一定要滅亡。所以滅亡的原故，就是由於外國人口增加和政治經濟三個力量一齊來壓迫。我們現在所受政治力經濟力兩種壓迫已達極點。惟我們現在民族還大，所受外國人口增加的壓迫，還不容易感覺。要到百年之後，纔能感覺。我們現在有這樣大的民族，可惜失去了「民族思想。」所以一受外國的政治力和經濟力來壓迫，以後又遭天然的淘汰，我們便是亡國滅種之憂……所以我們要努力去恢復我們固有的道德、智識、和能力。努力去恢復「民族思想」、「民族精神」、「民族主義」和「民族地位。」並且要努力去學歐美之所長，然後纔可和歐美並駕齊驅。」這番話語，都是提醒我們要為我們的民族大大的努力，纔能够億萬萬年也不會滅亡！

惟吾人須知古今中外民族與民族生存競爭的最後勝利，係半恃「強弱之勢」，半恃「衆寡之形。」洪亮吉的百物篇曾說道：「天生百物，非專以養人。人能殺物，物亦能殺人。一言之，不過恃強弱之勢與衆寡之形。」吾輩國家種族間亦然。我們的民族就「衆寡」言之，現在並不算少，但就「強弱」言之，則恐不如人遠甚。孟子說：「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我們民族前途的最大危機就是在這一點。一個民族如果弄到「人不如人」、「人不像人」或「人不如其爲人」，則雖獎勵生育，增加人口，亦不足以救種族之危亡。管見以爲今日最爲急要之問題不在於大家努力「添子益孫」而在於如何使我們民族「轉弱爲強」職是之故，強種學術，遂不可不努

力講求。歐美優生學者常言人類種族遺傳的變遷，頗爲迅速，少則數代，多則數百年，遂呈重大的變化。現在白種諸族對於強種優生均提倡不遺餘力。蓋一國必能強良其種族於內，始能共競生存於外。否則一旦與他族接觸，無論智識力，均必相形見絀，終歸失敗。今後欲發揚「民族主義」和「民族精神」，尤應以淑種學理原則爲其科學的基礎。庶使民族日臻優強美善，自然更適於生存。近世的遺傳學與優生學雖爲頗屬幼稚之科學，然關於人類進化之重要事實及重要原則，已多所發明。特略述其大意，以引起國人之注意而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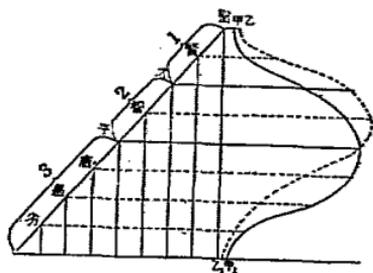
## 二 天賦的不平等與人種改良之可能

優生學者所根據最顯明的事實即爲人類「天賦的不平等」。假使人類生來便是平等，則非特無研究淑種之必要，而且亦無改良人種之可能。所謂「天賦的不平等」，乃人類「自然不平等」並非「人爲的不平等」。天賦的不平等乃生物界的普通現象。中山先生的民權主義第三講中曾說道：「自人類初生幾百萬年以前，推測近來「民權」萌芽時代，從沒有見過天賦有「平等」的道理……拿掉上這一瓶的花來看，此刻我手內所拿的這枝花是槐花。大概看起來，以爲每片葉子都是相同，每朵花也是相同。但是仔細考察起來，或用顯微鏡試驗起來，沒有那兩片葉子完全是相同的。也沒有兩朵花完全是相同的。就是一株槐樹的幾千萬片葉中，也沒有完全相同的，推到空闊時間的關係，此處地方的槐葉和彼處地方的槐葉，更是不相同的。今年所生的槐葉和去年所生的槐葉又是不相同的。由此可見天地間所生的東西，總沒有相同的。既然都是不相同，自然不能夠說是

「平等」。自然界既沒有「平等」，人類又怎麼有平等呢？天生人類本來也是不平等的。……如果不管各人天賦聰明才力，要勉強去造成平頭的假「平等」。世界便沒有進步，人類便要退化……所以人造的「平等」，只有做到聖賢才智平庸愚劣各人的立足點都是「平等」，那纔是真正「平等」。那纔是自然之理。」所以一切政治革命、經濟革命、社會革命、和教育革命，充其量只能去掉各種「人爲的不平等」，決不能去掉「天賦的不平等」。

中山先生的民權主義第三講第一段會根據各人天賦的聰明才力，將人類分爲「聖賢、才智、平庸、愚劣」八等。而在第三講末段及第五講第四段中復根據各人的聰明才力，將人類分爲「先知先覺」、「後知後覺」及「不知不覺」三種。中山先生說：「我對於人類的分別，是何所根據呢？就是根據於各人天賦的聰明才力。照我的分別，應該有三種人：第一種人叫做先知先覺。這種人有絕頂的聰明，凡見一件事，便能够想出許多道理。聽一句話，便能够做出許多事業。有了這種才力的人，纔是先知先覺。由於這種先知先覺的人，預先想出了許多辦法，做了許多事業，世界纔有進步，人類纔有文明。所以先知先覺的人，是世界上的創造者，是人類中的發明家。第二種人叫做後知後覺。這種人的聰明才力，比較第一種人是次一等的，自己不能够創造發明，只能夠跟隨摹倣。第一種人已經做出來了的事，他便可以學到。第三種人叫做不知不覺。這種人的聰明才力是更次的，凡事雖有人指教他，他也不能知，只能去行。照現在政治運動的言詞說：第一種人是發明家，第二種人是宣傳家，第三種人是實行家。世界上的大事，都全靠這三種人來做成的。但是其中大部份的人都是實行家，都是不知不覺。次少數

圖配分力才明聰的賦天類人  
(法類分的生先山中據據)



上圖甲、  
曲線代表  
人類天賦  
能力自然  
的分配乙  
乙曲線則  
代表優生  
學者理想  
中的人類  
天賦能力  
分配

的人便是後知後覺。最少數的人，我是先知先覺。世界上的進步，都是靠這三種人。無論是缺少了那一種人，都是不可能的。『大概言之：中山先生所說「聖賢」兩等人可以算是「先知先覺」，「才智」兩等人可以算是「後知後覺」。至於「平庸愚劣」四等人可以算是「不知不覺」。這種「天賦的不等平」，雖無法免除，但優生學者則深信可以人力變更其相對的數量，因而促進人種之改良焉。

關於人類天賦的不平等，在統計測量上已有許多事實足以證明各社會階級無論在身體方面或腦力方面均有種種差異，且各階

級所產天才之多寡亦有所不同。試略舉若干統計事實如左：

(一)身材的長短

大致上等社會各階級的平均身材通常比下等社會的身材稍高。據瑞人萊士富羅 (A. Nicoforo) 測量樂山城 (Launenhe) 三千一百四十七個兒童之平均身材如下：

年 齡	男		女	
	富 者	貧 者	富 者	貧 者
七 歲	一二〇・〇	一一六・一	.....	.....
八 歲	一二六・二	一二二・五	一二三・三	一二九・五
九 歲	一二九・九	一二三・九	一二九・六	一二四・四
十 歲	一三四・二	一二八・九	一三五・二	一二九・七
十 一 歲	一三五・二	一三四・二	一三七・四	一三四・一
十 二 歲	一四〇・五	一三八・八	一四二・九	一四〇・一
十 三 歲	一四四・四	一四〇・五	一四八・二	一四六・四
十 四 歲	一五〇・一	一四六・二	一五二・六	一四六・五

又據英人德爾德敦 (Dr. M. Ederion) 測量蘇格蘭格拉斯哥城 (Glasgow) 三萬零九百六十五個女孩與三萬二千八百一十一個男孩之身材, 按照貧富等級列表如左:

男孩年齡	極貧	小貧	小康	富裕
五歲半至六歲半	四一·三	四二·一	四二·一	四三·〇
六歲半至七歲半	四三·〇	四四·〇	四四·〇	四四·八
十三歲半至十四歲半	五五·二	五五·五	五七·二	五七·七

又女孩身材之測量結果亦大致相似。又意大利巴格林尼 (Bergini) 測量意大利男孩之結果如左：

年齡	男孩		者	身材	
	富	貧		富	貧
十一歲	一三三·六	一三三·六	者	一三三·五	一三三·五
十二歲	一三七·〇	一三七·〇	者	一三二·五	一三二·五
十三歲	一四二·五	一四二·五	者	一三八·六	一三八·六
十四歲	一五〇·六	一五〇·六	者	一四〇·〇	一四〇·〇
十五歲	一五七·二	一五七·二	者	一四八·六	一四八·六
十六歲	一六三·八	一六三·八	者	一五一·二	一五一·二

十七歲 一六四・〇  
一五一・四

又其他許多學者對於俄國、英國、法國、德國、及巴爾加利亞等國測量兒童身材所得之結果，亦大致相似。即上等社會的平均身材恆較下等社會稍高。

又據意大利人李飛 (L. L. Li) 測量應募軍人二十五萬六千一百六十六人，計得上等階級應募者之平均身材為一六六・九吋，中等階級應募者之平均身材為一六五・〇吋，下等階級應募者之平均身材，則在一六五・吋與一六四・三吋之間。又其他諸國如法國、瑞士、西班牙、英國、俄國、美國、德國、印度、波蘭等應募軍人之平均身材亦因階級地位而有差別。

又英人羅伯李 (Charles Roberts) 測得英國二十歲至三十歲的中年男子之平均身材，按照職業分類如左：

職業區分		平均身材
一	般人	六七・五
專	門職業	六九・〇
商	人店主	六八・〇

在外操作之工人（農工礦工及船夫）	六七·五
在 城 市 操 作 之 手 藝 工 人	六六·五
常 坐 工 人（裁縫及工廠工人）	六五·五
精 神 錯 亂 之 人	六五·五
監 獄 犯 人	六六·〇

又據赫德立加醫生 (Dr. Alex. Hrdlička) 測量美國一般軍人的平均身材係在一七一厘米與一七二厘米之間，而本國生長的軍人之平均身材則在一七一·三五厘米與一七三·五厘米之間。又大學男學生的平均身材則在一七一·二厘米與一七五·二厘米之間。又據臥洛雷士 (Olofs) 測量西班牙專門職業階級之平均身材為一六三·九厘米，而工人階級之平均身材則僅為一五九·八厘米。又據朗戈特 (Langsdorf) 測量法國學生之平均身材為一六八·七厘米，公務及管理人員為一六七·四厘米，商店店主為一六五·一厘米，普通工人則為一六四·四厘米。又據庫魯克 (Cooke) 測量印度上中等階級之平均身材為一六四·六厘米，下等階級則為一六三·四厘米。又據英人葛理士 (H. Ellis) 的研究，英國天才三百六十二人的平均身材大都較一般人民之平均身材為高。又據美人戈文 (E. B. Gowin) 測量美國現代名人二千四百九十四人之平均身材及體重均較持有保險單的普通人民之平均身材及體重為高，并列表如下：

職業階級		身	材	體	重
神	仕	五	一〇・六		一七六・四
小城	牧師	五	八・八		一五九・四
大學	校長	五	一〇・八		一八一・六
獨立學院	校長	五	九・六		一六四・〇
城市中學校	校長	五	一〇・四		一七八・六
小城中學校	校長	五	九・七		一五七・六
各省律師協會	會長	五	一〇・五		一七一・五
各府檢察	律師	五	一〇・〇		一六二・九
售貨	經理	五	一〇・一		一八二・八
售貨	人	五	九・一		一五七・〇
鐵路公司	總理	五	一〇・九		一八六・三
分	站長	五	九・四		一五四・六

〔附註〕以上各項統計，詳見美國俄尼所達大學俄國社會學教授索羅金所著社會的動遷 (S. Sorokin's *Social Mobility*, pp. 216-224.)

又據俄國人類學者希洛可哥洛夫 (S. M. Shirokogoroff) 綜合各專家測量中國人身材的結果，均證明中國學生之平均身材較普通人口之平均身材為高，并列表如下：

省 份	普通人口的平均身材	學生的平均身材
山 東	一六六五種	一七〇二種
江 蘇	一六四三種	一六五〇種
浙 江	一六二八種	一六四七種
湖 北	一六三五種	一六八九種
廣 東	一六〇七種	一六三六種

〔附註〕上表見 (S. M. Shirokogoroff's *Anthropology of Eastern China and Kwangtung Province*, pp. 17-18.)

(二) 頭蓋腦殼大小及腦髓重量 又據各專門家的測量，各人類種族上等階級的平均頭蓋大小，腦殼大小與平均腦重 (the cranial capacity, size of head and weight of brain)，似較下等階級的平均重

稍高。據馬特格嘉教授 (Prof. Matigka) 曾將中歐波希米亞布雷格 (Brno) 城年在二十歲至六十歲死者二百三十五人權得其平均腦重如左：

階級區分	腦重 (格蘭姆)
粗工	一四一〇
土木工人	一四三四
司閘及運輸工人	一四三六
手藝工人	一四五〇
商人及音樂家	一四六八
醫生及大學教授	一五〇〇

又據萊士高羅測得樂山城的土木工人之子與教授醫生及律師之子各五十人的頭蓋圓周 (circumference) 差別如左：

年齡	教授醫生之子	土木工人之子
十歲	五二八・〇	五二三・三

又英國人類測量學者巴爾森 (H. G. Parsons) 總合其自己測量的結果，與其他人類測量學者的結果，計得英國各階級的平均頭殼大小（即長與寬之和）如左：

十	一	歲	五三三・〇	五二四・八
十	二	歲	五三五・五	五二四・九
十	三	歲	五三六・四	五二八・四
十	四	歲	五四一・八	五二八・六

階級	組	合	測量	人數	頭殼大小
罪	犯		三、〇〇〇		三四二
一	般	人	數	千	三四三至三五二
陶麥士醫院之學生			一五三		三四五・七
鐵路	工	程	師	一一八	三四六・〇
皇家學院	學	生	四五七		三四七・〇
劍橋大學	學	生	一、〇〇〇		三四七・五

牛津大學學生	九五九	三四九・〇
皇家學院教員	八八	三五〇・〇
大學院教職員	二五	三五〇・〇
受過教育的蘇格蘭人	二〇	三五一・五
受過教育的英格蘭人	四〇	三五三・〇
英國的解剖學者	二九	三五四・〇

(附註)見 P. Sorokin's *Social Mobility*, pp. 224-227

(三)天才的階級分配 據英國優生學鼻祖戈爾登 (Francis Galton) 及其他諸人總合研究英國所產天才之分配，計得上等及專門職業各階級僅佔人口百分之四・四六，而所產天才則為百分之六・三。至於各種職工階級共佔人口百分之八四，而所產天才則僅佔百分之一・七。戈爾登並計得英國十九世紀所產最著名之科學家一百零七人中，屬於貴族者九人，屬於專門職業者五十二人，屬於銀行家及大工商業者四十三人，屬於農家者二人，屬於普通工人者僅一人云。

又據法人坎德爾 (de Candolle, A.) 的研究，法國十九世紀末葉以前所產最著名的科學家計有百分之三十五係出自貴族，百分之四十二係出自專門職業與中等階級，其餘各下等階級僅佔全國人口三分之

二乃至四分之三，而所產的著名科學家則僅佔百分之二十三。又歐洲一百個最著名的科學家，計有四十一人出自貴族，有五十二人出自中等階級，僅有七人出自勞動階級云。

又德人邁詩 (Fritz Meier) 研究德國生於一七〇〇年後及死於一九一〇年前的各種著名天才四千四百二十一人，計得上等階級（即貴族專門職業與富裕階級）所佔人口雖不及百分之二十，而所產天才則為百分之八三·二，至於下等階級所佔人口雖在百分之八十以上，而所產天才則僅為百分之一六·八。

又據美國卡特爾 (Cattell, J. M.) 教授的研究，美國各階級所產著名科學家人數及各階級所佔人口百分數如左：

社會階級	每階級所產科學家百分數	每階級所佔人口百分數
專門職業	四三·一	三·一
製造及商業	三五·七	三四·一
農業	二一·二	四四·一
其他階級	無	一八·七

又據美人庫拉克 (Olatto, E. L.) 研究美國著名文學家一千人的出處如下：

文 學 家 出 處	每階級所產文學家總數
專 門 職 業 階 級	三二八
商 業 階 級	一五一
農 業 階 級	一三九
匠 人 及 工 人 階 級	四八
出 處 未 詳 者	三三四

又據美國敦尼所達大學社會學教授索羅金 (Sorokin, P.) 研究美國實業界及金融界領袖四百七十六人，計有百分之七九·八出自實業階級與專門職業階級，百分之一五·六出自農業階級，僅有百分之四·六係出自精工及粗工階級。

又據俄人費利捷潘高 (Philipschenko, Jr.) 研究俄國現代科學家、學問家、及美術文學家的出處如下。

父親的職業	每階級所產科學家及學問家	每階級所產美術及文學家	每階級所產現代科學家及大學問家	每階級近八十年間所產最大科學家及學問家
專門職業階級	三六·〇	四四·六	四六·〇	三〇·二

官吏階級	一八·二	二〇·〇	八·〇	一五·五
軍人階級	九·四	七·七	一四·〇	一六·二
神仕階級	八·八	一·八	一〇·〇	一四·八
商業階級	一三·〇	六·七	一二·〇	五·六
農業階級	七·九(甲)	九·六(甲)	六·〇(甲)	一四·一(乙)
工人階級	二·七	九·六	四·〇	三·五(丙)
出處未詳	四·〇	無	無	〇·一
共計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一〇〇·〇

(附註) (甲)包括地主紳士, (乙)專指地主紳士, (丙)包括小農。

故俄國現在的勞農兩階級雖佔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 而所產的科學家、學問家、美術家及文學家實不多。且俄國與歐洲各種社會主義運動的過去領袖和現在領袖大半皆出自「非工人」階級云。

以上所舉各種統計事實(均詳見 P. Sorokin's Social Mobility, Chaps. X-XIII) 雖不必絕對精確可靠, 但至少可以表明人類「生來是不平等的」不過現時社會上有許多的不平等都是由於人為, 並非真正由於天賦。今後各種政治制度、經濟制度、社會制度和教育制度的根本改革, 其最大目標不外盡量去掉各

種「人爲的不平等」，但是不要勉強去創造中山先生所謂「平頭的假平等」。若是要去創造「平頭的假平等」，世界便沒有進步，人類便要退化。人類祇要能够革除各種人爲的不平等，則現時產生天才較少的各階級將來均必貢獻較多這是可以斷言的。所以上列各種統計事實及各階級所產天才比例，並非絲毫不能增減。因爲現在社會上很多的不平等，都不是真正的天賦不平等，要把一切人爲的不平等去掉之後，纔能够顯出真正的天賦不平等來。換言之，即社會上一切人爲的障礙都要掃除乾淨，俾人人皆有均等機會各享充分的生養教育，然後各顯大好本領，大好頭腦，和大好身手，各盡其才，各擅所長，以貢獻於全社會，則人類的進步，自能一日千里。中山先生所謂：「聰明才力愈大者，當盡其能力以服千萬人之務；造千萬人之福；聰明才力略小者，當盡其能力以服千百人之務；造千百人之福；至於全無聰明才力者亦當盡一己之能力以服一人之務，造一人之福。照這樣做去，雖天生人之聰明才力有不平等，而人之服務道德心發達，必可使之成爲平等了，這就是平等之精義。」這種精神纔是人類共同前進上進的原動力。較諸近十餘年來許多不重服務，祇重奪取，不務耕耘，專務收稅，不顧一路哭，祇顧一家富的達官貴人，軍閥財閥，與夫其他在「人爲的不平等」狀況之下討便宜生活的人們，其相去何可以道里計耶！

所以各種有意義的革命，都是要打平一切「人爲的不平等」，以解除人類社會許多的苦痛，和去掉文明進步許多的障礙。我們可以說上述各階級的身材體重之種種差別至少有一部份係由於營養有厚薄，生活有勞逸，和境遇有苦樂。近數年來據各種專門名家的觀察，均證明人類種族的身材體重實與營養有相當的關係，

並非完全由於天賦的不同。譬如俄國在革命時代與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二年的天賦，人民飽受飢餓，因此身材短瘦頗多，據俄國黨文諾夫斯基（Prof. Ivanovskiy, A.）的測量，俄國在饑饉期內成年男子的身材會減短四・七種，成年女子的身材則減短三・五種。同時體重亦有相當的減輕，但食物充足以後，人民的身材體重遂逐漸恢復原狀。又德、法、比、丹諸國在戰爭饑饉之中，人民的身材體重亦因營養不佳而受同種的影響。反之，歐洲荷蘭與一八七二年以後之薩克桑尼（Saxony），意大利、瑞典、法國及近今之美國，則因環境改善及生活程度增高而致身材體重多有增加。（參閱 P. Sorokin's Social Mobility, pp. 317-318; Carr-Saunders' The Population Problem, pp. 340-341; S. M. Shirokogoroff's Process of Physical Growth among the Chinese, pp. 120-122）及本書第七章第三節）不過身材體重仍有其本然的天賦差別，非環境所能完全左右之。按照吾友竺可楨先生所作中國歷史上的旱災統計，自東晉迄今歷史上所載旱災每百年平均有四十九起。黃河流域各省每世紀平均有旱災八起，長江流域諸省旱災較少，每世紀平均有五起（見史地學報第三卷第六期）。這種旱災對於中國民族的身材體重雖不無相當的影響，但是我們萬不能說北方人民和南方人民的身材體重應與旱災次數成正比，因為還有更為根本的種族遺傳差別足以影響人之修短強弱以及智愚優劣也。

據近世生物學者遺傳學者及優生學者研究證驗之結果，已公認人類「天賦的不平等」係根於先天的遺傳環境的力量和教育的力量雖大，實遠不及遺傳之重要。是以在同一教育之下，人類依然有智愚優劣。或在

同一環境之下，人類依然有強弱壽夭。猶夫在同一優美的舞臺之上，而演員仍有工拙精粗。優生學之目的，乃在研究遺傳的原理原則以及改良人種的健全方法，俾一個社會或一個民族之中，優強淑善分子日益增多，劣弱愚陋分子日益減少。然後將來的種族在體魄與精神兩方面，均可日見良好健全。生物界中既能由下等動物進化而到人類，則人類即應繼續擇種留良，向上進化，把品性、才具、體質、容貌，都再行逐漸變好。故「天賦的不平等」，雖不能免除，而種族的平均本能與平均內美，則可以逐漸提高。英國的文學家納斯金說：「無健全的體魄，決無健全的心靈。無健全的心靈，決無健全的體魄。一個品行端正具有內美的人必有其外美。所以一個人的真正好壞祇要從面貌上就可以看得出來。大致道德的品質和形體的品質皆以從遺傳得來的為多，從教育得來的為少。不過有了良好的遺傳而無教育去補充他，亦無由成德達才。所以祇要從善生善教兩方面注意，人類身心高貴所能達到的程度是不可限量的。人類的最高目的是要增多具有最高標準的人生。即體魄情感和智慧心靈皆最完全的人生。這種最高尚完全的人生纔是國家民族的真富。」（參閱 John Reinick's *Essays on Political Economy*）所以人種的改良，乃人類社會一切改良之中最根本而最高美的改良。至於人種改良方法之實施，可分兩大類：一為自然選擇，一為人為選擇。人為選擇不外婚姻選擇生育差別與國家取締。三者自然選擇如「不廢江河萬古流」有淘汰淑世界古今一切生物及人類的偉大力量。自然選擇之最要原則，雖為「裁者培之，傾者覆之，最適者生存，不適者滅亡。」然維持各種「生物的均衡」使之「並育並存」免致某種生物過分繁殖，亦為自然界重要原則之一。試觀世界一切生物各有自衛器官，在勢均力敵情形之下，大半得以

綿延其族類，便知「弱肉強食」並非自然界之唯一原則。各種生物在勢力均等或武裝和平之下，其重大部份或最大部份固能「共存共榮」，「並育而不相害」。且任何一種生物如果過分繁殖，必受天演的嚴厲裁汰以恢復生物界之均衡焉。（參閱松村松年著薛德楨陳端本譯生物界之神祕第一至第五諸章）人類既為自然界中生物之一種，對於自然選擇之實施，亦莫之能逃。不過因人類腦力心靈之發達，得天獨厚，荷天之寵，而享受種種優待之特權耳。

今人有謂人類因智識與文化之進步已超出乎自然選擇之上者。實則不然。人類無論如何進化，決不能完全超越自然選擇之範圍。疾病與死亡，即自然界對於人類施行選擇的最要方法。在生物學者與微菌學者眼界之中，多數的疾病不過為人類與他種下等生物戰鬪受傷之表徵，疾病的死亡（別不罹疾病的自然死而言）則為人類與他種下等生物戰鬪失敗之表徵。弱者先滅，強者後亡。人之有壽夭，皆因人類應付他種生物遂戰之自然抵抗力，或人為抵抗力，各有強弱大小。自然抵抗力指個人固有之體力而言。人為抵抗力則指各種衛生設備而言。兩種抵抗力之中，固有的體力自更重要。此種固有的抵抗力之強弱大小，多由父母祖先遺傳得來。職是之故，人為選擇遂極關重要。況人類猶夫其他生物，既可繁殖無限。至少在全人類的「生育革命」未完全實現以前，種族與種族之間，生存競爭必不能免。一個民族欲求最適於生存，尤不能不注意種族內部的人為選擇。我們民族的人為選擇，太不講求，實為民族墮落不競的一個最大原因。人為選擇不外婚姻選擇，國家取締，及合乎淑種原理的生育差別數者。是以男女擇配應絕對自由，並應十分謹慎。務期適合淑種原則，然後可開良好之

花，結良好之果。淑種學者常謂一國的女子如能在法律上、經濟上、教育上、及倫理上、均與男子絕對平等，則女子得享同等的擇配自由權，當可裁汰許多惡劣男子。蓋婚姻之提議雖大都發端於男子，而女子實操最後之可決權與否決權也。一國的青年男女應視擇配為終身大事之一。孔子云：「妻也者親之主也。子也者親之後也。婚姻萬世之嗣也。不亦重乎。」又美國耶魯大學前任校長赫德立亦言：「人生有兩件事須自己選擇。一為自己的未婚妻，一為自己的人生觀。」此雖為青年男子說法，甚望青年女子亦作為如是想，作如是觀。至於國家之取締亦甚重要。婚律宜妥為制定，切實施行。凡有各種不能療治的危險遺傳疾病之男女（如癲狂及神經衰弱之類）宜設養濟院以收容之。待以人道，惟不許結婚傳後。如不加以收容，則應施行「絕育手術」，免使再養類似之分子。又普通男女未結婚以前，須由國家所設衛生機關或註冊機關查驗身體一次，無惡疾或低劣品質者始給證書，亦為保護善良之一法。國家為人民全體福利計，及種族將來健全計，不得不如此也。

### 三 遺傳的理則和遺傳的工具

遺傳之原則相似者恆孕育相似者。故父母必有形體的與精神的良好品質，始能傳之子女和子女之子女。按照韋司曼 (August Weismann) 的重要學說生物之胚種形質 (germ plasma) 與身體形質 (soma or body plasma) 完全不同。胚種形質乃生命之源泉，代代相傳，無大變更。而身體形質則不過為胚種形質之養料，或其「受託者」。因兩種胚種形質結合之作用，母體卵中所含之胚種形體逐漸發育增多，遂分配於各細

胞中，轉變爲身體形體，以造成身體之各部，但有些細胞則仍充滿原有之胚種形質，以爲遺傳後代及補生身體何部受傷之用。故胚種形質能化生身體形質，而身體形質則不能化生胚種形質。父母子女之所以相似，皆由胚種形質係一系相連。至於各個個體所以不能完全相同，則因每代兩性的胚種形質有新的混合之故。優美的胚種形質混合之結果，必能發生優美的變化。是以婚姻選擇途途非常重要。又身體形質既不能化生胚種形質一切身體上所受外緣的影響，如不會到影響胚種形質，則胚種形質概不發生變化。按照韋氏之意見，祇有胚種形質內之固有單位品性 (Inherent unit characters) 能遺傳，至於後天的習性 (acquired characters) 則不能遺傳。按習性之不能遺傳，實使人類更有日新又新及前進上進之機會。否則父母的各種舊染污習均必直接傳之後裔。假使子女一經出世，遂少朽骨庸，或馬克斯化，或生來就是三寸金蓮，一副煙癮，世世代代皆遺傳下去，莫之能改，豈非種族之至不幸乎。美國加里豐尼亞大學生物學教授霍爾謨斯會命其畢業生曼女士 (Miss M. Mann) 將尋常蒼蠅數萬分爲若干組，分別置於酒精、嗎啡、鉛毒、一炭醇綠、砒霜、及高溫度等毒藥之下，任其繁殖至十代之久，均未發生何種能够遺傳的變化云。又孫中山先生所著心理建設第五章內也說道：「吾俗呼養子爲螟蛉，蓋有取於螟蠶變螟蛉之義。古籍所傳螟蛉養子也，螟蠶蜂蟲也。蜂蟲無子，取桑蟲蔽而瘖之，幽而養之，祝曰：『類我類我。』久則化而成蜂蠶云。吾人以肉眼觀察之，亦必得同等之判決也。惟以科學之統系考之，物類之變化，未有若是其突然者也。若加以理則之觀察，將螟蠶之，取螟蛉蔽而瘖之，幽而養之之事，集其數起，別其日數，而同時考驗之，又以其一起分日考驗之，以觀其變態，則知螟蠶之取螟蛉蔽而瘖之是也，幽而養之非也。」

蔽而殤之之後，螺贏則生卵於螟蛉之體中，及螺贏之子長，則以螟蛉之體爲糧，所謂曲而養之者，卽曲螟蛉以養螺贏之子也。螺贏並未變螟蛉爲己子也，不過以螟蛉之肉爲己子之糧耳。螺贏之蔽螟蛉於泥窩之中，卽用其蜂蟻以灌其毒於螟蛉之腦髓而蒙之，使之醉而不死，活而不動也。若螟蛉立死，則其體卽成腐敗，不適於爲糧矣。此爲物種不易因環境影響而發生突變的又一個很好的證據。惟胚胎形質雖通常不因環境勢力而發生能夠遺傳的永久變化，但並非絕對不能受任何環境之影響或侵害。大致胚胎形質所最需要的便是營養。如果胚胎形質中有若干單位性質營養缺乏或受其他重大的侵害，亦能發生不良的影響。其顯著的事例厥爲闊洛（Kallouzi）的餓蠶試驗，闊氏將蠶受餓至兩代之久，至第三代雖喂飼極良，身體亦不能復如常蠶之大了。但此種情形或因受餓的雌蠶化成了蛾，所生之卵，卵黃缺乏，是以孵化爲幼蠶之後，先天缺乏營養，後天遂不能發育如常，亦未可定。此種結果，大概由營養不足所致，並非胚胎發生根本變化。正如嬰兒未產以前，母體滋養供給如果不足，亦發生顯著的影響。惟母體如果營養充足，則下次所產生之嬰兒仍可甚爲健壯，足見父體與母體之胚胎形質，並未發生變化。所異者母體營養之供給有厚薄，遂致子女之身體形質有強弱耳。此種現象在我國早婚多育的貧窮社會狀況之下似甚普通。是以女子在妊娠期內應受特別保護，多有休息，營養亦應較豐。且孕育不宜過密。所養子女的身體形質當較健壯焉。

在近世遺傳學上最重要的發明，大致當首推奧人曼兌爾的遺傳定律（Mendel's law）。曼氏之遺傳定律通常分兩部份：一爲主宰定律（the law of dominance），二爲分離定律（the law of segregation）。

按照第一定律，凡兩種有關係而不相同之性質，第一次互相配合之結果，祇有一種性質能發現出，其他一種性質則隱伏不現。譬如將長幹豌豆與短幹豌豆互相配合，則第一子代 (the first filial or  $F_1$  generation) 均為長幹，並無短幹，亦無長短適中之中間物。又如將黃豌豆與綠豌豆互相配合，則第一子代全數皆為黃豌豆，並非黃綠各半。故長的性質與黃的性質是謂之主宰性或顯性 (dominant)，而短的性質與綠的性質則謂之退守性或隱性 (recessive)。此種退守性並非完全喪失，不過隱伏不現而已。如果將第一子代之長幹的或黃色的雜種自相配合，則第二子代的豌豆便有長有短，或有黃有綠。其主宰性與退守性之分配，大都為三與一之比。(即三長一短或三黃一綠) 此種原有性質在第二子代中按照一定比例而互相分離之現象，是謂之分離定律。所有在第二子代中再行現出之退守性均為純種。故能復生真種。(即真的短種或真的綠種) 但其餘在第二子代中現出之主宰性，則並不一致。若使之自行互相配合，則有三分之一為含主宰性的純種。(即真的長種或真的黃種) 其餘三分之二為退守性，惟并非純種。其下代之比例，為一退守性，三主宰性。故第二子代之公式可書為  $IDD + 2DR + IRR$ ，或一個含主宰性的純種，兩個含生宰性及退守性的雜種，一個含退守性的純種。并非  $3D + 1R$ ，或三個含主宰性的純種，一個含退守性的純種。按照曼兌爾的解釋，凡含有甲種性質的個體發生之胚種細胞 (Gametes or mature germ cells) 都含甲種性質；含乙種性質之胚種細胞都含乙種性質。在第一子代的個體中，遂含有兩種性質。其各個胚種細胞均含有兩種性質之定性素。一由父方得來，一由母方得來，故在第二子代中有些相互信質，復能各自分離。所得結果約為純種雜種各半。以

上所舉的例，係僅就一對相互性質在第一子代及第二子代之遺傳變化而言。若性質種類愈多，則因獨立分離之結果，變化愈愈形複雜了。關於曼兌爾定律及其變化的精密說明，可參考各種專籍專篇，非本文所詳述。吾人所當注意者，乃為曼兌爾的定律，非特許多動植物的遺傳已證明均屬適用。而且人類的遺傳亦一律適用焉。

生物界的一切有機體皆賴生殖以延續其族類，因為一切有機體體終必衰老死亡。惟生殖細胞能發生新的生體，此新生體復形成生殖細胞，而再生新的生體。如此代代傳衍，物種得以永續。生物的生殖作用有兩種方式：一為無性別的或不分雌雄的生殖 (asexual reproduction)，僅於植物界及下等動物界有之。二為有性別的或分雌雄的生殖 (sexual reproduction)，則於高等動物與人類始有之。有性別的生殖實較無性別的生殖更足以加速物種的進化。蓋緣兩性生殖之雌雄配合既可變化萬千，實使各種遺傳品質有種種新的結合，以供自然選擇之可能也。人類的生殖作用亦係由兩性的生殖細胞結合而成一新生體。俟新生體的生殖細胞成熟之後，再與其他異性的新生體之生殖細胞互相結合而再成新生體。如此世代相傳，種族的生命得以永遠保續。有性別的生殖在生物進化史上起源頗早。當初兩性的生殖細胞形式皆同，後來經過長期的進化，在高等生物之中，兩性生殖細胞遂彼此各異其形式。一性的生殖細胞逐漸增大，並儲藏養料而變為卵。其他一性的生殖細胞則仍然異常細小，不過逐漸具有活動的能力而變為精蟲。當初一切身體細胞皆能變為卵或精蟲，隨後則祇有特別器官始能產生卵與精蟲。人類的卵約大如針頭，而精蟲則非顯微鏡不能見。鴉鳥的卵重約一磅，而精蟲亦非顯微鏡不能見。但兩性的生殖細胞雖大小各異，而雙方的遺傳勢力則仍屬相等。兩性的生殖細胞

卵與精蟲各皆有核。卵核與精蟲核大小約相等。卵核與精蟲核的結合乃新的生命所由發生。核中的重要部份爲染色質 (chromatin)，由染色質而形成若干染色體 (chromosomes)，每種生物之染色體有一定數目，一定形式，一定大小。染色體之任務所以指導細胞的活動。當細胞分裂之時，染色體均排列成對，各自減半分裂，然後受精作用而與異性之細胞核合成一新生體，而恢復通常之染色體數目。是以代代相傳而染色體之數目則不致遞增。蓋每一新生體既由兩個異性的細胞結合而成，若每代的染色體皆因兩個異性細胞的結合而增加一倍，終必無法生殖也。

人類的生殖細胞共有四十八個染色體，每個染色體皆含有若干定性因素或定性因子 (character determiners or genes)，半由雄性得來，半由雌性得來。是在受精之時，兩性的單位性質得有種種新的配合而遺傳於後代。且同一父母所生之子女，除一個卵球分裂爲二之同卵雙生 (identical twins) 而外，亦各有種性情態之不同，皆因定性因子之配合各異之故。故定性因素或定性因子乃各種遺傳品性之代表者。定性因素爲種族歷史上綿延不絕而自己成長自己分裂之遺傳要素。每種定性因素各有其特別作用與特別個性，甚少變更。如有變更，則必引起某種單位性質的根本變化，而傳諸後裔。至於環境的影響如未曾使各種定性因素本身發生變化，則無論其影響或優或劣，或良或不良，均不能傳諸後裔。又自一九〇二年美國潘斯密尼亞大學生物學者麥克格爾 (O. B. McClung) 及在麥君前數年另有一德國學者先後查得有些昆蟲動物以及人類之雄性生殖細胞，皆含有一個無配偶之染色體，名曰 X 染色體以來，一般細胞學者經繼續研究考察

之結果，大都承認雌雄性別乃曼兒爾遺傳性之一。有些生物生有二種之精蟲與一種之卵，即精蟲可分生有X染色體者與Y染色體者二種，卵則僅生X染色體。例如許多的昆蟲線蟲及所有的脊椎動物與人類皆屬之。但另有一些生物則生一種之精蟲與二種之卵，即精蟲僅生X染色體，卵則可分生有X染色體者和Y染色體者二種。例如海麻、蝴蝶、飛蛾、及鳥類皆屬之。人類的精蟲既分別含有兩種不同之染色體，故性別之決定似基於雄性之「性染色體」。即有X染色體之精蟲與有X染色體之卵結合則生女；有Y染色體之精蟲與有X染色體之卵結合則生男。此種說明如果確切，則胎兒之為男為女，實於受精之時便已決定。非特一切的法律不能將男變女或將女變男，即一切環境的影響亦不能變男為女，或變女為男。不過男女決定根於性染色體之學說，似尚有若干困難。按照此說，男性的兩種精蟲理應相等，且人類所生男女比例亦應完全相等。但事實上則各民族中所生男孩皆多於女孩，即為男一〇四至一〇八與女一〇〇之比。按照哈佛大學教授伊士特 (E. M. East) 的解釋：「此種現象或因在受種後之初期，便有若干較弱的女胎早被淘汰，遂致女孩較男孩為少，亦未可知。蓋通常所謂兩性中之較弱者實為兩性中之較強者，故女子自幼至老，其死亡率皆低於男子」云。（參閱 E. M. East, *Heredity and Human Affairs*, pp. 78-79）但此說尚待證實，且兩種精蟲數目是否相等及是否同樣活躍，又有些室家夫婦何以專生男孩，或專生女孩，似均有研究的價值，在此種問題未得有圓滿的答案以前，上述男女性別基於性染色體之說，尙難認為完全成立也。

又人類的疾病亦可分為二種，有能遺傳的，有不能遺傳的。大致疾病之由於身體的結構根本不健全或何

部器官根本欠缺者，多能遺傳；其由於外來寄生物之侵害者，則多不能遺傳。然亦有類似遺傳而實為一種先天的感染。譬如所謂遺傳梅毒，乃因嬰兒在未生前之胎內即已感染；故祇可謂之先天梅毒，而不能謂之真正遺傳。至於真正的遺傳病則大都按照曼兒爾的遺傳定律而反復表現於後代。遺傳的疾病多根深蒂固，無法醫治。故男女擇配不可不慎。否則一代有了遺傳的疾病，必或顯或隱，繼續傳諸後裔。如影隨形，絲毫爽不爽。子孫孫世世代代，皆莫之能逃。所謂「一失足，成千古恨」，所謂「種了惡因，必結惡果」，皆莫過於最不幸的遺傳病了！故國家對於有危險遺傳疾病者之加以取締隔離，或施行絕育手術，或不許結婚傳後，實有充足理由。現在已經查得人類有多種疾病確能遺傳。尙望政府衛生機關，和醫學家、遺傳學家、優生學家、及生物學家，繼續研究考察，並將各種確能遺傳的疾病和低劣的特性，廣為宣導，詳加說明，俾青年男女及一般民衆多享學術應用之利益；其有功於種族前途，當不在禹下也。

#### 四 優生學的真正目標和真正使命

近世的強種優生政策，殆完全基於遺傳學理與遺傳定律。倘忽視遺傳理法，而空言人種改良，終必南轅北轍，徒勞無功。優生學者一面認為純粹改良環境，固不能將種族胚質次第變好。同時也認為純任橫逆的天演自然行使，亦於種族前途有所不利。故注重以人擇補助天擇，以人演糾正天演。善乎！曰人永井潛之言曰：

「人類之遺傳亦與一般動植物相同，皆由多數不變不滅之單位性質從一定之法則而匯合聚散者。人

種改良學之方針，全基於此理法。與夫畜產家園藝家精選適當之種子，應用遺傳現象而行改良者同樣。若欲使人類繁殖佳良之子孫，而絕滅其不良者，則第一不可不注目於其種子，即由遺傳而可決定子孫形體之單位性質也。

「最近之學說，皆以外界之變化，能影響生物一代間其體細胞之形質，但使其生殖細胞內之遺傳物質變化，則不可能。故外界之影響，僅及於不傳後代而僅一代死滅之體細胞；乃限於其生物一代，而不波及於子孫者也。然則應用外界之影響，以計子嗣之改善，真所謂緣木求魚也。吾人以富滋養之食物，新鮮空氣，有規律之生活，確能使虛弱人變為強壯。但此僅限於其人一代；不能由此而同時使彼之子孫亦強壯也。由教育而啓愚者之蒙，由法律而防犯罪者之暴，得宗教而改善惡人，由社會制度之改良而輕滅弱者之窮乏，於某範圍內，固屬可能。但由此而同時使其子孫增智，遏罪，悔惡，免病，則不能也，印於沙上之波痕，每一波去，一波又來，生而復消。人之一生間獲得之性質，世代反覆之大波小波，既生矣，又洗去而無遺痕者也。幾多之競馬，各組常由同一出發點而出發。人類亦無賢無惡，皆每一代有同一之出發點。即生而赤裸之心與體，為彼一生之濫觴。亞里斯多德之子，快非生而具有亞里斯多德之智識也。」

「是故遺傳的單位性質恰如元素，外界之影響，非可變其本性，但受外界之影響，得行適應之反應者也。單位性質決定體細胞形質之際，非為合於定型之方法，乃變通而趨有利之方。外界之作用，得影響於一代間生物者，全不過此變通有利之範圍耳。由環境之如何，教育之如何，由外圍之利害，由感化之善惡，人於某程度

內，得爲善爲惡；但其範圍有限也。所謂上智與下愚不移，此非獨限於上智與下愚也，就一切單位性質言之也。性近習遠之言，不可不謂爲過重外來之影響也。人皆以爲由醫術之進步，使能強壯而有撲滅疾病之力，教育能使人類賢智，宗教法律之力，可變惡人爲善人。自古以來，人皆抱此思想。殊不知任何琢磨，瓦終爲瓦，非玉決無光也。磨固重要，但較此更重要者，不可不有可磨之材料選擇也。世之爲政者、學術者、宗教家、教育家，皆以此材料之選擇等閑視之，而唯腐心於琢磨也。執近以實驗遺傳學說之確實立場，大聲疾呼之人種改善學之聲所驚，彼等始漸由其誤謬之長夢覺醒，而有近世之狀態焉。

「以改善民族，爲可增進社會之安寧福祉之根本，決非始於今日，遠在希臘之古，即可見其實行之跡。但學問的研究此大問題而創現在之所謂優生學或人種改良學 (eugenics) 者，實自英國戈爾登始。故人種改良學以英國爲其策源地。現已流布於世界各國。而因長足進步的實驗遺傳學之助，更與以確定之根據。今則由理論之研究而轉入於實行期矣。其爲實行之先驅者爲美國。美國自一九〇七年以後，即有數州先後制定絕育法律，對於癡狂癡呆及重罪犯人，多施行絕育手術，使終身不能生殖。於男子則斷其輸精管，於女各則斷其輸卵管。手術極爲簡單，以局部麻醉，僅數分鐘即可了事。且生殖腺毫不受害，故性慾無障礙，人道上無可非難者。

「是故戈爾登所壽之人種改良之種子，今已雲蒸龍騰，譬乎爲萬人瞻仰之中心。好學之人，經世之士，莫不企足而期待其開花結實之日也。」（參閱永井潛芳著胡步蟾譯生命論第十四章。）

優生學的真正目標不惟重視死亡的選擇 (fatal selection)，尤特別重視婚姻的選擇 (sexual selection) 和生育的選擇 (reproductive selection)。此三種選擇在人類社會之中第一種選擇是消極的，第二第三兩種選擇始為積極的。第二第三兩種選擇雖有連帶關係，然意義稍有不同。假定最美麗的姻緣雖佔多數而養育太少，最不美麗的姻緣雖佔少數而養育太多，則全社會的生育率仍為反選擇的。故有了選擇的婚姻還要兼有選擇的生育，種族的胚質纔能日趨健全。持自然淘汰或天擇論者往往過於重視死亡的選擇。其實無論在生物界以及人類社會之中，專慕選擇的死亡決不足以促進物種或人種的進化。美國優生學者梭爾茲斯 (S. J. Holmes) 說得好：「自然淘汰論者，通常甚為重視輕的死亡率（即選擇的死亡）。但真正的重要問題不是何種死亡，乃是何種生存，與何種繁衍。因為死不是創造的，生纔是創造的，劣敗與淘汰不能解釋進化的途徑，完成生命和延續生命因素纔能左右進化與適應的途徑。有了一些死亡，不過予生者一種便利。祇可視為進化的一個有用條件，但吾人尚須另外去尋求一切向前向上進化的積極原因，即須努力去尋求各種有機物何以能維持及延續其生命的真因。吾輩人非求得此種真因，必無從了解何以各種有機物能有綿延其生命與族類所必要之各種進步也。吾人對於生物進化史的任何部份如能發明其實在原因，便知其原因實異常複雜。故以自然淘汰解釋進化，祇可視為一個重要的初步解釋。大都不足以闡明進化之真因。惜除自然淘汰之外，縱有其他的進化因素，吾人亦尚難知其底蘊耳。」霍氏並謂：「許多死亡的原因皆與自然淘汰毫無關係。譬如輪船沉沒，火山爆發，以及暴風地震等之傷害人命，皆為非選擇的死亡。又戰爭的死亡亦大半為反選擇的死亡。」

又過於緊張的經濟競爭，亦足使種族遭受退化的影響。英國優生學者柏爾森 (Karl Pearson) 及其同事曾用統計方法，證明自然選擇在人類社會之中，雖為一有效力之因素，但種族並非緣個人與個人競爭生活需要而進化。蓋一切增高劣弱分子的死亡率之社會狀況，同時亦於其他分子甚為不利。故其結果不啻使全羣退化也。一國如有一大部份人民因工業競爭的壓重壓迫而致身力交瘁，另有一更大部份人民亦因生存競爭過於激烈而分別遭受損害，則其國家決難與人民享受遠較高美健全的生活之另一國家共競生存。又一個內部常起內訌鬪爭而致耗盡其聰明才力之國家，必毫無應付一切對外競爭之能力，此種外界的競爭，隨時皆可危及其國家之生存區。」（參閱 S. J. Holmes, *Studies in Evolution and Eugenics*, Chaps. II, and V）

大致社會愈紛亂的國家，其種族反選擇的死亡亦愈大。是以中國今日雖天行異常嚴酷，而種族則并不比歐美諸族更為健全。正如歐美近代天擇的行使，雖隨文明進步而減退，遠不及歐洲中世紀之嚴酷，然近代的人文進化反一日千里，與中世紀的黑暗時代殆不可同年而語。推原其故，顯因黑暗時代的高死亡率中間，有一重大部份皆為非選擇的或反選擇的。譬如中世紀宗教戰爭的死亡，差不多完全是反選擇的死亡，又如武士決鬪就個人勝負言，或為選擇的死亡，就全社會言，仍為反選擇的死亡。因凡有武士資格的人總算是社會中的健者，如果武士時常好勇鬪狠，則全社會壯健分子的死亡率不啻比較增高也。又如重大的瘟疫有時亦不啻強弱智愚，把一個城市的人口掃除大半。可見生存競爭愈激烈和天災人禍愈普遍的國家，其反選擇或反優生的死亡

亦愈多。據英國優生學者柏爾森的計算，歐美現在選擇的死亡率約佔總死亡的百分之六十。至於我們中國現在的人口死亡率是比歐美多數的國家約高一倍，但是選擇的死亡率恐怕不到百分之六十，即非選擇和反選擇的死亡恐怕比歐美還要高些。關於此點，以上第六章已討論及之，茲不復贅。

總之，「死」既不是「創造的」，「生」纔是「創造的」。與其偏重選擇的死，不如注重選擇的生。僅有選擇的死，決不能維持社會的長足進步和種族的長期進化。要有選擇的生，纔能維持社會的長足進步和種族的長期進化。孔子說：「未知生，焉知死。」莊子說：「善吾生者，即所以善吾死也。」霍爾登說：「生物界甚大部份的選擇洵淑肯和平進行，從容實現。所謂生存競爭，優勝劣敗，在許多的物種之中，若僅為其小部份的選擇方法。又所有為爭奪食物或爭奪配偶而互相殘殺的方法，在下等生物之中，或能促進物種的進化，但在文明的人類之中，則行之未見其有利。」中山先生也說：「人類初生之時，亦與禽獸無異。經幾許萬年之進化，而始長成人性，而人類之進化於是乎起源。此期之進化原則，與物種之進化原則不同；物種以競爭為原則，人類則以互助為原則。人類順此原則則昌，不順此原則則亡。此原則行之於人類，當已數十萬年。故人類今日之進化，已超出乎物種原則之上矣。」所以今後的人類無論為「生存」問題，或「求偶」問題，或其他種種的社會問題，均可採用各種更為文明的解決方法；使大家都能豐衣足食，美住利行；男有分，女有歸。祇要社會有了良好的組織，人口有了相當的限制，便可並育而不相害。不必訴諸「磨牙吮血，殺人如麻」或「龍爭虎鬪，勢不兩立」的物競方法。對於「糊口」問題，固然應用互助原則去解決。對於「擇配」問題，今後既女子解放，男女社交自由，雖「不待父

母之命，媒妁之言，已不必「踰東家牆，然後可以得妻。」祇要大家努力「先修其身，」把自己的品行學問和整個的人格通通變好，便可「求得淑女，宜爾室家。」「中情好修，不用行媒。」遇有兩雄求一雌的時候，其最後的選擇權應聽隨女性的自由意志。即失意的人亦祇好成人之美，兒女固要情長，英雄也要氣壯。所謂「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舉凡大丈夫，真男子，祇要自己生活是真實的，心底是光明的，氣概是勇敢的，學行是上進的，意志是堅強的，人格是高貴的，不患不能求得佳偶良緣，永借伉儷，繡秀鍾英，誕降嘉種。此一國善男子善女人最萬美之天職亦最特殊之福利。種族胚質的根本改良，既完全繫於人口各個人遺傳品質的優美良好。擇善之家，必有餘慶；擇不善之家，必有餘殃。所以婚姻要注重「擇善留良；」生育要注重「樹德務滋，除惡務盡。」「多結善果，少種惡因。」國家對於社會中的最低劣份子，尤應設法「絕其本根，勿使能殖，則善者自生。」所謂積極的優生意義不外乎是。

宇宙間祇有一種死亡是創造的。即孔子所謂「殺身成仁」和「朝聞道，夕死可矣」的死，孟子所謂「舍生取義」和「以身殉道」的死，曾子所謂「任重道遠，死而後已」和「臨大節而不可奪」的死，墨子所謂「赴湯蹈火，死不旋踵」的死，禮記所謂「以死勤事」的死，太史公所謂「重於泰山」的死，諸葛武侯所謂「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死，文文山所謂「而今而後，庶幾無愧」的死，史可法所謂「國亡與亡」的死，和中山先生對於黃花崗七十二烈士所謂「以死來喚醒四萬萬人，以死來為四萬萬人服務」的死，以及對於革命軍人所謂「我死則國生」的死。這種的死是本於救世之仁，教人之仁，救國之仁，和救種之仁。這種的死有最積極的意

義，最重大的使命，最熱烈的情感，和最永久的價值。可使河山增色，可與日月爭光。可以教仁教義，可以教孝教忠。可使頑夫廉，懦夫有立志。可使現在未來的人羣社會覺悟蘇醒。可使當時後世的好雄賊子「仔細思量」，可以激發一般人類愛族愛種的觀念。這種的死有振起國魂，挽救頹風，和改變歷史進程的力量，所以是創造的，是光榮的，是神聖的。但是這種的死是凡有血氣所最心痛的死。從救種學者的眼光看來，也是最反優生的死。因為這種的死乃種族的一種重大犧牲，乃人類的一種重大損失。故國家社會對於這種死者之家屬子嗣，應盡量從優撫卹，以示崇德報功而補救種族胚質的損失於萬一。同時我們還要格外努力把國家社會造到能够長治久安萬年有道的境界，使這種最反優生的死亡可以次第免除；則種族人類對於此種最肯為國為種而為真理為主義奮鬥犧牲而能「服千萬人之務，造千萬人之福」的真正偉大人物，均可享受其「生力」的貢獻，不僅享受其「死力」的貢獻。其有造於國家種族與世界文化當更不可限量。孔子說：「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微禹，吾其魚乎。」又說：「民到於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又說：「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詩經說：「人之云亡，邦國殄瘁。」所以一國的各種真正領袖人才應受社會的特別愛護俾能盡力「服衆人之務，造衆人之福。」并多有機會將其優美的天才良好的品質傳諸子孫後裔焉。

## 第九章 習傳良窳文化優劣與種族進化之關係

### 一 習傳的性質和種類

除以上兩章所述自然環境與胚質遺傳兩個重要因素之外，尚有第三個重要因素，亦於種族進化有重大的影響。此第三個重要因素，可總稱之為習傳 (tradition)。習傳與遺傳完全不同。遺傳為種族的，生物的，與生理的。習傳則為社會的，心理的，與文化的。又習傳與自然環境，亦有重要的區別。自然環境，為地理的與氣候的，習傳則為社會的與文化的。故二者對於種族進化的影響，各有不同。種族的盛衰興亡，乃這三個因素，或三種影響的結晶。所以欲斷定一個種族何以進化，何以退化，或一個時代何以興盛，何以衰敗，總要把這三個因素的加以縝密的分析研究，才能够得着種族的正確的解釋。不然，必陷於一元解釋的錯誤。

人類習傳之起源甚為複雜，其種類亦極繁多，並隨社會進化而日積月累，愈演愈繁。人類的習傳，所以比一切下等生物均更複雜，皆因人類的腦力心靈遠較發達。不僅能有直接的感覺，而且能有抽象的思考。自有抽象的思考，而語言文字因以發生。有了語言文字，而抽象的思想復更形發達。許多的意義，許多的情感，許多的觀念，均得自由傳達，自由交換。加以社會愈深演，人與人之關係亦愈密切，許多的風俗制度，皆次第產生。許多的習慣

好尚，與學術技能，皆可自由傳授，自由仿效，自由學習，於是人類的各種習傳愈加豐富。自近世科學昌明，交通便利，地球縮小，各國家民族之接觸日多，各種習傳自由交換自由模仿之機會又更見增多。譬如習太極拳爲固有的習傳，習飛行則爲新添的習傳。又如從前的金蓮舞亦已改爲高跟舞或天足舞。可見習傳常有因仿損益，隨時代而變遷。且今日之人類上下數千年，縱橫五大洲，無論何種習傳，多可自由習得焉。

大致一切壞的習傳，較好的習傳容易仿效。故對於習傳之選擇，不可不慎。我們總要有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的精神，才能把各種習傳次第變好。孔子說：「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又說：「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亦與之俱化矣。與不善人居，如入鮑魚之肆，久而不聞其臭，亦與之俱化矣。丹之所藏者赤，漆之所藏者黑。故君子必慎其所與處者焉。」又說：「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又說：「少成天性，習慣自然。」又說：「誠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墨子亦見染絲者而歎曰：「染於蒼則蒼矣，染於黃則黃矣，所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則爲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非獨染絲爲然也。國亦有染。所染當，故王天下，功名蔽天地。所染不當，故國殘身死，爲天下僇。士亦有染，所染者當，則家日益，身日安，名日榮，處官得其理矣。所染不當，則家日損，身日危，名日辱，處官失其理矣。」又三遷的孟母，對於孟子少時之社會環境亦非常注意。孟子後來在中國文化史上能有重大的貢獻，有些優生學者或完全歸功於孟子遺傳的良好。但吾人平心而論，孟子所以能够成一個「大賢」和能夠「不失其赤子之心」，未始非半由孟母「擇鄰斷機」的督促勉勵有以致之。孟子：「說五殺者種之美者也，苟爲不熟，不如糞禱。」這就是說種子固然

要好，環境亦不可忽視。按孟子因持「性善」之說，容有偏重社會環境而輕視遺傳之處。所以他說：「人性之善也，猶水之就下也，人無有不善，水無有不下。」又說：「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矣，乃所謂善也。若夫爲不善，非才之罪也。」又說：「故凡同類者舉相似也，何獨至於人而疑之，聖人與我同類者。」又說：「富歲子弟多類，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又說：「人皆可以爲堯舜。」都是說人之爲善爲惡，非因本然之性有善惡之分，乃因環境有順逆和習傳有良窳之不同。但孟子也說道：「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桀、紂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又說：「居天下之廣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與民由之，不得志獨行其道，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又說：「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又說：「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又說：「王者之不作，未有疏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又說：「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又說：「有大人之事，又小人之事。」又引伊尹之言曰：「天之生斯民也，使先知覺後知，使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是孟子雖一面承認「人性皆善」，「人皆可以爲堯舜。」但同時也承認人類的秉賦非完全平等。并且覺感「王者之久不作」而慨然以「平治天下」爲己任焉。

至於孔子的學說則似比孟子尤注重遺傳。故祇言「性近習遠」而不言「人性皆善」。并言：「天之生物，因材而篤，裁者培之，傾者覆之。故大德必受命。」又說：「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又說：「唯上知與下愚不移。」又說：「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語上。」但孔子亦深信秉賦較差的人們，倘能因學力行，固有上

達之可能。所以他說：「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爲下矣。」又說：「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又說：「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又說：「若聖與仁，則吾豈敢。抑爲之不厭，誨人不倦，則可謂云爾已矣。」又說：「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我者，其天乎？」按照孔子的教義，人之秉賦雖不皆平等，然在可能範圍之內，得以學力減輕天賦的不平等。不過固有的不平等亦能因習傳的好壞而發生更大的差別耳。

關於習傳的性質，英國人口學者卡爾桑德爾斯曾有很詳細的說明。卡氏略謂：

「習傳乃抽象的思想之產物。人類心靈發達的顯著特徵，厥爲抽象的思想方法。至於抽象的思想方法之所以能充分利用，則有三因：一因人類之天性 (human instincts) 甚爲相近。人類各種同樣的感覺器官對於外界各種物體印象所發生的感應大都相同。(按此與孔子所謂「性相近」和孟子所謂「口之於味有同嗜，耳之於聲有同聽，目之於色有同美」之說正屬相同，譯者附誌) 抽象的思考既以各種感覺器官爲基礎，人類各種天性之相近實於心思之發達，有極大的便利。二因人生的幼稚時期 (the immature period) 較其他各種生物皆延長甚多。故人生的學習期間亦因此加長。三因人類有言語的能力 (the power of speech)。人類有了言語的能力，始有彼此交換抽象的思想之可能。人類有了交換抽象的思想之可能，社會才能有各種的人文進步。」

「在太古幼稚的人類之中，各種抽象的感想或觀念皆極欠明確。這個時期可稱爲渾沌時期。各原始民

族皆屬之。其次則爲常識時期。在此時期之中，各種抽象的觀念逐漸明確，各種的感想亦漸與迷信分開。惟人類的思想雖有相當的進步，亦不過備具各種普通的常識而已。最後則爲科學的時期。在此時期之中，各種有統系的高深思想如科學、哲學、與形上的宗教，乃盡量發達而進行不息焉。（按卡氏這個分期的方法係根據英國社會倫理學者霍布浩士（J. F. Hobhouse）的方法，與中山先生的心理建設第五章對於人類進化所分「不知而行」、「行而後知」與「知而後行」的三個時期約略相當。可以互相參考。又人類各個人的心理建設，大致亦可分爲三期：一爲不知而行的孩提時期，二爲行而後知的少年時期，三爲知而後行的成年時期。不過很多渾沌無知的人，大致終身皆在前兩個時期中過日子。所以中山先生所著心理建設一書，就是要使全國人民都能完成第三期「知而後行」的心理建設，才能夠創造一個三民主義的新國家。譯者附誌。）

「欲明瞭習傳所以爲抽象思想的產物。須首先明瞭語言、風俗、俗諺、制度、典章、用具等，皆可儲存許多的意義。而語言文字尤爲現今儲存抽象意義及傳達抽象意義的最要工具。在人類未有文字及未發明印刷以前，各種抽象的意義大半儲存於各人的記憶之中，借語言的力量而傳達於後代。其次則把許多抽象的意義寄寓於各種儀飾和用具之中，因而傳達於後代。至各種抽象的意義，所以有傳達於當時或後代之可能，則因人類有幾種本然的心理傾向（innate tendencies），如互相仿效，互表同情，和互相提醒（imitation, sympathy, and suggestion），皆爲吸收各種習傳的重要心理作用。至於習傳一經獲得之後，則更有習慣

(Child) 的作用，使之保存勿失，而再傳達於後代。各種習傳既為前代的抽象思想之產物，自然代有增加，愈積愈多。經過一些變更損益而再傳達於後代。

「是以無論何種族在任何時代皆有許多的習傳。此種習傳能影響種族各個人身心應用的程度和方向。譬如魚獵民族普通的身體動作各有不同，而農工商業民族的每日身體動作又各有不同。又一個時代才智運用的程度和方向亦受習傳的影響。譬如所學的語言文字不同，或俗制所規定之學科需要不同，和一個時代的機會及鼓勵方法各有不同，皆足以影響才智運用的程度和方向。又如有些民族保酷愛和平，有些民族則鼓勵爭鬪。凡此種種的習傳，皆足以影響整個民族的感情風尚焉。」

「又一個種族，在一個時代的種種習傳，並可成為種族選擇的標準。在高級種族之中，各階級及各羣組常有習傳之不同。此種階級間的習傳差別雖不如種族間的習傳差別之大相懸殊，但亦能影響種族內部的選擇。在原始社會之中，種族內部的習傳較為一致，故種族與種族間的習傳選擇遠較普通；惟在近代的社會之中則種族內部的習傳，甚不一致，故除種族間的選擇之外，並有階級間的選擇亦頗屬重要。至於選擇之成否，則隨各種族與各階級所有習傳之善惡為轉移焉。」

「總之，習傳實有若干力量，足以左右人類歷史的各種變遷。譬如日本在十九世紀下半所以能一躍而為世界列強之一，顯係大半（如非完全）由於習傳的變更，而非由於種族胚質的變更。日本之維新不外迅速吸收了歐洲的習傳。曠是之故，吾人欲斷定遺傳與習傳孰為重要，頗不易言。大致希望由胚質的變好，以

謀人類種族將來身心的根本健全之人，自係建立良好的基礎。因為須有胚質的健全，乃能有身心的健全；但一切以爲胚質的變更，便可影響社會整個的進化，及左右歷史整個的進程之人，亦不無錯誤。須知歷史的進程，大半根於習傳的變遷，此種習傳的變遷，大都隨胚質變遷爲轉移。譬如德國在十九世紀種種思想行動的重大變遷，與其最後釀成歐洲大戰的慘劇，均係由於習傳的改變，并非由於胚質的改變。故歐洲現在許多急要的社會問題之能否解決，及將來更大的浩劫之能否避免，亦全賴習傳的變更，而不靠胚質的變更。蓋緣人類所積種種的習傳，實能影響個人運用智慧之方向，及範圍個人固有本能之表現也。但一個社會的習傳，如果漸趨於一致，則各個人本能的差別當更爲顯著。現時各種族間的習傳雖尚不一致，而在同一種族中各階級間的習傳則漸趨一致，故各人的天賦本能，遂居主要位置焉。（參閱 Carr-Saunders: *The Population Problem*, Chaps. IV, XXI, and XXII.）

又美國社會學家基定士（F. H. Giddings）在其所著社會學原理一書對於習傳的性質種類亦有詳細的重要說明。基氏略謂：

「社會心理之發達與習傳種類的增多，乃由動物而進於人類的特徵。所謂習傳乃由社會各個人的記憶所傳授下來的智識和信仰之總稱。故社會的習傳又可視爲社會已往的共同經驗，與過去許多世代的輿論之結晶。社會的習傳可分爲三大類。第一類基本的習傳爲經濟的、法律的和政治的（The primary traditions are the economic, the juridical and the political）。第二類的習傳爲個人的、審美的、和宗教

的 (The secondary traditions are the artistic or personal, the aesthetic, and the religious) 第三類的習傳則為神學的、哲學的、和科學的 (The tertiary traditions are the theological, the metaphysical, and the scientific)。

「一切習傳信仰皆常隨新的思想而有變遷，換言之，即習傳常與輿論互相和合，其和合之結果則成為社會的標準、法度、政策、理想、好尚、信仰、信條、及種種的主義 (standards, codes, policies, ideals, tastes, faiths, creeds, and "isms")。譬如經濟的習傳與經濟的思想，和合之結果則成為生活的標準，真正的生活標準，乃係一種經濟的人生觀，所以約束社會的經濟欲望，和經濟行為。又法律的習傳與新的法律和合之結果則成為法典。在民治發達的社會之中，人民公意乃法律所由發生效力的最高權。又政治的習傳與政治的輿論和合之結果則為政策。在政治安定的時代各種政策大半以當時的政治習傳為基礎。但在政治不甚安定或有新的發展之時代，則各種政策多以政治的輿論為指歸。其他各種的習傳亦全賴新的思想和新的主義去分別推進。個人的習傳與新的思想互相和合則成一種理想。審美的習傳與新的審美批評互相和合則成一種好尚。宗教的習傳與新的宗教思想互相和合則成一種信仰。神學的習傳與新的神學思想互相和合則成一種信條。哲學的習傳與新的思想互相和合則成一種主義。至於科學的習傳尤富於去偽存真，毫不妥協的精神。即舊的習傳與新的發明並不互相調和。凡舊的習傳經新的研究證明為真，則存其真；如果後來證明非真，則去其非真。此種去偽存真的結果才是真理。

「上述習傳與輿論的產物祇存在於社會各個人的心中，此種社會心理的共同產物就各個人而論，爲客觀的亦爲主觀的。因爲從一方面看來是社會共同的價值估計。從另一方面看來，也是各個人交互的態度感想。」（參閱 J. H. Giddings: *The Principles of Sociology*, pp. 74, 140-147）

## 二 改進習傳提高文化爲維持種族進化的必要條件

一個國家社會習傳習傳的良窳文化的優劣，時常影響到種族的選擇。所以習傳與文化要優美健全，種族的選擇亦當比較健全。本章所謂「習傳」，係按照最廣的定義立論，差不多與「文化」二字同一意義。吾友許仕廉先生在其所著文化與政治把「文化」二字下了一個定義。他說：「文化者，社會羣生之歷史遺傳也。」又說：「文化是淵源於團體的經驗和知識作用，從心靈所創造或意志所模倣所得，且具有社會價值的一切事物能力的總稱。」（參閱許仕廉著文化與政治第三五及第五十頁）所以我們也可以說：「文化是由社會記憶所傳授下來的各種習傳之總和。」所以我們要推進文化，就要把所有社會的各習傳通通變好。我們要改進中國社會的各種習傳和改進中國民族整個的文化。總要把各種習傳和各種文化事業加以縝密的分析研究，並且要把世界人類所有的習傳和文化來供我們的比較參考。總要能夠一方面發揚我們固有的優點而革除我們固有的弱點；一方面吸收他國文化之所長而捨去其文化之所短。我們的習傳才能次第完全變好；我們的文化才能有不已的顯著進步，而不至宣告破產。我們今後所創造的新文化總要適合世界人類的最高標準，及使

我們的國家民族永遠適於生存。著者常說：「我們要無東無西，擇世界之至善而從；知往知來，審天演之潮流以進。」就是這個意思。近二三百年來歐美文化所以能有長足的進步，其最大原因不外數端：一由於自然科學家 and 社會科學家的絕大努力和絕大貢獻；二由於歐美諸國的文化時常互相接觸，互相鞭策；三由於歐美民族當於勇邁前進和自強不息的精神。至於我們中國的文化所以進步遲較迂緩，其最大原因固然由於政治之不良，但是習傳之泥於舊俗，學術之瀕於破產，思想之故步自封，以及人民之缺乏進取的志願和自強不息的精神，也是其中的幾個大原因。許仕廉先生說得好：

「中國目前最大需要，是思想的徹底。所以國家建設的第一步是思想的建設。不獨中國如是，世界各國莫不在思想徹底之後，始有真正建設之可能。否則思想一日不徹底，社會紛亂亦延長一日。」

「在這個二十世紀民族競爭時代，我們中國人應當睜開眼睛，以批評精神，把中國社會所有的文化事實，一件一件的和其他民族社會的文化事實來比較、估量、選擇。我們比人家優的地方，當然應該保留。我們比人家劣的地方，當然應該放棄。當是非不定，無從判別優劣的地方，可從大多數意見解決之。從國家大致到女子權足，都應該經過這種估量選擇的手續。這是我們研究社會科學和哲學所負的責任。」方針既定，便應想出行行的方法。方法既定，乃請政治家社會服務家及實行家去實行。於是實行家有實行的方向和知識的指導。同時，哲學家科學家的理論，也就漸漸實行了。苟如此做下去，十年之內，中國富強不難比衡歐美各大國。」

「中國推新三十年，尚不能得一個鞏固的政府及安寧的社會，是由於沒有一定改革的方向和知識的

指導。而實行方向和智識指導的缺乏，又由於三十年來哲學家及社會科學家之不盡職。他們之不盡職，由於他們太空泛，把中西文化問題，放在一個錯根基上，根基錯了，討論結果就不免偏錯。中國之亂，誰負其責！

### 三 三民主義指導之下的基本建設

今後的中國既在中山先生的建國方略，建國大綱和三民主義指導之下，自然不會再如許仕廉先生所說毫無「一定改革的方向和知識的指導」，但是我們有了先知先覺的發明家，給我們很多的重要發明，還望有許多後知後覺的贊成人努力去宣傳。和更多的實行家努力去實行。我們有了統一的意志，統一的思想，統一的主義，統一的信仰，統一的力量，和統一的目標。不患不能統一中國，和改良中國，不患不能從政治上、經濟上、學術上、文化上，把整個的國家社會建設起來，並使我們整個民族的習傳和品質都次第變好。

中山先生的建國方案，博大弘遠，精密周詳，經緯萬端，有條不紊。綜其建設的根本大計畫，共分四大部份：一為建心理設，二為物質建設，三為社會建設，四為國家建設。所以中山先生不但注重政治的和經濟的根本改造，而且注重整個民族國家社會心理的、思想的、和文化的根本改造。他是從國家大政，地方自治，羣衆生命，民族生存，到適尼，納妾，賣兒，溺女，吸食鴉片，崇拜偶像，都要一一加以根本改革。所以中山先生不但是政治的和經濟的大革命家，也是思想的和社會的大革命家。茲將中山先生建設方案之大者遠者列表如下：

#### 一、心理建設 行易知難。

(甲)行之非艱，知之惟艱的種種鐵證。

(乙)人類的進化分三時期：

(一)由草昧進文明，爲不知而行之時期。

(二)由文明再進文明，爲行而後知之時期。

(三)自科學發明以後，爲知而後行之時期。

(丙)文明之進化成於三系之人。

(一)先知先覺，爲深思創造的發明家。

(二)後知後覺，爲仿效推行的宣傳家。

(三)不知不覺，爲竭力樂成的實行家。

(丁)求知方法。

(一)學貴知其當然，與其所以然。

(二)科學爲統系之學，條種之學。凡真知特識必從科學而來，捨科學而外之所謂知識，多非真知識，

(戊)能知必能行。

(一)科學昌明之世，凡造作事物者，必先求知而後乃從事於行，是以事半功倍。

(二)前此破壞之革命成功而建設之革命失敗，乃由於知與不知之故。

(三) 凡知爲必要之事，必能行之。故曰「能知必能行」。  
(四) 不知亦能行。

(一) 人類之進步，皆發軔於不知而行，故不知而行，乃人類進化必要之門徑。

(二) 習練、試驗、探索、冒險，四者皆爲行其所不知。

(三) 今日圖治之道，與利尙可緩，除害尤宜急。中國今日貧弱至是，乃官吏貪污政治腐敗爲之害。倘此害一除，則致中國於富強，實頭頭是道。

(四) 革命之後，人民爲主，官吏爲僕，爲人民者祇知除害足矣。爲此需要不必待於普通教育科學知識，凡人有切身利害皆能知能行。國害一除，國利自興。富強之基，於是乎立。

(五) 中國今日欲迅速開發富源，立救貧弱，莫如歡迎外資外才以發展我之生產事業。所謂「治本爲先，救窮宜急」。「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實業發達，民生暢遂，教育自可普及。故曰「不知亦能行」。

(庚) 有志竟成。

(一) 凡事順乎天理，應乎人情，適乎世界潮流，合乎人羣需要，而爲先知先覺者所決志行之，斷無不成。古今之革命維新興邦建國等事業，莫不皆然。

(二) 中國革命幸已達破壞之成功，建設事業雖未就緒，然希望日佳，終必達完成目的。

二、物質建設 實業計畫（本書第一章已略為述及）。

三、社會建設 民權初步。

（甲）中國四萬萬民衆等於一盤散沙，乃由於異族專制有以致之，滿清之世，集會有禁，文字成獄，偶語棄市，人民之集會自由，出版自由，思想自由，皆削奪淨盡。是以人心渙散，民力不團結。

（乙）今後民國安危，全視民權發達如何，必使選舉、罷免、創制、複決四大民權充分發達，方得謂為純粹之民國。

（丙）欲發達民權，必從團結人心糾合羣力始。欲團結人心糾合羣力，非從集合不為功。集會為發達民權之第一步。

（丁）民權初步一書，所以教國民行使民權之第一步。凡欲知集會之原則條理，欲具集會之習慣經驗者，不可不習此書，使成為一普通常識。

四、國家建設。

（甲）民族主義。

（一）民族是由「王道」自然力結合而成的，國家是由「霸道」人為力結合而成的。按照中國歷史上社會習慣諸情形，「民族主義」就是「國族主義」。

（二）中國人數最多，民族最大，但是只有「家族主義」和「宗族主義」，沒有「民族主義」，所以欲教

中國，便要提倡「民族主義」用「民族精神」來救國。

(三)中國民族現時的危險是受天然力與外國的政治力和經濟力三種的壓迫。所以爲中國民族前途設想，就應該設法去打銷這三個力量。

(四)「民族主義」是國家圖發達和種族圖生存的寶貝。中國的「民族思想」因受異族征服，銷滅了幾百年。所以近百年來又受「帝國主義」的壓迫。

(五)受屈的中國民族，必首先恢復我們民族自由平等的地位，才配得來講「世界主義」去爲世界上的人打不平。

(六)要恢復「民族主義」應該把我們固有的道德智識和能力一齊恢復起來，同時也要去學歐美之所長，才能够和歐美並駕齊驅。要學外國，總要迎頭趕上去，不要向後跟着他們。總要學得比外國還要好，所謂「後來者居上」。

(七)中國恢復到頭一個強國的地位，便要「濟弱扶傾」用固有的道德和平做基礎，去統一世界，促進大同，便是我們「民族的真精神」。

#### (乙)民權主義。

(一)「民權」是人民的政治力量。「政」是衆人的事，「治」是管理。管理衆人的事便是「政治」。有管理衆人之事的力量便是「政權」。以人民管理政事，便叫做「民權」。

(二)「民權」的作用是要來維持人類的生存。人類要能夠生存就須兩件最大的事，第一件是保，第二件是養。保就是自衛，養就是覓食。人類的保養和動物的保養衝突，便發生競爭，人類要在競爭中求生存便要奮鬥。所以「權」是人類用來奮鬥的。

(三)「民權」不是天生出來的，是時勢和潮流所造就出來的。現在世界的潮流已到了「民權時代」。所以在三十年前，革命同志便下了決心主張要中國強盛，非提倡「民權」不可。因為「民權」是提倡人民在政治上之地位都是平等的。

(四)中國自秦以後，歷代的君主專制，都是祇顧保守皇位，並不理民事，祇要人民納糧，其餘都是聽人民自生自滅。人民各人的「自由」，大多沒有團體，沒有抵抗力，「一片散沙」。所以受外國帝國主義政治的侵略和經濟的壓迫，欲矯此弊，就要把「自由」這個名詞用到國家身上去。個人不可太過「自由」，國家要得完全「自由」。到了國家能夠行動「自由」，中國便是強盛的國家，中國民族才真能自由。

(五)自人類初生幾百萬年以前推到近來「民權」萌芽時代，從沒有見過天賦有「平等」的道理。天生萬物，固然沒有「平等」，天生人類，本來也是不平等的。到了人類專制發達以後，更造成一些人為的不平等。所以要講「民權平等」，同時又要世界有進步。便要使人民在政治上的地位「平等」。即祇是去掉人為的不平等，而使各人在政治上的立足點都是「平等」，才是自然之真理。

(六)世界人類其得之天賦者約分三種：有先知先覺者，有後知後覺者，有不知不覺者。先知先覺者為發

明家，後知後覺者爲宣傳家，不知不覺者爲實行家。欲謂和三種之人使之「平等」，則人人當以服務爲目的，而不以奪取爲目的。聰明才力愈大者，當盡其能力以服千萬人之務，造千萬人之福，聰明才力略小者，當盡其能力以服十百人之務，造十百之福。至於全無聰明才力者，亦當盡一己之能力，以服一人之務，造一人之福。故天賦的聰明才力雖有不等，而人之服務道德心發達，必可使之成爲「平等」，這就是「平等」之精義。

(七)國家的政治大權要分開成兩個：一個是「政權」，要把這個「政權」完全交到人民手內，要人民有充分的「政權」，直接去管理國事，這個「政權」便是「民權」。一個是「治權」，要把這個大權完全交到政府的機關之內，要政府有很大的力量去治理全國事務，這個「治權」便是「政府權」。

(八)民權要有四個：即「選舉權」、「罷免權」、「創制權」、「複決權」。治權要有五個：即「行政權」、「立法權」、「司法權」、「考試權」、「監察權」。用人民的四個政權來管理政府的五個治權，才算是一個完全的「民權政治機關」。因爲人民是要有「權」去管理政府，政府是要有「能」去爲人民謀幸福。中國能夠實行這種「政權」和「治權」，便可以破天荒在地球上造成一個新世界。

#### (丙)民生主義。

(一)「民生」的意義就是「人民的生活」，「社會的生存」，「國民的生計」，「羣衆的生命」。「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又名「共產主義」即是「大同主義」。

(二)「民生」是「社會進化」的重心，「社會進化」又爲「歷史」的重心。「歷史」的重心是「民

生，」不是物質，所以用「民生」這兩個字來包括「社會問題」較之用「社會」或「共產」等名詞為適當，切實而且明確。

(三) 社會之所以有進化，是由於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相調和，不是由於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有衝突。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相調和，就是為大多數謀利益；大多數有利益，社會才有進步。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之所以要調和的原因，就是因為要解決人類的生存問題。古今一切人類之所以要努力，就是因為要求生存。人類因為要有不間斷的生存，所以社會才有不停止的進化。所以社會進化的定律是人類求生存。人類求生存才是社會進化的原因，階級戰爭，不是社會進化的原因。階級戰爭祇是社會當進化的時候所發生的一種病症。這種病症的原因，是人類不能生存。因為人類不能生存，所以這種病症的結果，便起戰爭。所以「民生問題」才是社會進化的原動力，從前的「社會主義」錯誤物質是歷史的中心，所以有了種種紛亂。我們現在解除社會中的紛亂，便要改正這種錯誤，再不可說物質問題是歷史的中心，要把歷史上的政治和社會經濟種種中心都歸之於「民生問題」，以「民生」為社會歷史的中心。先把中心的「民生問題」研究清楚，然後對於社會問題才有解決的辦法！

(四) 「民生主義」的辦法是國民黨老早就確定的。一個是平均地權，一個是節制資本。只要照這兩個辦法，便可以解決中國的「民生」問題。平均地權是由政府照地主所報地價抽稅或收買。除私人的人工改良及地面建築之外，凡因社會改良和工商業進步所增高之地價均完全提歸公有。節制資本在消極方面是

要節制私人資本，在積極方面是要發達國家資本。使生產和分配問題都能夠圓滿解決。

(五)「民生主義」就是「社會主義」就是「共產主義」這種「共產主義」的制度，并不是由馬克思才發明出來的。當原始人類發生的時候便有此種制度，人類最先所成的社會，就是一個「共產社會」。所以原人時代已經是「共產」時代。即現在非洲和南洋羣島那些土人生番的社會制度也通稱是「共產」可見我們祖先的社會一定也是「共產」的。

(六)「共產主義」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義」是「共產」的實行，兩種主義沒有甚麼分別。要分別的還在方法。

(七)三民主義的意思，就是民有民治民享。這個民有民治民享的意思，就是國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才是真正達到民生主義的目的。這就是孔子所希望之大同世界。

(八)「民生主義」和「資本主義」根本不同的地方是「資本主義」以賺錢為目的，「民生主義」則以養民為目的。所以「民生主義」不但注重生產問題，同時也注重分配問題。

#### 五、建國大綱 凡二十五條。

第一條至第五條宣布革命之主義及內容。

第五條以下則為實行之方法與步驟。

#### 六、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

第九章 習俗民風文化優劣與種族進化之關係

(甲)國民黨之主義。

(一)民族主義。

(二)民權主義。

(三)民生主義。

(乙)國民黨之政綱。

(子)對外政策凡七條。

(丑)對內政策凡十五條。

七、地方自治開始實行法。

(甲)開始試辦之六事如左：

(一)清戶口。

(二)立機關。

(三)定地價。

(四)修道路。

(五)墾荒地。

(六)設學校。

(乙)其他應由地方自治團體次第興辦之要事則爲農業合作、工業合作、交易合作、銀行合作、保險合作等。務使地方自治團體不止爲一政治組織，亦爲一經濟組織。

#### 八、中國革命史。

(一)革命之主義。

(二)革命之方略。

(三)革命之運動。

(四)辛亥之役。

(五)討袁之役。

(六)結論。

#### 九、中山先生自傳。

十、中山先生其他著作演講及宣言。

十一、孫逸仙傳記。

十二、中山先生年譜。

按中山先生的國家建設一書，共分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義、五權憲法、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外交政策、國防計畫八冊。關於民生主義只成四講，在未講之目錄中，間尚有住居、養生、送死及民生主義結論，三民主義結

論諸篇，情無遺稿。中山先生國家建設自序云：「其他（五權憲法，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外交政策，國防計畫。）各册於思想之線索，研究之門徑，亦大略規畫就緒。俟有餘暇，便可執筆直書，無待思索。方擬全書告竣，乃出面問世，不期民國十一年六月十六日陳炯明叛變，砲擊觀音山，竟將數年心血所成之各種草稿，並備參考之西籍數百種，悉被燬去，殊可痛恨。」可見當時的稿件損失至大且巨。幸中山先生尚有關於這五個問題之其他著述宣言及講演記錄甚多，故同志讀者不難舉一反三，致知力行，努力去完成各種建設的革命工作，以竟中山先生未竟之志。邵元冲先生說得好：「要想從政治上、經濟上、社會上、文化上，將整個的民族和國家建設起來，本是一件偉大而艱難的事。但如果成功了以後，在歷史上也是空前的一頁。我們看了各國建設的成功，無有不經過精密的設計和艱難的奮鬥，一方面來打破舊環境舊習慣，一方面來創造新制度新社會。凡是經過愈艱難的，其成功就亦大。我們一定要不畏難，不草率，腳踏實地步步的走到成功的路上去。」（見邵元冲著建國之路第十三頁）自然中山全集中的各種重要設計，當實施的時候，在不背三民主義範圍之內都要因時因勢再經一度很精密的斟酌損益，才能推行盡利。中山先生的國家建設自序中就說道：「尙望同志讀者本此基礎，觸類引伸，匡補闕遺，更正條理，使成一完善之書，以作宣傳之課本。」又物質建設自序中也說道：「此書爲實業計畫之大方針，爲國家經濟之大政策而已，至其實施之細密計畫，必當再經一度專門名家之調查，科學實驗之審定，乃可從事。故所舉之計畫當有種種之變更改良。讀者幸毋以此書爲一成不易之論，庶乎可。」所以善讀中山先生遺著的人，總要當做一部日新又新與時進化的革命理論去讀，不要當做一部應試科舉的八股文去讀，庶幾近之。

我們瀏覽中山全集，覺得中山先生的思想線索極爲精密周詳。其中祇有「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的那一句話在斷章取義的青年讀者，或不免發生誤解。但是中山先生固很明白的說道：「共產主義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義是共產的實行。所以兩種主義沒有什麼分別，要分別的還是在方法。」又說：「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這種共產主義的制度并不是由馬克思才發明出來的。當原始人類發生的時候，便有這種制度，便是實行共產。我們可以考察現在非洲和南洋羣島的土人生番通通是共產。可見我們祖先的社會一定也是共產的。」又說：「共產主義之實行，並非創自俄國。我國數十年前洪秀全在太平天國已經實行，且其功效較俄國尤大。後爲英國戈登所破壞，故今日無從考察。」又說：「民生主義就是大同主義，民生主義的目的，就是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可見中山先生是承認「民生主義」和「共產主義」有一個完全相同的目標，這個相同的目標都是「要使人民不致受財產分配不均的痛苦。」不過中山先生是根本否認馬克思的「唯物主義」和「階級戰爭。」并且再三說明「社會之所以進化，是由於大多數的經濟利益相調和，不是由於大多數的經濟利益相衝突。」所以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可以說是「王道」的共產主義，不是「霸道」的共產主義，是孔子的大同主義，不是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甚望青年同志把這個分別認得十二分清楚，才不會誤入歧途。明達如許仕廉先生可惜也說道：「三民主義及建國大綱，對於種種經濟社會改革實在問題，不免有模糊處，如是左右兩派，各有不同的解釋，其結果是國民黨左右的分裂。」其實國民黨之「左右分裂」大都由於故鬧意見，互爭雄長，祇可以說各人自己的良心「不免有模糊處」，那裏能夠說中山先生的主義「不免有模糊處」呢？中山先

生說：「革命要革心。」所以大家祇要良心不模糊，則對於三民主義的解釋也就不會模糊了。

簡切言之，三民主義的最高使命不外創造新的民族習傳，新的政治習傳，和新的社會習傳或生活習傳，把我們整個民族的文化標準和人生標準都盡量提高，使國家種族永久適存於世界；然後本此主義，本此基礎，本此精神，本此力量，去促進世界的統一和人類的大同。中山先生說：「一個民族的存在和發展，要以自信力為基礎。」所以我們很希望凡在「青天白日」底下的國民，大家都見解要真，信仰要專，自知要明。人人都要充分了解三民主義的真意義，並且要本三民主義的基礎發揮而光大之，俾由心理建設以達到實際建設，由國家建設以達到世界建設，由民族建設，以達到人類建設。不必見異思遷，朝秦暮楚；不必徘徊歧路，自暴自棄。我們無論黨員與非黨員都要自己預備去做黨治後面的主人翁，預備去做四萬萬聖主明王之一。因為黨治的最後目的就是要以民治國，和天下為公。中山先生說：「一人一家沒有飯吃，很容易解決，要全國人民都有飯吃，四萬萬人都足食，便不容易解決。」我們也可以說：「一人一家不能了解三民主義很容易解決，四萬萬人或八千萬家都要了解三民主義，便不容易解決。」我們國人現時鬧吃飯的饑荒，也鬧知識的饑荒。所以實在不配談甚麼「打倒有產階級和知識階級」。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不但要使人人有飯吃，而且是要使人人有知識。按照中山先生的意見，這步工作要三十年才能成功。所以連吳稚暉先生都願意把「少則五百年，多則三千年，才能成功的無政府主義」暫行置之高閣，來為三民主義「拔刀相助」。並且說道：「我個人最少能占這三十年的一部，我也當盡我的力，在這一部份時間內，與大家共同奮鬥。」為什麼一般「能占這三十年的全部份」的青年和壯

年反不願意犧牲自己的偏見，偏要徘徊歧路，別有企圖，不肯去一致努力共同奮鬥，「一德一心，立定厥功」呢？孟子說：「是亦不可已乎？」此之謂失其本心。」所以我們很希望革命同志邦人諸友，大家都要「不失其本心」才好哩！至於貪官污吏，腐化分子，和見利忘義只管一家富，不管一路哭的人們，也應痛改前非，迷自反省！總要大家少種惡因，才能多結善果。總要根本掃除「天下爲家」的觀念，才能樹立「天下一家」的楷模。我們耍能夠創造各種嶄新的良好習傳，才能够維持國家民族於不墜。所謂「移風易俗天下皆寧。」改良習傳俗制與提高文化道德之關係民族前途有如此者。

## 第十章 生育革命的積極意義博愛精神和科學基礎

一般反對生育革命的人們，都以爲生育限制是消極的，不是積極的。但是對於人口增加的法則與人類生活的物質需要稍有研究的人，和要想解除人類社會的根本亂源，及維持人類種族的長期進化的，都承認生育革命是有最積極的意義最博愛的精神和最科學的基礎。自從歐洲大戰期內以及歐戰告終以來，歐洲學者對於人口問題的研究是非常努力，非常認真，非常縝密，非常遠大。即思想比較落後的日本學者，對於這個問題也漸加注意，祇有我們「地大物博」的中國學者大半還是因襲宗法社會的舊思想。但是如果問道：中國的地如何的大物如何的博？土地與人口比例如何？可耕之地約有若干？如何使國富的增加速於人口的增加？如何使各種的富源能夠節節利用？以及人口已否超過最適宜的限度？恐怕大家都莫明其妙。又如問道：中國何以內亂獨多？饑饉獨多？失業的人獨多？無教育的人獨多？軍閥獨多？土匪獨多？貪官污吏獨多？土豪劣紳獨多？腐化惡化獨多？社會罪孽獨多？天災人禍獨多？疾病死亡獨多？不平等條約獨多？學術文化何以落後？以及我們整個的民族何以貧弱不競？恐怕大家也是莫明其妙。有些人以爲中國的亂源都是由於帝國主義的壓迫。但是帝國主義者何以能夠以小役大，以寡犯衆，和以後進壓迫先進呢？可見我們不能用外因來解釋中國的貧弱。中國的貧弱自有其更爲複雜而更爲重大的內因。據我們的觀察，各種內因之最大者莫如「無教無養的小孩子的哭聲比別的

國家獨多。」這種哭聲是比帝國主義者的軍艦在我們的領海內河所發出的砲聲，尤令人感覺不安。因為這種哭聲就是一個民族毫無遠識慮的顯者表徵。孔子說：「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西諺說：「無遠識者國族恆亡。」所以外國軍艦在我們的領海內地演習射擊，是有目標的，不是亂來的。他們的目標不外「覺弱攻昧，取亂侮亡」。他們鑒於中國人的生命最賤，所以不妨把我們「次殖民地」的土人來作他們打靶的目標。譬如山東的濟南，四川的萬縣，江蘇的上海南京，都是人稠稠密之區，然而帝國主義者都可以隨意開放大砲，演習打靶，旁若無人。一般以衆民爲可恃的國人應該澈底覺悟了！拿破崙說：「軍中戰術，每十年而一變。」現時用密集隊來進攻敵人的方法在戰術中早已不能適用，而代以展開的進攻方法了。人口政策雖不必每十年而一變，但至少也應審時度勢，和根據科學之原則，「窮則變，變則通。」以期全國的人口密度最能適合國家種族的適存點和全民幸福的最高點，斯爲得策。舊時早婚繁育，添子益孫多多益善的辦法無論從國防方面，經濟方面，社會方面，種族方面及其他方面着想，均已不適用了。現時世界學術進步，一日千里，各種新的人口理則，實送較縝密深邃，更能適應時代之要求，及維持人類之進化。所以現在不憚煩瑣要將生育革命的積極使命博愛精神和科學基礎再行反復言之。

## 一 普遍的生育革命可以免除國際的競爭……點齊一國際的文化進差以促進世界的大同

現時國際的競爭，實以人口問題或盲目的提倡增加人口爲其主要原因之一，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英國人口學者柯克斯說：

「因政治野心而提倡增加人口，因人口增加而圖謀經濟的擴張和感覺疆土的飢荒，乃戰爭必然的原因。只有把個人的「獸性」設法截住，方可除却國際衝突的大源。不幸各國多數的人民（尤其是政治上的領袖人物），對於這個問題都只朝着相反的方面進行。他們開始就武斷以爲無論如何國際戰爭總不免要時常發生的，隨着就說各國都應盡力多生小孩，子才能夠去抵制別國。每個國家既然都是這樣要求一更大的人口，預備供將來的大戰來屠戮，於是男男女女都儘量來使用他們的生殖力。這樣的做去，轉瞬就把人口增加到很大，面面相對，無地可居，祇有兩條路在他們面前，便是「飢餓和戰場。」於是他們的領袖人物就出來說道：「我們的人口是這樣多了，我們必須用戰爭來開疆拓土，找一條出路呵！」一到戰爭發生，他們又換一個論調說道：「我們必須多生些小孩子，預備第二次的戰爭吧！」所以除非各國大家訂約各負一種道德上的責任去限制人口，才能夠免却和鄰國爭鬥。不然，這種因人口過增而起迭的戰爭，是永不會終止的。」（見柯克斯所著人口問題第三章戰爭與人口。）

又國民黨先烈朱執信先生也說：

「現在的人動不動都講強種強國。自己一族的人想他一天多過一天，自己一族人所占的土地，也想一天多過一天。這就是所謂大什麼主義，大什麼主義，帝國主義了。如果這一班人能登再稍微進步一點，想着自己

只管把別人逼壓服了，自己子孫布滿世界。幾萬年後，還是自己的子孫和自己的子孫爭麵包拚命。或者也會有自己的子孫和自己的子孫，你吃我我吃你的時候。一定會把現在那一種與會淋漓的帝國主義，大什麼主義丟下了。這是可以有的事。但是這個問題，還沒有解決的。因為現在一班人還在那顛倒夢想一族支配全球的時候。（見宋執信集下卷人類的將來。）

又日人安部磯雄氏所著產兒限制論裏頭也說道：

「歐洲的戰爭實以德國的人口增加為原因的第一位。假使德國在幾十年以前講求了人口限制的方法，此次歐洲戰爭或者不至於發生了。現在日本也和戰前的德國處在一樣的境遇，也不得不費心解決人口問題了。無論日美問題或日華問題，都是與人口問題有關係的地方居多。我國若不斷然講求限制人口的方法，果能放棄對於滿洲蒙古和西伯利亞的領土野心嗎？我對於這點不能不感着不安了。」

「我國所惹起的國際問題，不僅在東亞方面，即在美國，也成了很煩惱的問題。加州日僑之數雖不過六七萬，而他們的蕃殖力的可怕，也是一個被排斥的理由。又布哇地方日本的人口問題也視為非常重要，現在稱為文明國的第一流的國家，普通生育率，每千人中不過三十人，而布哇地方日本人的生育率每千人中竟達五十人。因此布哇地方的美國人對此也深感不安。現在住美國太平洋沿岸的日僑約有十萬，布哇的日僑約有十一萬。區區二十萬人移到外國，已經惹起現在這樣的國際問題，若是把我們每年多生的過剩人口六七十萬都移到外國去，一定要惹起更多的國際問題了。這究竟是我國所採取的好方法嗎？」

「因人口問題惹起國際問題，並非上策。我們爲世界平和計，必須廢止這種煩惱的國際關係。而欲使國際關係圓滿進行，各國都應該解決自己的人口問題。要把國內的人口限制到本國能夠贍養的程度纔好。換句話說，本國人口若增到本國國土所不能贍養的程度，便是不道德的行爲，便是國家的大辱。若是一個人自己養出不能贍養的孩子，便是不負責任的人，就應受攻擊，這種人若因小孩太多累及親戚，他就該怎樣受人批評呢？若是國家也和個人一樣，把增加的人口移到外國去，也是同樣要受非難的。」（見原書第九章李達譯本）

按日本在中國的僑民據民國十三年調查共有二十二萬餘人，其中有十八萬人居於南滿鐵道一帶。據最近報載，此項在華日僑總數已增至二十五萬左右，而在東三省方面的日僑則已超過二十萬，且有逐年增加之勢。這種情形當然使我們國人非常感覺不安。因爲日本既抱有種種侵略的野心，竭力提倡向外殖民，同時他們對於限制人口一層復未能充分注意。日本的生育限制運動，對於一般民衆尙很少成績。日本政府雖然特派了一個委員會研究人口問題，然而該國內的輿論在傳統的軍閥主義之下，對於用生育限制來解決人口問題的辦法，似乎還不甚贊成。（參閱 E. B. Reuter, *Population Problems*, p. 180. 及立法院統計月報第一卷第三期第五十九頁戰後人口問題研究的趨勢，美國 A. B. Wolfe 原著孫拯譯）日本人的生育率 and 自然增加率現時都還是很高。他們的生育率是常在百分之三十五左右，他們的自然的增加率是常在百分之十二乃至十四以上。在華日僑的蕃殖力當然也是很快，何況他們還有自己的火車輪船隨時運送人口入境呢？我們

國人千萬不要以為區區二十餘萬的日人移住我們的東三省，不算什麼要緊。須知二十五萬人每年按千分之十二至十四的速率在一百年間便可增加到八十多萬乃至一百萬以上之鉅數。此外據我國報紙的記載東三省尚有朝鮮人七十八萬，俄國人二十三十萬。（參閱新紀元週報第一卷第十一號張伯塔博士之滿洲現狀及中國評論週報第二卷第四十四期潘光巨著 *Japanese and Korean Immigration into Manchuria*）而田中義一前年上日皇的密奏則謂：「今日在東三省之朝鮮民幾百萬有奇」（見時事月報第一卷第二期第五頁）故日俄及朝鮮人之在東三省者總計當已超過一百五十萬以上。如果這些外僑悉按千分之二十至十四的速率逐年增加，則每五十年便可加倍。這還是假定以後不再有外僑入境。所以我們政府今後對於白色帝國主義者和赤色帝國主義者的移民入境均應迅速設法嚴加取締制裁。如其不然，轉瞬便會發生國際上種族上政治上和經濟上很重大的糾紛，這是可以斷言的。

我們為太和民族計，最好是採用普遍的生育節制，以調劑其人口的過剩。這是唯一的根本救濟方法。因為按照日本的國勢，實無再行加大人口之必要。孫哲生先生說得好：「日本縱不侵略滿蒙，並不會使其民族消滅的，並不會使其國家不存在的。故我國反抗其帝國主義的侵略，並不予日本以致命傷。所以我們民族主義力量之發展與外國民族，並沒有妨害的。」至於日本的移民和侵略政策當然於我們民族生存上和國家主權上都有很大的妨害。我們不得不採取自衛的手段。為什麼日本民族不去自行限制生育，偏要把他們的人口增加到本國國土所不能供養的程度，來強迫我們中國友邦去替他們供養呢？豈不是安部磯雄氏所謂：「不道德的行政

爲，和國家的大辱」嗎？美國俄海約大學經濟教授歐爾夫說得好：「一個國家總要自己去維持其最適宜的人口密度。凡已達到最適宜的人口密度之國家實有正當理由禁止外國移民入境。無論何國皆無收容他國的剩餘人口之義務。」又美國哈佛大學教授伊士特也說：「凡因人口太密迫於經濟需要而向外國移民的辦法，決不能使本國人口有永久的救濟，因爲接踵而至的高生育使本國人口轉瞬又復到原有的狀態。這是人口學鼻祖馬爾薩斯的第二人口法則。換言之，即戰爭饑饉和移民皆祇能消滅人口壓迫於一時。大致人口消減一分，生育率立刻高漲一分。所以不久又回到原來的狀況。譬如意大利是年年輸送大批移民出境，而意大利今日的人口壓迫則並未消滅絲毫。所以移民出境猶如從有流泉的水池中掬水一樣。一面取出，一面流入，而原來的水平面則依然如故。」（參閱 T. M. East: Heredity and Human Affairs, pp. 273-274）所以野心勃勃而同時自己的人口復已超過本國國土所能供給的國家，如今日之日本和意大利，如果自己不去「限制天公移民入境」，而祇想把自己所不需要的人口向外國移植，這種國家不但是國際間最不道德的搗亂分子，而且他們本國早速必有因人口問題而淪於塞爾菲米尼教授（Prof. Gaetano Salvemini）所謂「飢餓和無政府狀態」的一天。這是我們可以預料的。（參閱建國週刊第三十七期意大利的人口過剩問題漢鐘譯）所以塞蒂君說：「日本欲調劑人口過剩，根本的解決方法，最好是生育節制。」（建國週刊第三十五期第二十一頁）又王勳堉君更詳細說道：「二十餘年來日本政府之移民計畫，已不知多少，迨其終極，則皆等於具文。日本欲從移民以解決人口過剩問題，恐亦終成畫餅矣。欲解決人口問題，其惟節制生育一道乎？三年以前，日人對於節

制生育，皆認爲一種危險思想。然自一九二六年以降，經日本各大學教授之討論，咸認此爲解決人口匱乏之惟一方法。自是以還，日本之觀念一變，節制生育運動，遂成長足之進步。報紙雜誌，雖尙多所討論，而一般經濟學家，則皆竭力贊助。最近東京帝大與早稻田大學之教授，亦曾有一度之辯論。政府對此亦有相當之認識，數年以後，節制生育，終將成爲日本最努力之一種運動。日本之人口問題，或將藉此而得其解決之道乎？（地理雜誌第一卷第二期王勳堵著日本之人口問題）日本如必欲延續其傳統的移民和侵略政策，亦應轉向英俄兩國的屬地發展方爲合理。因爲現時國際上只有兩個最大的地主：一個就是英國，一個就是蘇俄。這兩個國家，一個是白色帝國主義的雄長。一個是赤色帝國主義的領袖，他們兩國的土地是差不多奄有地球面積之半，英國的屬地約等於母國面積的一百零二倍，而俄屬西伯利亞則約等於歐洲俄國面積的三倍。日本如果要顯其本領，就要努力去打破這兩個國際上的最大地主的土地壟斷，才能促進世界的和平及增進太和民族永久的光榮。日本如能爲亞洲被壓迫的民族來打不平，來謀解放，日本民族是不會滅亡的。日本若是用霸道來壓迫亞洲的各民族，終久是要失敗的。中山先生說得好：「我們講『大亞洲主義』，以王道爲基礎，是爲打不平。你們日本民族既得到歐美的霸道文化，又有亞洲王道文化爲本質。從今以後，對於世界文化的前途，究竟是做西方霸道的鷹犬，或是做東方王道的干城就在你們日本國民去詳審慎擇！」

至於爲中國民族計，我們無論是要對付白色帝國主義者或赤色帝國主義者，都不在於努力去提倡增加人口，因爲中國現時所最需要的不是人口數量的增多，乃是民族自衛力量的加大，和國家文化的提高。我們現

在的人口數量，約十一倍於法蘭西，九倍半於英倫三島，七倍半於日本，七倍於德國，四倍於美國，二倍半於蘇俄。我們自衛的力量也應比照加倍，國家種族才有健全的生存發展。我們聽見日本的人口每年增加六七十萬，以為很不得了；孰知中國的人口每年增加四五百萬，是更不得了！所以中國要想用增加人口的方法來強國強種，直無異緣木求魚。須知種族自衛的力量決不能專靠人數的優越。我們山東的人口是比日本還要稠密，但是我們并不能禁止日本的蹂躪。我們東三省人口的平均密度也已經超過美國人口的平均密度約五分之二，但是我們也不能抵抗赤白帝國主義者的侵略。又如英國的澳洲，加拿大，和俄國的西伯利亞，人口比我們的東三省還要稀少得多，為什麼日本人不敢去侵略他們呢？可見先哲所謂「存亡在虛實而不在衆寡。」和「民衆而不用者與無民同。」那兩句話是很有道理。我們總要造到柯克斯所謂「大家情願戰死而不願以疆土的任何部份屈服於外來的新侵略人種」的時候，我們領土的完整才能夠保全。我們民族的生命才能够永續。所以移民實邊自然是很好的政策，但是同時也要盡量提高人民的知識程度和自治能力，及嚴密邊境之國防設施和增大大國家的自衛力量，然後邊民的生命財產與幸福自由才有確實的保障。如其不然，移民實邊的政策必難有很大的成功！

據著者的管見，我們欲於最短期間躋中國於富強之域以及維持國家民族今後的長期進化，我們不但不要鼓吹增加人口，而且要提倡普通的和分別的節制生育。其中很多的理由，在以上諸章大致已經說過了。現時國際上所以甚不安寧，固然由於行霸道的國家之暴戾專橫，也是由於行王道的國家之萎靡不振。所以亞洲的

弱大民族如今日之中國印度總要能夠努力去提高自己的生活標準，努力去減免自己的人口壓迫，努力去創造新的文化，新的國家，和新的社會，把我們自己文化的優點弱點和西方文化的優點弱點逐一分析比較，作一次最澈底的總清算。一面要保留我們固有之所長，革除我們固有之所短，一面要吸收歐美文化之所長，去掉歐美文化之所短，我們才可以如中山先生所說「學得比外國還要好。」我們才能夠齊一國際的文化等差而次第進入人類於大同。美國社會學家洛士 (F. A. Ross) 說：「東方諸國如果能夠移風易俗應文化的要求，把婦女壓迫，幼年早婚，未壯養子，殺嬰墮胎，高嬰孩死亡率，無教育民衆的繁多，無職業民衆的擁擠，貧苦顛連的普遍，饑饉災荒的頻仍，以及氣息奄奄束手待斃者之滿坑滿谷，皆一一根本免除，則西方諸族（即現居歐洲，美洲及大洋洲而約占世界人類百分之三十五的各民族）現時對於取締東方諸族（即現居亞洲及非洲而約占世界人類百分之六十五的各民族）禁止移民入境所建築的大壁壘自可撤銷。」此雖從西方民族方面立論，實可爲留心東方民族前途者他山之助焉。

## 二 普遍的生育革命可以減少苦樂時差苦樂地差和苦樂人差以增高人生的價值和人類的幸福

朱執信先生所著人類的將來一篇論文的首段說道：

「一個朋友告訴我，他想將來的人類一定會滅絕。爲什麼呢？因爲「人類照馬爾薩斯的法則，是倍加的。

無論什麼民權主義，民生主義，實行了的時候，到底總有不能養這無窮增加人口的日子。現在的人口是十六萬萬，讓他作五十年一倍算，一百年後也有六十四萬萬了。到這個時候，已經是地面不能再養活人了。一定是你殺我，我殺你，纔能殺活，並且免不了人吃人的慘事。却是那個時候，人民的知識，比現在進步。他們曉得了這人殺人人吃人的原因，都是在傳種這件事，因為生兒女的數目，要比死人多，所以人口一天一天增加，到這個人殺人人吃人的地步，保得住一代，保不住十代，保得過千年，保不過萬年，算到無路可通，自然就要有第二種辦法。大概厭世的人，常講死是好的，不過能夠死的，實在是少數，在野蠻社會，自殺是很少的，要等有了知識，纔能教自殺，然而總是少數。不過要人類絕種，並不要他自殺，只要他避姪就殺了。他們既然算到無路可通，就一定會想到自己雖然不肯自殺，何苦再來傳種，等子孫受這痛苦。這個想頭，一進行了，就沒有人類再出生，一代就完了。……人類是這樣滅去了，再過一百幾十萬年，還會有別種動物，也走到這個地方，得了現在人類的知識，也要學人類的避姪，不再傳種，於是乎又絕滅了，世界只管繼續，這個現象，還要循環。」

執信先生對於他的朋友這個論調曾下了幾個很好的批評，執信先生說：

「他的觀察是很深銳的，他所設想的人的心理，是過去現在將來進步的人裏頭能殺有的，然而究竟有幾層我們不能不注意的，就是：（一）人類的思想，是不是以這種進步爲止境的。（二）一定的時候，一定的社會裏頭的思想，有沒有一致的可能。（三）在實現這個變形的自殺的時候，會有中途更變不會。」

執信先生的結論是（一）人類的思想斷不以不傳種這一級爲止境的。人類達到能殺看被生的快樂，同

時又能數解脫生的苦痛，必定有比不傳種主義更進步的理想出來的。(二)再講將來的社會如果弄到人吃人的地步，(或者永遠不到這個地步都不定，因為人類防止過庶的辦法是很容易做的。)人類的思想也仍然不能一致。所以在一個時間一個社會完全被不傳種這個主義的支配是不會有的。(三)假如真有這個理想，支配了一個社會，把傳種的事情中止了，這個完全避妊的方法行了幾十年和死了大半的人，生活壓迫去了，苦痛沒有了，這個思想，也必受環境的改變，人類有了生趣，自然又傳起種來。所以不傳種這一種手段是不會澈底的，是會中途更變的。

執信先生并說道：

「一個人的觀察，無論如何，不能不受環境的影響。對於當前的苦樂，評價總未免高一點，對於時間空間的距離稍為多一點的苦樂，評價就未免少一點。同一個人，由於同一的苦樂在心理上所生影響，昨天所受的比去年所受的多一點，明天所受的，比明年所受的也多一點。何以同一種苦樂在同一個人會有兩種的影響？這個只有「苦樂時差」能較說明他。同一個時候，同一種苦樂，為什麼這一部份人可以感覺到，那一部份人不能感悟到呢？這個只有「苦樂地差」能較說明他。……一個國家社會政治上經濟上的進步，有減少苦樂時差的傾向，越進步的人，他越能較感覺到以前過去很久，和以後隔很久纔來的苦痛。又社會組織的進步也有減少苦樂地差的傾向，在組織更進步的社會裏頭的人，更能較對於疏遠的人起一種同情。……然而時差地差減少只管減少，消滅永遠不能消滅。所以無視苦樂時差，無視苦痛地差的見解，是武斷的，誇張的，因為時差地

差雖然減少，究竟不是全無差別。所以幾千百年很疏遠的人的困苦，不能般搖動當時最親近的人的快樂。」

執信先生最後的結論是「人類貪生怕死，是錯的，但是貪死怕生，也是錯的。人類只知人生有樂，不知有苦，是錯的，怕了苦，就怕了人生，那是更錯的。將來的哲人，一定要超越生死，超越苦樂，這是不離生死，不離苦樂，這就是解脫究竟。」

關於上述執信先生的朋友那一段話語，我們可以說他立論的出發點是對的。他說：「無論你什麼民權主義，民生主義實行了的時候，到底總有不能養這無窮人口增加的日子。」這話是不錯的。因為人類的貪生怕死，（或好生惡死）實在是貪到（或好到）人殺人人吃人的時候之可能。不過大多數的人類都是可教訓的，都是能有進步的。譬如現在的人類大半都已經知道人殺人人吃人是不好的，不過還不知道人口增加與人殺人，人吃人的關係，和如何說法保持最適當的人口數量及最適當的人口密度罷了。人類既大半都是貪生怕死，或好生惡死，若希望他們本着人殺人人吃人的苦痛經驗來完全避妊，不再傳種，一代就絕滅了，這不但不能的，而且也是毫無意義的。我們固然要努力去減少苦樂時差和苦樂地差，因為減少苦樂時差和苦樂地差，在政治上經濟上社會上人道上都很有合理的基礎和很健全的理由。但是要完全消滅苦樂時差和苦樂地差，不但不能，而且很可以不必。今天不管明天的苦樂，只管努力去生小孩子，固然是很愚蠢；這代恐怕後代人吃人，後代人不再傳種，也是一樣的愚蠢。今年不管明年的苦樂，固然是沒有遠見；今年要消弭億萬萬年後之苦痛，也是力不從心。又愛與同情亦因時間空間的距離而有強弱，絕對不能毫無等差，而且誰欲毫無等差，也

是無從辦到。譬如我們對於地球和日月總覺得比別的恆河沙數的諸星宿是要親密一點，所以大家對於地球面上的生活多少總有一點留戀。並且有人類種族都想爭在氣候溫良日光斜佑的南北溫帶中討生活。又李白獨飲亦祇「舉杯邀明月」，而不邀其他的諸星宿。因為我們縱能把一切大千世界看來同地球日月一樣的重要一樣的親切，也自罔然的。所以愚夫愚婦，聽見地震山崩，日蝕月蝕，都會恐慌起來。惟對於流星變異位置，則并不發生恐懼。又如戒殺放生的佛家把人吃動物看得和人吃人一樣的苦痛，固然有可取的地方。但是誠如朱執信先生所云：「我們看見人吃牛，如果覺得苦痛，將來再進步的人，豈不說牛吃草，人也要苦痛，所以同情總有個高低，不能一樣的。」如果愛與同情都完全沒有高低，沒有等差，則人吃人固然不應該，人吃動物也是不應該，人吃植物，也是不應該，人吃水與空氣也是不應該，因為水與空氣也含有很多的細微生物。所以推到極點，只有大家「餓死首陽」才是應該。試問這種思想能夠說得通嗎？何況人吃動植物如果是不應該，則動植物中如猛獸毒蛇寄蟲微菌的吃人也是不應該。我們能夠用愛與同情去感化他們，使他們也不吃人嗎？所以極端的「無視苦樂時差和無視苦樂地差」的見解，是會弄到毫無意義，毫無見解。所以人類因為怕人殺人吃人，就會完全避姪，完全絕種的說法是完全於理不通，而且分析起來不過是和「因噎廢食」的一套話語，一樣的粗淺，并無何種更為高深的意義。無非是想用不苦痛的方法把全類未來的生命一筆勾消罷了！

至於現代的東西學者所主張的生育節制或生育革命是有最積極的意義和最科學的基礎，與朱執信先生那位朋友的主張是完全不同。生育革命的最大目標和最高使命是要達到「絕對的人類並育而不相害，和

相對的萬物並育而不相害。」生育革命不是貪死怕生，不要人生。不是要人類完全避世，不再傳種。不過不要人類的數量繼續按照幾何級數或複利公式累進的上漲。夫然後人生的價值才能夠繼續上漲。朱執信先生說得好：「社會上一切善良制度，皆為增加生存價值而生。其目為不良之制度而當排去之者，皆以有損於生存價值故也。」（朱執信集卷上生存之價值）我們鑒於人類的過分繁殖是有損於人類的生存價值，所以主張要加以數量的限制。使遠在人殺人吃人的互競點以下。然後人類社會可本着「互助的原則」繼續向上進化。要能夠絕對免除戰爭內亂，殺人放火，和「謀閉不與，盜竊亂賊不作」，「道不拾遺，夜不閉戶」，才可以達到「絕對的人類並育而不相害。」又人口不過庶之社會，其各種植物之滋生亦比人口過庶的社會遠較暢旺繁多。并且有獸醫學者去替動物醫病，有昆蟲學者去替植物醫病，有生物學者養牲畜者，有習樹藝者和各種農林試驗場去改良物種，鳥獸魚鱉固無剝胎殺卵和竭澤而漁的危險，森林樹木亦無旦旦而伐的危險，牲畜的待遇是遠較優厚，許多生物都受法律的保護和人道的愛護，動植物的繁殖量固屬較多，動植物的平均壽命亦可加長。祇有五穀的害蟲，森林的害蟲，和吃人吃動物的蒼蠅蚊蟲，蟻蝨臭蟲，及寄生人體獸體的各種微菌小蟲始分別減少而已。所以人類生殖率的減低，是於許多的動植物也是有福的。所謂達到「相對的萬物並育而不相害者」以此。不過不能如最少數的宗教家之愛無等差罷了。人類既要靠別的生物來生活，自然不能絕對的愛無等差。不過人類的本身如能辦到不必競爭而後生存，則其他的生物亦當受福不淺。所以我們并不希望完全消滅苦樂時差和苦樂地差，只希望盡量減少這個時差地差，和盡量齊一我們愛的等差。我們欲減少苦樂時差，和苦樂地差，欲盡

量齊一我們愛的等差，使未來的生命能夠同現在的生命一樣的快乐安全或更爲快乐安全；使未來的生活需要能夠同現在的生活需要一樣の豐富美便，或更爲豐富美便；使未來的人類能夠同現在的人類一樣の光榮神聖，或更爲光榮神聖；并使未來的萬物能夠比現在的萬物更爲各得其所；皆應以限制生育爲其最要的基本條件之一。不然，世界的和平，人類的大同，和相對的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都是永遠不會實現的。

生育革命不但是可以減少苦樂時差和苦樂地差，並且可以減少苦樂人差。大致人口密度愈大的國家其人民的苦樂愈不均。所以如能限制人口的增加，使人民皆有養有教，則各種政治的經濟的和社會的進步皆速較迅速，人民的機會比較均等，地位比較均等，教育比較均等，和財富分配比較均平，則各種苦樂人差自可減除大半。欲達到此目的，須使生育節制愈普遍愈佳，愈開明愈好。現時歐美各國的節育運動雖已有一百多年的歷史，但迄今還是不能澈底，即富貧育差和智愚育差，還是很大，所以未能免除苦樂人差。我們中國將來的生育革命就要盡力設法預免此弊。大致最爲普遍生育節制亦即最合人道和最合優生的生育節制，故對於各種節育的知識和方法總要使最應節育之人最易得着，庶幾近之。

### 三 普遍的生育節制可以減少苦樂性差和男女數差以維持兩性的數量平衡及增進兩性的共同幸福

普遍的生育節制還有一個最重大的使命，厥爲減少苦樂性差和男女數差，以維持兩性的數量平衡，及增

進兩性的共同幸福。朱執信先生所著男子解放就是女子解放那篇論文的末句說道：「我所看見的解放，是男女都受解放。說神聖就兩邊都神聖，不然便大家都不神聖也可以的，我們還是不分階級的好。」朱先生那篇文字的字樣題似乎是偏重男子的解放，然而他的思想內容却是很公允。所以他也說：「女子沒有解放完的時候，男子斷不能算是解放完。」不過我們就中國現在的社會來說，女子的解放自然是比男子的解放更為急要些，因為中國女子數千年來所受俗制的壓迫實在是比男子所受俗制的壓迫多得多。自國民革命初步成功，在主義上，政治上，經濟上，倫理上，教育上，都已承認男女平等的原則。今後的最要問題是如何使女子在實際上能夠享受男女平等的種種利益。女子的解放終久是於男子也有很大的利益，因為女子智識增高，天稟發達，人格完全，則女子對於人類的貢獻當遠遜前代。無論分工合作皆能使兩性的共同生活更為充實美滿，更為光榮神聖。今人有提倡坤化主義，讓女子來組織政府，以達到世界的真正和平及人類的安寧福祉者。鄙意絕對的坤化和絕對的乾化，皆有所偏，任何一性的專制都是不好。最好的辦法是男子要相對的坤化，女子要相對的乾化。庶使雌雄兩性更能互相提攜，互相調和，互相扶助，互相維繫，人類的生活纔能永遠向前向上盡量發展。坤化主義者以為「欲提倡人類的和平，須以女子為先鋒隊，因為女子都是慈善的，可以領導人類守秩序，崇道德，尚慈祥，所以要用女子的慈善性來改造男子的暴烈性。」他們以為「生人的人都是女子，殺人的人都是男子，所以祇要女子從男子手裏把屠刀奪過來，全世界人類便可永遠弭戰休兵，歌詠太平，熙熙皞皞，相安無事。」其實這種主張大都情感有餘，理論不足，祇可認為有相當的理由，而無充分的理由。譬如我們中國的歷史上也有幾次

「女后臨朝」並不見得有若何特殊的良好成績。又如國民政府的女職員恪慎厥職者固多，荒廢厥職者亦復不少。所以純粹的坤化政府也還是要求乎其人。第一我們要知道女性不盡是慈善的，男性也不盡是暴烈的。從遺傳學上講來，兒女的種種特性均係傳自父母，女兒有很多地方完全像父親，男兒也有很多地方完全像母親。女子的天性雖比男子更為慈善，但是我們不能因此遂謂女子性善，男子性惡。須知女性有很多能夠博愛犧牲，男性也有很多能夠博愛犧牲。男性之中不少可親可敬的善男子，女性之中也不少可畏可怕的雌老虎。又如兩個男性有時因為愛了一個異性，不惜彼此決鬥，兩個女性有時因為愛了一個異性，亦不惜彼此拼命。是以坤化主義者所謂「雌與雌相遇，不會發生爭鬪，雄和雄相遇，才會發生爭鬪」的那一番話語，大都違反事實，不足為信。第二我們要知道世界上的亂源絕對不能完全歸咎於雄性的發達，實有其他更為根本的原因。所以僅靠坤化主義來消弭世界的根本亂源，是不能奏效的。坤化主義好比像藥中的甘草，雖則用處很廣，然而專用甘草一元湯是不能醫病的。何況我們現時二萬萬女同胞之中，能讀書識字的至多恐怕不到二百萬人，或百分之一。所以全國的男子縱願辭尊居卑，一致拜倒坤化主義的石榴裙下，天下也不會太平的！

現時世界人類混亂的原因——尤其是我們中國混亂的原因——是異常複雜。很多地方和很多時候，無男相，無女相，都是一樣的黑暗愚蓋，一樣的昏曠胡塗，一樣的渾沌紛亂，一樣的醉生夢死，一樣的麻木不仁，一樣的半身不遂，一樣的百孔千瘡，一樣的困苦顛連，一樣的忽生忽滅，一樣的辜負了人生！救濟方法是要注重普遍的善生，善養，善教。中國今日之大患，第一患亂與不安，第二患貧與不均，第三患昧與無教。總要安而後能富，富而

後能救。所謂「民亦勞止，汙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我們有了小康，纔能夠在精神上物質上都有種種的進步。我們整個的國家民族都有了絕大的長足進步，纔能夠次第進入人類於大同。中山先生說：「現在各國的政治都進步了，祇有中國是退步。何以中國要退步呢？就是因為受外國政治經濟的壓迫，推究根本原因，還是由於中國人不「修身」，我們現在要「齊家治國」，不受外國的壓迫，根本上便要從「修身」起。然後我們民族的精神和民族的地位，才可以恢復！」所以我們無男相，無女相，要想「齊家治國平天下」，都要「壹是皆以修身爲本。」中山先山說：「三民主義要三十年可以成功！」所以大家都要有三十年的訓練宣傳，三十年的勇進前進，三十年的和平奮鬥，三十年的正心誠意，三十年的格物致知，三十年的明德新民，才能夠完全實現三民主義的目的，才能創造一個三民主義的新國家和新社會。這還是假定我們要能夠在這三十年之內，把現時大家在「血淚」中生活的人口壓迫減到零點。如果不然，雖再過三十年也不會成功的！「血淚」生活二字是借用目前中國社會的病態作者張振之先生的話，可惜張先生所看出來的中國人口病態是和我们所看出來的很不相同，張先生原書所舉廣州南京兩市的出生統計和死亡統計據我們看來都是很不可靠的。我們根據該項統計計得廣州全市的生育率應爲每年每千人中僅生十人，而死亡率則爲每千人中約死十四人。又南京市的生育率則每年每千人中僅生兩個半人，而死亡率則爲每千人中約死十人。換言之，我們以早婚多育著名的國家，反而我們廣州市和南京市的生育率都比歐洲的法國還低了又低。我們的死亡率也能夠和歐美澳三洲白種人的最低死亡率不相上下。爲什麼我們一般人民還在「血淚」中生活呢？豈不是很奇怪嗎？可見這些

統計是很不完全，而出生數目較死亡數目尤少報甚多。此不僅廣州南京兩市爲然，即北平市的生死統計亦犯此病。鄙人已在他處討論及之。（參閱拙著中國人口論第三章）除出生數目查報更不完全之外，還有一個出生少於死亡的重大理由，厥爲廣州南京北平三市的人口男女比例皆約爲三與二之比，（因爲這三個城市未結婚或未滿家眷的男學生男公務員男同志男工友和男候差人員及其他失業男子皆比未結婚或無親眷的女學生女公務員女同志女工友和女候差人員及其他失業女子是要多十之七八）這種城市的市民既約有三分之一的家眷皆不在城內。所以這種男多女少的城市之生育率較諸男女比例約略相等的城市之生育率當然是要低些。此外還有一個出生少於死亡的局部理由，厥爲我國溺女或拋棄女嬰之風仍極盛行。據浙江金華育嬰堂報告，每年收養人家戶拋棄之嬰孩約三四百個概爲女子。計養活者不過三分之一，其餘仍分別死去。至於未能收容者尚有數倍之多。又據該縣某女校校長聲稱該校自創辦以來三十一年間，差不多每年必在校門口發現若干拋棄的嬰孩，亦均爲女子云。觀於上述三大城的女子出生數總比男子出生數約少十之一二乃至十之二三，以及女嬰死亡恆高於男嬰死亡有時至二倍以上，便知很多女孩都是才生下來遂慘遭溺斃或故意拋棄也。

我國現時之苦樂性差和男女數差皆屬甚鉅，此爲女子受種種壓迫之顯著特徵。我國人民的男女比例，非特城市的人口女少於男，即各省區的人口亦女少於男。茲根據各省區及各城市民國十七年的人口統計，計得男女百分比比例如左：

省區或城市	男女		比例
	男	女	
江蘇(四十二縣)	一〇〇	一〇〇	八七·三
浙江	一〇〇	一〇〇	七八·六
安徽(五十五縣)	一〇〇	一〇〇	七七·五
陝西	一〇〇	一〇〇	七九·〇
察哈爾	一〇〇	一〇〇	七一·一
廣西(十六年)	一〇〇	一〇〇	八〇·七
雲南(十二年)	一〇〇	一〇〇	九〇·八
上海	一〇〇	一〇〇	七三·八
南京	一〇〇	一〇〇	六〇·三
北平	一〇〇	一〇〇	六五·一
天津	一〇〇	一〇〇	六一·七

九	西	張	昆	福	汕	寧	杭	安	蕪	武	廣
江	安	家	明	州	頭	波	州	慶	湖	陽	州
市	市	口	市	市	市	市	市	市	市	夏	市
一〇〇											
六〇·六	四九·六	三六·一	九二·八	六五·〇	五七·六	七〇·九	六六·一	六八·九	六一·八	六〇·一	七〇·一

據右表觀之，我國人口的男女比例除有特別情形外，無論在城市或省區皆女少於男，而城市的男女比例，

又大都較各省區的男女比例相差尤巨。城市的男女比例所以相差最巨，固有一部份由於在城市的各種工業吸收男子較多。及城市學校之男生多於女生所致。但是除去此種理由之外，各城市居民仍然有很大的兩性數差，不過頗難確定此種數差究竟爲若干耳。惟表中所列七省區之男子總數約爲五千一百四十四萬八千二百人，女子總數則僅爲四千一百八十三萬四千人，故七省區之男女數目爲一〇〇與八〇·二之比。此數如果準確，則全四萬七千萬人中，男子約佔二萬六千萬，女子僅佔二萬一千萬。即女子約比男子少五千萬人，相差不可謂不巨。這個相距懸殊的兩性數差，除初生之時男胎常較女胎多百分之一二而外，至少有四個理由可以說明之。

(一)爲上述溺女或投棄女嬰的惡習仍極盛行。據最近全國十六城市的育嬰所調查報告，合計收養之嬰兒男性僅佔百分之八，女性則佔百分之九十二。可見嬰孩之遺棄者大都爲女性。(參閱汪滔著「中國育嬰所現狀」時事月報第一卷第二期第三十五頁)(二)爲女子因養育過繁醫學不精和保護不周，故在養子期間死於難產及多產者衆。(三)爲初生女子因迷信而被溺棄者頗多。據汪滔君所著「中國育嬰所調查報告，福州」(虎)年所生之女嬰多被溺棄，又綏遠「羊」年所生之女嬰亦多被遺棄。(參閱時事月報第二期第三十五頁至三十七頁)又據戴季陶先生言，浙江湖州地方亦有因迷信而溺棄女嬰之事。(四)爲女子受不良的婚姻制度，家庭制度，經濟制度，教育制度，社會制度和其他重男輕女的種種俗制之壓迫虐待，致鬱抑憂憤，自怨自艾，薄命而死者衆。所以兩性數差乃我國男女苦樂不均的特別標識。今欲減少兩性數差和苦樂性差，除盡量革除各種不良俗制及提高女權之外，最要緊的一件事莫如生育節制了。

論到我國人民應否節制生育？及每雙夫婦應有子女若干，祇要請我們全國的婦女不徵求異性的意見，用不記名投票法自動的總投票一次，就可以知道。我想贊成限制生育的姊妹們必定佔最大多數。中山先生說：「一種政策主張，總要與人民有切膚之痛。」生育革命，可以算是與全國的婦女人人都有切膚之痛。較諸女子參政坤化運動等等尤為急要千百倍。因為沒有生育革命，女子就根本沒有母性自由之可能。沒有母性自由那裏配談甚麼女子參政或坤化運動呢？美國山格夫人所著婦女與新種族中曾說道：「自由的母性，是婦女的自由中最神聖的一面，所以是婦女的自由中一種最高尚，最神聖的性質。自由的母性，是不受捕捉的母性，是不受束縛的母性。是欲使這世界幸福，從自己的要求的母性。自由的母性，是婦女界最健全解放和最建設的新道德。母的新道德，第一便是不願糊糊塗塗的做母親，即反抗舊式婦女做機械的母親。自己選擇自己的配偶，自己決定可以有小孩的時期，並嚴格的規定產兒的數目。不從無智和偶然而生子，必從母性深切的要求而生子。這樣產生的子女，定能做新種族的基礎，這樣的母親是完全沒有墮胎的必要，殺嬰的必要和棄兒的必要。這樣產生的子女才是戀愛的花。這樣的母性自由才是種族自由和人類幸福的神聖保障。所以新種族的產生，不得不利賴自由神聖的母性。」又英國社會主義者韋爾斯也說道：「養子雖為女子本然之天性，然母性並不希望多子。」金陵大學喬啓明先生說：「中國女子的特病，只求多生，不求善養。」其實這句話語是錯誤的。嚴格言之，「只求多生，不求善養」，乃中國男子的糊塗，何嘗是女子的特病呢？猶憶歸有光先妣事略中曾詳述他的母親是十六歲子歸，共養過八胎，最後是死於多產，將死那一天，曾嘆道：「吾為多子苦。」老嫗以杯水盛二蝶進曰：

「飲此後姪不教矣。」「孺人舉之盡昏不能言。」因此溘然長逝。這種早婚多子現象，迄今殆數百年如一日。其實八胎尚不算多。據著者的目觀耳聞，每個女子所養兒女最高數目有十胎以上至十六七胎的，甚至有二十二胎的，至於十胎以下五六胎以上的尤不計其數。大致生得多，自然死得多。歸有光的母親所養的子女，約成年者半，早夭及不育者亦半，而且把自己的生命也一齊斷送在內。一般早婚多產的婦女，不難照此類推。這些「吾爲多子苦」的慈母，暗中不知爲自己流了多少血淚，並且看見她們的子女，一面出世，一面夭亡，或因身體衰弱一再流產，又不知流了多少血淚。又生育太繁，則溺女之事，遂習以爲常。此外還有兩個方法便是賣妻鬻子，詩家所謂：「飢雄語餓雌。生離勝死別。餓雄看飢雛。隨行兩眼血。」小兒殘離膝。聊可易斗粟。汝留共汝死。汝去猶汝福。汝去慎勿哭。汝倘無處鬻。羞飢食汝肉。」如果兒女賣不成錢，則仍然隨處拋棄道邊。所謂：「去年生兒猶賣錢。今年生兒棄道邊。嗟哉兒父何其酷。棄兒安得飽汝腹。」另外還有一個很普通的方法，就是抱兒乞食。所謂：「母抱兒，兒在懷中啼。我兒且勿啼。村中榆樹剝盡皮。三日不食氣一絲。那得有乳哺汝飢。」抱兒出門去。負兒行道周。不知東西與南北。仰面乞食低面羞。行人來往各恓恓。誰能救汝母子命。」又小農典妻的苦楚，亦常於詩歌中見之。所謂：「苦苦苦。舊年鬻牛犛。今年典妻子。屋裏無人淚瀟瀟。」夫別妻。夫自往東妻往西。妾身往哺富家兒。家中有兒慎勿管。管我兒。剗我肉。肉剗盡。乳不足。新麥多收兩三斛。明年蚤望將身贖。」美國前哈佛大學校長愛里約特曾說過：「中國許多的人民都是窮得想好不能好。」這是很沉痛的話語。可惜這種現象迄今尚依然如故。是以我國人民的生育率如果毫不減低。非特經濟進步社會進步和人文進步異常迂緩。而且大多數婦女的生活必

長此完全斷送於唯一一的養子事業之中。試問如何去謀婦女解放呢？婦女有何機會去得着相當教育呢？更有何機會去在教育階壇上敷教論道，或在政治舞臺上建功立業呢？

所以生育節制和母性自由乃關係婦女自己終身的幸福康樂，和她們所養子女及自己家庭的幸福康樂。應爲今後婦女解放運動中最要的中心問題。這個中心問題，應當由婦女們自己去努力研究，努力提倡，努力宣傳。健全的節育知識，愈普及愈佳。美國俄海約大學經濟教授臥爾夫說：「健全而合理的人口政策必須計及女子方面因高生育率所致召之莫大犧牲。凡不顧女子利益及女子態度之任何人口政策不啻根本危害其政策之標的。猶幸現今的女子已有相率自行決定其人口政策之趨勢。且彼等所決定之政策大都與避免人口過庶或維持最適宜的人口密度之宗旨相符。是則極堪告慰云。」又陳東原先生在其所著中國婦女生活史中也痛快說道：「生育節制的利益，即捨開限制人口會使國家富強，社會健全而外。尚有種種切身的好處。對於女子終身的幸福，是尤其重大的。所以制育的事，女子實在應當居主動的地位。最好是婦女們自己研究，自己主張，自己實行，自己互相傳告。雖不必把生育節制的方法彰明列爲婦女功課之一（其實歐美已有很多節育講授所了，有些還是政府創辦的），受教育的婦女們似乎都應以沒有制育的知識爲可恥。更進一步說，在今日的中國，至少須要有一位偉山類夫人這樣的女子，苦口婆心以殉道的精神爲同胞婦女謀幸福。……無限人口的增殖是最大的罪惡。那末，制育運動還有什麼顧忌呢？從前上海和北京兩處的制育研究會，是男子做主動的，雖然失敗亦已不值回顧。將來應該有婦女做主動的組織的。」所以我們很希望全國受過良好教育的婦女，和全國的

婦女聯合會，婦女問題研究會，家庭改進會等，都應自動的聯合起來。把這個與大家有「切膚之痛」的節育大問題，妥慎研究，妥慎傳授，妥慎應用於家庭改良種族進化的光明途程上。庶使中國的人口問題有圓滿解決的希望。生育節制愈普遍。中國的進步亦愈速。所以未婚女子，對於男子求婚，皆應以限制產兒爲最要條件之一。已婚女子亦應絕對維持自己的母性自由，即對於子女多寡應有最後的決定權。而且夫婦都要有爲子女求進步的願望。庶使所養子女能夠一代康強一代，一代優勝一代，一代光明一代。而對於國家社會亦每一個人有每一個人的價值，每一個人有每一個人的貢獻。我們的民族必可從此復興，從此復活，從此日就光輝，從此日有健全發展。我們將來造成的新烏託邦，非到地球末日決不會滅亡！

一國的男女數差和苦樂性差如能盡量減低，使兩性最得其平，非獨於女子甚爲有利，同時亦於男子甚爲有利。因爲兩性的最高生活和最大幸福全賴兩性的俱分發展與最大調和。所以如最近歐洲戰後諸邦女多於男，固然不好，或如今日過庶的中國，男多於女，也是不好。在這兩種的社會之中必有一部份的人民不能求得匹偶而索然寡歎，且社會的罪惡和不規則的男女關係亦較普遍。據生命統計學者對於歐美各國生命統計的分析研究，均證明結婚男女的死亡率，除年齡在二十歲至四十歲之結婚女子而外，大都較單身男女的死亡率爲低，而以寡夫寡婦或離婚男女的死亡率爲最高。可見伉儷生活實與男女壽數有相當的關係。固然在婚姻自由的國家，凡能共成良好眷屬的男女大都爲種族中最健全的分，其本然的個人壽數理應較高。不過伉儷相得與室家之好，能使已婚男女的生活更爲安定，更爲規則，及更爲健全，因而影響各人壽數亦未可知。（參閱）

Newholme, The Elements of Vital Statistics, pp. 218 - 215. and G. C. Whipple, Vital Statistics, pp. 281 - 282.) 茲將法蘭西普魯士及瑞典三國一八八六年至一八九五年間每年齡分組中各種男女每萬人的特別死亡率列表如左：

國別及區區關係	性別及年齡組	男			女		
		二十歲至四十歲	四十歲至六十歲	六十歲以上	二十歲至四十歲	四十歲至六十歲	六十歲以上
法蘭西	已婚	七七	一五三	五八三	八〇	一一一	四五六
	未婚	一〇三	二四六	七九四	七八	一六六	七三〇
普魯士	已婚	七一	一七五	五八二	七九	一一八	四九七
	未婚	八四	二三一	八〇六	五九	一七九	七二九
瑞典	已婚	二〇一	三四六	一〇九一	一〇一	一七二	八〇五
	未婚	二〇一	三四六	一〇九一	一〇一	一七二	八〇五

已 婚	五三	一一四	四五三	六六	九六	三六四
未 婚	八三	二〇四	六九〇	六一	一一〇	五二八
寡 寡 或 離 婚	一〇八	一九〇	八五六	九八	一三二	六九八

又美國康乃耳大學威爾柯克斯教授 (Prof. W. F. Willcox) 計得紐約省 (紐約及巴佛羅兩城除外) 一九零八年至一九一一年間每年年齡分組中各種男女每千人的死亡率如左:

年齡分組	男			女		
	未 婚	已 婚	寡 夫 或 離 婚	未 婚	已 婚	寡 婦 或 離 婚
二十五至二十九	六·六	四·二	一一·〇	四·七	五·七	九·四
三十至三十九	一二·九	五·九	一四·二	七·四	六·三	九·五
四十至四十九	一九·五	九·五	一七·三	一〇·〇	八·二	一二·一
五十至五十九	二八·七	一七·〇	三〇·五	一九·九	一四·五	一八·八
六十至六十九	五一·〇	三一·九	四八·六	三七·一	二八·一	三八·二
七十至七十九	一〇一·四	七二·七	九六·〇	八二·二	六一·四	八七·二

八十及八十以上 二〇四·二 二〇五·一 三一五·七 二七九·八 一九四·八 二六九·八

據以上兩表觀之，可見男女配偶之情況與死亡率之高低，頗有相當之關係。是以一個國家社會倘能使男女數差與苦樂性差率都減至最低，則兩性之間皆可享最大的擇配自由與最高的共同幸福焉。

## 第十一章 生育革命的具體方案與政府應有的指導設施

我們主張生育革命至少有三個最大目標；第一是要維持適合最高人生標準的人口數量，第二是要實現適合生理的人種改良，第三是要增進兩性生活的和樂健康與整個個人的安寧福祉。一般反對生育革命的人們大都完全不了解人口增加的理則，完全不了解人類能夠作自己的園丁，和超脫物種互競的範圍。他們以為生育革命是消極的，悲觀的；孰知他們主張任聽人民自生自滅，自演自滅，纔是消極的，悲觀的。生育革命者對於種族前途是有預定的辦法，反生育革命者對於種族前途是毫無預定的辦法。生育革命者對於種族人類是先憂後樂，反生育革命者對於種族人類是先樂後憂。生育革命是要把人類的生養問題完全科學化和人道化；反生育革命是反對人類生養問題的科學化和人道化。生育革命是有預算的人類經濟，反生育革命是無預算的人類經濟。孔子說：「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我們相信實行生育革命的國家必定生活安全，文化日進，反對生育革命的國家則生活危殆，亂輪常轉。我們今後的人口政策，關係國家民族的幸福前途至大且巨，於此乎？於彼乎？是在國人之善擇而已。著者以為我們國人如果仍然不注重生育革命，我們的民族將繼續消沉下去，不知伊於胡底。所以希望大家把生育革命當作一種愛國保種的事業，我們的民族纔有救藥。爰就管見所及，擬定生育革命的具體方案，以作本書之終結，而供國人

研討之資料。

## 一 取締宗法式的早婚和納妾

一國的男女結婚年齡與人口數量增加的快慢及人口品質優劣的消長，均有密切之關係。遲婚遲到大家成「怨女曠夫」固然很壞。早婚早到「十四爲君婦，羞顏未嘗開」或「今日新嫁娘，問年纔十五」亦足以礙族弱種。據俄國人類學者希洛可哥洛夫測量江浙兩省中國人的身材和體重，計得江浙兩省男子的發育以十歲十一歲爲第一次驟然迂緩之時期，以十五六歲爲第二次驟然迂緩之時期。（參閱原著英文中國人發育之研究第十四，二十八十五，及八十六等頁）故在十五六歲之時結婚，是否於兩省人民身體之發育更有妨害，乃一頗有研究價值之問題。希洛可哥洛夫並言各種族身心之發育顯與內分泌作用有關係，據香港大學謝希爾（Prof. Shallehear）教授之意見，中國民族的發育所以異於歐洲諸族，或由於胸腺（Thymus）保存較久，致身體發育遭受影響。因中國人的婚姻選擇皆由父母作主，而中國人的心理復大都以和平謹慝爲選擇標準。世代相沿，種族胚質發生若干變化。遂致華人的胸腺因此保存較久，而身體之發育遂不如歐洲諸族之健全云。（參閱希氏原書第一一二頁及一一三頁）足見我國的舊式婚姻實於身體之發育與胚質之健全皆有若干不良的影響。潘光旦先生頌揚我國家長選擇的舊式婚姻如何謹嚴審慎，合乎優生，其立論甚缺少科學的根據。

又一國各階級的結婚年齡，如早遲各異，甚不齊一，亦足影響種族的品質。現時歐美人民的結婚年齡大致本上等的階級結婚愈遲，愈下等的階級結婚愈早。譬如英國一九一一年上上等階級（專門職業階級）在二十五歲以下結婚之男子僅佔本階級已婚男子百分之七，而煤礦工人在二十五歲以下結婚之男子，則佔本階級已婚男子百分之五十七。（參閱 A. Newsholme, *Elements of Vital Statistics*, p. 100）又美國窮鄉僻壤之農家女子亦大都早婚多育，年在二十歲以下出嫁者仍佔多數，已婚女子孕育八胎以上者仍佔重要成分。（參閱 Fugwell, Munro, and Stryker: *American Economic Life*, p. 241）至於大學畢業之女子則通常結婚最遲，甚或太遲。又丹麥京城一八七八年至一八八二年間之官吏平均結婚年齡比工人的平均年齡約大五歲。又普魯士一八八一年至一八八六年各階級的平均結婚年齡如下（參閱 S. J. Holmes: *The Trend of the Race*, p. 150）

階級區別	平均結婚年齡
官吏	三三・四一
醫生	三一・七六
美術家與文學家	三〇・六一
海陸軍人及警察	二九・三〇

平	常	工	人	二九·四〇
金	屬	工	人	二八·〇四
工	廠	僱	工(男)	二七·六七
工	廠	僱	工(女)	二四·六二

是以歐美現時各階級的軒輊生育率並非完全由於生育限制，亦由於各階級的結婚年齡甚有差別。我國現時受過教育的各階級亦有比較遲婚的趨勢。惟未受教育的各階級則仍然繼續早婚，殊非國家種族之福。爲思慮預防計，應迅速頒安婚律，規定結婚最低年齡切實取締早婚，凡將婚男女均須向官廳領取婚姻證書，以便查明是否已達及婚年齡。如是則未受教育各階級的結婚年齡至少可以遲延一二年，免與已受教育各階級的結婚年齡互相懸殊。

關於此點，拙著中國人口論中曾主張「男女未滿二十歲，女子未滿十八歲，不許結婚。」而中國人口問題總答辯的作者楊敬春先生則主張「提高法定結婚年齡，男子爲二十歲，女子爲十七歲，並切實禁止早婚。」鄙人關於女子早婚年齡的主張，僅比楊先生提高一歲。惟對於楊先生的主張甚難贊同。諺有之：「妹十七，郎十八，郎是箱子正出土，妹是蕪菜正冒芽。」可見女子結婚年齡定爲十八歲並不太遲。想國內未婚的姊妹們必無異議。祇有抱子又想抱孫和抱孫又想抱曾孫的舊式家長或稍感不便而已。又大學男女同校的制度亦足以增加

有教育男女的結婚率。美國的大學女子約有一半皆不出嫁，誠屬不幸。故男女同校在優生學上頗有提倡的價值。據一八九五年美國謝雲女子 (Miss Shinn) 計得美國大學女子畢業後之結婚率如下 (參閱 G. J. Holmes: The Trend of the Race, p. 232)

結婚時年齡	男女同校之女子結婚率	男女分校之女子結婚率
二十歲	三八·一	二九·六
三十歲	四九·九	四〇·一
三十五歲	五三·六	四六·六
四十歲	五六·九	五一·八

一國的女子結婚年齡與女子之生育量甚有關係。按照英國的官廳統計，女子的生育量以十七八歲為最大，以後則逐年漸減。二十歲至二十五歲之間，減少尤為顯著。二十五歲至三十五歲，則減低趨勢較為和緩。三十五歲以後，則又減低加速。四十五歲以後則更為迅速大減。又一八五五年蘇格蘭每百個已婚婦女中所佔養子之婦女人數如左 (A. Newsholme, Elements of Vital Statistics pp. 101 and 69)

年 組	年 組	每一百已婚婦女中養子之婦女人數
十五歲至十九歲		五一·一二
二十歲至二十四歲		四二·七〇
二十五歲至二十九歲		三六·六〇
三十歲至三十四歲		三〇·二四
三十五歲至三十九歲		二四·二〇
四十歲至四十四歲		一一·三三
四十五歲至四十九歲		一·八一
五十歲至五十四歲		〇·〇九
五十五歲至五十九歲		〇·〇三

又柏林,瑞典,及新南威爾,每百個已婚婦女中所佔養子之婦女人數各如左:

年 組	年 組			
	柏 林	瑞 典	新 南 威 爾	瑞 典
一八八七—一八九〇年		一八九一年	一八七一年	一九〇一年

十五歲至十九歲	五〇・三四	五一・八一	五〇・一〇	五六・二八
二十歲至二十四歲	四五・五五	四五・一四	四四・一五	三九・七〇
二十五歲至二十九歲	三三・六〇	三七・五三	四〇・七五	二九・八七
三十歲至三十四歲	二二・五〇	三一・一八	三三・六七	二二・六八
三十五歲至三十九歲	一四・五〇	二五・〇四	二七・〇四	一七・二五
四十歲至四十四歲	六・〇三	一四・二三	一三・四一	八・八一
四十五歲至四十九歲	〇・七四	二・〇〇	〇・七一	〇・四三

又嬰兒死亡率與女子結婚的年齡頗有關係，大致女子結婚過早，或結婚過遲的嬰兒死亡率均較結婚年齡適當的嬰兒死亡率為高。據意大利優生學者奇尼教授 (Prof. G. Chin) 曾將母親年齡與一歲以下之嬰兒死亡率作一統計如左：

母 親 年 齡	每千嬰兒中之嬰兒死亡數
一 九 以 下	一七一
二 〇 — 二 四	一三三

二	五	—	二	九	一六六
三	〇	—	三	四	一七〇
三	五	—	三	九	二二〇
四	〇	以	上		三三〇

又據美國勞工部童工局 (The Children's Bureau of the U. S. Department of Labor) 一九一五年曾詳細調查費納德非亞省之姜士敦城的嬰孩死亡，計得母親年齡與嬰兒死亡率的關係如左：

母 親 年 齡	嬰 兒 死 亡 率
二 〇 以 下	一三七
二 〇 — 二 四	一一一
二 五 — 二 九	一四三
三 〇 — 三 九	一三六
四 〇 以 上	一四九

以上兩表所列統計均證明嬰兒死亡率以母親二十歲至二十四歲之間為最低。又愛華特 (R. J. Ewart)

的統計研究亦以母親二十歲至二十九歲之嬰兒死亡率為最低。是以我們國人的結婚年齡祇要比宗法時代的早婚年齡平均提高一二年或二三年，便可減少一部份的多產。和嬰兒死亡而且并不妨害兩性的共同幸福。

據英人登洛布 (A. C. Dunlop) 根據蘇格蘭的戶口統計，計得女子每遲婚一年平均約少養三分之一個小孩，或每遲婚三年約少養一個小孩。且青年女子因遲婚一年所少養子女之分數較壯年女子尤鉅，即二十至二十五歲之女子每遲婚一年約減少○·四五小孩，二十五至三十之女子每遲一年約減少○·三七小孩，三十至三十五之女子約○·三二小孩，三十五至四十之女子約○·二九小孩，四十至四十五之女子則每遲婚一年約減少○·一九小孩云。又納妾亦應嚴加禁止。既可保障女權，並使一般男子更有求得配偶的機會，因我國男女比例既相差約五分之一，此項兩性的數量差別，縱令室家夫婦，大家「不重生男重生女」亦非多年不能恢復其均衡。若再許男子娶妾，則失偶的男子必比照增加。且多妻之家，溺女必多，即男女比例永無恢復平衡之希望也。又為同樣的理由對於娼妓制度亦應嚴加取締。大致挾妓男子的平均年齡通常比妓女的平均年齡總要大八歲十歲或十幾歲。所以娼妓制度如果盛行，非犧牲了種族的現在，抑且犧牲了種族的未來。關於此點我們不妨照俄國的辦法，對於開妓館的人和販子的均應從嚴治罪，黨員挾妓者應開除黨籍。官吏挾妓者亦應受處分。推對於娼妓本身，除有花柳病者得分別開辦外，其餘宜從寬發落，予以自新之路。（參閱 *Woman in Soviet Russia*, By *Jessica Smith*, pp. 140-143）又歲數相差過大的男女不許結婚，亦為着一苦樂性差和減低男女數差的一個必要條件。因為此種限制一方面可使青年男女更有求得配偶之機會，一方面可

使解夫寡婦更願樂風求凰，而免除許多怨曠也。胡漢民先生說：「我們將來可在婚姻法中規定一條法律限制男女結婚年齡的最大異差，（譬如說男女結婚年齡相差最多不得過十五年）以爲世界婚律之標準。」著者以爲此種規定甚屬公允，其效果可使更多年齡相當的男女都成良好眷屬。

## 二 實行「一枝花」至「兩枝花」制

上面所說取締舊式早婚納妾等辦法雖然是非常要緊，但是還不够避免多產，因爲我們並不希望男女結婚過遲，祇希望不要像快要過去的宗法時代這樣過早。據美國社會學家洛士說：「人類的死亡率率既隨人文進化而日形減低，在最近的將來，祇須利用女子四分之一的生育量，便能維持適當的人口密度。」所以若是專靠遲婚的辦法來防止人口的過分繁殖，恐非大家成「怨女曠夫」不可。法國經濟學家波魯（P. I. Bourdieu）十餘年前就說道：「瑞典的婦女現在已將結婚平均年齡延至二十七歲，但是并不能防止瑞典人口每年約按百分之一增加。如果要單靠遲婚來維持定量的入口，非將婦女結婚年齡延至三十歲或三十二歲不爲功。」可見單靠遲婚來限制入口是絕對不可能的；縱能辦到，亦非種族人類之福。因爲結婚太遲，在婦女的生理上危險必多，如不育、難產及流產等均必增多，而嬰兒死亡率亦必增高。且男女婚嫁不能及時，怨曠必多，下規則的男女難交與夫花柳疾病的蔓延均必相因而至。又男女婚嫁不能及時，則抱獨身主義者必因以增多。有此種種理由，吾人並不主張不近情理或違反自然的遲婚，不過亦不主張由父母媒妁一手包辦之變態的童養媳式的早婚。

耳。

人口過庶問題既非專靠相當的遲婚所能解決，生育節制遂爲防止人類過分繁殖及增進人類幸福的最要法門。蓋緣人類夫婦的親密關係實含有兩種作用。一爲滿足性欲，致篤愛情。二爲孕育子女，延種種族。夫婦之道所以能久，皆賴此兩種作用互相維繫。夫婦爲王道的自然結合，而非霸道的勉強結合，乃人類社會中最神聖美滿的親密關係。下等生物除爲生殖的需要而交尾之外，大都罕有性欲的存在。人類則除應生殖的需要而外，對於性欲的愛仍有一種迫切的需求，且在男女兩性最健康的身體發育上與最優美的靈性發展上皆爲無間斷的熱烈要求。所以性愛不僅爲肉體的創造所必需，亦爲精神的創造所必需。所以完全除開孕育子女，兩性的戀愛仍然是人生一種最根本的需要，和最神聖的安慰。孟子說：「男女居室，人之大倫。」孔子說：「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達乎天地。」戴季陶先生說：「男女的關係，是人類生命的總關鍵，他在「生」的意義上，只有和「殺」的意義集中的戰爭，可以相提並論。在生死過程當中的「食」的問題，尙不足與之比大。英國的哲學家羅素說：「人生是寂寞的，所以男女都想望合兩性之好，來得着一種內心的安慰。不過美滿的婚姻應基於男女的互相愛慕，但並不以互相愛慕爲唯一究竟，大致在最美滿的姻緣中夫婦早遲都有一種孕育子女的希望。」山格夫人說：「自己要生子女的要求，是從普通滿足幸福的夫婦之愛而惹起的。這樣被惹起的要求，是非常之堅強而且非常之熱心的。」愛理士也說：「在夫婦普通愛的生活裏，性欲的愛終久是要變爲父母的愛。」羅素也說：「無戀愛不能有良好的婚姻，但是最美滿的婚姻並不以戀愛爲終極，必定還有一個戀愛以外的

宗旨，即婚姻亦爲未來的新生命的源泉。有了這個宗旨，然後婚姻的愛纔能够伸張到無限的未來。」不過人類夫婦即無求嗣願望之時，亦能孕育子女。甚至不基於互相戀愛的婚姻，或強制的男女偶合亦能孕育子女。可見子女之孕育并不隨夫婦有無求子願望爲轉移。且人類的伉儷生活既須時常同衾共枕，不能如天上的「牛郎織女」一年一聚，生育限制遂不可少。生育限制所以使夫婦無求嗣願望之時便可不養子女。這個節育的要求在婦女方面是非常重大。乃爲維持母性自由的基本條件。但同時亦爲增進伉儷幸福，子女健康，社會安寧，和種族健全的基本條件。

世有四不朽，曰立德，曰立功，曰立言，曰立後。所以我們並不反對孟子「無後爲大」之說。不過我們第一要把「男後」和「女後」看得一樣貴重，一樣神聖。第二要把「立後」和「立德，立功，立言」看得一樣重要。千萬不要把「生小孩子」當作唯一的人生觀，不管「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的人們也拼命去養些柯克斯所謂：「自己所不需要，社會所不需要，國家所不需要，種族所不需要，誰也不需要的小孩子」，而把「立德，立功，立言」一概置諸腦後。我們就拿一個「孝」字來講，也不僅「有後」一事足以盡之，不過「有後爲大」就是了。所以孔子說：「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孝經也說：「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所以祇是生了無數的小孩子，絕對不能算「孝」。還要一面能够「繼志述事」，「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一面使自己的兒女也能够「繼志述事」，「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纔能算「孝」。朱執信先生所作星光詩上說道：「一個星毀滅了，別個星剛剛圓起。我們的眼睛昏澀了，還有我們的兄弟，我們的

兒子。」杜甫夢李白的詩則說道：「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世。」所以「有後為大」，還要看室家夫婦自己的身價如何，和品格如何。如果低能的份子與夫「積不善之家」也盡量去生養無數的小孩子，豈不是等於按照幾何級數成複利公式去為國家種族製造妖孽嗎！

且無論聖賢才智，平庸愚劣，如果養子太多，父親的進款總要消滅，母親的精力總要耗竭，兒女死的亡總要增多，家庭的幸福總要受影響，國家的安寧總要受危害。這是如影隨形絲毫不爽的。英國名醫赫雷（Norman Haire）有言：「我們祇要將生命統計略加涉獵，便可看出兒女衆多的大家庭是白白糟塌人類生命。大致兩個兒童以上的家庭，其死亡率恆視子女之繁多而累進遞增。」又德國優生學會前任會長卜若滋（Dr. Bloch）曾將德國威克森尼（Wickens）省勞工家庭五三三六家所養子女二六四二九人之嬰兒死亡率加以精密分析，計得曾有子女兩個以上之家庭的一年以下嬰兒死亡率如左：

嬰兒出生次序	嬰兒死亡百分數
第一胎嬰兒	二二·九
第二胎嬰兒	二〇·四
第三胎嬰兒	一一·二
第四胎嬰兒	一三·二

第五胎	嬰兒	二六·三
第六胎	嬰兒	二八·九
第七胎	嬰兒	三三·一
第八胎	嬰兒	三三·二
第九胎	嬰兒	三六·一
第十胎	嬰兒	四一·三
第十一胎	嬰兒	五一·四
第十二胎	嬰兒	五九·七

又按照德人希格爾 (Siggel) 的觀察亦謂：「嬰兒死亡率恆與孕育多寡成正比例，無論其死亡的原因為生物的或社會的，莫不皆然。即每雙夫婦養到五個六個或七個小孩以上，其嬰兒死亡率必次第增高，殆無疑義。」又丹麥醫生布雷靈 (Dr. J. de Brin) 及郎吉 (Dr. C. de Lange) 兩氏曾計得丹麥勞動階級之嬰兒死亡率如左：

家庭子女數	嬰兒死亡百分數
一個子女之家	二〇・一
二個子女之家	一九・一
三個子女之家	二五・一
四個子女之家	二三・四
五個子女之家	二四・五
六個子女之家	三一・一
七個子女之家	三五・八
八個子女之家	四〇・三
九個子女之家	五二・五

又一九〇五年十月三日之社會調和 (Sozialharmonie) 雜誌中曾列有類似之統計如下:

家庭子女數	嬰兒死亡百分數
一個至四個子女之家	二二・六

五個至八個子女之家庭	三〇・二
九個至十二個子女之家庭	四九・五

(註)以上各表見 "Some More Medical Views on Birth Control," edited by N. Haire,

pp. 86-88.

又據美國一九一三年勞工部童工局調查費納德費亞士敦城 (Johnstown, Pa., U. S. A.) [四  
九一個已婚婦女共養子女五六一七人之嬰兒死亡率如左:

嬰兒出生次序	每千嬰兒中之死亡率
第一胎至第二胎	一三八・三
第三胎至第四胎	一四三・二
第五胎至第六胎	一七七・〇
第七胎至第八胎	一八一・五
第九胎以上	二〇一・一

又美國罕明敦醫生 (Dr. A. Hamilton) 一九一〇年調查芝加哥家庭一六〇〇戶之嬰兒死亡率

如左：

家庭子女數	每千嬰兒中之死亡率
四個子女以下者	一一八
六個子女以上者	二六七
七個子女以上者	二八〇
八個子女以上者	二九一
九個子女以上者	三〇三

〔註〕以上兩表見 A. Newsholme, Elements of Vital Statistics, pp. 345-346.

又據美國勞工部童工局一九一八年詳細調查美國某某八個城市的嬰兒死亡率所得關於子女多寡與嬰兒死亡之結果如左：

子女出生次序	每千嬰兒中之死亡率
第一胎	一一五·八
第二胎	一〇二·七

第 三 胎	一一·五
第 四 胎	一二七·〇
第 五 胎	一二九·三
第 六 胎	一三二·二
第 七 胎	一二八·二
第 八 胎	一六二·六
第 九 胎	一四二·一
第 十 胎	一八一·一
第 十 一 胎	一四六·八

[註]右表見 G. C. Whipple, Vital Statistics, pp. 421-422.

以上所列各種統計雖不能算十二分精確，但總可證明生育愈繁，嬰兒死亡率愈高，且各項統計均一致證明嬰兒死亡率以第一胎至第四胎為最低，第五胎以後則次第增高。又據美國紐約衛生局專醫癆病之醫官（諾夫 (Hopk)）說道：「以我多年診治肺病的經驗，已經顯示於我，那患肺病的人，他或她若是生於大家庭呢，總是最後生的小孩子中之一個，即第五個，第六個，第七個，第八個，第九個等。這種現象解釋非常顯然。當父每

紀較老，尤其是當母親的因為屢次懷孕，又還要到工廠商店去作工，一直作到分娩那一天，身體自然時常虧弱，因之小孩子生下地來，先天就沒有多大活動力，他遺傳下來就是體質的貧乏，其以對於肺病和對於其他嬰兒時期或兒童時代的任何病症都很難抵抗」(見柯克斯原著人口問題武增幹譯本第一〇四頁至一〇五頁)又據英人安塞爾(C. Ansell)所編英國富裕階級的家庭統計，凡養子期間相隔不滿一年者，其嬰兒死亡率較諸相隔一年至二年者約多一倍，較諸相隔二年以上者則約多二倍。又據愛華德之統計研究亦證明生育太密常使子女的身心兩方面雖滿六歲之時猶受影響云(參閱B. J. Holmes, *The Trend of the Race*, pp. 321-322)。又據國民政府立法院統計處調查漢口工人的天然家庭(natural family)五〇八家共養子女二〇四三人，或平均子女為四·〇二人。並計得子女多寡與死亡率高低之關係如左：

子女出生次序	出生總數	死亡總數	出生總數中之 死亡百分數
第一胎	五〇四	一九二	三八·〇
第二胎	四三一	二〇五	四七·六
第三胎	三二八	一四四	四三·九
第四胎	二四四	一二八	五二·四
第五胎	一九五	九七	四九·七

第 十 三 胎	第 十 二 胎	第 十 一 胎	第 十 胎	第 九 胎	第 八 胎	第 七 胎	第 六 胎
二	六	七	二一	四六	五一	四八	一二四
二	四	六	一三	三六	三七	八四	七九
一〇〇・〇	六六・七	八五・七	六一・九	七八・二	七二・五	五七・一	六三・七

右表所列死亡總數雖包括早夭與成年死亡在內，而不僅限於一歲以下之嬰孩。但普通的趨勢實以前四五胎的死亡率為最低，以後則大致次第增高，直至第十五胎竟全數死亡，無一存者。足見子女愈多則死亡率愈高，與上列歐美諸邦的各種統計大致相同。倘使我國人口有更為精密的人事登記，則死亡率必隨生育多寡而有更為規則的增加傾向，可以斷言。又據國民政府立法院統計處調查金陵大學學生之經濟家庭 (Economic Family) 九十三家共計丁口八十三人，或平均每每家為八・九人。計一年之間共生小孩四九人，即每千人中之生育率為六〇・二。全年一歲以下之嬰孩死亡為一五人，即每千嬰孩中之一歲以下嬰孩死亡率為三〇・六。或

約佔三分之一而弱。又全年內之其他死亡則爲一六人，故一年間之死亡人數共爲三一一人，即每千人中之死亡率爲三八·一。而全年九十三家八一三中之人口自然增加率則爲千分之二二·一。（即六〇·二減去三八·一）於此可見金陵大學學生的家庭之生育率死亡率，和自然增加率均屬甚高，此種家計比較富裕之家庭的生育率，和死亡率，猶尙如是，則普通一般的家庭之生育率死亡率，均必甚高無疑，惟一般的自然增加率則或屬較低，因普通一般的家庭當遠較貧苦也。

以上所舉種種統計皆證明生育愈多，死亡率愈高，其最大原因皆由於爲母者養育太繁，氣血衰弱所致。所以我們的結論是每雙健全良好的夫婦至少應養子女二人，至多可養四人，非有夭折，不宜再行增多，且養子期間不宜過密，或一年兩年，可由夫婦量力自行酌定，能使授乳期畢數個月後始再懷孕最佳。俗諺說得好：「一個兒子提心吊膽；兩個兒子，錦上添花；三個兒子，到老變成四家；多男多女多冤家；一男一女一枝花；無男無女養仙家。」世無仙世，亦無長生不老之人，所以世上的人大半都喜傳後。隨養仙家的人，自屬無多。加拿大士蘭多大學經濟學院院長馬克哀夫說：「據英格蘭與威爾士的統計報告均證明上中等各階級祇於有了兩三個或四個子女之後始行認真節制生育。故歐美人民傳後的欲望仍屬甚強，不過不願如從前之漫無限制耳。是以生育率雖次第減低，但仍有其天然的限制。現時歐洲許多進步的國家之人口生育率似均當減至千分之二十之概數云。」我們主張健全的夫婦至少應有「一枝花」，至多可有「兩枝花」，實在不能算少。所以希望一般讀者不必爲我們民族「提心吊膽」。我們相信如果大家採用了最少「一枝花」最多「兩枝花」的制度，我們民族

必能由荆棘叢生的生活而進於松柏優美的生活。雖千秋萬世也不會滅亡。觀於附列兩表便知我國的生育率  
和死亡率均有大大減低之必要，即至少應各自減低一半，方能與種族最健康生活最富厚的白種諸國相比擬  
也。

(一) 附各國人口之生育率死亡率及自然增加率比較表。

國 名	類 別	年 度	生 育 率	死 亡 率	自 然 增 加 率
澳 斯 達 利 亞		一九二六	二二·〇	九·四	一二·六
奧 地 利		一九二六	一九·一	一四·九	四·二
比 利 時		一九二六	一八·九	一二·八	六·一
英 倫 各 島		一九二六	一八·四	一二·〇	六·四
加 拿 大		一九二六	二四·八	一一·五	一三·三
錫 蘭		一九二六	四一·〇	二四·七	一六·三
智 利		一九二五	三九·六	二七·六	一二·〇
中 國		民十三至 十四兩年	四二·二	二七·九	一四·三

新 西 蘭	和 蘭	日 本	意 大 利	愛 爾 蘭	埃 及	英 屬 印 度	甸 加 利	德 國	法 國	芬 蘭	英 格 蘭 與 威 爾 士	丹 麥
一九二六	一九二六	一九二六	一九二五	一九二六	一九一九 至二四	一九二五	一九二六	一九二六	一九二五	一九二六	一九二六	一九二五
二一・〇	二三・八	三四・八	二七・八	二〇・六	四一・六	三三・六	二七・三	一九・三	一九・〇	二一・六	一七・八	二一・〇
八・七	九・八	一九・二	一六・八	一四・一	二六・六	二四・七	一六・六	一一・五	一八・二	一三・四	一一・六	一〇・八
一二・三	一四・〇	一五・六	一一・〇	六・五	一五・〇	八・九	一〇・七	七・八	〇・八	八・二	六・二	一〇・二

北愛爾蘭	一九二六	二二·五	一五·〇	七·五
挪威	一九二六	一九·七	一〇·六	九·一
羅馬尼亞	一九二五	三五·二	二一·〇	一四·二
塞爾非多爾	一九二六	三六·一	二二·二	一三·九
美保羅	一九二五	三二·三	一六·四	一五·九
蘇格蘭	一九二六	二〇·九	一三·〇	七·九
西班牙	一九二六	二九·九	一九·〇	一〇·九
瑞典	一九二六	一六·九	一一·八	五·一
瑞士	一九二六	一八·二	一一·七	六·五
南非洲(白種)	一九二六	二六·二	九·六	一六·六
美國(登記區域)	一九二六	二〇·六	一一·二	八·四
烏拉圭	一九二六	二五·四	一〇·五	一四·九

〔註〕表中所列關於中國的統計係根據金陵大學農林科的調查。

(二) 附各國人口一歲以下之嬰孩死亡率比較表。

國名	類別	年 度	男 孩	女 孩	合 計
澳 新 達 利 亞		一九二六	六〇・六	四七・〇	五四・〇
奧 地 利		一九二六	—	—	—
比 利 時		一九二五	一〇四・四	八二・四	九三・七
英 倫 各 島		一九二六	八一・五	六三・〇	七二・四
加 拿 大		一九二六	一一二・九	九〇・〇	一〇一・八
錫 蘭		一九二六	一八〇・九	一六七・一	一七四・一
智 利		一九二六	二六二・二	二五三・二	二五七・八
中 國	(甲) 民十三十四 (乙) 民十八		—	—	(甲) 二二九・〇〇 (乙) 三〇六・〇〇
丹 麥		一九二五	九〇・五	六八・六	七九・八
英 格 蘭 與 威 爾 士		一九二六	七九・一	六〇・九	七〇・二

羅 滿 尼 亞	挪 威	北 愛 爾 蘭	新 西 蘭	和 蘭	日 本	意 大 利	愛 爾 蘭	英 屬 印 度	荷 加 利	德 國	法 國	芬 蘭
一九二五	一九二三	一九二六	一九二六	一九二六	一九二六	一九二五	一九二六	一九二五	一九二六	一九二六	一九二五	一九二六
—	五四·一	九三·七	四三·六	六八·三	一四四·四	一二五·六	八〇·九	—	—	—	九八·九	九二·七
—	四五·四	七五·四	三五·七	五三·五	一三〇·二	一一三·〇	六七·六	—	—	—	七八·六	七八·一
一九一·八	四九·八	八四·九	三九·八	六一·一	一三七·五	一一九·五	七四·四	一七四·四	一六七·五	一〇一·四	八九·〇	八五·六

塞爾非多爾	一九二六	一六三·三	一四六·五	一五五·〇
賽保羅	一九二五	—	—	一六八·〇
蘇格蘭	一九二六	九四·〇	七一·七	八三·一
西班牙	一九二六	—	—	一二五·六
瑞典	一九二六	—	—	五七·一
瑞士	一九二六	六三·〇	四九·八	五六·五
南非洲(白種)	一九二六	七〇·一	五九·三	六四·八
美國(登記區域)	一九二六	八一·一	六五·一	七三·三
烏拉圭	一九二六	九八·二	八八·一	九三·四

(註)表中所列關於中國的統計(甲)爲金陵大學農林科之鄉村調查(乙)爲立法院統計處對於金陵大學學生之家庭調查。

綜觀以上兩表,便知白種諸族的生育率,死亡率及一歲以下之嬰孩死亡率多已銳減。祇有中國,印度,錫蘭。

埃及、智利、羅滿尼亞、日本諸國仍屬甚高。這些國家大都尚不注重限制生育，所以內部的人口壓迫特別嚴重。又蘇俄在歐戰以前的生育率爲百分之四三·八，死亡率爲二七·三，嬰兒死亡率爲二五六。但一九二三年蘇俄各聯邦共和國之死亡率有減至百分之二三·一者，有減至二一·〇者，亦有減至一七·一者。而生育率則仍爲百分之三五·四乃至四二·六。因此人口增加頗速。據英國經濟專家杜步之意見：「蘇俄雖爲地廣人稀之國家，但有些地方亦已超過適中的人口密度。故蘇俄今後的人口問題當更值得研究。且人口如果繼續有加無已，則在最近之將來，或須由決定各種新經濟政策之最高經濟設計委員會設法一併限制人口。而節制生育在明日之蘇俄當成爲提高生活程度之重要確語。」（參閱 Maurice Dobb: *Russ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since the Revolution*, pp. 71, 76, 336-9.）於此可見共產主義并不能解決人口問題，並可證明馬克斯派的人口學說之毫無科學的根據也。

大致現時生育與死亡皆已減低之歐美諸邦，俟生育革命更爲普遍及公衆衛生更爲完善之後，其生育率與死亡率當分別再行減低。其結果或使「婚姻的選擇」「生育的選擇」及「死亡的選擇」皆更爲健全。一因人生標準再行提高，則男女擇配當更爲謹嚴慎重。二因生育節制愈普遍，則現有軒輊生育率當可次第免除。三因社會繼續向上進化，生活更爲安全，一切不自然的死當可減至最低。至於衛生進步所以不易妨礙自然選擇的健全行使，則因各種衛生大都祇能減少傳染疾病的死亡，而甚難減少遺傳疾病的死亡。美國生物學家霍

爾羅斯說：「我們如果將多數文明國家近數十年的死亡統計詳加研究，便可查出一種最顯明的普通事實，即各種傳染疾病之死亡率皆減少甚多，而各種基於機能根本不健全之疾病死亡率則並未若何減少。足有自然選擇並未失其效用。吾人可不必擔憂。」霍氏並謂「許多能夠直接間接傷害人類的胚種形質而危及種族健全之外因，若隨衛生進步而分別移去，則衛生運動實足補償其和緩天擇之反優生影響，且於種族前途當有益無損。一個於個人福祉最為健全的環境，安知不是同時亦於種族福祉最有裨益。蓋在此種健全的環境之下，各種低劣遺傳或更少發生，而各種優美的遺傳變化則更有增多之可能也。」（參閱 *Population Problem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Edited by J. I. Dublin, pp. 260-261, 270-272.）又美國人文生物學者雷門柏爾對於近世死亡統計之精密研究，亦與霍氏之結論大致相同。即近世文明國家雖衛生甚有進步，而自然選擇則仍然行健不息。譬如許多特種遺傳疾病的死亡率，雖在英美及巴西三個不同的環境之下，仍極為相似。又美國人口中之「先天異狀」(congenital malformations) 無論為男為女，皆多數早夭。計男子有百分之九十六以上女子有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皆未滿一歲遂相率死去。此亦為天擇繼續健全行使之有力證據云。

（參閱 Raymond Pearl: *Studies in Human Biology*, Chs. V and VII.）

### 三 生育革命應以政府為主要訓導保育機關

前面說過我們的人口政策要「後來居上」，至於究竟是「後來居上」呢？還是「後來居下」呢？則全視我們的國民與政府今後對於這個最根、本最重大的社會問題和人生問題能否充分注意，及能否用最通達最開明的態度去研究最遠大最健全的解決方法。著者以為欲解決這個最根本最重大的人口問題，除由政府迅速積極籌備清查全國戶口及制辦生命統計，使大家明瞭我國人口的各種事實真象外，並應由政府衛生機關設立人口問題專門委員會，努力去研究遺傳優生的原理實施，和生育節制的智識方法。又教育機關，科學團體以及婦女團體亦應各有研究討論的組織，以輔政府之不逮。政府應隨時召集專家討論人口問題之研究方法，及決定人口政策之施行步驟。此外並應訓練公衆衛生人才，醫學人才，與看護人才，以便從事實際衛生行政，優生行政，接生保育，與節育訓導等工作。務使將來全國地方自治完成之時，雖最小自治單位亦有公衆設立的「保育院」以為保護產婦嬰孩之場所，並為節育知識之訓導機關。凡產育頻仍或不應有生育之婦女，以及其他需要節育知識之已婚男女或將婚男女，均得聲請公立保育院之負責醫生或看護士授以應有之知識。又依法應行絕育之太不健全分子，亦應分別施行絕育手術。凡此種種設施均應由政府機關負責舉辦，遂較完善。所有辦理衛生行政優生行政以及節育指導之醫務人員，對於數量方面與品質方面的人口理則，均應充分了解，方能勝任愉快。

我們相信在這種政府衛生機關的指導之下，我們全國將來的生育革命當較歐美多數的國家尤為健全。而歐美現時節育運動的種種流弊如軒輊生育率 (differential birth-rate) 如人為的墮胎 (induced

abortions) 等皆可免除。歐美軒軀生生育率之害，本書已反覆言及。薩英人赫崙 (D. Heon) 及包威士 (O. A. Powys) 的研究均證明英國與澳斯達利亞百分之二十五的低級已婚人口竟產生了後代人口百分之五十。美國哈佛大學伊士特教授謂：「此種不良的影響，祇有教導最須節育的各階級均從事節育，作為一種公共政策，方能免除。」實屬甚有見地。(見 E. M. East, Herodity and Human Affairs, pp. 252-253) 關於歐美諸國今後的人口趨勢，據美國威士康新經濟教授列士柯希爾 (D. D. Leachler) 與加拿大士蘭多大學經濟學院院長馬克哀夫及其他許多人口學者會謂：「歐美多數國家今後的人口生育率均當更為普遍減低。蓋十九世紀之節育運動，大都限於上中等或智識階級有產階級以及城市人口，至於二十世紀的節育運動，則當次第普及於各階級及全民衆云。」(見 Population Problem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edited by L. I. Dublin, Chs. VI & XIX) 至於人為的墮胎，非特有背人道，為法律所必禁，而且種種不良的影響，但事實上則歐美墮胎之風仍極盛行，而城市又較鄉村尤為普遍。據美國羅賓生 (Dr. W. J. Robinson) 估計美國每年墮胎總數約有一百萬至三百萬之多。又據其他專家的估計每年約在五十萬至二百萬左右。又據紐約美國生育節制聯盟會研究指導部一九二五年報告：「全年曾向該部請授節育知識之一六五五婦女中大半皆承認有過人為的墮胎。其總數共為一四三四胎。計一次乃至四十次不等。其曾經墮胎四五次至十次者甚不乏人。在婦女的身體方面自然受害不淺，但祇要加以正當節育指導，則此種墮胎之事大半皆可免除云。」又據該指導部石醫生 (H. M. Stone) 報告：「大致向該部請求節育指導之

婦女可分數種：(一) 爲身心不甚健全，於生育或多育均甚屬危險之婦女。如有心病，腎病，肺病，淋症，梅毒，與盆骨太小，及有花柳病者皆屬之。(二) 夫有殘疾，肺病，花柳病，心病，或其他疾病或不良好嗜好，無供養之能力。妻雖不欲離婚，但不願在此種情形之下受孕者。(三) 婦女年逾四十五歲當天癸將終之兩三年 (the period of menopause)，月信已若斷若續，雖仍有受孕之可能，而在生理上實不宜再行養子者。據內分泌學者與心理學者皆謂在天癸將終之年所養子女，每每身心皆不健全云。(四) 婦女雖未達天癸將終之時期，但已養育過繁，心力交瘁，不堪再行受孕或再有生育者。(五) 自營生活之新婚夫婦，夫的進款尚不充裕，不便早有子女；而妻亦願繼續原有工作任务，欲再越一二年始養子女者。或夫婦有一人或二人仍在校肄業，欲完成學業始行養子，但願先行結婚者。其實青年男女成婚之後，願遲一二年始行養子，乃屬人之常情，故除非兩造均願早養子女，理應避免受孕。凡此種種情形皆有傳授節育知識之必要。無論從淑種方面社會方面或夫婦子女之健康幸福方面着想，皆有極充分之理由云。(參閱 Norman Haire, Some More Medical Views on Birth Control, pp. 221-239)

現時對於生育節制最爲公開而成績亦最爲優良之國家當首推歐洲的荷蘭。據從專節育指導四五十年之荷蘭著名女醫士賈可布士 (Alta Jacobs) 說道：「當一八七九年之時，余爲荷蘭首都最早行醫的第一個女醫生，未幾遂與勞動階級之貧窮婦女接近。感覺彼等需要個人衛生及保護小孩各種常識甚亟。未幾並感覺欲減除勞動階級的個人苦痛及增進入羣社會的一般幸福，其最良善而最迅速之方法，莫如使不願再行多

生小孩，及爲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計，皆不宜再養小孩之人，均能得着最無妨害而最爲可貴之節育知識。余當初傳授節育知識，傳爲防止疾病，滅除個人苦痛，及防免於家庭社會均感不之便多處。孰知節育知識之廣播更有增進公衆幸福，兩性道德，扶助女子之經濟獨立，和其他種種利益。迄今將近五十年，許多曾經領授節育知識之人，其子女現已長成，且各自有其家庭。在今日節育知識甚爲普遍之荷蘭，除守舊的宗教家庭外，大家庭已屬罕見。積四十五年的經驗已證明所得的各種良好結果，皆能一一如余當初所預期。荷蘭乃大規模實行科學的生育節制的第一個國家。現在不僅當階級的生育率業已減低，即各階級的生育率均已減低。同時全國的死亡率亦已大大減低，故生育雖減而人口數量則並未消滅。譬如一八七〇年至一八八〇年間之生育率爲千分之三六·二，死亡率率爲千分之二四·三，故人口增加率爲千分之一·九。至於一九二五年之生育率則爲千分之二四·二，死亡率僅爲千分之九·八，故人口增加率反爲千分之一四·四。死亡率減低之最爲顯著的成績首推四歲以下之嬰孩。在二十世紀之初年，荷蘭一歲以下之嬰孩死亡率爲千分之一六五·四，而一九二四年的嬰孩死亡率則僅爲千分之七一·六〇，即僅佔所生嬰孩百分之七有奇。同時一歲至四歲之嬰孩死亡率則由千分之一八·四二減至一一·七五，或僅爲百分之一有奇。足見畏懼民族自殺的論調實屬毫無根據。其實荷蘭現時仍嫌人口增加太快，和其他世界多數國家一樣。祇望將死亡率減到最低的可能點之時，而生育率則再行減低，人口方有漸趨靜止之希望，免致因人口過庶危及國家之安全。凡善於觀察者無偏見之人，均必承認荷蘭爲歐洲現時民族最健康與民德最高厚的一個國家。荷蘭現已無公娼，無妓館，花柳病較少，私生子率

亦甚低，而婦女在法律上及社會上的地位亦高於許多國家的婦女。故生育節制在各國家及各階級均應日趨普遍，不僅爲醫學上的種種理由，且爲促進國際平和，改良人類種族，增進家庭幸福，鞏固國家安寧，及提高婦女地位之要素。惟節育方法之指導應由男女醫生最適當。云。（N. Haire, Same More Medical Views on Birth Control, pp. 173—190）

總之，我國將來的生育革命應視爲實現三民主義的一部份最要根本工作。中山先生的民生主義保注重節重節制資本，平均地權，以預防財富分配的種種不均，而增進一般人民的幸福樂利。本書所發抒的人口政策則注重節制生育，平均人權，以預防軒輊生育率之不良影響，而調劑我國人口的過庶。實與中山先生民生主義用完全相同。故主張應由政府衛生機關及公衆產育院負指導節育之責。而不應完全聽由室家夫婦自己去尋求節育方法，免使一般醫生藥房隨意蔽詐，視爲利藪，反致最須節育的室家夫婦無從問津。又現時通都大邑新法墮胎之事，已時有所聞，逐漸成爲智識階級富裕階級以及浪漫婦女獨享之特殊權利，弊害滋多，甚非種族前途之福。理想的節育方法應備具幾個條件：一須不悖人道，二須不傷身體，三須普遍適用，四須無由濫用。關於節育方法現時雖醫學專家亦意見尚不一致。惟科學進步既日新月異，早遲必能得到適合以上數項條件的節育方法。據美國社會學者洛士登言：「現時各處的試驗室正從事節育方法的研究，大致爲時未久，必能得到絕對不傷害婦女身體，而與服傷風頭痛藥片一樣單簡的暫時避孕方法。」（見 E. A. Ross: Standing Room Only? p. 209）英國人口學者卡爾桑德爾斯則謂：「關於限制人口的方法最好能够有一致的意見。人類不

但要決定應將人口限制到若何程度，並且要知道如何去限制人口。」在卡氏個人似注重自然的節育方法，而視人為的節育方法為末策。但同時亦聲明此事應由各人自己去選擇良好方法，不必強同。（見 A. M. Carr Baunders, The Population Problem, p. 316）著者亦以為自然的節育方法最能適合上列四項理想條件，和奧羅先生的理想條件。此種方法大都應由男子負較大的責任，而且「惠而不費。」夫婦既可互享圓滿的伉儷生活，同時為男子者復可留下精神，多為社會人羣造福。舉凡大丈夫真男子均能見大處遠處各自寶貴其妻室，限制其子女，并使國家種族的共同幸福更有保障也。關於此種方法，如英國的愛理士（H. Ellis）蓋爾（J. P. Gair）美國的朗大夫（H. W. Long）及山格夫人（M. Sanger）等皆有專著詳細說明，可供參考。又英國第二生產率委員會宣言：「理想的節育方法莫如自己節制，」殆即為此而發。其實此種方法，祇要粗知「愛的藝術」，則林林總總，皆易行之。據英國赫爾醫生（Norman Haire）訪查英國、美國、加拿大、德國、荷蘭、比利時、法國、意大利、奧地利、南非洲，及奧期大利亞人民節育實況的結果認為最大多數的家庭皆實行生育節制，而且亦以不用機械的方法為最普通云。要之理想的節育方法，似應注重生理上的研究發明，而不應注重物質上的研究發明，然後更能普遍適應室家夫婦的真正需要也。

至於產婦與嬰孩之保育問題亦甚有研究的價值。我們不主張任聽民人「自生自養」，但亦不主張完全「兒童公育」。著者以為所有產育院均應由公家設立并由政府衛生機關訓練合格醫務人員及看護人員辦理接生保育事務。惟生母仍須親自授乳遠較妥善。生母親自授乳實有種種的利益，「可減少嬰兒之死亡，」可

刺激良母對於兒童之愛感。三可使養子較稀。因為有些婦女在授乳期內往往月經停止，比較不易受孕也。我國婦女多自行授乳，此種天生本能和良好習慣，宜予保存。惟授乳期間不宜太長，最多以十個月乃至十二個月為限。授乳太久，於母子兩方皆有損無益。又嬰孩死亡率常與「貧窮」「愚昧」二者成正比。是以一個家庭或一個國家社會皆應努力去去掉一個「貧」字和一個「昧」字。免致嬰兒夭折頻仍，為母者時常斷乳，時常受孕。大致嬰孩死亡率愈速，則受孕亦愈速。既倍極勞瘁，復增多感傷。據愛理士云：「人工授乳之嬰孩死亡率較乳房授乳之嬰孩死亡率約高三倍。而乳母授乳之嬰孩死亡率則較生母授乳之嬰孩死亡率約多二倍。」足見為嬰孩健康和減少生育計，均以生母親自授乳（除非生母實在無授的能力）為最佳。

至於無條件的「兒童公育」，流弊滋多，易使為母者放棄哺育兒童之天職，并使下等婦女得以隨時獻身於任何男子，一旦有身，遂向國家母職部報告。其實彼等帶着梅毒或其他疾病，未必有做「公育院」乳母之資格。徒增殖一些不倫不類之劣陋分子。聞歐戰時候，德國政府所辦「兒童公育所」的成績就是很壞很壞。英國人口學者柯克期曾痛言其弊，不可不慎。易家越先生主張「婦女在就梅一月前入共產院，一月後遂出共產院。」「嬰兒生出到三歲均入兒童公育院，由好乳母供給充足的乳汁。」著者以為此種辦法，窒礙甚多，未見其可。如果生母一個月後遂不自行授乳。試問那有這樣多的「好乳母」來供給「充足的乳汁」呢？并且做乳母的那有生母這樣心痛兒女呢？其結果不過使小孩子受罪，及增多嬰孩死亡。何況為婦女的如果世世代代均毋庸親自授乳，則將來的婦女，恐因此逐漸喪失其授乳的本能，亦未可知。種族必從此退化無疑。陳東原先生主張

「從小孩子生下來一直到不吃奶的時候，母親應離開她們的職業，到公育院去專作母親。」雖屬較近情理。惟管見以爲兒童公育一時殊難到。且現代的經濟及社會情形之下，一般蒙昧無知的婦女均必相率早婚繁育，爭先恐後，同到公育院去「專做母親。」即隨時添設公育院也是來不及的。鄙人以爲更屬妥善的辦法，應由國家及地方衛生機關設立最完備的產育院。凡孕婦均須向產育院報告，由公家醫生代爲診查。將分娩之前一月送入產育院，分娩一個月後出院，將嬰兒攜回自養。在住院兩個月期內概不收費。惟婦女在外作工時間，如欲將嬰孩寄託產育院代爲照料，亦可聽之。作工完備之後，仍須領回。至於每個已婚女子所養小孩數目均應有限制。由產科醫生看護士教以無害而有效的節育方法。太不健全的男女均應施行「絕育手術。」如此則「兒童公育」的流弊與夫「自生自養」的流弊均可免除矣。

## 第十二章 結論

### 一 生育革命與種族前途

有些人或以爲我們國人採用了本書所主張的人口政策和生育革命，我們的人口一定會消滅，我們的民族終久必會滅亡，實則不然。須知一國人口增加的遲速全視生育率和死亡率相差的大小如何。我們因生育率減低之結果，大家更有機會注重公衆衛生，家庭衛生，個人衛生和嬰孩衛生。并努力去掉社會的各種紛擾，各種愚昧，各種貧窮，各種黑暗，各種疾病，各種迷信，各種罪惡，和各種亂源。使死亡率亦大大減低，則人口并不減少。不過爲大家減除一筆最大的無謂消耗損失和無謂苦痛犧牲罷了。比方說，我們的生育率如能減去一半或一小半，同時我們的死亡率亦減去一半或一小半。則人口的自然增加率並無若何變更。譬如英國一九一四年之人口生育率爲千分之二四，死亡率爲千分之一四，自然增加率爲千分之十。又英領印度同年之生育率爲千分之四十，死亡率則爲千分之三十，故自然增加率亦爲千分之十。那年印度的人口約爲二三五，〇〇〇，〇〇〇。假定印度當時的生育率和死亡率能減至與英國相等，即減去千分之一六。則印度的自增加率仍爲千分之十。然而即可少生三百七十六萬人和少死三百七十六萬人。這是何等經濟，何等健全哩！足見印度是每年白白糟蹋三

四百萬的生命，並且耗費許多的精力財力。種族元氣必然因之大減。我們現在的中國也是一樣。按照民國十三十四兩年金陵大學農林科卜凱和喬啓明兩教授調查安徽、河南、江蘇、山西等省農戶四二一六家共計二二一六九人之結果，計得每千人中之生育率爲四二·二，死亡率爲二七·九，自然增加率爲一四·三。而歐洲體育運動最有成績的荷蘭在一九二五年之生育率則爲二四·二，死亡率爲九·八，自然增加率爲一四·四。即中國人每年每千人中要比荷蘭多生一八·〇人，同時每千人中要多死一八·一人，所以自然增加率還比荷蘭稍低。若照此推算，則全國四萬七千萬的人口每年要多生八百四十六萬人，同時要多死八百五十萬零七千人。而實在增加的人口，則爲六百七十二萬一一人。假定中國的生育率與死亡率能夠減到同荷蘭一樣低，則實在加的人口當爲六百七十六萬八千人，但每年便可少生八百四十六萬人和少死八百五十萬零七千人。我們想想我們每年如能少去這一大筆的虛糜，爲家室夫婦及國家種族，節省了多少的精神元氣，多少的痛苦悲傷，多少的金錢財產，多少的禍患災難呢？所以我們民族現在最不經濟而最傷元氣的事情，莫過於高生育率和高死亡率了！這些每年多生的人和多死的人，如果排列成兩條平行的直線，假定每人佔立一尺半的位置，則兩條直線約各長一百二十七萬丈，或七千零八里有奇。恐怕比萬里長城還要長些！可見我們國人每年因高生育率所召高死亡率的消耗損失，是再大沒有了！我們全國的婦女如何去得着母性自由和真正解放呢？我們的國家元氣，種族元氣，和社會元氣，安得不斷喪無餘呢？我們如果照此類推，則中國近五十年因高生育率和高死亡率所糟蹋的人命祇按人口三萬五千萬平均計算，依照上述的排方法可以排成二十六七萬里這樣長的直線，能夠圍

繞地球赤道數週了！假使每年多生一個人和多死一個人所耗的精力錢財共值一百元，則每年應耗無謂的金錢六萬萬至八萬萬元。五十年的無謂消耗共為三四百萬萬元，即等於全國現有國富百分之八十乃至一倍。設若沒有這種無謂的消耗，則我們近五十年內的國富，差不多可以增加一倍了！試問反對生育節制的人們對於我們國家民族每年這樣大的無形損失，想到沒有呢？我們祇要每年拿這筆無謂的大損失之一部份來普及教育，振興實業，和訓練海陸軍，則我們早已造到世界頭等國家的地位了！而且我們這個辦法並不會使中國人口如何減少，這是何等經濟，何等健全呢！

我們要知道高生育率和高死亡率是如影隨形。所以生育率減低的國家，死亡率大都同時減低，這是差不多成了人口學上的公例了。譬如美國的家庭自一七九〇年至一九二〇年之間，平均每戶的人數曾由五·七人減至四·三人，即每十年約每月減少十分之一人。但美國的人口增加仍極健全，近年且從嚴取締移民入境，以增進勞工幸福及維持一般人民的健康生活，并無人口消滅之憂，反面國勢蒸蒸日上。且美國大多數的人口學者皆主張等到人口增加到一萬五千萬或最多增加到一萬六七千萬之後即不應再有增加。否則無論從天然富源方面，勞力供給方面或其他種種方面着想，皆無法維持全國人民的最高生活標準。所以美國人民將來的生育率當更為普遍減低，乃必然之趨勢。又據英國前任生產死亡登記局局長馬來特爵士 (Sir Bernard Malin) 一九一七年就皇家統計學會會長的時候，就說道：「法國當一九〇六年至一九一三年之間生育率低落百分之十七，嬰兒死亡率低落百分之十八。同時英格蘭與威爾士生育率低落至百分之十一，嬰兒死亡率

低落至百分之十八。丹麥生育率低落至百分之十一，嬰孩死亡率低落至百分之十四。挪威生育率低落至百分之五，嬰孩死亡率低落至百分之六。瑞典生育率低落至百分之十，嬰孩死亡率則低落至百分之十三。這都是表示一國若能減低生育率，便可以救得大批嬰孩的生命。反之，一國糟蹋無數嬰孩的生命，都是濫生小孩的直接結果。並且把許多青年或中年婦女的生命也一齊斷送了！柯克斯說得好：「任何人口的總額增加到很大的時候，其增加率必定要低落。這是人口數學上必然的法則。我們最應注意的是要看這種增加率的低落，是由於增加死亡率，或由於減少生育率。因為無論何國早遲總要在低生育率和高死亡率二者之中選擇其一。大凡能夠高瞻遠矚見識遠大的人都贊成減低生育率的方法，祇有中國印度還用高死亡率的方法哩！」所以我們認為減低生育不但是全國婦女最大的解放，並且是全國男子最大的解放，也就是我們中國民族最大的解放。

樂觀派的學者如楊效春先生一面主張「把女子結婚年齡定為十七歲」，一面復主張「全國的貧苦兒童都應由公衆代為養育並供給衣食」，同時楊先生又不許我們提倡「生育節制」；吾想在這種保育政策之下，全國的貧民必一致努力早婚多產，添子益孫，恆河沙數的貧苦兒童逐日添造起來。縱將全國屬於中山先生所謂「小貧」階級的家庭通通改作「大貧」階級的養育院，都還不夠。這樣的「大中華貧兒國」恐怕不見得更適於生存罷！楊先生既徵求「大家嚴密的指正」，著者不得不貢獻數語，以與楊先生商榷。鄙意一切救貧政策和救貧方法，總要能夠「止貧」和能夠「防貧」。不然，「舊貧」去了，「新貧」又來，「貧去」「貧來」終究還是一個「貧」。猶如一國的人民不講體育衛生，不講防病療病方法，專講由「公家施捨棺木」施來施

去，死亡率並不減低。或不謀善生善養善教，專重「嚴刑峻法，不教而殺。」殺來殺去，罪惡並不減少。因為這些方法都是消極的而非積極的，是治標的並非治本的。根本的救貧方法，一方面固然要改良生計，普及教育。一方面也要傳播節育福音，使貧民知道「量入爲出。」如果能力不夠，就不要隨便生小孩子。實於身家社會均有裨益。總之，小孩子來得太快，母親的精力就會耗竭，父親的進款或社會的進款就會空虛，貧窮疾病和高死亡率就會接踵而至。這種社會的人口，就會如韋爾士所開：「百分之九十九的人口皆從幼到老斤斤以糊口爲唯一事業。從事一種如螻蛄覓食一班的生活。並且靠着無可逃避的天災人禍來維持一種土地與人口的均衡。這樣的國家種族，自難有進步之可言。」這些險惡的結果，是絲毫不爽的。楊先生既爲鄉村教育的導師並且是一個經濟學者，我們要請楊先生擔任一部份提倡生育革命的責任纔好哩。

楊先生說「生育限制」是「因噎廢食」的主張。著者則以爲「相當的生育限制」是「飲食有節」的主張。要大家「不要兒女」，纔是「因噎廢食」的主張。他人有無「不要兒女」的主張，著者不得而知。如有其事，著者亦願對楊先生「毫不客氣，加以辯駁。」鄙意「不要兒女」和「獨身主義」是一樣的，不近情理，一樣的對於種族前途放棄一種最高天賦。一國的聖賢豪傑，和一切善男善女，如果放棄了這個最高天賦，尤使種族遭受莫大的損失。如同他們或她們都在疆場上戰死了一樣。現時社會之中已有一部份的優秀健全的青年男女，「未嘗不欲擇配，又惡不由其道。」所以大家還要努力改革俗制，改進社會，提倡各種高尚的娛樂和健全的社交，使青年男女更有自由擇配的良好機會，免使國家種族遭受一種無形損失。又自由結婚的國家，其結婚

率之高低恆與經濟狀況之良窳成正比例。所以經濟的改造尤萬不可少。經濟生活愈優美，人民亦更願結婚傳後。男女擇配既比較容易，而且結婚之後亦更能建造良好的家庭。又男女社交應充分自由，但同時總要高尙純潔，各有分際，而不流爲浪漫淫蕩。正當的婚姻和良好的家庭方能增多。否則必比照減少。蓋男子過於浪漫，女子必視婚姻爲畏途。反之，女子如果過於浪漫，男子亦難視爲意中良伴也。浪漫的生活即成婚之後，亦罕有良好結果。所以男女都要有高尙的道德，並且兩性之間都要有同樣的道德標準，不許有兩樣的道德標準；兩性的擇配自由和種族的根本健全，始有保障。然後社會之中，所有健全分子皆能求得佳偶良緣，共成良好眷屬。俗諺說得好：「種蓮子，開荷花。種好子，結大瓜，不種子，沒有他。」所以我們決非喪心病狂，主張因噎廢食，不要種子。我們是主張要種好子，纔能結大瓜。並且選得好種子，還要種得不太密，纔能真正結大瓜。

從前美國羅斯福總統曾說道：「一國的健全男子都應有當兵的義務，健全的女子都應有養子的義務。然後國家種族得以永遠生存發達，弗替弗衰。」所以當兵爲男子最高天職之一，養子則爲女子最高天職之一。人類一日未到世界大同，男子一日不能不當兵。人類一日未到地球末日，女子一日不能不養子。且男子終究還有不必當兵的一天，男子不當兵的一天就是世界的人口問題完全有了解決辦法的那一天，女子則永遠沒有不必養子的一天。所以婦女養子的責任，可以說是「悠久無疆」，與人類相終始。這個責任既是「天長地久」，最重要而最神聖。我們就要盡量設法減除婦女一切無謂的痛苦犧牲，使她們都能得着最大的安慰，享受最高的幸福。美國社會學家洛士曾說道：「每添一個子女必添兩種消費，一種是生理上的消費，一種是經濟上的消費，

經濟上的消費得由父母共同負擔，生理上的耗費則祇能由母親獨擔。所以要有生育節制才有婦女解放。」英國人口學家柯克斯也說：「婦女的格外重視，當遠過於男子。因為婦女必須嘗試懷孕的麻煩，與生產的危險。」我們國人前此都把婦女當作養子的機器看待。子女多寡，為賢妻良母的差不多毫無發言權。婦女在種種不良俗制壓迫之下，從未享受過完全的生活。此我民族所以不昌！我們主張相當的生育節制，不過使全人類的婦女在她們天長地久的養子期間，或各個婦女在她們一生一世的養子期間，多放幾天優待假，多有幾天休息，使她們更有自由的機會，去發展自己的能力天才。然後她們所養的子女，也更為英俊高貴，更為優強健壯，更為聰穎活潑，更為美滿完全。並可得着完善的母教。而為未來的良好國民。然後可以引領文化，承繼地球，延及苗裔，傳之無窮。老子說得好：「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復守其母。沒身不殆。」又云：「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又說：「多言數窮，不如守中。」是以名利要知足，養兒也要知足。男子當兵要有休養，慈母養子也要有休養。兵士要改良待遇，慈母也要改良待遇。何況為慈母的既同時為丈夫愛的中心，凡能愛妻如己愛妻逾己的人們，尤非「既知其子，復守其母」不可。理想的圓滿家庭，自然是要「三位一體」。有了聖父聖母，還要有聖子聖女，然後聖父聖母優美的「胚種形質」方有所寄託。我們提倡生育節制，不過是希望大家情長兒女，寶貴兒女。不要狗狗兒女，糟塌兒女。并不是希望大家不要兒女。一切生物界中都有兩條大定律：一為種族的自衛。一為種族的繁衍。人類既爲生物之一種，亦不能違此定律。人類種族自衛的責任，大半由男子擔任之。而繁衍的責任，則大半由女子任之。種族的自衛愈嚴密，繁衍的機會愈多。反之，種族的繁衍愈健全，種族自衛的

力量亦愈大。所以一面要設法增大種族自衛的力量。一面也要改良婚姻，改良遺傳，改良生育，以謀族種的根本健全。然後我們的國家民族可躋於世界最先進國家和最優強種族之林。然後國以永利，民以永福。『室家無離曠之思，千歲無戰鬪之患。』

## 一一 達到大同世界必經之階段與必由之正路

大凡一個國家民族在世界上和別的國家民族人與人比，國力與國力比，文化與文化比，如果樣樣不及別人，一旦與他族接觸，總歸要失敗的。現在歐美日本諸民族皆強，我們民族「苟不盡力，子孫將弱。」所以我們總要大大努力「轉弱為強，」「轉危為安，」「轉禍為福。」並且時常要有高瞻遠矚知己知彼的眼光，和自強不患一往無前的毅力。方能在人類進化的途程上和世界最先進和最優美的各民族一齊去賽跑。我們對於國家種族和世界文化，人人都負有最大的使命，和最高的天職。著者時常懸想我們中國的民族將來必能與白種諸族為「運理之枝頭，」作「後彫之松柏。」所以我們總不要却步不前，自暴自棄。我們現在既然這樣落後。我們就要本着我們的大仁大智大勇，迎頭趕上去。我們最大的目標，是教中國以教人類，教中國以救世界。教中國民族以救世界民族。我們改進中國民族亦即改進世界民族。我們提高中國文化，亦即提高世界文化。孔子說：「君子居下流。」我們可以說：「一個國家民族更要居下流。」所以我們總要疾惡如仇，當仁不讓，努力向前，至誠向上，「明德新民，止於至善。」「修齊治平，一以貫之。」我們人人都要有強有力的志願，然後可

以進化無盡期。我們人人都要有強有力的志願，然後我們國家民族可以得救。著者十餘年前曾言及：「中國有四大憂患：曰私，曰昧，曰貧，曰弱。中國有四大要需：曰公，曰明，曰富，曰強。我輩能除掉此四大憂患，培植此四大要需，則中國必興。」現在此四大憂患仍未若何減輕。此四大要需還是異常缺乏。是以欲建設三民主義的新國家，欲完全解決中國的人口問題和其他各種問題。都全靠大家努力去除掉此四大憂患，去培植此四大要需。才能够完成三民主義，教育革命，物質革命，和生育革命，才能够提高人生的標準，人格的標準，和人種的標準，和真善美的標準。我們要造到「大道之行天下爲公」才謂之公，我們要造到人人「克明峻德」才謂之善，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才謂之明，我們要造到人人皆「以財發身，不以身發財」才謂之富，我們要造到人人皆「日新又新，自強不息」才謂之強。我們要先造到這種境界，才能本此基礎，本此精神，去促進世界的統一和人類的大同！中山先生說：「中國四萬萬人要能先治其國，再去談世界主義，乃有實際！」實在是大家很好的教訓。

我們今後自然不必再去提倡好勇鬪狠，推亡獨霸，及率獸食人的「帝國主義」，以增多人類的殺機和國際的暴行。但是我們也不要首先放棄我們民族自求生存進化所相依爲命的民族主義，去學無祖國的猶太人作國際間的流寇，去煽惑民族自殺的「階級戰爭」，以自速國家種族的斬絕滅亡。我們相信「帝國主義」和「階級戰爭」是現在全世界人類的兩個大仇敵，兩個大盜賊，兩個搗亂分子。所以我們很希望全國的同胞，都不要爲這兩種暴力主義所誘惑所屈服。就是做過牠們傀儡和受過牠們欺騙的人們，也要及早覺悟，及早懺悔。

及早回頭。因爲「薰蕕不同器而藏，堯桀不共國而治。」「善勝惡者昌，惡勝善者滅。」所以總望大家善於選擇，毋入迷途纔好哩！我們深信在這兩種「國際間的暴力」與「階級間的暴力」之間，有一條能够拯救我們國家民族的光明道路。有一條能够達到世界和平的終南捷徑。這條光明道路，這條終南捷徑，就是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和孔老先生的「大同主義」。我們深信這條「由三民主義以進於大同主義」的光明道路，纔是將來世界人類進化所必由之「禮門義路」。這條光明道路，這條「禮門義路」，是我們民族對於全世界人類的特殊貢獻。這個特殊貢獻纔是今後「世界的光」。孔子說：「誰能出不由戶，何莫斯道也。」孟子說：「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弗由，哀哉！」所以中國今後的唯一希望，就是我們大家「同走正路」。「共由斯道」。世界今後的唯一希望，也是要靠全人類「同走正路」。「共由斯道」。我們祇要考察歐美現時最先知最先覺最超然最偉大的社會思想家所揭示的各種主張，就知道他們也是與我們中山先生和孔老先生的主張不約而同的。所以我們深信我們民族的真精神和真文化尙未瀕於破產。我們親愛的國人祇要大家振起國魂，發揮而光大之，並輔以歐美文化之所長，必定能够創造一種最爲高美的文化。創造一種基於愛心、道心、公心，而不基於殺念、惡念、邪念的文化。必定能夠創造一種中山先生所謂「後來居上」的文化。和孔老先生所謂「有志未逮」的文化。所以我們人人都要本着我們的大好身手，大好精神，大好模範，大大的前進。上進。大大的奮鬥到底。大大的促成厥功。這就是我們全國的親愛男女同胞所應隨時戒懼警惕，所應朝夕奮發努力，無論最快樂的時候，或最沉痛的時候，都要念念不忘的。同時我們對於生育革命也要充分注意。才

能使國民全體乃至世界無類共存共榮，並育而不相害。世界的和平與文化的演進才有真正的保障。

我們今後的革命領袖，國民領袖，無論男的女的，文的武的，尤其是要大家能識大體，能顧大局，能夠努力同心，和衷共濟，能夠高瞻遠矚，知往知來；能夠扶危定傾，撥亂反正；能夠有猷有為，遺大投艱。領袖的責任和事業是要「拯斯人於塗炭，為萬世開太平」。所以務須把革命的題目認得萬分清楚，不要把「天下為公」的「為」誤作「楊子為我」的「為」，把「天下為公」的「公」誤作「三五諸公」的「公」。則一切問題均可迎刃而解。革命前途，繼能大放光明。大家纔能夠對得住革命歷史上的先烈忠魂和先覺導師於地下！我們要在這種可親可近可愛可敬的領袖指導之下，我們中國的民族纔能夠真正得救！我們青天白白，美玉無瑕，至聖至神，永表東亞的新烏托邦纔能夠安穩健全的產生出來！我們全國人民纔能永享更為高尚文明，更為豐富康強，更為公正純善，更為親愛自由，更為完全美滿，更為光榮神聖的共同生活和個人生活。我們未來如茶如錦的新烏托邦，就是我們全民共有的新天國，也就是我們由「中國一人」以達到「天下一家」所必由之正路！

## 附參考書籍及論文要目

### (一) 參考書籍

- 總理全集  
孫中山先生遺教  
中山全集  
三民主義的連環性  
唯物史觀與倫理之研究  
孫文主義之哲學的基礎  
日本論  
中山先生思想概要  
三民主義概論  
三民主義在中國文化上的根據  
朱執信集  
吳稚暉先生全集
- 胡展堂編  
黃昌穀編校  
孫文學說研究社印行  
胡展堂著  
同 前  
戴逸陶著  
同 前  
新覺編  
楊幼炯著  
王治心編著  
建設社編輯  
羣衆圖書公司出版

中國國民革命軍

梁啟超

德國文學

陸氏定著

日記集

如也著

A. M. Carr-Saunders: *The Population Problem*, Oxford, 1922.

T. N. Carver & H. W. Lester: *This Economic World—and How It may be Improved*, New

York, 1928.

Harold Cox: *Population Problem*, London, 1928.

Louis I. Dublin and others: *Population Problem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Boston &

New York, 1928.

Edward M. East: *Heredity and Human Affairs*, New York, 1927.

Edward M. East: *Mankind at the Crossroads*, New York, 1928.

Havelock Ellis: *Studies in the Psychology of Sex*, Philadelphia, 1910.

J. P. Gair: *The Control of Motherhood*, London.

F. H. Giddings: *The Principles of Sociology*, New York.

Norman Haire: *Some More Medical Views on Birth Control*, London, 1928.

在倫敦倫敦大學印刷

1928年11月

- F. H. Hawkins: *The Racial Basis of Civilization*, New York, 1928.
- S. J. Holmes: *Studies in Evolution and Eugenics*, New York, 1928.
- S. J. Holmes: *The Trend of the Race*, New York
- E. Huntington: *The Character of Races*, New York, 1924.
- G. H. Knibbs: *The Mathematical Theory of Population*, Australia, 1922.
- H. W. Long: *Sane Sex Life and Sane Sex Living*, Boston.
- O. W. Mergold: *Sex Freedom and Social Control*, New York.
- A. Newsholme: *The Elements of Vital Statistics*, New York.
- Raymond Pearl: *The Biology of Population Growth*, New York.
- Raymond Pearl: *Studies in Human Biology*, Baltimore.
- Ruth Reed: *The Modern Family*, New York, 1929.
- E. B. Rauter: *Population Problems*, New York, 1922.
- E. A. Ross: *Standing Room Only?* New York, 1927.
- John Ruskin: *Views on Social Justice*, (Edited by James Tuchs, 1926).
- Bertrand Russell: *Principles of Social Reconstruction*, London, 1916.

- Margaret Sanger: *Magnetic Methods of Birth Control*. New York.
- S. M. Shirokogoroff: *Process of Physical Growth among the Chinese*. Shanghai.
- S. M. Shirokogoroff: *Anthropology of Eastern China and Kwangtung Province*. Shanghai.
- S. M. Shirokogoroff: *Anthropology of Northern China*.
- Jessica Smith: *Woman in Soviet Russia*. New York, 1928.
- Pitirim Sorokin: *Social Mobility*. New York, 1927.
- O. C. Taylor: *Rural Sociology*. New York, 1926.
- Griffith Taylor: *Environment and Race*. Oxford, 1927.
- Tugwell, Munro & Stryker: *American Economic Life*. New York, 1925.
- H. G. Wells: *The Open Conspiracy—Blue Prints for a World Revolution*. London, 1928.
- H. G. Wells: *The Way the World is Going*. London, 1928.
- H. G. Wells: *The World of William Gladstone*. London, 1928.
- H. G. Wells: *Men Like Gods*. London, 1928.
- G. G. Whipple: *Vital Statistics*. New York.

人口問題

柯克斯原著 武培幹譯

經濟學叢書及譯文第四

三四一十六

中國民族史

王桐齡著

中國民族志

張其昀撰述

中國地理大綱

張其昀著

中國地勢變遷小史

清代通史

蕭一山著

中國政治思想綱領

王恆著

文化與政治

許仕廉著

中國婦女生活史

陳東原著

清朝全史

中華書局印行

新青年人口問題專號

(第七卷第四號)

人文生物學論叢

潘光旦著

中國之家庭問題

潘光旦著

革命與戀愛

洪瑞釗著

西洋家庭制度研究

易家鉞著

飢荒的中國

馬羅立著 吳鵬飛譯

目前中國社會的病態

歷代戶口通論

生命論

生物界之神祕

人口食糧問題

耕者要有其田

平均地權

民生主義與人口問題

平均地權初步之商榷

中國人口問題

憲首（生計百物命理天壽寺廟等篇）

農業政策

中國農業改造問題叢著

東方雜誌農民調查專號

民國十七年度賑務報告書

張振之著

黎世衡著

永井潛著 胡步蟾譯

薛德楨著

陳端木合譯

黃枯桐譯

嚴仲達著

劉寶書著

王警濤著

向紹軒著

文公直著

洪亮吉著

唐啓宇著

唐啓宇著

（第二十四卷第十六號）

附錄考書類及論文要目

中國華洋義賑救災總會叢刊  
三百三十一

世界的人種問題

產兒限制論

太平洋之將來

婦女問題十講

遺傳學

遺傳論

遺傳學

人類生命的進化著

進化概論

優生問題

遺傳與優生

生物界之神祕

內分泌論

性愛研究

女性中心論

黃新民著

安部磯雄著 李達譯

許復七譯

本間久雄著 章錫琛譯

李積新編

周建人著

英國 Watson 著 余小宋譯

G. A. Dorsey 著 錢伯涵譯

美國 Collier 著 張百良譯

王新命譯

劉雄著

薛德煒

陳燦木譯

顧壽白著

羽太銳治著 黃孤鳳譯

美國瓦特原著 夏丐尊譯

人類學

中國人口論

美國現今的經濟革命

(二) 參考論文

中國鄉村人口問題之研究

蘇湖一百零二農家之社會的及經濟的調查

自然淘汰與中華民族性

論江浙兩省人口之密度

最近中國之人口統計

東三省之直魯移民

地大物博之真相

滿洲之價值

東三省的移民問題

張伯苓先生之滿洲現狀談

中國的人口問題

陳映璜著

陳長術著

袁佛爾原著 陳長術譯

喬啟明著(金陵大學刊印)

(金陵大學農林叢刊第四十二號)

H. H. Hensford 著(新月第六第七第十等期)

潘光旦譯

竺可楨著(東方雜誌第二十三卷第一號)

陳華寅著(立法院統計月報第一卷第一期)

馮玉海譯(銀行月刊第八卷第六第七第八等號)

(經濟半月刊第二卷第十三期)

張其昀著(地理雜誌第一卷第一期)

徐柏園著(建國第十五期)

陳彬龢譯(新紀元週報第一卷第十一號)

劉光華著(新生命月刊第一卷第二號)

對於時論「中國人口問題」的總答辯

今日中國之亂源

中國之史前遺存

中國與亞洲各弱小民族的命運

三民主義的人口論

馬爾薩斯人口論與民生主義

中國人口問題

成府人口調查

中國人口的向北移殖

法人目中的中國人口

社會生活的理化基礎

地理對於人生之影響

中國第四紀人骨之發見

北方大旱及其善後之策

黃河之根本治法商榷

楊效春著（東方雜誌第二十四卷第二十二號）

藥彙著（先導第一卷第一號）

程鳳林著（東方雜誌第二十五卷第十一號）

臺蒂著（建國第三十五第三十六兩期）

李海士著（現代中國第二卷第一第二兩號）

蔡步青著（指導第二十三第二十四兩期）

桑原隲藏著（東方雜誌第二十五卷第一號）

房福安（社會學界第二卷）

一仲譯（江蘇黨聲第二十一及第二十二兩期）

A. Legendre 著（東方雜誌第二十

五卷第二十一號）

許仕廉著（社會學界第二卷）

竺可楨著（科學第七卷第八期）

翁文灝著（科學第十三卷第一期）

張其昀著（地理雜誌第二卷第三期）

李協著（科學第七卷第九期）

調政時期的人口與食糧

江南民食與西北災荒

人口調查與民族生存的關係

調政時期調查戶口之意見

定期戶口大調查之意義與方法及各國最近狀況

調政時期的統計事業

中國人口統計表

世界各國人口之研究

節制生育在中國之需要

中國青嬰所現狀之一斑

中國人之「生」和「死」

馮爾薩斯人口論

社會主義與兩性問題

創造國際以求世界和平

快救人

劉南峯著（建國第三十一及第三十二兩期）

梁敬錚著（時事月報十八年十二月第一卷第二期）

王振宇著（明日之江蘇第四期）

許崇灝著

鄭堯梓著（明日之江蘇第三第四兩期）

邵合江著（建國第一卷第二期）

（科學第五卷五期）

羅錦澄著（中央日報副刊第一〇六第一〇七等號）

張毅城著（中央日報副刊第九十五號）

汪滔著（時事月報十八年十二月第一卷第二期）

劉運籌講演（中央日報十八年八月二日）

柏忒尼作（社會科學論叢第一卷第二期）

黃普生譯（社會科學論叢第一卷第二期）

周憲文譯（新女性第三卷第十一號）

焦易堂講演（尙慕姜印佈）

人種之起源和內分泌

日本之人口

日本之人口問題

日本地理概觀

驚心動魄之日本滿蒙積極政策

意大利的人口過剩問題

英帝國殖民運動概觀

歐洲十九世紀人口變動與移民問題

新俄之疆域與人口

中國之氣候

歷史人物與地理關係

中國民族的智力

測性或生男生女研究

遺傳與文化

比較解剖學上之天演觀

介六著（東方雜誌第二十五卷第十號）

陸其芳著（地理雜誌第一卷第一期）

王勤培著（地理雜誌第一卷第二期）

王勤培譯（地理雜誌第一卷第三期）

田中義一上日皇之奏章（時事月報十八年十一月第一卷第二期）

漢鐘譯（建國第三十七期）

朱起鳳譯著（地理雜誌第一卷第二期）

梁紹文著（致力第一卷第三期）

王勤培譯（地理雜誌第一卷第一期）

沈思瑛譯（地理雜誌第一卷第三期）

丁文江著（科學第八卷第一期）

童潤之著（東方雜誌第二十六卷第三號）

李積新著（科學第八卷第七及第十兩期）

陳楨著（科學第八卷第六期）

唐燿譯（科學第十二卷第五期）

生命遺傳與天演

習得性之遺傳

人類之天演

人類之將來

人類體質與智力之遺傳

氣候變更說述要

演化學與獲得性

洪亮吉及其人口論

洪亮吉之人口論及物競論

中國近百八十餘年人口增加之徐速及今後之測劃方

法

關於中國人口問題答潘光旦先生

C. M. Ohno & J. L. Buck: The Composition and Growth of Rural Population in China. The

Chinese Economic Journal, March, 1928.

J. L. Buck: An Economic & Social Survey of 150 Farms in Yenshan County of Chihhi

夏文通譯(同前)

張孟聞著(同前)

劉恆振譯(同前)

日牟丘淺次郎著(新中國第一卷第二號)

劉叔雅譯

劉威譯(同前)

張孟聞譯(同前)

胡煥庸著(科學第十三卷第十一期)

法國 Quenot 原著(科學第十三卷第十一期)

任呈因譯

張蔭麟著(東方雜誌第二十三卷第二號)

陳長蘅著(中國人口論補遺)

陳長蘅著(東方雜誌第二十四卷第十

八期及中國人口論補遺)

陳長蘅著(現代評論第七卷第一六八期)

Published by The University of Nanking, 1928.

Chang-Heng Chen: Are there only 300,000,000 People in China? (The China Critic, Vol. II

No. 38 & 39.)

Jameson Chen: Reconstruction of the Chinese Family. (The China Critic, Vol. I, No. 7)

Warren Chen: Recent Population Statistics. (The China Critic, Vol. II, No. 16)

Edward Kwong: Over-population & Birth Control. (The China Critic, Vol. I, No. 11)

Kan Lee: Over-population and Its Remedies. (The China Critic, Vol. I, No. 8)

D. K. Iau: The Chinese Family System. (The China Critic, Vol. I, No. 17)

D. K. Iau & Chung-Ming Chen: Statistics of Farm Land in China. Reprinted from the

"Chinese Economic Journal" March, 1928.

Quantin Pan: Anthropological View on China's Troubles. (The China Critic, Vol. I, No. 8)

Quantin Pan: China and Birth Control. (The China Critic, Vol. I, No. 9)

Quantin Pan: Familism and the Optimum Family. (The China Critic, Vol. II, No. 16)

Quantin Pan: Japanese & Korean Immigration into Manchuria. (The China Critic, Vol. II,

No. 44.)

Quentin Pan: Early Chinese Colonization in Manchuria. (The China Critic, Vol. II, No. 45)  
Quentin Pan: Qualitative Aspect of Chinese Colonization in Manchuria. (The China Critic,  
Vol. II, 46.)

Quentin Pan: Recent Chinese Colonization in Manchuria. (The China Critic, Vol. II, No. 47)

W. F. Willcox: The Population of China in 1910. (Reprinted from the Journal of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 March, 1928.)

W. F. Willcox: What is the Probable Population of China Proper? (An unpublished article  
shown to the present writer by Prof. J. L. Buck.)

The following articles may be found in the "Problems of the Pacific" (Proceedings of the Second  
Conference of the 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 Honolulu, Hawaii, July 15-29, 1927)

Edited by J. B. Condliffe:—

- (1) O. E. Baker: Land Utilization in China.
- (2) Legislative Aspects of Asiatic Migration. (Prepared by International Labor Office of League  
of Nations.)
- (3) C. L. Alsberg: The Factors that Govern Population Growth.

- (4) S. Neau: *The Problem of Population and Food Supply in Japan.*  
(5) H. E. Gregory: *The Geography of the Pacific.*

### 增補參考書籍

- |   |        |
|---|--------|
| 食料與人口   | 董時進著   |
| 中國人口問題  | 許任賢著   |
| 北平郊外之鄉村聚落   | 李庚著    |
| 建國月刊第二卷第二期民衆問題專號  |        |
| 服務月刊  | 服務委員會印 |
| L. K. Tao: <i>Livelihood in Peking.</i>   |        |
| J. H. S. Boscard: <i>Problems of Social Well-Being.</i> 1927, New York.   |        |
| G. D. H. Cole: <i>The Next Ten Years in British Social and Economic Policy.</i> 1929, London.                                   |        |
| M. J. Rosenaw: <i>Preventive Medicine and Hygiene.</i> (Sect. I. Ch. VI; Sect. II. Chs. II & III; and Sect. IX) 1916, New York. |        |
| Maurice Dobb: <i>Russ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since the Revolution.</i> London, 1929.   |        |

## 增補參考論文

- 今年糧食問題的一種研究  
如何去調查人口  
人口動態調查施行預定計劃  
人口編查與政治建設之關係  
解決民食問題  
江蘇省近代式戶口大調查計劃書  
江蘇省民政廳一年來工作之總檢查  
人類之發源地  
李侯與人生  
英哉北滿  
人口問題之新觀察  
中日糧食問題的觀察  
遺傳和環境

附參考書籍及論文要目

- 張心一著（立法院統計月報第一卷第九期）  
朱景文著（立法院統計月報第一卷第八期）  
鄭堯梓著（明日之江蘇第五期）  
余天曉著（明日之江蘇第五期）  
嚴柏梁著（明日之江蘇第七期）  
鄭堯梓著（明日之江蘇第十一卷第十二兩期）  
（明內之江蘇第十二期）  
美國鄧堅博士著（地理雜誌第三卷第一期）  
呂炯譯  
朱炳海譯（地理雜誌第二卷第六期）  
抱石著（人文月刊第一卷第一期）  
陳叔兌譯（新生節第三卷第二號）  
徐方千著（東方雜誌第二十六卷第十九號）  
周建以著（同上）

如何開發東三省

南陽著（中東經濟月刊五週紀念特刊）

吉黑移民問題之研究

吳士元著（同前）

五年來世界經濟之變遷及將來之趨勢

汪桂馨著（同前）

中國糧食問題發生之原因及其解決之方法

董時進著（同前）

如何振興我國農業

黎際濤著（同前）

最近世界經濟之變遷及將來之趨勢

張格惟著（中東經濟月刊第六卷第三號）

五年來東三省經濟發展之回顧及其前途

仲銘著（同前）

由天災人禍說到移民

惠民著（同前）

對於民法親屬繼承兩編原則上應先決各要點之意見

陳長蘅（中央大學法學院季刊第一卷第二期）

Leonard S. Hsu: Population Problems in China. (Sociology and Social Research, Vol. XIII,

No. 5).

D. K. Hsu: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nd the Population Problem. (The China Critic, Vol. III,

No. 10).

Boris P. Torgashoff: Town Population in China. (The China Critic, Vol. III, No. 14).

Maxwell S. Stewart: Birth Control and Labor Movement. (The China Critic, Vol. III, No. 22).

Quantin Pan: Patrilineage and the Surname. (The China Critic, Vol. II, No. 24).



中國經濟學叢書  
三民主義與人口政策

此書作者撰圖印影究

中華民國十九年八月初版

每册定價大洋叁元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作者 陳長蘅

發行兼印者 上海黃山路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商務印書館

Chinese Economic Association Series

SAN MIN CHU I AND POPULATION  
POLICY

By

CHANG HENG CHEN

1st ed., Aug., 1930

Price : \$3.00, postage extra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All Rights Reserved

